

苏修的谎言和历史的真相

2
62

人 民 出 版 社

苏修的谎言和历史的真相

人 民 出 版 社

苏修的谎言和历史的真相

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9.25印张 186,000字

1977年12月第1版 197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1001·338 定价0.68元

目 录

苏修的谎言和历史的真相

——关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几个问题

..... 钟 铨 (1)

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

——驳苏修篡改中俄东段边界史的谎言

..... 曲瑞瑜、王慎荣、周 雷、褚靖寰 (28)

雅克萨战争是中国抗击沙俄侵略的正义战争

——驳苏修歪曲雅克萨战争性质的谬论

..... 群 哲 (48)

涅维尔斯科依——十九世纪中叶

沙俄侵略黑龙江地区的急先锋

..... 志力 钟铨 (69)

中俄《璦琿条约》与苏修霸权逻辑..... 钟 铨 (93)

柳条边的历史和苏修的谬论..... 纪 实 (126)

谎言改变不了历史

——驳苏修篡改我国准噶尔部历史的无耻澜言

..... 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 (142)

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部叛乱

与抵御沙俄侵略的斗争..... 庆 思 (167)

沙俄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早期侵略……………希 达 (189)

老沙皇侵略我国西藏的罪行是掩盖不住的

……………李绍明 (213)

沙俄的侵华工具——俄国东正教布道团……………方 秀 (241)

霸权主义的“杰作”

——评莫斯科出版的《中国近代史》

…………… 吴寅年 (258)

无耻的背叛

——斥齐赫文斯基之流对义和团运动的诽谤

…………… 石 岚 (283)

的第一个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条约”，^① 强调这个条约是“对俄国有利的条约”，^② 指出“《尼布楚条约》的订立，实质上是莫斯科外交的极其重大的胜利。”^③ 就连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等人一九六一年主编的《外交辞典》，也强调中俄尼布楚谈判是“正式的平等的谈判”，“该约巩固并扩大了两个邻国人民的和睦关系。”^④ 这些论断，大体上符合历史事实。

现在，苏修出于它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竟一反前言，大肆攻击、歪曲《尼布楚条约》，根本否定它的法律效力，胡诌什么《尼布楚条约》签订前中国对俄国进行了掠夺战争，这个条约是俄国被迫签订的割地条约。^⑤ 苏修如此歪曲《尼布楚条约》，其险恶的用心，不过

① 谢宾科夫：《十七世纪俄中关系》，一九六〇年莫斯科版，第二〇八页。

② 沙斯京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一九五八年莫斯科版，第一六一页。又卡芬格乌斯《彼得一世时期的俄国对外政策》一书也指出：《尼布楚条约》是“对于俄国有利的。”见该书一九四二年莫斯科版，第五页。

③ 波爵姆金主编：《外交史》，第一卷，一九四一年莫斯科版，第二三一页。

④ 《外交辞典》，第二卷，一九六一年莫斯科版，第四〇三——四〇四页。

⑤ 麦利霍夫：《十七世纪满洲人在东北》，一九七四年莫斯科版；麦利霍夫：《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清朝中国对黑龙江流域和中央亚细亚的扩张》，载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七期；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二卷，一九七二年莫斯科版；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一九七二年莫斯科版；纳罗奇尼茨基、斯拉德科夫斯基等：《远东国际关系》，一九七三年莫斯科版；别斯克罗夫内、齐赫文斯基、赫沃斯托夫：《论俄中边界形成史》，载苏联《国际生活》杂志，一九七二年第六期；等等。

是为了把鸦片战争后沙俄强加给中国的《璦琿条约》和《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说成是平等的，把沙俄通过上述不平等条约侵吞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大片中国领土说成是“部分地收回了”清朝通过《尼布楚条约》“从俄国夺去的领土”，为苏修向中国提出新的领土要求制造舆论根据。人们不禁要问：《尼布楚条约》订立前中国和沙皇俄国究竟是谁侵略谁？这个《条约》的性质到底是什么？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揭露苏修伪造历史、充当殖民主义辩护士的丑恶嘴脸，我们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回答。

一、是中国侵略沙俄，还是沙俄侵略中国？

苏修歪曲《尼布楚条约》一个重要手法，就是捏造《条约》签订前的历史背景，把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说成“自古以来就是俄国的领土”，是俄国人首先“开发”的“新土地”，把中国军民反抗沙俄入侵的斗争诬蔑为“掠夺战争和侵略行为”。这完全是混淆黑白。

历史事实表明，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劳动、生息、繁殖的地方。至晚到八世纪上半期，在俄罗斯人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七百多年以前，中国唐朝政府就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建立了行政管辖机构。其后中国辽、金、元、明历朝政府继续在这一地区设

官治民，实行有效的管辖。

十六世纪末，明朝地方官员女真族人努尔哈赤崛起东北，逐渐把明朝的东北疆土置于自己的统治下。他先后统一了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并开始统一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经过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皇太极两代，到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末，西起贝加尔湖，北到外兴安岭，南至日本海，东达鄂霍次克海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纳入了清的版图。分布在这一地区的明朝臣民蒙古、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奇勒尔、赫哲、费雅喀、恰喀拉等族，都变成了清朝的臣民，由清朝设官管辖，征收赋税。其中有的直接编入八旗，设牛录章京等官管辖。例如在清太宗皇太极的《实录》中，就记载了大批索伦（包括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牛录章京的名字。八旗中的许多有名氏族如鄯扎氏就住在乌苏里江、雅兰河一带，阔绰氏住在乌苏里江以东阿库里河（今苏联瓦库河）流域，乌札拉氏住在黑龙江下游宏加力河一带，精奇里氏、郭贝勒氏等住在精奇里江（今苏联结雅河）一带，鄂卓氏等住在雅克萨一带。鄂嫩河、尼布楚一带则是中国蒙古族茂明安部的游牧地。

当时，俄国人连黑龙江是什么样子都还没有看见过，可是苏修却大言不惭地说，黑龙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俄国的领土；“在俄罗斯人出现以前，黑龙江地区和乌苏里江边区”不仅“不属于中国”，甚至中国政府“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些地方”。这真是海外奇谈！他们是十足的主

观唯心主义者，竟以为历史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捏造。然而事实明明白白：在一六四三年第一批沙俄哥萨克匪徒侵入黑龙江之前，中国历朝政府已经统治这个地区近千年之久。这个铁一般的历史事实，决不是任何谎言和诡辩所能改变的。就连沙俄学者也确认：明王朝在黑龙江下游的特林“建立了地方管辖机构，把奴尔干改为省一级的都司。”^① 贝加尔湖以东、黑龙江以北的达斡尔地区是“中国最北部的地区。”^② “我们写阿穆尔省的全部历史，要写它先前作为满洲国家北部的一部分的历史”。^③ 一六七六年俄国出使中国的尼果赖也承认：居住在精奇里江、牛满河、松花江和乌苏里江等处的达斡尔人和仇切尔（女真）人都是中国臣民。^④ 甚至沙俄侵华急先锋涅维尔斯科依也不得不承认：黑龙江地区是“当时我国（俄国）政府及整个文明世界公认属于中国的地方”。^⑤ 今天苏修闭着眼睛说瞎话，真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众所周知，俄罗斯人到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才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当时它的领土远在乌拉尔山以西，和

① B. П. 瓦西里耶夫：《关于黑龙江口附近悬崖上的碑文的记载》，载《帝俄科学院通报》，一八九六年第四期。

② 《百科全书》，一八三五年彼得堡版，第二册，第一六一页。

③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编：《阿穆尔省记述》，一八九四年彼得堡版，第六页。

④ 巴德雷编：《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一九一九年伦敦版，第二三八—二四〇页。

⑤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一九四七年莫斯科版，第三六三页。

中国相隔很远。一五八一年起，沙俄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张，占领西伯利亚的大片土地，直到十七世纪才与中国为邻。

恩格斯指出：沙俄向外扩张是“一次征服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征服，一次吞并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吞并”。（《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沙俄侵入中国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和黑龙江流域，正是征服西伯利亚的继续。当时俄国已开始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它的侵略扩张除了传统的封建性领土征服外，还具备了原始积累过程中殖民掠夺的一切特征，其残暴、野蛮、贪婪与同一时期西方殖民者在美洲、非洲、印度尼西亚等地的殖民掠夺暴行相比，有过之无不及。

一六四三年，沙皇政府利用中国明清两朝交替、清军主力入关的时机，首次派遣以波雅科夫为首的武装强盗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一六四四年，沙皇政府又训令雅库次克统领派遣军役人员到中国精奇里江一带“进行侦察，征服这些土地”，并指示说：“如新土地上有人难以制服，……则可用战争和破坏他们的一些地方的手段来平定这些不顺从的人。”^①在沙皇政府直接指使和鼓励下，哈巴罗夫、斯捷潘诺夫等率领的一批批哥萨克匪徒，以雅库次克为基地，越过外兴安岭，相继入侵中国黑龙江地区。当地居民正告他们：黑龙江流域的人民“臣属中国皇

^① 弗纳德斯基主编：《俄国历史资料汇编》，第一卷，一九七二年纽黑文、伦敦版，第二六八页。

帝”，“向中国顺治皇帝（一六四四——一六六一年）缴纳贡赋”。^①但是这些殖民强盗蓄意侵占中国领土，置若罔闻。他们窃据中国达斡尔头人阿尔巴西的住地雅克萨，强筑堡砦，并将雅克萨改名为阿尔巴津。哈巴罗夫甚至要求雅库次克统领弗兰茨别科夫派军队来“征服沙姆沙汗（指顺治皇帝——引者）”。弗兰茨别科夫立即奏请沙皇派大军来“占领达斡尔地方（指贝加尔湖以东、黑龙江上中游一带），并控制沙姆沙汗”；^②随后又派契奇金带兵支援哈巴罗夫，并指示他设法向顺治帝递送信件，令顺治帝“归顺俄国”。信中说，如若他不愿“归顺”，沙皇将“以武力平定之，占尔城池，将尔及诸王公，包括妇孺，斩尽杀绝”。同时要顺治帝立即“贡献金银、花绸、宝石、毛皮，竭尽全力为之”。^③看，沙俄的侵略气焰是何等嚣张！

在波雅科夫、哈巴罗夫等南侵黑龙江的同时，叶尼塞斯克的沙俄殖民当局也不断派遣“远征军”越贝加尔湖向东侵犯，在中国蒙古族茂明安部居地尼布楚强筑堡砦，并将尼布楚改称为涅尔琴斯克，作为进一步向黑龙江中、下游扩张的基地。

这些野兽般的沙俄殖民强盗侵入中国领土后，到处劫掠居民，抢走他们的全部牲畜、粮食和毛皮；对被绑架

① A.И.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一卷，一九一六年赤塔版，第七二页。

② A.И.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一卷，第六九——七〇页。

③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一卷，一九六九年莫斯科版，第一三二——一三四页。

的“人质”横施酷刑，勒索他们所能勒索的一切，如有不从，则“将他劈为两半”。他们掳掠妇女和儿童，横加摧残，对不屈从的妇女，就“在夜间将她掐死”。^①他们用炮火洗劫城寨和村庄，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甚至把成群的中国猎户关在屋中活活烧死。^②他们流窜到哪里，就在那里刮起腥风血雨。在这些侵略强盗的蹂躏下，中国黑龙江锦绣河山，变成满目荒凉，众多的中国居民淹没在血泊之中。

对于哥萨克匪徒的暴行，连某些沙俄学者也并不否认，例如达维多夫就指出：“我们掌握的有关上述时期（十七世纪中叶——引者）的全部资料，显现了一幅早期外来的俄国人以不人道态度对待黑龙江各部落的可怖图景。”^③早期苏联学者曾严厉谴责哥萨克的罪恶行径，指斥哈巴罗夫是“十七世纪的俄国侵略者”。^④历史记载和公众舆论，早已把苏修顶礼膜拜的这些沙俄殖民强盗钉上了耻辱架。

苏修反诬清军反抗沙俄侵略的自卫行动是对俄国的

①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一九二五年列宁格勒版，第二八、三〇、五〇页。

② 《清康熙实录》，第一一二卷，第五——六页；戈鲁勃佐夫：《阿尔巴津古城的历史》，一九〇二年海兰泡版，第一四页。

③ 达维多夫：《满洲和蒙古东北部的殖民》，一九一一年海参崴版，第一一页。

④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五九卷，一九三五年莫斯科版，第三七二页。

“掠夺战争和侵略行为”，这是贼喊捉贼的惯技。

列宁教导说：“怎样找出战争的‘真正实质’，怎样识别它呢？战争是政策的继续。应当研究战前的政策，研究正在导致和已经导致战争的政策。”（《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

《尼布楚条约》前中俄之间的战争是沙俄强加于中国的。沙俄推行野蛮的侵略扩张政策，入侵黑龙江流域，践踏中国主权，蹂躏中国人民，这就是导致战争的根本原因。有压迫就有反抗，有侵略就有反侵略的斗争。中国军民奋起反击入侵者，维护领土主权和民族独立，这是每一个国家都拥有的自卫权利。一六五二年清军讨伐哈巴罗夫匪帮的乌札拉村之战，一六五五年围剿沙俄入侵者的呼玛尔之战，一六五八年全歼斯捷潘诺夫匪帮的松花江之战，一六八五——一六八六年两次雅克萨之战，都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的反击沙俄侵略的正义战争。早期苏联历史学家巴赫鲁申指出：“俄国人的入侵以及伴之而来的对居民的残酷杀害和对这块土地的蹂躏，给和平的达斡尔土地留下了骇人听闻的印象。”他还着重指出：“中国皇帝是达斡尔地区的最高君主，……是他们唯一的天然的保护者。”^①巴赫鲁申揭露了沙俄的侵略实质，充分肯定了清军抵抗侵略的正义性。这对于热衷于沙俄殖民扩张政策辩护的苏修，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①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四一——四二页。

二、《尼布楚条约》是经过 平等协商庄严缔结的

苏修否定《尼布楚条约》的另一个重要手法，就是硬说中国“违反国际法的一切准则和惯例”，“根据虚构的理由提出他们的要求，”“用武力威胁”把领土条款“强加于俄国”；《尼布楚条约》对俄国是“不平等条约”，“它意味着丧失了俄国的很大一片领土”，如此等等。

沙俄早期侵略中国的历史，本身就证明苏修这些提法的荒谬。我们已经指出，《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前，沙俄侵略中国已足足有几十年。清朝政府于一六七〇年、一六七六年、一六八三年和一六八五年多次呼吁沙俄停止武力侵略，和平解决两国间的边界问题，均遭拒绝，最后才被迫实行自卫反击。一六八六年沙俄因武力侵略受挫，表示接受清朝政府提出的和平倡议。当时中国军队在雅克萨节节胜利，孤城唾手可得，但清朝政府获悉俄方同意和谈后，立即下令无条件地解除对雅克萨的包围，全军撤到瑷珲等地。这一行动为中俄会谈创造了有利条件。今天，苏修竟把侵略成性的沙俄打扮成受压迫的一方，把被侵略的中国说成是侵略者、压迫者，抹杀中国方面一贯的和平努力，真是极尽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之能事！

苏修硬说清朝政府向沙俄提出了“领土要求”，这完

全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以南直至鄂霍次克海的广大地区，历来是中国的领土，中俄尼布楚谈判举行前一年，康熙帝（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年）曾经明确指出中俄冲突是由于沙俄侵略中国造成的。他说：“罗刹侵我边境，交战于黑龙、松花、呼马尔诸江，据我属所居尼布潮、雅克萨地方，收纳我逃人根特木耳等。及我兵筑城黑龙江，两次进剿雅克萨，攻围其城，此从事罗刹之原委也。”康熙帝指示清朝使团：“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如鄂罗斯遵谕而行，即归彼逃人及我大兵所俘获招抚者，与之画定疆界，准其通使贸易”，^①表示决心收复被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双方在平等基础上划界媾和。难道一个独立国家无权要求维护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吗？难道这就叫做向沙俄提出了“领土要求”吗？一六八九年六月，康熙帝鉴于准噶尔叛乱首领噶尔丹配合沙俄侵扰喀尔喀蒙古，为了防止他们之间进一步勾结，恢复北部边疆的安宁，他希望与沙俄早日达成妥协，因此又指示即将启程的清朝使团说：你们开始谈判时，仍应以我前次的指示为准；“彼使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河）为界。”^②这个谕旨主动提出把原属中国的尼布楚一带地方让给沙俄，准备作出重要的领土让步。它实际上就是清朝使团在尼布楚谈判中的指导方针。难道这也算是向俄国提出

① 《清康熙实录》，第一三五卷，第一五页。

② 《清康熙实录》，第一四〇卷，第三〇页。

了“领土要求”？

其实，“根据虚构的理由”向对方提出领土要求的正是沙俄侵略者自己。一六八六年初，沙俄政府给行将启程的全权大臣戈洛文的秘密训令规定的要点是：（一）“应以黑龙江为界”。（二）“若中国皇帝的军事长官说，由于黑龙江注入大海，并流经中国的城郊和领土，不能以黑龙江为界”，则俄方“至少应提出以注入黑龙江的比斯特拉河（又名布列亚河，即牛满河——引者）或结雅河以上的黑龙江为界”；（三）“如果中国人坚持原有主张，毫不让步，不愿根据上述条件缔结和约，大使必须依照沙皇陛下的命令和西伯利亚部的军事训令，采取行动（关于作战的行动）。”^①试问，这样的训令不是要强迫清朝政府接受俄方蛮横无理的领土要求，又是什么？

此后，沙俄政府因远征克里米亚失败，政局不稳，曾经几次修改对华谈判方案，降低了一些要价。但不论是哪一个方案，其出发点都是一样：这就是企图通过外交谈判，取得黑龙江以北的全部或一部分中国领土；竭力保持既得侵略权益。

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尼布楚谈判正式开始。戈洛文抢先发言，诬指中国首先挑起战争，硬要清政府接受“两国以黑龙江至海为界”的无理要求。清朝使臣索额图当场予以驳斥，严正指出：由于俄国人侵入中国雅克萨

^① 加恩：《彼得大帝时代的俄中关系史（1689—1730）》，一九一二年巴黎版，《附录》第三页。

等地，给当地中国居民造成严重危害，中国才不得不举行自卫反击。并指出：“鄂嫩、尼布潮系我国所属毛明安诸部落旧址，雅克萨系我国虞人阿尔巴西等故居，后为（沙俄）所窃据”；^①沙俄入侵者理应退到色楞格以西，将尼布楚和雅克萨一带归还中国，因为这些地方是中国蒙古族的土地，历来即属中国所有。^②戈洛文无词以对，竟然蛮横地表示“没有时间来讨论历史事实”！^③

第二次会议上，俄方按照沙俄政府既定方针，始则坚持前议，强求“以黑龙江为界”，说什么这条河流“久已属沙皇所有”，^④继而表示“让步”，提议把布列亚河或结雅河以西黑龙江以北的大片土地划归俄国，并要求中方赔偿俄国在雅克萨等地的“损失”。索额图抱着早日缔约划界的愿望，一面明确表示不能同意俄方的方案，另一方面主动作出让步，声明可以把尼布楚让给俄国。但是，中方这一领土让步仍不能使俄方满足，他们悍然加以拒绝，从而使谈判陷入僵局。

由于俄方顽固坚持侵略立场，中俄会议从二十四日起被迫中断。清朝使团对此深感不安，担心“莫斯科人并

^① 《清康熙实录》，第一四三卷，第一四页。

^② 荷尔德：《中国概述》，第二卷，一七三八——一七四一年伦敦版，第三一一页。

^③ 刘选民：《截至〈尼布楚条约〉为止的中俄关系》，载《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1940年第23卷第4期。

^④ 雅科夫列娃：《一六八九年第一个俄中条约》，一九五八年莫斯科版，第一六七页。

不想要和平，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一种阴谋，其目的是拖延时间，别有所图。”^①为了不使谈判破裂，清朝使团通知俄方，如果他们有事要谈，中方仍然准备听取并予以回答。同时，针对俄方停止谈判的要挟，加强戒备，以防万一。

二十五日后，双方通过译员继续协商。中国方面据理驳斥了俄方无理要求，并再三表示希望互相让步。当时，尼布楚一带布里亚特等族人民风起云涌的抗俄斗争，使戈洛文恐惧万分。他担心这种局面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所牵涉的不仅是尼布楚和雅克萨的问题，甚至还要迫使沙俄将贝加尔湖以东的土地全部归还中国。同时，俄方查明雅克萨和格尔必齐河之间可供居住之地很少，也不出产貂皮，而在额尔古纳河西岸却找到了银矿、盐湖，且有很多可供居住的地方和耕地。^②因此，也表示不再坚持占据包括雅克萨在内的黑龙江北岸。这同沙皇政府强要“以黑龙江为界”相比，确实降低了一些要价，但它“并没有超出（沙皇）训令的范围。”^③经过长时间的往返交涉，双方终于商定两国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及外兴安岭至海为界。九月六日，在俄方提出的条约文本的基

① 塞比斯：《耶稣会士与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九六一年罗马版，第二三九页。

②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二卷，一九七二年莫斯科版，第五四四——五四五页。

③ 特鲁塞维奇：《俄中通使通商关系》，一八八二年莫斯科版，第三二页。

础上，双方全面地达成了协议。

以上事实雄辩地证明，《尼布楚条约》是双方经过平等协商、中国方面作了重大让步的结果。苏修说中国“把沉重的领土条件强加于俄国方面”，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所谓俄方“丧失了大片领土，”更是颠倒历史。《尼布楚条约》只是表明沙俄承认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事实，规定沙俄把侵占中国的一部分土地归还中国罢了。早期苏联学者也认为：《尼布楚条约》使俄国“放弃了它在黑龙江侵占的全部土地”；①《尼布楚条约》订立后，“俄国失去了它在前半个世纪中靠损害中国”而获得的大部分土地。②中国收回被沙俄侵占的固有领土，完全符合尊重双方主权和平等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苏修把这件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说成是中国“割占”了沙俄的领土，俄国受了“损失”，岂不是荒谬绝伦？

苏修还把清朝政府派遣军队随使团前往尼布楚，说成是中方向俄方施加军事压力，缺乏和平诚意，这更是颠倒是非。

如前所述，倡议和平解决两国边界争端的是清朝政府而不是沙俄。缺乏和平诚意，妄图在谈判中施加军事压力的是沙俄，而不是中国。戈洛文使团并不是口衔橄

① 哈恩斯基：《自古至今的中国》，一九二七年伯力—海参崴版，第二六九页。

② 安德生：《十九世纪沙俄同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载苏联《阶级斗争》杂志，一九三六年第九期。

榄枝的和平鸽，而是武装到牙齿的双头鹰，沙皇曾授权戈洛文在西伯利亚招募新兵，支援在黑龙江地区的沙俄侵略军，并“想尽办法”在中国领土上“重建”被清军摧毁的殖民据点。^①大批俄军随戈洛文向黑龙江进发的消息，“在中国引起了严重的不安”，^②沙俄致清朝政府的国书中，又扬言沙皇“已派出无数雄兵”前往雅克萨“讨平敌人”，^③这种恫吓，不能不使清政府有所戒备。在沙俄已经向中国黑龙江地区增兵的情况下，清政府相应地派出一定数量的护卫兵力，是完全必要的。没有这支兵力，就不足以保障清朝使团的安全，免受俄军威胁，就说不上使谈判在平等的基础上正常进行。更应指出的是：尼布楚是当时沙俄侵占下配置重兵的侵略堡垒。尼布楚城上架设的是沙俄的大炮，并不是中国的大炮。在尼布楚城下举行谈判，实际上是在沙俄大炮的射程内谈判。康熙帝同意在这样的地点举行谈判，充分表明中国方面的和平诚意。在这些铁的事实面前，究竟是谁企图在谈判中实行武力威胁，岂不是洞若观火吗？

苏修竭力夸大随使团前往的清军人数和武器装备，连船夫和清朝使臣的大批家人、夫役也都算作战斗部队，企图造成谈判是在“庞大的满洲优势兵力”胁迫下进行的

① 雅科夫列娃：《一六八九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一二九、一三一—一三二页。

② 雅科夫列娃：《一六八九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一五三页。

③ 班蒂什—卡敏斯基：《一六一九——一七九二年俄中外交文件汇编》，一八八二年喀山版，第四一页。

假象，借以证实自己的谬论。他们信口开河，越说越神，自相矛盾，破绽百出。^①事实上，根据文献记载，一六八八年清朝使团赴色楞格斯克时，随行卫军只八百人，^②中途为噶尔丹叛军所阻，被迫折回；第二年改道赴尼布楚时，因获悉戈洛文带来重兵，酌增护卫兵力，分水陆两路，由水路前往的黑龙江兵为一千五百人，^③由陆路随使团同往的军队为一千四百人，^④总计中国在尼布楚的兵力共为二千九百人。沙俄方面，一六八六年戈洛文从莫斯科出发时随带了五百多名火枪兵，途经西伯利亚时又增募了一千四百名哥萨克兵，总数约二千人左右。^⑤再加上先

① 关于清朝使团随带军队人数的各种离奇说法：《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说有士兵六千人（该书第二卷前言，第一九——二〇页）；齐赫文斯基等说有士兵八千人（《中国近代史》，第五九页）；利亚波夫等说有士兵一万人（《俄国远东史纲》，一九五八年伯力版，第五一页）；纳罗奇尼茨基、雅科夫列娃说，水陆两路总数有一万五千至一万七千人，其中水师约三千人（《远东国际关系》，第三〇页；《一六八九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一五七——一五八、一七五页）；卡巴诺夫更夸大为单水师就有一万人（《黑龙江问题》，一九五九年海兰泡版，第二〇——二一页）；贾丕才说清政府“在尼布楚附近集中了约一万七千五百人的精锐部队”（《证实真相的文件》，载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苏联《消息报》），等等。

② 《清康熙实录》，第一三四卷，第三页。

③ 《清康熙实录》，第一四〇卷，第三〇页；荷尔德：《中国概述》，第二卷，第三〇八页。

④ 荷尔德：《中国概述》，第二卷，第三〇八页；另据戈洛文报告，由陆路前往的清军只一千名，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二卷，第四八三页。

⑤ 班蒂什—卡敏斯基：《一六一九——一七九二年俄中外交文件汇编》，第五二页；A. II.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一卷，第一八九页，注一。又特鲁塞维奇说，戈洛文随带的总兵力共为二千四百人，见《俄中通使通商关系》，第三〇页。

已盘踞在尼布楚、雅克萨等地的沙俄军队二千人，戈洛文共拥有约四千人的兵力。就武器装备而言，清军更远远不及俄军。有些苏联著作坦率承认：“俄国使臣在尼布楚取得了外交胜利。……这一胜利是由俄国人对于俄国的真正实力所具的信心，和对于中国军事方面比较落后这一事实的了解所决定的。清军大多数是用弓箭装备起来的，而当时俄国早就牢固地掌握了火器。”^①可见，无论从军队人数或武器装备来说，都不存在什么中方用优势兵力进行威胁、破坏谈判平等基础的问题。

尼布楚会议上中俄双方卫队的人数完全相等，也证明“中国以武力逼签条约”的说法纯属虚构。谈判前夕，中俄双方曾就担任会场警卫的两国卫队人数进行过充分协商。中方同意俄方关于各带三百名卫士赴会的提议，同时提出除刀剑外不得携带任何火器进入会场的主张。在整个谈判期间，清朝使团始终严格遵守上述协议，而俄方却密令卫队暗中揣着禁止携带的火器——手榴弹赴会。^②会议期间妄图实行“武力威胁”，制造“不正常情况”的，不正是俄国使团吗？

应当指出，尼布楚谈判进行的方式、条约的订立（会谈、会议、签署、互换和宣誓等），都是经过中俄双方认真商定的。如谈判正式开始前，双方在协商会议程序时即

① 雅科夫列娃：《一六八九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一八九页。

②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二卷，第五〇五页。

已议定，两国使臣“应在每一件事上平等”，“任何一方不凌驾于对方之上”。^①又如条约正式签订前夕，在双方协商签约程序和宣誓仪式时，中方曾提议两国使臣只盖章，不签字，也不必交换条约文本；俄方坚持必须签字、盖章和互换文本，认为非如此不足以保证该约具有法律效力。同时，俄方强调两国使臣必须在誓词中表明他们的君主履行条约的责任和决心。中方一概采纳了俄方的意见。如果《尼布楚条约》真是强加于沙俄的“不平等条约”，那末，戈洛文为什么对于签订该约心情如此急切，生怕《尼布楚条约》成为一纸空文，希望该约切实生效呢？

俄国使团对《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是感到极为满意的。在双方互换条约文本以后，戈洛文等在俄国的鼓乐声中频频举杯祝贺，热烈与清朝使臣拥抱，再三恳留清朝使臣多住一天。第二天，戈洛文又派员向清朝使臣赠送礼品，“以纪念双方使团要员之间在前一段时期建立的真挚友谊。”^②来使转述戈洛文嘱咐的话说：所赠都是他珍爱之物，为了感谢中国使臣，即使价值万金，也不足为贵。貂皮、猞猁皮表明他热忱之情；自鸣钟系有声之物，象征大臣分别后仍可声息相闻；望远镜能视远方；银壶、银杯可开怀畅饮，以示别后彼此怀念，如同相见，言为心声。如果《尼布楚条约》真是俄国在清军压力下被迫签订的“不

^① 荷尔德：《中国概述》，第二卷，第三一〇页。

^②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二卷，第六〇〇页。

平等条约”，那么戈洛文等何以会如此兴高彩烈？此外，戈洛文回莫斯科的途中，沙皇曾派遣官员专程前往迎接，发给奖章，祝贺谈判的成功；回到莫斯科后，立即受到沙皇伊凡五世（一六八二——一六九六年）和彼得一世（一六八二——一七二五年）的接见和嘉奖，也足以充分证明沙皇政府对《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是十分满意的。如果《尼布楚条约》使“俄国丧失了大片领土”，戈洛文为什么还会受沙皇政府如此特殊的赏识和嘉奖呢？

三、《尼布楚条约》内容不容歪曲

苏修拚命诋毁《尼布楚条约》，再一个重要手法就是随意曲解约文，胡说其中关于边界的条款“含糊不清”，“并没有为俄罗斯和中国确定明确的界线”，“甚至没有真正解决黑龙江地区的边界问题”，因而“这一条约作为法律文件是不完善的”，等等。在苏修笔下，“鸣炮誓天”庄严缔结的《尼布楚条约》竟成了毫无法律效力的一张废纸，这与当年老沙皇为非法侵占外兴安岭以南的中国领土所散布的谎言一模一样。

事实上，《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明确规定了中俄两国东段边界的走向，条约写道：“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格尔必齐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

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分划，今尚未决，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遣专使，或用文牒，始能定之。又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从这段约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尼布楚条约》关于中俄两国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的规定，内容清晰、明确，根本不容置疑。一八九一年俄国出版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一书所附《东西伯利亚地图》，一九一四年帝俄官方出版的《俄国亚洲部分地图集》中《俄国在亚洲的领土扩张图》，所标示的一八五八年前的中俄东段边界线都是以《尼布楚条约》的上述规定为依据。苏联早期历史学者巴赫鲁申明确指出，这个条约“规定沿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和雅布洛诺夫及斯塔诺夫山脉作为国界。”^①英国历史学者普罗思罗主编的《东西伯利亚》一书也尖锐地指出，所谓《尼布楚条约》“含糊不清”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这个条约在当时情况下尽可能明确地规定了直到东洋（指太平洋——引者）的边界，只留下紧靠太平洋岸的乌第河地区另行议定。此外还及时地树立了界碑，并且每年进行巡边。”^②苏

① 巴赫鲁申：《十六、十七世纪西伯利亚殖民史纲》，载《巴赫鲁申学术著作集》，第三卷，第一分册，一九五五年莫斯科版，第一五六页。

② 普罗思罗主编：《东西伯利亚》，一九二〇年伦敦版，第二三——二四页。

修想要一手遮天，抹煞客观事实，是绝对办不到的。

《尼布楚条约》第一条规定：中俄两国边界自格尔必齐河发源地起，顺山岭“直达于海”，“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这就充分说明，这条作为中俄东段边界主要定向标记的山脉，是指黑龙江和勒拿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即东西走向的外兴安岭（俄名斯塔诺夫山脉），而“直达于海”是指直达于鄂霍次克海。一些持有客观态度的沙俄学者曾经确认，根据《尼布楚条约》，中俄“边界规定为沿额尔古纳河，然后沿石勒喀河的支流格尔必齐河，并继续沿着勒拿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之间的分水岭向东延伸。”^① 甚至一九六〇年出版的谢宾科夫著的《十七世纪俄中关系》也承认：“按照《尼布楚条约》第一条，俄、中之间的国界被规定为沿格尔必齐河，并自它的上源沿斯塔诺夫山脉，直到乌第河流入鄂霍次克海的地方。”^② 上引普罗思罗的书中也说：“在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条约》中，俄国人承认中国的边界沿着黑龙江以北约二百英里（合三百二十多公里——引者）远的斯塔诺夫山脉的山脊，在乌第河附近直达于鄂霍次克海。”^③ 现在，苏修竟全然不顾以上述分水岭为界的明确规定，忽而说外兴安岭有许多支脉，按照《尼布楚条约》“并不能断定以哪一

① 达维多夫：《满洲和蒙古东北部的殖民》，第一五页。

② 谢宾科夫：《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〇七页。

③ 普罗思罗主编：《东西伯利亚》，第二〇页。

条支脉为界”；忽而又自相矛盾，断言按照这个条约，中俄两国“应以位于靠近黑龙江的山脉为界”。试问，究竟是《尼布楚条约》中关于外兴安岭走向的规定“含糊不清”，还是你们故意歪曲约文，存心制造混乱？

苏修还荒诞无稽地说，斯塔诺夫山脉在乌第河上游附近折向南行，穿过黑龙江和松花江，直到朝鲜边界而达于日本海。他们据此断言，按照《尼布楚条约》，“乌第河以东和以南的土地，包括整个黑龙江下游和滨海地区都没有定界。”这又是当众造谣。实际上，《条约》规定暂行存放、另行议定的只限于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地区，而苏修竟把待议地区扩大到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不仅如此，如果按照他们所捏造的外兴安岭走向，实际上今天中国黑龙江省的东部岂不也成了待议地区？这种包藏祸心的谬说，完全是重复十九世纪中叶沙俄侵略分子涅维尔斯科依的滥调。当年，沙俄侵略者一直把涅维尔斯科依的这种惊人“发现”当作他们任意曲解《尼布楚条约》，向中国提出狂妄的领土要求的重要依据。但是，由于这种异想天开的说法太不顾起码的地理常识，连一些稍微尊重事实的俄国学者也不得不指出是“牵强附会”。^①另一个给涅维尔斯科依写传的苏联历史学家卡马宁也指出：“涅维尔斯科依的这些设想，如我们现在所知，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不存在一条从乌第河上游到朝鲜的

^① 帝俄地方自治会编：《黑龙江地区》，一九〇九年莫斯科版，第五〇页。

统一山脉，也不存在他所写的斯塔诺夫山脉的那种急转弯。”^①这些评论有力地驳斥了涅维尔斯科依及其继承者的无耻谰言，揭穿了他们的丑恶嘴脸。

更不可思议的是，苏修竟指鹿为马，偷梁换柱，胡说“根据”《尼布楚条约》，中俄两国的界山并非外兴安岭，而是黑龙江以南的大兴安岭山脉！照这个说法，今天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地区似乎都应该划入俄国的版图。但是，苏修的力气即使再大些，也无法把外兴安岭搬到黑龙江以南来。他们的无耻叫嚣，只不过进一步暴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野心。

对于中俄东段边界的另一重要定向标记——格尔必齐河，苏修也要了一套边界“搬家”的把戏，企图借此证明《尼布楚条约》的约文“含糊不清”，可以任意解释，并无法律效力。其实，这也不是他们的新发明。早在十八世纪，沙俄反动历史学家米勒尔就故意把注入黑龙江的阿玛杂尔河，说成是大格尔必齐河；他认为依俄国的利益来看，最好以阿玛杂尔河作为国界。现在，苏修也跟着鹦鹉学舌，硬说按照《尼布楚条约》，应当把中俄国界划在阿玛杂尔河。这种说法真是利令智昏。

《尼布楚条约》规定为中俄国界的格尔必齐河，所指十分明确，这就是在绰尔纳河附近流入石勒喀河的格尔必齐河，不可能有第二种解释。第一，沙俄官方出版的地

^① 卡马宁：《涅维尔斯科依传》，载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第一九页。

图，明确地把这条格尔必齐河作为中俄国界，例如俄国移民局出版的《俄国亚洲部分地图集》第三图《西伯利亚图》（一七〇一年雷米佐夫绘制）中，就在注入石勒喀河的格尔必齐河旁清清楚楚地标明了“边界”字样。第二，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清朝使团首次提出以格尔必齐河为界的建议时，就是指“注入石勒喀河”的格尔必齐河。俄方首席代表戈洛文在给沙皇的报告中确认这一事实，他还写道：“格尔必齐河流经尼布楚和雅克萨的当中。”^① 打开地图就可以看到，戈洛文所记的该河方位，恰与流入石勒喀河的格尔必齐河位置相符。第三，俄方同意作为国界的格尔必齐河，也明明是指注入石勒喀河的格尔必齐河，而不是指雅克萨附近的阿玛杂尔河。例如，他们在九月五日和六日提出的两个条约草案中写道：“将在绰尔纳河附近自左方向下流入石勒喀河之格尔必齐河定为两国之边界。”^② 《尼布楚条约》俄文本的第一条第一句同上面这句话完全相同，没有作过一字改动。第四，苏修还说，《尼布楚条约》的拉丁文本中提到绰尔纳河流入黑龙江，因此，位于该河附近、作为国界的格尔必齐河就不应是流入石勒喀河的格尔必齐河，而应是流入黑龙江的格尔必齐河，即阿玛杂尔河。这真是可笑已极。谁都知道，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二卷，第五二七页。

^②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二卷，第五六三、五七四页。

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向来把石勒喀河看做是黑龙江的一部分。中国的官方文书和地图（如康熙图、乾隆图、道光图），从来都是把石勒喀河作为黑龙江上游的正流，所以约文中的黑龙江当然包括石勒喀河在内。又如《黑龙江外记》说：“黑龙江发源蒙古喀尔喀部之垦（肯）特山，其上游，蒙古谓之鄂伦河，他书亦作敖嫩河，即元史斡难河，元太祖始兴地也。自此东北流，经尼布楚城之南，入省东北境，受西南来之额尔古纳河，经雅克萨城折而东南，……东入于海。”^①又如尼布楚谈判的中方译员徐日升和张诚的日记中也明确地提到，尼布楚位于黑龙江北岸。^②这些都是黑龙江在当时包括石勒喀河的明证。苏修摇唇鼓舌地进行诡辩，难道就能够改变这一客观事实吗？

总之，在早期中俄关系史上，沙俄自始至终是侵略的一方，中国是被侵略的一方；清朝政府为了保卫国家主权，坚决抵抗沙俄入侵，促成了中俄尼布楚会议的召开；《尼布楚条约》是经过平等谈判庄严缔结并有利于俄国的，决不是中国用武力逼签或有损俄国主权的；《条约》所规定的中俄东段边界是明确、具体的，决不是含糊不清、可以任意解释的。苏修为了美化沙俄侵略者，掩盖其十九世纪下半叶违约侵吞中国东北大片领土的罪行，为了给

① 西清：《黑龙江外记》，卷一。

② 塞比斯：《耶稣会士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第二〇一页；荷尔德，《中国概述》，第二卷，第三〇八页。

他们自己覬覦中国领土制造“根据”，竟然明目张胆地重弹老沙皇的旧调，肆意歪曲《尼布楚条约》的背景、谈判过程和条约的基本性质，否定《尼布楚条约》的法律效力，甚至随心所欲地把《条约》规定的界山、界河统统搬家。历史真相不容歪曲。谎言和诡辩代替不了事实。苏修越是颠倒黑白，他们伪造历史的面目也就暴露得越加彻底！

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

——驳苏修篡改中俄东段边界史的谎言

曲瑞瑜、王慎荣、周雷、褚靖寰

自从苏修叛徒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社会帝国主义以来，它就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疯狂争夺世界霸权。苏修新沙皇为了替自己的侵略扩张政策辩护，指使它的外交官和御用文人齐赫文斯基之流，挖空心思地为沙皇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的罪行翻案，为提出新的领土要求制造舆论，抛出了《论俄中边界形成史》、《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等文章和专著。这些反华文章明目张胆地篡改中俄边界史，编造了种种离奇的谎言，胡说什么：满族不是中国人，满族居住的地方是独立国家；黑龙江流域既无满洲人，更无中国人居住过，甚至宁古塔、吉林及其毗连的大片土地都不是中国的领土，早在遥远的时代，就属于俄国了。如此等等。

“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列宁：《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戳穿谎言最有力量的是事实。历史的真相是怎样呢？满族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民族；该族首领努尔哈赤及其几辈祖先，都是明朝在东北的地方官。在一六四三年老沙皇派

遣第一批所谓“新土地发现者”侵入黑龙江流域以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及其领导的清政权，已经统一了整个东北，接管了明朝的东北疆土。把这一段历史事实公诸于世，就是对苏修新沙皇谎言的最好回答。

努尔哈赤等女真族首领 是明朝东北的地方官

毛主席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已经发展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满族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成员。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就世代劳动、繁衍在东北这块肥田沃野上。苏修却胡说，满族不是中国人，满族居住的地方“是一个不依附于中国的独立国家”，^①这真是荒谬透顶！

举世皆知，富饶广阔的中国东北地区，从古代起就和中原地区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证明，满族是居住在黑龙江流域的古老民族。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一脉相承，是满族的祖先。远的不说，在八世纪上半叶，中国唐朝就在黑龙江流域设有行政机构。

如同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一样，十四世纪以后，明与

^① 苏联政府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声明。

女真的关系，也是一个国家内中央与地方的隶属关系。明朝在女真族居住的地方，设立了建州、兀者、毛怜等卫，让他们治理本民族的事务。这些卫的长官从明初开始都是女真族首领，累世受封，二百年间，这种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始终没变。

据历史文献记载，明继元朝以后，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在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达乌第河，南濒日本海，包括整个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设立了都指挥使司、卫、所等各级行政机构几百个。^①一四〇九年（永乐七年），在黑龙江口特林地方设立的奴儿干都指挥使司，^②就是管辖这些卫、所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这些卫、所的官吏是“因其部族”，“官其酋长”，^③任命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职，“给予印信，自相统属”。^④一四〇三年（永乐元年），明王朝在建州部族中设立了建州卫，^⑤部族首领阿哈出任建州卫长官。一四一二年（永乐十年）在今依兰附近设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任建州左卫指挥使。一四四二年（正统七年）又分设建州右卫。

建州三卫和其他卫一样，是明代设在东北的带有军事性质的地方政权机构。经过明王朝的任命和批准，建

① 《大明会典》，第一二五卷，兵部八；《明史》，第九〇卷，兵志二。

② 《明太宗实录》，第六二卷，永乐七年闰四月己酉。

③ 《大明一统志》，第八九卷。

④ 《李朝实录》，第七卷，太宗四年四月甲戌。

⑤ 《明太宗实录》，第二四卷，永乐元年十一月辛丑。

州三卫的长官是世袭的，父死子代，世世不绝。按照明朝中央的规定，它必须遵守明朝的制度和法令，服从调发，戍守边疆，“有所征调，闻命即从，无敢违期”；^①对明朝统治者，还要按时进贡。满文“贡”字(Alban)实际是“贡赋”之意，所以《明会典》说，“贡到方物，例不给价”。^②

恩格斯曾指出：“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一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建州三卫与明朝的关系，从开始就是中央和地方的隶属关系，怎么能说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呢？苏修硬把明朝的地方政权说成独立国家，显然是别有用心。

十六世纪后期，努尔哈赤不断晋升的事实，进一步说明了这种中央与地方的隶属关系。努尔哈赤是清肇祖猛哥帖木儿的后裔，他二十五岁以其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实力发展很快，引起了明王朝重视；而努尔哈赤本人自世袭建州卫长官以后，由于“忠于大明”和“保塞有功”，多次被明朝晋级加封。

一五八三年(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被明朝任命为指挥使。据历史文献记载，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的祖父叫场，父亲塔失，在明征讨阿台时做向导，死于兵火，明“以祖父故，予指挥职”。^③努尔哈赤实际是世袭父祖之职

①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四，《女直》。

② 《明会典》，第一〇八卷。

③ 《建州私志》卷上。

任指挥使的。

一五八九年(万历十七年),努尔哈赤晋升为都督佥事^①。究其原因:一是对明“忠顺”,“斩逆酋”平定叛乱有功;二是“念其祖父死事”,“有殉国忠”;三是“令铃束”女真各部戍守东北疆土。^②

一五九一年(万历十九年),努尔哈赤又晋升为都督。他本人曾夸耀过坐授都督敕书。^③一五九五年(万历二十三年),努尔哈赤以“保塞有功”,晋号龙虎将军。这在明、清历史文献中有多次而又明确的记载。^④

在短短的二十年中,努尔哈赤接连晋升,由指挥使升为都督佥事、都督,以至晋号为龙虎将军,成为有职有权的明朝属下官吏。努尔哈赤作为明朝的东北地方官也是尽其职守,效忠朝廷,对明朝中央的“宣谕”,“无不听命”。^⑤努尔哈赤自己就说过:“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进贡,忠顺已久”。^⑥一五九六年(万历二十四年)

① 《明神宗实录》,第二一五卷,万历十七年九月乙卯。

② 《万历武功录》,第一一卷,《努尔哈赤传》;《东夷考略·建州》;《山中闻见录》,第一卷,《建州》;《清皇室四谱》,第一卷。

③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一卷;《万历武功录》也说“拜爵大都督”;《明神宗实录》第二五一卷则称“建州卫都督努尔哈赤”。

④ 努尔哈赤晋号龙虎将军,《东华录》、《三朝辽事实录》、《皇明从信录》、《东夷考略》、《皇明通纪辑要》、《山中闻见录》、《建州私志》、《清史稿》、《李朝实录》等书都有明文记载,时间虽然不同,但对努尔哈赤确由明朝封为“龙虎将军”这个历史事实,却是一致肯定的。

⑤ 《为夷酋速儿哈赤病故吊祭事》(万历三十九年),辽宁档案馆藏,明档屏风档〇〇三。

⑥ 孟森:《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第二〇九页。

努尔哈赤在给朝鲜国王的回帖中也说过：我保卫明朝九百五十余里地界是很恭顺的。回帖用的就是篆文“建州左卫之印”。^①努尔哈赤在称汗以前，与明王朝关系很密切。据《明实录》记载，从万历十八年到万历三十九年，努尔哈赤除了派他的弟弟舒尔哈齐等人向朝廷进贡外，他本人就亲自到北京进贡达八次之多。

大量的史实证明：建州女真“俱系朝廷属卫，世受爵赏”。^②从猛哥帖木儿到努尔哈赤，他们既是建州女真的首领，又是接受明朝印信、袭衣的地方官吏。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明朝的封建统治日益腐败，宦官专权，赋税徭役连年加重，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爆发了李自成农民大起义；明朝的“文武边官，欺诬壅蔽”，东北各族人民深受其害，不得安宁。^③明朝中央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起兵反抗明廷的统治，接管了明朝的东北的疆土，取而代之，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中，满族变成了中国的统治民族。马克思曾经指出：“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中国记事》）在中国多民族国家漫长的历史上，有时这个民族的统治阶级取得统治地位，有时那个民族的统

① 申忠一：《建州图录》（复制件），沈阳故宫博物馆保存。

② 《明宪宗实录》，第四一卷，成化三年四月癸亥。

③ 孟森：《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第二〇九页。

治阶级掌握统治权，这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清取代明而夺得统治权，正是满族贵族由地方统治者变为全国统治者的改朝换代。但是，苏修叛徒集团硬把满族居住的地方说成是独立国家，把满族建立的清朝说成是外国对中国的统治，这当然不是对历史的无知，而是怀有不可告人的野心。他们否认满族是中国人，就是妄图否定中国对黑龙江流域的主权，达到进一步侵略中国的目的，居心之毒，可谓极矣！

清在入关前就统一了黑龙江流域

马克思于一八五七年写道：“它（按：俄国）占领当今中国统治民族的故乡——黑龙江两岸的地方，才只有几年的时间。”（《俄国的对华贸易》）这段话，十分明确地指出黑龙江两岸是满族的故乡这一历史事实。可是那些声称自己“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领土野心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者，厚颜无耻地叫嚷什么中国的黑龙江两岸“历来就是属于俄罗斯的土地”，^①“甚至宁古塔、吉林及其毗连的大片土地，在行政上都未被满人划入清帝国版图”。^②为了篡改历史，还胡诌什么：“满洲人是居住辽东半岛的一个好战民族”。^③然而，黑龙江流域的历史却

① 一九七一年四月六日苏联《真理报》。

② 米亚斯尼科夫：《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二卷《前言》。

③ 齐赫文斯基等：《论俄中边界形成史》，载苏联《国际生活》杂志，一九七二年第六期。

有力地戳穿了这种可耻的谎言和诡辩。

明初，女真族分建州、海西、“野人”女真三大部，没有一个居住在辽东半岛。明代茅瑞征所著《东夷考略》记载：“女真各部在混同江以东，东滨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干”。由于女真各部经济的发展，要求与汉族加强经济和文化的联系，而明朝又采取了积极的“招抚”措施，以及“野人”女真南迁和瓦剌部的东移，女真各部出现了频繁迁移的局面。建州女真辗转迁徙，最后于正统年间定居浑河、苏子河上游，即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海西女真一部南移到开原以北和松花江中上游及辉发河一带。“野人”女真经过迁徙，分布于建州、海西以东和以北的广大地区，从松花江中游以下，至黑龙江流域，东达海岸。

民族迁徙是世界历史上常见的现象。建州和海西女真的迁移，只不过是中国的一个民族在自己国家境内的搬搬家而已。

在十六世纪末，女真族逐渐形成几个强大集团：建州五部、长白山三部、扈伦四部、东海诸部。当时，“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①恩格斯指出，割据所造成的“疆土分裂状态”，“分散和抵销了民族的集体力量”。（《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而政治上的统一，消除人为的分裂、割据状态，经济、文化才

^① 《满洲实录》，第一卷。

能够获得发展，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才能够有所改善。因此，统一是当时各族人民的要求，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十七世纪初，明王朝已经衰落、腐朽，统一东北的历史任务，落到了政治上、经济上比较先进的建州女真及其首领努尔哈赤的身上。

努尔哈赤领导的统一东北的战争，开始于一五八三年夏，仅用六年时间就统一了建州五部。紧接着又用两年多一点时间，统一了长白山三部。以后，经过政治和军事的反复较量，努尔哈赤率领的建州女真先后征服了扈伦四部。

黑龙江流域是满族的故乡。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和扈伦诸部的时候，当然不会忘怀生活在那里的与其语言、骑射相同的同族人。清入关以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就统一了黑龙江流域，这一历史事实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统一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的斗争，早在十六世纪末就开始了。而一六〇七年（万历三十五年）在豆满江（图们江）畔进行的乌碯岩大战，则是关键性的一仗。在这个战役中，努尔哈赤以少胜多，大破乌拉部首领卜占台的主力部队，乘胜追击，夺取了高岭会宁路，打开了通向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流域的大门。从此，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以宁古塔为中心根据地，向东、北两个方向胜利进军。一是统一地处黑龙江中下游两岸和乌苏里江两岸，滨海地区及库页岛的“东海诸部”，其中包括瓦尔喀、渥集、虎尔哈、萨哈连、使犬、使鹿等部；一是统一地处

黑龙江中上游两岸，北到外兴安岭的北方的“索伦诸部”，其中包括索伦、达斡尔、鄂伦春等部。

瓦尔喀、渥集的居地，相当于现在苏联滨海地区的南半部、松花江、乌苏里江之间，南抵图们江。瓦尔喀部原属女真族，皇太极就说过：瓦尔喀与我都住在女真之地，同为一族。^①一五九八年，努尔哈赤派他的长子褚英等领兵一千人，征瓦尔喀安楮拉库路（松花江上游二道江一带），攻克二十个屯寨，同时拿下内河路（松花江上游）。^②一六〇七年春，瓦尔喀部蜚悠城（珲春北二十里古城）城主策穆特赫率众归附。^③一六〇九年，攻取兴凯湖以东瑚叶河畔（今苏联滨海地区刀毕河）的溲野路。^④一六一〇年招抚渥集部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四路（在绥芬河流域及乌苏里江上游，明双城卫、速平江卫）。^⑤一六一一年，夺取渥集部乌尔古宸（今苏联比金河一带）、穆棱（今穆棱河流域）二路。^⑥一六一四年，努尔哈赤派兵征服雅揽（明牙鲁卫）、西临（今苏联苏祖赫河一带，明薛列河

① 《清太宗实录》，第一五卷，天聪七年九月癸卯。

② 《清太祖实录》，第二卷，丁酉春正月壬辰朔；戊戌春正月丁亥朔。

③ 《清太祖实录》，第三卷，丁未春正月己丑朔；己酉十二月戊申朔；庚戌十一月壬寅朔。《西伯利东偏纪要》。

④ 《清太祖实录》，第三卷，丁未春正月己丑朔；己酉十二月戊申朔；庚戌十一月壬寅朔。《西伯利东偏纪要》。

⑤ 《清太祖实录》，第三卷，丁未春正月己丑朔；己酉十二月戊申朔；庚戌十一月壬寅朔。《西伯利东偏纪要》。

⑥ 《清太祖实录》，第三卷，辛亥七月戊戌朔；《西伯利东偏纪要》。

卫，又作失里卫)二路。^①一六一五年，出兵渥集部东额黑库伦城（今苏联纳赫塔赫河地方）。^②以后，又征服厄勒（今苏联滨海省雾迷大沟）、约锁（今苏联纳赫塔赫河一带）等地。^③一六三三年，吴巴海率兵征乌扎拉部（今苏联宏加力河口对岸）获胜。^④一六三五年，又统一了尼满阿库里路（今苏联伊曼河、瓦库河一带，明亦麻河卫）、阿万路（今苏联维亚泽姆斯基一带）等地。^⑤皇太极经多次征抚，瓦尔喀部、渥集部已全境臣服。

虎尔哈部位于黑龙江中游及宁古塔东北地方。该部与满族同是女真人。一六一八年，虎尔哈部长纳喀达率民百户，前来归附。^⑥一六一九年，努尔哈赤命穆哈连领兵一千人，收虎尔哈部遗民。^⑦一六二五年，努尔哈赤派兵征南路虎尔哈部。一六三五年，派兵征黑龙江虎尔哈部时，皇太极对出征的人员说：“攻略时，宜与之曰，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尔等向未之知，是以甘

① 《清太祖实录》，第四卷，甲寅年十一月乙酉朔；乙卯年十一月癸酉朔；《西伯利东偏纪要》。

② 《清太祖实录》，第四卷，甲寅年十一月乙酉朔；乙卯年十一月癸酉朔；《西伯利东偏纪要》。

③ 《清太宗实录》，第二五卷，天聪九年十月癸未；《西伯利东偏纪要》。

④ 《清太宗实录》，第一二卷，天聪六年十二月乙亥；第二三卷，天聪九年六月丁未；第二五卷，天聪九年十月癸未；《西伯利东偏纪要》。

⑤ 《清太宗实录》，第一二卷，天聪六年十二月乙亥；第二三卷，天聪九年六月丁未；第二五卷，天聪九年十月癸未；《西伯利东偏纪要》。

⑥ 《清太祖实录》，第五卷，天命三年十月丁卯。

⑦ 《东华录》，第一卷，天命四年正月庚戌。

于自外。”^①由于皇太极采取了这种“征抚并用”的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征战过程中，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对归附的上层人物采取了联姻、封官、“赐以田庐”等各种政策，结果虎尔哈各部相继归附。

萨哈连部位于黑龙江中游两岸。该部也是满族的一支。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命大臣扈尔汉、安费扬古率兵二千征萨哈连部，“行至兀尔简河，剖舟二百，水陆并进，取河南北诸寨，凡三十有六。”以后渡黑龙江，取萨哈连十一寨。^②

使犬部（主要是赫哲人），居于乌苏里江下游，至松花江、黑龙江会流处，沿混同江两岸。一六一六年，招服阴达琿塔库喇喇（即使犬部，今抚远，与苏联哈巴罗夫斯克附近）、诺罗（今挠力河附近）、石喇忻（今七星河一带）等三路（明喜申卫、亦儿古里卫、亦速江卫）。三处路长四十人，率众来归，努尔哈赤对他们给与赏赐，授以官吏。从此使犬部每年来贡貂皮。^③

使鹿部（主要是鄂温克人），居住在今苏联滨海地区北半部，外兴安岭以南，阿穆贡河流域、乌第河流域以及库页岛等地。一六一七年，努尔哈赤派兵征库页及附近

① 《清太宗实录》，第二一卷，天聪八年甲戌十二月壬辰。

② 《清太祖实录》，第五卷，天命元年七月丁亥；天命元年八月己亥朔；金梁辑：《汉译满文老档拾零》第二一一四页。

③ 《清太祖实录》，第五卷，天命元年八月己亥朔；天命三年二月辛卯朔。《东北边防辑要》下卷；《西伯利东偏纪要》；《清文献通考》第二七一卷，舆地三。

小岛。^①这个地区的各个部落，也都先后向皇太极进贡，表示臣服。^②

“索伦诸部”是黑龙江“土著之民”，从精奇里江到额尔古纳河，从小兴安岭到外兴安岭，整个黑龙江上游两岸，都是他们驰骋游猎的地方。一六三四年，索伦部首领巴尔达齐（达斡尔人）率众归附，以后多次来朝贡貂皮等物。^③一六三六年，另一索伦部首领博木博果尔也向清臣服，“既而叛去”。皇太极于一六四〇年派兵平叛，攻克了索伦部的雅克萨城（今苏联阿尔巴津城，明卜鲁丹河卫）、乌库尔城（在乌库尔河与黑龙江会流处附近）、阿萨津城（乌库尔城之东南黑龙江北岸，明出万山卫）、铎陈城（在阿萨津城之东南，明出万山卫）等木城。对博木博果尔的残余势力，一直追到齐洛台地方（今苏联赤塔附近），^④获胜而归。至此，黑龙江北岸，雅克萨至精奇里江（今苏联结雅河）一带的索伦部落，皆置于清政权的管辖之下。

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还先后招收和征服了西至贝加尔湖的蒙古诸部。一五九四年，北科尔沁部、喀

① 《清太祖实录》，第五卷，天命二年二月丙申朔；《东北边防辑要》卷上，《库页岛沿革形胜考》。

② 《清太宗实录》，第五九卷，崇德七年三月癸巳。

③ 《清太宗实录》，第一八卷，天聪八年五月丙戌朔；《黑龙江志稿》第五四卷《人物志·巴尔达齐》：“天聪八年，巴尔达齐来朝，贡方物，太宗妻以宗室女，授额附。”

④ 《清太宗实录》，第五一卷，崇德五年三月乙丑；第五三卷，崇德五年十二月乙未；《东北边防辑要》下卷，《西伯利东偏纪要》。

尔喀五部遣使通好。^①一六〇六年，尊努尔哈赤为“神武皇帝，自此蒙古各部朝贡岁至。”^②一六三五年，编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为十一旗。^③此后，厄鲁特、鄂嫩河及尼布楚一带的茂明安等部，相继率部归服。满清贵族用封官、联姻，巩固对蒙古诸部的统治。

清统一东北以后，清太宗皇太极的诏书表明，从鄂霍次克海，到贝加尔湖，包括外兴安岭以南和库页岛在内的原属于明朝版图的广大地域，都已纳入清政权的管辖之下。^④而分布于这一地区的明朝臣民，如鄂温克、达斡尔、赫哲、鄂伦春、费雅克、蒙古等族，当然也都成为清王朝统治下的臣民了。

清入关以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领导的东北统一事业进展迅速，根本原因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由于实现统一，结束了分裂动荡的局面，这就有利于东北社会经济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东北边疆的巩固。当沙俄侵略者东侵时，满族和其他各族人民英勇反抗，给侵略者以迎头痛击，胜利地保卫了中国的神圣领土，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① 《东华录》，第一卷，甲午正月。

② 《东华录》，第一卷，丙午正月。

③ 《东华录》，第二卷，天聪九年二月丁亥。

④ 《清太宗实录》，第六一卷，崇德七年六月辛丑：“予继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

清政权对黑龙江流域实行有效的管辖

苏修伪造历史，胡说什么“早在那些遥远的时代，俄国就着手开发几乎无人居住和不受任何人管辖的阿穆尔沿岸和滨海地区了。”^①还说居住在黑龙江两岸的“土著部落纳双重贡”，^②等等。这也是不值一驳的。历史的真相是：一六四四年清入关前，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为首的满族统治者，不仅接管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两岸这片广大领土，而且行使了国家主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进行了有效的管辖。

公元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政权，一六三六年皇太极改称为清。清政权为了巩固和加强对整个东北地区的统治，和明朝一样，采取设官镇守的办法。在黑龙江下游，派官兵“驻防”宁古塔，在黑龙江上游索伦部居地也有“兵将留守”。^③同时，对那些主动来归和被征服的各部首领，分别授以“牛录章京”等官职。这些新任命的官吏，有的入八旗，随军作战；有的任官后复还原籍。如索伦部都勒古尔、达大密、阿济布等人，就是授为“牛录章

① 齐赫文斯基等：《论俄中边界形成史》，载苏联《国际生活》杂志，一九七二年第六期。

② 米亚斯尼科夫：《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二卷《前言》。

③ 《清太宗实录》，第三二卷，崇德元年十二月壬申；第三五卷，崇德二年五月癸未；第五二卷，崇德五年七月癸未。

京”后，又回索伦故地管理“新降人口”的。^①这样做，就加强了清政权对黑龙江流域的管理。

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创建的“兵民一体”的满族社会组织形式。^②按规定，“凡隶于旗者，皆可以为兵。”^③随着统一事业的发展，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把征服的各部落也“编户入旗”，称为“伊彻（满语：新）满洲”。一六四〇年将索伦、达斡尔部所归附的人民“均隶八旗，编为牛录”，“其中有能约束众人，堪为首领者，即授为牛录章京。”^④对虎尔哈等部来归人员则“按丁披甲，编补各旗缺额者。”^⑤清统治者为扩大兵源，凡“新满洲”壮丁，“俱令披甲”，“均隶各旗”。索伦、达斡尔人骁勇善战，对东北的统一事业和巩固边防，起了积极作用。

清政权对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各族居民，除直接编入八旗者外，还通过“噶珊”（或称“嘎山”）的基层行政组织进行管辖。“噶珊”（满语，即乡村）由不同的家族和个体家庭组成，乡村的首领叫“噶珊达”，即乡长，还有“喀喇达”，即氏族长（姓长）。所谓“设姓长、乡长，分户管辖”。^⑥

① 《清太宗实录》，第五六卷，崇德六年六月辛亥、甲寅。

② 《清太宗实录》，第七卷，天聪四年五月壬辰，皇太极说：“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

③ 《清文献通考》，第一七九卷，兵一。

④ 《清太宗实录》，第五一卷，崇德五年五月戊戌；第五二卷，崇德五年七月癸未。

⑤ 《皇清开国方略》，卷三一，太宗崇德八年七月戊戌。

⑥ 《清文献通考》，第二七一卷，舆地三。

据记载，乡在天命年间就已经存在，^①就连隔海相望的库页岛上，也“设姓长、乡长以统之。”^②“噶珊”具有双重性质，既是部落组织，又是地方基层机构。“喀喇达”（氏族长）、“噶珊达”（乡长）既是部落首领，又是握有实权的地方官吏。他们的职权范围很广，除了管理户口、催纳贡物，定期向清政权缴纳赋税，^③还处理乡内的不法不平诸事。^④

马克思指出：“捐税体现着表现在经济上的国家存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清政权对黑龙江流域的主权和有效管辖还表现在征收贡赋方面。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统一黑龙江流域过程中，把被征服各部“编为户口”，下令贡献方物。居于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各部族归附后，“以丰貂之产，岁时献纳。”^⑤那里物产丰富，如清代有诗形容的那样：“东瀛地区富难详，美毳尤称貂鼠良。”^⑥索伦部首领巴尔达齐以及一些小部落首领或族长，带着貂皮、狐皮、海獭、海豹皮等土物特产，每年从黑龙江地区定期到盛京（今沈阳）向清缴纳赋税。索伦、达

① 金梁辑：《汉译满文老档拾零》户口迁移：天命八年七月初二日记户口迁移情况时，就提到四十多个乡。

② 石荣璋：《库页岛志略》，卷一。

③ 《东北边防辑要·库页岛沿革形胜考》卷上；间宫林藏：《东鞑纪行》，一九三五年，大连版，九〇页。

④ 《西伯利东偏纪要》卷下：“其一姓一乡各有长，有不法不平诸事，则投姓长、乡长，集千证，公议处置。”

⑤ 《清文献通考》，第二七一卷，舆地三。

⑥ 《吉林外纪》，第一卷。

斡尔人“无问官兵散户，身足五尺者，岁纳貂皮一张。”^①“岁时进献”的大小部落首领，有的几人，几十人，多者达一百多人，“贡献不绝于道”。^②这种情况，从天命年间起从未间断。对前来朝贡者，清政权分别赏赐给蟒缎、朝衣、镶领、缎袍、弓矢、甲胄、银器等物，有时皇太极还亲自接见，设宴款待。

使犬、使鹿部被招附之后，每年也以貂皮等土产，就近向宁古塔的清官吏缴纳贡物。一些散居较远的地方，如库页岛等地，不能按时到宁古塔，清政权每年派官员到黑龙江下游的普禄（今苏联波卡罗夫卡附近）、台伦（今苏联卡尔吉），或到伊曼（今苏联伊曼河附近）地方开设临时衙门，作为受纳贡物、发放赏赐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各族部落，有的一年一贡，有的两年一贡，“岁有贡额，第其等以行赏”。^③从满族统治者建立后金政权以来，已成定例。^④

因此，苏修说居住于黑龙江流域各族部落是“纳双重贡”的，纯属欺人之谈。黑龙江流域各族人民向中国的历代政府缴纳赋税，这是历史事实；至于所谓向俄国“纳贡”则完全是别有用心捏造的。

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早在十七世纪上半叶，满族统

① 《黑龙江外记》，第五卷。

② 《清太宗实录》，第一七卷，天聪八年二月己巳。

③ 《盛京通志》，第一五卷。

④ 《清文献通考》，第二七一卷，舆地三；间宫林藏：《东槎纪行》，第三四页；吴振臣：《宁古塔纪略》。

治者就继中国明朝之后，对包括库页岛在内的整个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确立了行政管理，设官镇守，征兵收税。那种所谓黑龙江流域“几乎无人居住和不受任何人管辖”的论调，又是何等的无稽！

黑龙江流域是满族的故乡，清政权对黑龙江流域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史有明文，中外昭知。就连俄国人自己也承认：“在俄国文献里，根本没有关于阿穆尔地区古代居民的记载”。“它的过去紧密地与中国历史相联”。^①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黑龙江流域“游历”的马克也明确地说：“中国政府历来就管辖着黑龙江两岸，松花江过去一直是而且至今仍然是中国政府活动到这里的通道。很久以来，满洲官员每年都从松花江来到黑龙江，沿江而下，向附近居民征收贡赋，直到基立亚克人居住的地区。”^②大量中外文献中，关于黑龙江流域受清政权管辖，人民向满族统治者缴税、纳贡的记载，无可辩驳地说明了黑龙江流域已纳入了清的版图。因此，当哈巴罗夫等沙俄强盗向黑龙江地区的达斡尔人勒索毛皮的时候，达斡尔人严正拒绝说：“我们是向沙姆沙汗（即中国皇帝）缴纳贡赋的，为什么我们要把贡赋缴给你们？”^③“你们一定要强求，我们只有战斗。”^④表现了中国各族人民反抗外来侵

① 冈索维奇：《阿穆尔边区史》，一九一四年海兰泡出版。

② 马克：《黑龙江旅行记》。

③ 俄国古文献委员会：《历史文献补编》，卷三，圣彼得堡，一八四八年，第五八——五九页。

④ 索洛维约夫：《俄国古代史》，第一二卷，一八七九年彼得堡出版。

略的英雄气概。有压迫就有反抗，有侵略就有反侵略的斗争。当哈巴罗夫一伙匪徒对于达斡尔人打家劫舍，惨无人道地屠杀居民的时候，达斡尔人进行了炽烈地战斗，顽强地捍卫了自己的家园。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老沙皇妄图灭亡中国的迷梦破灭了，新沙皇步其后尘也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雅克萨战争是中国抗击 沙俄侵略的正义战争

——驳苏修歪曲雅克萨战争性质的谬论

群 哲

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发生在黑龙江上游地区的雅克萨战争，是中国为驱逐沙俄侵略者，收复被侵占的神圣领土而进行的一场正义战争。这场战争是沙俄强迫中国进行的。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初开始，沙俄就派出小股武装匪徒，侵入中国的黑龙江流域，践踏中国的主权，掠夺中国人民的财产，残害中国人民的生命。中国政府虽然多次提出抗议和进行交涉，沙俄却置若罔闻。中国军民才被迫奋起自卫，抗击沙俄侵略。雅克萨战争是中国军民反击沙俄侵略的正义战争，这本来清清楚楚，早有定论。可是，近年来，苏修叛徒集团出于反华、扩张的政治需要，竭力替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老沙皇辩护，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制造舆论。他们指使其御用学者，炮制了许多歪曲、篡改、伪造中国历史的“专著”。这些所谓的“专著”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肆意篡改中俄早期关系史；歪曲雅克萨战争的性质。苏修官员贾丕才在一篇文章中胡说什么：雅克萨战争是“入侵俄国领土”，“目的是把俄国

人从自古以来就是他们所开拓的地区排挤出去”^①。苏修御用学者齐赫文斯基、麦利霍夫等抛出的《中国近代史》、《十七世纪满洲人在东北》等所谓“专著”，也企图论证这些谬论。表面上，他们旁征博引，实际上是断章取义，随意歪曲、篡改历史，手法极其卑劣。

一、雅克萨战争是沙俄侵占 中国领土引起的

苏修御用学者说什么：黑龙江沿岸地区——包括雅克萨在内——是俄国“新土地发现者”所“开发”的，并已“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正式并入俄国版图”。他们不厌其详地列举了“八十年代之前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即黑龙江沿岸地区。——引者）修建起的所有城堡”的名字，说什么：“到满军进攻这些地方之前”，“上迄石勒喀河，下至库马拉河（即呼玛河。——引者）”，“已经有了二十多个居民屯落”^②。他们根据这些就煞有介事地得出结论说：应把中国“在一六八三——一六八六年间在阿穆尔沿岸地区采取的军事行动看作掠夺战争和侵略行为”^③，是中国“企图用武力把它的控制权扩张到俄国人居住并已开

① 贾丕才：《证实真相的文件》，载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苏联《消息报》。

② 麦利霍夫：《十七世纪满洲人在东北》，一九七四年俄文版。

③ 同上。

发的领土上”^①。他们喋喋不休地说了这么多，总括起来不外是说：中国发动雅克萨战争是在“俄国领土”上进行的，因而是“侵略”，是“扩张”。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黑龙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明载史籍，举世皆知。远的不说，八世纪上半叶，唐朝在此地就设立了室韦都督府和黑水都督府。十世纪的辽朝直接统辖这一地区。十二世纪，金朝则在黑龙江上游和下游分别设立蒲与路和胡里改路。雅克萨地区属蒲与路管辖。十三世纪，元朝则在这些地区设置了开元路和水达达路。

到了明朝，对黑龙江地区的管辖更加健全。统辖包括黑龙江流域在内的广阔地区的著名的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建立在一四〇九年（明永乐七年），它下设四百多个卫、所，形成一个巨大的行政管辖网。雅克萨地区属一四〇七年（永乐五年）三月设立的卜鲁丹河卫管辖。《明实录》记载了这些地方的各族人民向明朝交纳贡赋等事。例如，一四〇七年，在卜鲁丹河卫设立的前五天，该处女真人来朝^②。一五一三年六月，“海西卜鲁丹河等卫女直都指挥同知亦哈纳等来朝贡马，赐宴并赏金织衣、彩缎等物有差”^③。这一切证明，远在地处欧洲的俄罗斯形成统一国家之前，中国便早已开始管理黑龙江地区，并且在此地有效地行使管辖权了。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第五七页。

② 《明太宗实录》，卷四八，永乐五年三月。

③ 《明武宗实录》，卷一三二，正德八年五月。

苏修御用文人对这些历史事实噤若寒蝉，讳莫如深，竟然采用割断历史的手段，欺骗世人。他们胡说什么：“满清编年史《实录》和其它清代官修文献提供的性质各不相同的文件证明，现代黑龙江的领土，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初以前并不属于满人，也未作为边外领土纳入清帝国的管辖范围之内”^①。这种割断历史的拙劣手法根本不值一驳，因为凡是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中国的历史并非自清代开始，清代只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的一个阶段而已。而且，即使在清代，这些地区也完全是中国的领土，历史事实绝不象苏修文人所捏造的那样。

清朝统治者在入关之前，经过统一东北各部至一六四二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已全部接管了原明朝所属奴儿干都司属下各卫、所，黑龙江流域也已归清朝管辖。当时的清太宗皇太极给明崇祯帝的信中已经明确指出：“予纘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指鄂霍次克海及日本海。——引者），迄西北海滨（指贝加尔湖——旧称北海或白海。——引者），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②。清朝统治者取得全国政权之后，设置宁古塔将军管辖黑龙江沿岸地区。至于包括雅克萨在内的黑龙江上、中游地区的各民族——索伦、达斡尔等，至崇德年间

① 麦利霍夫：《十七世纪满洲人在东北》。

② 《清太宗实录》，卷六一。

(一六四〇年前后)皆已先后“分隶八旗,编为牛录”^①,属宁古塔将军辖区,由布特哈总管等官员管理^②。

中国历史上的大量文献表明,黑龙江地区的索伦、达斡尔等民族与清朝政府具有密切的政治联系,而其中较突出的例子是达斡尔族的一位首领巴尔达齐。巴尔达齐自天聪八年(一六三四年)至顺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年)先后二十余年岁岁来朝进贡,从未间断。清朝政府册封他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满语,清初世袭武职名,汉名为外卫都指挥副使。),由于他娶了清皇族的女儿,又是清室额驸。巴尔达齐与其他达斡尔、索伦首领,如阿尔巴西等,世居黑龙江中上游地区,一直是中国属民,担任政府官职,管理这一地区的居民和土地。

可是苏修御用学者竟无视大量事实,公开说谎,胡说什么黑龙江沿岸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他们所开拓的地区。实际上在中国政府有效地管理这一地区,中国人民对这一地区的开发已取得显著成就的时候,俄罗斯人不仅没有到过黑龙江沿岸,他们甚至还不知道有黑龙江这条长川巨流。俄国历史文献证实:俄罗斯人首次得知黑龙江的传闻已是一六三六年^③。黑龙江地区广阔富饶的情况,

① 《朔方备乘》,卷二,《索伦诸部内属述略》。

② 见《朔方备乘》卷二:“布特哈初设索伦、达呼尔总管二员、副总管八员,谓之打牲头目、副头目……盖布特哈为打牲部落之总称,故东北数千里内处山野、业采捕者悉隶之”。

③ 冈索维奇:《阿穆尔边区史》,附录《阿穆尔大事年表》,一九一五年俄文版。

使得侵略成性的沙俄政府垂涎三尺。一六四三——一六四四年间，沙俄政府派出的以雅库次克文书官波雅科夫为首的一小股武装匪徒第一次侵入到黑龙江沿岸中、下游。沙俄第一批入侵者到处流窜作恶，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反抗和打击之下，并未能长期驻足。不过，这伙入侵匪徒倒亲眼看到：黑龙江和精奇里江沿岸的“达斡尔人村落一个接着一个，……种植着大麦、燕麦、糜子、大麻、荞麦和豌豆的田地几乎阡陌相连。此地的达斡尔人畜养着很多家畜和家禽——马、牛、羊，尤其是猪和鸡”，除盛产粮米外，“巴尔达齐处生长着蔬菜、黄瓜、罌粟、大豆、蒜、苹果、梨、胡桃和松果”^①。事实雄辩地证明，在沙俄侵略者到来之前黑龙江沿岸地区早已为中国各族人民所开发，农业、畜牧业的发展都已相当可观。

一六五〇年，沙俄政府派出一股以哈巴罗夫为首的武装匪徒经另一路线再次侵入黑龙江上、中游地区。正是这伙攻城略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匪徒，第一次侵占了中国的雅克萨城。雅克萨位于黑龙江上游左岸，地当“水陆扼要之区”^②。雅克萨为女真语，意为“刷坍了的河湾子”^③。哈巴罗夫入侵时，此城是中国达斡尔首领阿尔巴西的驻地。在黑龙江右岸，我国境内有一道小河，名字就叫阿尔巴西河（现名额穆尔河），雅克萨城就位于此

① 转引自卡马宁：《最初的远东探险者》，一九五一年俄文版。

② 《朔方备乘》，卷一四，《雅克萨城考》。

③ 《清文鉴》，卷五，地輿。

河口的对岸^①。俄国历史记载说，一六五一年哈巴罗夫潜入黑龙江时，“看中了此城的位置和防御设施……所以他决定留在此处，加固设防，把它作为自己在阿穆尔河上的所谓驻地。此城根据达斡尔酋长阿尔巴西的名字，定名为阿尔巴津”^②。

哈巴罗夫等盘踞雅克萨，四出侵掠，蹂躏中国居民，激起中国各族人民的无比愤慨，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关注。在中国军民打击之下，这群入侵黑龙江沿岸地区的沙俄匪徒一度已基本被肃清。但是，事隔不久，到了一六六五年，以切尔尼戈夫斯基为头子的一伙亡命徒再次窜入黑龙江上游，他们“恃雅克萨为窠穴”，四处抢掠，作恶多端。他们的侵略魔爪甚至伸到了中国东北的腹地。中国各族人民在自己的国土雅克萨一带打猎，也常常惨遭杀害。在俄国的官方文件里曾有一段这样的记载：一六八二年，“在菲律普斋戒期前的最后荤食日以前五或六天，即纪念米哈依尔的那一天，阿尔巴津哥萨克在上游的修道院屯把二十名中国猎人诱到冬营之内，在冬营里把他们活活烧死；中国猎人带有的马匹和粮食、器物，都被阿尔巴津哥萨克抢去了”^③。在中国文献里也记载了此事：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九月的一份上谕里说：

① 见中国出版的《黑龙江舆地图》等地图，亦可参照《十七世纪俄中关系》一书所附的十七世纪沙俄哥萨克别伊顿绘制的草图和十八世纪初列麦佐夫绘制的《阿穆尔河流域图》，参阅冈索维奇的《阿穆尔边区史》。

② 戈鲁勃佐夫：《阿尔巴津古城的历史》，第六页，一九〇二年俄文版。

③ 《历史文献补编》，第一〇卷，二三一页，俄文版。

“罗刹尚执迷不悟……又诱索伦、打虎儿、俄罗斯春之打貂人额提儿克等二十人入室，尽行焚死”^①。

沙俄侵略者的种种暴行，破坏了黑龙江沿岸地区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和平生活，破坏了该地区农牧业经济的发展。沙俄入侵的几十年间，黑龙江沿岸这片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大好河山竟被哥萨克糟蹋得支离破碎。一九三五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指出：随着沙俄哥萨克“侵入和平的达斡尔地区而来的是居民受到残酷的毁灭和土地遭到蹂躏。原来的城市变成废墟，耕地荒芜，居民……离弃家园”^②。这就是苏修御用文人所吹嘘的沙俄对黑龙江沿岸地区“已有四十年历史”的“开发”、“开拓”的真实情景！

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沙俄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为非作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当然不能置之不理。沙俄入侵中国领土、残害中国人民就是雅克萨战争的起因。

二、雅克萨战争是中国被迫进行的

苏修御用学者为了把雅克萨战争说成是中国对俄国的侵略，对战争前中国所作出的一切和平努力极力进行

① 《清圣祖实录》，第一一二卷，四——六页。

②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五九卷，三七三——三七四页，一九三五年俄文版。

歪曲，对中国多次提出的抗议交涉只字不提，可是事实胜于雄辩，谎言改变不了历史。

沙俄哥萨克入侵黑龙江流域的最初年代，恰值中国的清王朝刚刚建立，全国统一事业尚未最后完成，国内战争频繁，清王朝在当时不得不将主要注意力用于处理国内事务。因此，清政府对处理俄国入侵问题的意图是争取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一六五五年，沙俄政府第一个使团来中国，清政府当即义正辞严地质问沙俄使臣贝科夫：为何“俄国哥萨克窜扰黑龙江、残害中国属民”？贝科夫推诿罪责，声明侵袭黑龙江地区的哥萨克是“盗匪”，“他们作战是未经俄国君主允准的。”后来几个前来中国的沙俄使臣，如阿勃林等也都作过类似的声明^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为维护自己的神圣主权和各族人民的生命安全，便不得不以武力去反击窜犯黑龙江、为非作歹的哥萨克。于是发生了呼玛尔河口（一六五五年），尚坚乌黑（一六五七年），松花江口一带（一六五八年），古法坛村（一六六〇年），黑喇苏密（一六六四年）等几次战斗，从而在一段时间内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基本上肃清了黑龙江沿岸及其各支流的沙俄入侵者。

但是，沙俄政府并未因武装入侵受挫而放弃其侵略野心，他们除继续乘隙侵占中国领土，“筑室盘踞”，“戕害中国居民”外（一六六五年切尔尼戈夫斯基率领的一批沙

^① 班蒂什—卡敏斯基：《一六一九——一七九二年俄中外交文件汇编》，一七页，一八八二年俄文版。

俄亡命徒潜入并占据中国领土雅克萨),进而在中国边境地区进行策反颠覆活动,挑拨中国边境各族关系,挑动厄鲁特与喀尔喀之间的战争,企图以此削弱中国边防,制造民族纠纷,趁机混水摸鱼,取而代之。

一六六七年,中国索伦族的一个佐领根特木尔叛国投俄。清朝政府派遣一名扎尔固齐率兵追至尼布楚索讨根特木尔,并质间盘踞雅克萨、尼布楚等地侵扰黑龙江地区的究竟是什么人。沙俄督军达·阿尔申斯基在中国方面追究之下供认:他们并非什么“盗匪”,而是“大君主白沙皇的臣民”,在这些地方筑城“也是奉有上谕。”^①由此可见,哥萨克的入侵是奉沙皇的命令进行的。当时扎尔固齐虽率有军队,但并未诉诸武力,而是正式要求俄方交还遁逃。嗣后不久,清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的外交措施。

首先,清政府责成驻防脑温江(今齐齐哈尔一带)的达斡尔头目(相当于副都统)孟额德(一作孟格德)同俄方作初步接触。孟额德先后两次(一六六九年十二月十日和一六七〇年四月十五日)差遣属下官员沙兰岱至尼布楚洽商。第二次去时,沙兰岱携有中国理藩院以康熙皇帝名义写给阿尔申斯基的正式咨文。咨文除指控哥萨克的侵略罪行外,要求俄方归还根特木尔等逃人,并表示,今后“倘贵国有何言词通知我,可派使臣前来与朕面

^① 班蒂什—卡敏斯基:《一六一九——一七九二年俄中外交文件汇编》,一七页。

谈。”^①从而表达了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沙俄哥萨克侵犯中国边疆问题的意愿。

可是，沙俄政府不但没有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反而认为中国的和平建议是软弱可欺。阿尔申斯基按照沙皇的原有指示，竟然派遣军役人员米洛万诺夫等为使臣，前来北京，他携带一封语词狂妄的训令要求中国“归依”沙皇的“最高统治之下”^②。虽然这个训令被中国方面当作国书留下，但担任翻译的耶稣会士和负责接待的中国大臣未敢如实上报康熙，只转达了沙皇愿与中国皇帝友好相处的建议。因此米洛万诺夫等仍受到了热情接待。但是，当中国方面问及根特木尔及哥萨克入侵等事时，米洛万诺夫便按训令借词推诿，所以此次交涉未取得任何结果。

清政府误认沙俄方面表示了和好相处的愿望，认为两国有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基础，决定再从自己方面进一步加强努力。于是派遣级别较高的孟额德賚（jī 音击，带着的意思）送康熙皇帝致沙皇的国书，去尼布楚。在这份发于一六七〇年六月二十九日的国书里，康熙除了谴责哥萨克残害中国的“朱里真（即女真人，俄国称之为吉切尔人）与达斡尔人”，要求归还根特木尔等逃人外，再次

^① 班蒂什—卡敏斯基：《一六一九——一七九二年俄中外交文件汇编》，一七——一八页；《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二六九——二七七页，俄文版。

^②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二七〇——二七一页；《故宫俄文史料》，二六七——二六九页。

表示：“今贵君主既望与我和好相处，则理当归还逋逃之根特木尔，今后不在边界等处滋生事端”^①。孟额德也当面向阿尔申斯基指控了盘踞雅克萨的切尔尼戈夫斯基的种种罪行^②。阿尔申斯基当即许诺归还根特木尔^③，并且表示下令严禁雅克萨处哥萨克恣意妄为^④。

但是，沙俄方面背弃诺言，根特木尔等逃人始终不见归还，哥萨克仍然骚扰劫掠不止。一六七〇年至一六七二年之间，孟额德接连三次去尼布楚，催问沙皇是否已对一六七〇年六月二十九日的中国国书作出答复，但每次都徒劳往返，没有结果。直至一六七四年八月，当中国方面询问来华贸易的色楞格斯克商人罗曼诺夫等，是否赍来沙皇的复信时，罗曼诺夫等依旧推说不知^⑤。过去某些历史学家解释沙皇政府长期默不作答的原因是：“这些信件（指中国历次发出的信件）有些是从来就没有送达目的地，要不就是几年以后才送到莫斯科”^⑥。事实并非如此。最近苏联发表的沙俄历史档案资料（载《十七世纪俄中关

① 班蒂什—卡敏斯基：《一六一九——一七九二年俄中外交文件汇编》，二〇——二一页；《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二七六页。

② 班蒂什—卡敏斯基：《一六一九——一七九二年俄中外交文件汇编》，二一页；《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二八〇页。

③ 班蒂什—卡敏斯基：《一六一九——一七九二年俄中外交文件汇编》，三三页。

④ 《平定罗刹方略》，《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二八〇页。

⑤ 班蒂什—卡敏斯基：《一六一九——一七九二年俄中外交文件汇编》，二三页。

⑥ 〔法〕葛斯顿·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八页。

系》第一卷)证明,这些国书和咨文一经到达俄方,俄国地方当局便立即译成俄文,派特使专程驰送莫斯科^①。可见沙俄政府早已了解这些信件的内容,只是佯作不知而已。

一六七六年,正当中国发生“三藩之乱”之际,沙俄政府派来一个以尼古拉·斯帕法里为首的规模庞大的使团。清政府以为这个使团来华的宗旨是答复中国方面的倡议,和谈解决沙俄入侵中国和收留逋逃等问题,所以十分重视,给以热情接待。孰知沙俄使团来意并不在此。斯帕法里在向中国提出的十二条交涉事项中,没有一条涉及归还逋逃和停止俄方侵略等急待解决的问题,只是要求通商贸易。当清政府屡屡催问时,斯帕法里仍旧佯称不知,拒不作答。斯帕法里口头上说,此行意在修好,实际上不仅不肯解决妨碍两国和好相处的重大问题,反而多方刺探中国情报。他通过贿赂在华的外国耶稣会士(如南怀仁、徐日升等)搜集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而南怀仁等也向他建议,俄国可乘中国内务紧张之机,派军队“教训”中国^②。

沙俄政府的所作所为已使清政府忍无可忍。清政府当即向斯帕法里提出要求:俄国哥萨克必须无条件地退出中国领土,归还逃人根特木尔等,否则中国政府拒绝接待俄国来使,停止贸易往来,并且要求斯帕法里据此如实

①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一三五、一三七号文件。

② 班蒂什-卡敏斯基:《一六一九——一七九二年俄中外交文件汇编》,三三——三五页。

转告俄国沙皇^①。

斯帕法里归国后，沙俄政府依然我行我素，对中国的要求置若罔闻，拒不作复。

这就是雅克萨战争之前，中俄两国之间外交交涉的概况。从中可以看出，在对待两国关系上，中俄两国所持态度截然不同。中国方面只要有可能，便力争和平解决，因此行动是主动的，积极的。而沙俄政府方面，意在侵略，怂恿哥萨克入侵作恶，自己则佯作清白；无法继续欺骗时，则装聋作哑，搪塞敷衍。然而苏修御用文人秉承苏修领导集团的旨意，为老沙皇的侵略政策辩护，竟对中国的和平要求也肆意歪曲，胡说什么，这是“用来作战争准备的伪装和迷彩。”^②可是，事实戳穿了他们的拙劣伎俩，历史证明，施展诡谲阴谋，欺诈狡辩，出尔反尔等手段，蓄意侵略、扩张的恰恰是苏修御用文人为之涂脂抹粉的沙俄政府！

十余年的外交交涉，使清政府认识到，对待侵略成性的沙俄政府仅靠和平建议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从而被迫得出结论：“若辈非创以兵威，则罔知惩戒，将至蔓延，遂决意征剿。”^③

总之，由于沙俄政府坚持入侵中国，中国被迫进行的

① 班蒂什—卡敏斯基：《一六一九——一七九二年俄中外交文件汇编》，三三——三四页；《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

② 麦利霍夫：《十七世纪满洲人在东北》。

③ 《平定罗刹方略》。

一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三、雅克萨战争得到中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援

苏修御用学者为了歪曲雅克萨战争的性质，挖空心思地编造谎言，声称黑龙江沿岸各族人民“根本没有”向清政府“提出什么援助或保护他们免受俄国人迫害的要求”。他们“根本不愿与满人在阿穆尔河建立的统治相妥协”，“他们逃离满人控制，努力保持俄国国籍”^①。苏修御用学者编造谎言，其目的就是妄图证明黑龙江沿岸各族人民与中国无关，清政府采取军事行动驱除沙俄侵略者是违反当地人民意愿的“侵略”、“扩张”。这完全是对历史的歪曲，是对中国黑龙江沿岸各族人民的污蔑！

世代居住黑龙江沿岸地区的索伦、达斡尔、奇勒尔、赫哲、费雅喀等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土地。沙俄的武装匪徒侵入黑龙江流域，使他们遭到野蛮的残害和抢掠。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和生命财产，从沙俄武装匪徒侵入黑龙江沿岸那一天起，就坚持不懈地进行殊死斗争。俄国历史清楚地记载着，沙俄武装匪徒哈巴罗夫侵入黑龙江沿岸地区时，“达斡尔人决心反抗，不肯让哥

^① 麦利霍夫：《十七世纪满洲人在东北》。

萨克踏入自己的土地。”^①甚至当这些民族的首领被沙俄捕去作人质以后，虽然横遭严刑拷打，还是坚定地回答侵略者：“我们宁愿自己死去，这总比我们的人都死了强。”^②对于达斡尔人这种宁死不屈的事迹，俄国历史学家曾作过这样的评论：这种情况，在别的地区……“从未发生过。那时往往是一捉到酋长充当人质，全族人便缴纳贡税，俯首帖耳了。可是达斡尔人则进行战斗，他们与其说是为了自己的酋长，勿宁说是为了自己的土地和他们本人的生存。”^③俄国官方文件也记载：“达斡尔人与吉切尔人曾进攻阿尔巴津”，并于城外杀死十二名侵略者^④。甚至到近代，在黑龙江下游的费雅喀人中间，还流传着他们用各种巧妙的办法惩治入侵敌人——沙俄哥萨克的传说故事^⑤。历史记载，不仅戳穿了苏修御用学者所编造的黑龙江沿岸各族人民“逃离满人控制”、“归附”俄国的谎言，而且也充分反映了中国当地各族人民与外来侵略者进行殊死斗争的英雄气概。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

①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卷一，六七页，一九一六年俄文版。

②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一九二五年俄文版。

③ 萨道夫尼科夫：《我们的新土地发现者》，九六页，一九〇五年俄文版。

④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一三二号。

⑤ 参见施捷恩别格：《基立亚克、奥洛奇、果尔特、涅吉达尔、爱奴》，二九五——二九七页，俄文版。

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雅克萨战争就是在黑龙江沿岸地区的各族人民强烈地要求解除外来民族的侵略压迫的情况下进行的。沙俄武装匪徒侵入黑龙江上游地区以后，中国的索伦族“时被其害，子女参貂，抢掠殆尽”，他们“数以罗刹之过上诉”^①。一六七〇年六月二十九日康熙致俄国沙皇的国书里也提到：“朕所属虞猎人等曾至石勒喀河打牲捕貂，彼等归奏：石勒喀河口阿尔巴津地方住有小股俄人……彼等滥肆攻袭朕之边民——达斡尔人及吉切尔人。”^②正是由于黑龙江沿岸地区的各族人民“数以罗刹之过上诉”，纷纷向清政府告警，清朝皇帝康熙才认识到：对于入侵黑龙江沿岸地区的沙俄武装匪徒，“不速加翦除，恐边徼之民不获定息”^③。于是决心发起反击。苏联早期的历史著作也承认，沙俄哥萨克侵入黑龙江沿岸地区以后，首先遇到的是当地各族人民的反抗，后来，当地人民看到仅凭自己的力量不能彻底驱除这些侵略者时，“便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他们的唯一的天然保护者”——他们的“最高君主中国皇帝”^④。今天苏修御用学者对这些清清楚楚的历史记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竟闭着眼睛胡说什么黑龙江沿岸各族人民根本没有向清政

① 刘献廷：《广阳杂记》。

②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二七六页。

③ 《平定罗刹方略》。

④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

府“提出过什么援助或保护他们免受俄国迫害的要求”，连一点“微小的暗示”也没有^①。这种胡说八道，说穿了就是企图否定黑龙江沿岸各族人民与清政府的隶属关系，从而为老沙皇的侵华罪行辩护，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服务。可是，墨写的谎言是掩盖不住铁的历史事实的！

黑龙江沿岸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当地各族人民历来就是中国的主人，十七世纪的清朝政府是封建统治者，他们同各族人民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但是，清政府为了抗击沙俄侵略而进行的雅克萨战争，是符合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因而它得到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支持。当清朝政府决定以武力驱逐沙俄侵略者，并把军队开赴黑龙江沿岸地区以后，当地各族人民受到极大鼓舞，清军所到之处屡屡出现“苍茫大碛旌旗行，属国壶浆夹马迎”的动人情景^②。惨遭沙俄侵略者摧残蹂躏的黑龙江沿岸地区的各族人民，纷纷拿起武器配合作战。一六八三年，居住在牛满江的奇勒尔人，在奚鲁葛奴的带领下，与一伙被清军追击的沙俄匪徒展开激战，杀死了十多个敌人。然后偕妻子儿女投奔清军营地。居住在精奇里江一带的鄂伦春人朱尔铿格率领同族人民反抗沙俄侵略者勒逼贡税，在战斗中杀死五个敌人，并缴获了枪支。黑龙江下游的费雅喀人，也多次与进犯的沙俄侵略者作

① 麦利霍夫：《十七世纪满洲人在东北》。

② 吴兆骞：《秋笳集》，卷三，《奉送巴大将军东征巡察》。

战^①。军民互相配合，共同作战，到一六八五年，除盘踞雅克萨一处的沙俄侵略者外，其余各处的沙俄侵略者已被扫荡殆尽。

当清政府军队准备对沙俄侵略者盘踞的雅克萨发动进攻的时候，黑龙江沿岸各族人民更加积极地投入了这场反侵略战争。无论是筑城堡、建驿站，还是造船舶、运粮秣，都有他们参加。他们还勇敢地深入敌后进行侦察工作。达斡尔副总管倍勒儿和索伦副总管乌木布尔代就曾亲率本族健儿，深入敌后，捕捉俘虏，探明敌情。在一次突然与敌人遭遇的战斗中，倍勒儿等击退了敌人，捕获了噶瓦力喇等七名战俘^②。当地居民有的还只身深入虎穴，机智地打入沙俄匪徒侵占的城堡内部，利用敌人贪婪的特性，以交实物税为名，刺探敌情^③。达斡尔人在雅克萨战争中有五百人参加军队作战。索伦族各佐领在保证驿路畅通，生产军需粮米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蒙古族为配合雅克萨战争，对沙俄盘踞的色楞格斯克也展开了攻势，杀伤了很多敌人，并迫使沙俄侵略者“不敢迈出城堡一步”^④。参加雅克萨战争的，还有远处福建、山东、山西、河南、直隶等省的汉人水师营、藤牌兵。他们在东

① 上述几例均见《平定罗刹方略》；亦见于《清实录》，《黑水先民传》等著作。

② 《平定罗刹方略》。

③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

④ 班蒂什—卡敏斯基：《一六一九——一七九二年俄中外交文件汇编》，三八页。

北边疆，英勇战斗，为保卫边疆作出贡献。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各族人民为了反抗外来民族的压迫同仇敌忾，誓逐入侵之敌。

围攻雅克萨城的战斗，开始于一六八五年六月。在攻城之前，清军派人送信给盘踞雅克萨的沙俄侵略者，令其撤离中国领土。沙俄侵略者置之不理，于是清军开始攻城。经过激烈战斗，城墙被摧毁，四分之一的敌人被击毙。城内残敌被迫投降。清军对投降的敌人令其返回本土，不得重返雅克萨。然而这些获释的沙俄侵略者竟然违背约言，与途中相遇的沙俄援军汇成一股，趁清军撤离雅克萨之机，重新窜回，妄图继续盘踞雅克萨，进行侵略扩张活动。一六八六年七月，清军不得不挥师北上，再次讨伐盘踞雅克萨之敌。经过半年左右的围困，沙俄侵略者所余不过百人，弹尽粮绝。沙俄政府终于认识到轻易侵占中国黑龙江沿岸地区的野心难以得逞，遂响应中国政府的和谈建议，派遣使臣于尼布楚与中国使臣举行会谈。清政府为了稳定南方的统治秩序，为了粉碎沙俄与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勾结，维护北部边疆，宁可做出割让领土的让步，也希望早日与俄国缔约。最后，中俄双方终于在一六八九年签署了《尼布楚条约》。按《尼布楚条约》的规定，中国收复了雅克萨。

历史上著名的雅克萨战争，其所以从始至终都得到中国各族人民的支持和积极参加，就是因为它反映了中国各族人民反对外来民族侵略压迫、保卫祖国领土完整

的共同愿望。特别是世代居住黑龙江沿岸地区的各族人民受尽了沙俄侵略者的摧残，因而他们反抗侵略的要求最强烈，打击敌人最勇敢、最坚决。他们在这场反侵略斗争中在人力、物力上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保卫祖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们的英雄形象不容苏修御用学者丑化，他们的伟大功绩也不容苏修篡改和抹煞。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指出：“数百年来，沙皇政府比任何专制魔王更厉害地掠夺和压迫其他民族，不仅压迫大俄罗斯民族，而且使大俄罗斯民族腐化堕落，成为屠杀其他民族的刽子手。”（《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的光辉论断已经给侵略成性、作恶多端的沙皇政府作出了严明的判决。今天，苏修叛徒集团及其御用学者竟然背弃列宁的教导，为老沙皇翻历史旧案，歪曲雅克萨战争的性质，美化老沙皇，这恰好暴露了他们是一群拜倒在沙皇脚下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和扩张主义分子。

涅维尔斯科依——十九世纪中叶 沙俄侵略黑龙江地区的急先锋

志力 钟钙

一八四九年夏天，俄国沙皇政府派遣的一支武装“勘察队”，象窃贼一样从海上潜来中国内河黑龙江口，在河口湾附近中国领水内偷偷摸摸地进行了一系列非法的侦察活动。此后几年中，他们继续践踏中俄《尼布楚条约》，破坏中国主权，在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窃踞许多战略据点和港湾，为沙皇俄国侵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开辟了道路。

这支“勘察队”的头子，就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忠实鹰犬、海盗式冒险家——格·伊·涅维尔斯科依。

涅维尔斯科依的侵略行径反映了沙俄殖民强盗的极端贪婪和卑劣。揭露涅维尔斯科依在黑龙江地区的侵略活动，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沙俄对华政策的掠夺本质及其特点。

(一)

侵略中国，是沙俄争霸世界计划的重要一环；吞并中

国黑龙江地区，是沙俄向远东扩张的既定目标。十七世纪中叶，沙俄派遣哥萨克匪帮武装入侵黑龙江流域，经中国人民正义的自卫反击后，一六八九年，中俄两国通过谈判缔结了《尼布楚条约》。条约明确规定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据此，沙皇政府从中国领土上撤回了它的侵略军队。但是，沙俄觊觎黑龙江地区的既定方针并没有改变；在它积极谋求欧洲和中、近东霸权的同时，从来没有放弃侵略中国的野心。涅维尔斯科依在黑龙江下游的侵略活动，正是沙俄顽固推行侵华政策、蓄意撕毁《尼布楚条约》的表现。

《尼布楚条约》签订不久，毕生醉心于抢夺领土和出海口的沙皇彼得一世（一六八二——一七二五年），就叫嚷“俄国必须占有涅瓦河口、顿河口和黑龙江口”，因为这些地方对“俄国的未来发展异常重要”^①，并提出“将来必须在濒临大洋（太平洋）的黑龙江口建立俄国的城堡”^②。此后的历代沙皇，全盘继承了他的侵略黑龙江地区的既定方针。十八世纪，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一七六二——一七九六年）公然把夺取黑龙江作为俄国“远东政策的中心”^③，声称“假如黑龙江真是一条可供我们向堪察加

①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一九五九年布拉戈维申斯克出版，第二六页；福斯特：《莫斯科人和清朝官员》，一九六九年美国出版，第二四六页。

② 冈索维奇：《阿穆尔边区史》，一九一四年布拉戈维申斯克出版，第七〇——七一页。

③ 霍多罗夫：《波克洛夫斯基和远东研究》，载苏联《新东方》杂志，一九二九年莫斯科出版，第二五期。

和俄国在鄂霍次克海的领地运送粮食的方便途径，那末，占有这条河流对我们是重要的。”^①在涅维尔斯科依入侵黑龙江以前的一百五十多年间，沙俄一再疯狂叫嚷“修改”《尼布楚条约》，不断派遣间谍潜入黑龙江地区搜集情报，并且拟定了一个又一个武装入侵方案，积极准备力量，企图卷土重来。正如马克思在一八五八年所说：“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中国和英国的条约》）

事实表明，这一时期沙俄之所以没有发动大举入侵，主要是由于中国在康熙（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年）、雍正（一七二三——一七三五年）、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年）三朝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封建帝国，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清王朝仍然保持着强盛的外貌，它未敢轻举妄动。其次，是因为沙俄忙于在西方的侵略扩张，无力东顾。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武力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清政府日益腐朽。正如恩格斯所说，清帝国是如此衰弱，它再也“不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成了“野心勃勃的欧洲人的猎获物”。（《俄国在远东的成功》）

^①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一九四七年莫斯科出版，第四〇页。

俄国这时候仍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农奴制国家，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已有相当发展。沙皇政府为了维护日趋瓦解的农奴制，转移日益高涨的群众斗争的视线，为了给俄国资产阶级开辟更广阔的国外市场、掠取更多的殖民地，侵略野心更加膨胀。它一方面向黑海海峡、巴尔干、高加索、波斯伸出侵略的黑手；同时在东方、在中国，又同英国进行着激烈的角逐和争夺。在这种情况下，善于“灵活地利用一切领土扩张的机会”的沙皇政府（马克思：《俄国利用奥地利。——华沙会议》），决心把夺取黑龙江地区的长期预谋变为直接的大规模入侵行动。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沙皇尼古拉一世（一八二五——一八五五年）就发誓要不失时机地“实现他的高祖父和祖母（指彼得一世和叶卡特林娜二世）的意图”^①，即吞并中国的黑龙江地区，夺取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但是，在最后制定和实施这个计划以前，他还必须探明黑龙江口是否可以通航。因为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西欧和俄国的“航海家”如拉彼鲁兹、布劳顿、克鲁逊什特恩，都认为库页岛是一个半岛，黑龙江口不能通航。如果上述说法属实，则黑龙江作为通向太平洋的主要航道的价值便不足道了，这对于沙俄企图取道黑龙江出太平洋继续向东方扩张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尼古拉一世对此自然十分焦虑。为此，他于一八四三年曾策划派遣海

^①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第五九页。

军少将普提雅廷率领一支“海上探险队”，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去“查明以前的著名航海家关于海船不能进入黑龙江口的结论是否确实”^①。一八四六年初，他又命令俄美公司“要采取一切手段，确实查明船只能否驶入黑龙江；因为这是一个对于俄国极为重要的问题。”^②八月，俄美公司就派海军少尉加夫利洛夫伪装成“捕鱼的”“非俄罗斯人”，乘“康士坦丁”号双桅战船从俄国北美殖民地锡特卡窜到黑龙江口附近，但仍未找到进入江口的通道^③。早就密谋侵占黑龙江的沙俄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根据俄美公司的报告无可奈何地上奏沙皇说：“黑龙江对于俄国没有任何意义。”^④但是，侵略成性的尼古拉一世仍然贼心不死，一八四七年九月，他破格提拔双手沾满波兰人民和高加索各族人民鲜血的军官穆拉维约夫为东西

①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第五九页。

② 维诺库罗夫和弗洛里奇：《涅维尔斯科依海军上将的功勋》，一九五一年莫斯科出版，第四二页。

③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一卷，一八九一年莫斯科出版，第一七一——一七二页；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第六四——六六页。

④ 特列涅夫：《格·伊·涅维尔斯科依传》，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出版，第一四页。涅谢尔罗迭是尼古拉一世的忠实走卒，当时，他认为：俄国必须集中力量对付行将到来的欧洲革命高潮。他既担心俄国在远东采取新的扩张步骤，将削弱俄国在欧洲的力量，妨害它继续扮演欧洲宪兵的角色；又怕一旦与中国决裂，会使恰克图贸易中断，从而使国库减少巨额收入，严重打击正在发展中的纺织工业。因此，他对占领黑龙江地区的问题，持审慎态度，希望等待更有利的时机，以免顾此失彼。

伯利亚总督，指望这个阴险狡诈、掠夺成性、不择手段的忠实奴才帮助他实现鲸吞黑龙江的野心。与此同时，尼古拉一世积极支持海盗式冒险家涅维尔斯科依前往黑龙江口一带“勘察”，以便查清该江究竟能否通航。

穆拉维约夫和涅维尔斯科依，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培育出来的一对孪生子，是执行沙俄侵华政策的忠实奴仆。穆拉维约夫上任后，立即加紧筹建并扩大“外贝加尔哥萨克军”，准备入侵力量。涅维尔斯科依则与他紧密配合，从海上潜往黑龙江口一带“勘察”，进行了种种罪恶活动，充当了沙俄侵吞我国黑龙江地区的急先锋。

(二)

涅维尔斯科依(一八一三——一八七六年)是狂热的沙俄扩张主义分子，贵族地主家庭出身，一八二九年进入中等海军武备学校，一八三六年毕业后在沙俄波罗的海舰队服役，一八四六年晋升海军大尉。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受到沙文主义教育，接受了“彼得一世关于黑龙江及其河口对俄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想法”^①，把早期沙俄殖民者、罪行累累的波雅科夫、哈巴罗夫等奉为英雄，立志要做他们的继承人。参加海军后，他积极搜集和研究有关黑龙江的各种资料，极力鼓吹“俄国应当建设一支太平洋舰

^① 卡马宁：《涅维尔斯科依传》，载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第一二页。

队，找到便利的海港，并且在那里建设必需的基地”^①。他认为侵占黑龙江“对俄国有巨大的经济意义和战略意义”^②。在强烈的扩张野心的驱使下，他一直想到黑龙江口去窥探。

一八四七年十二月底，涅维尔斯科依靠海军大将康士坦丁亲王的帮助，谋得了正在赫尔辛基建造的“贝加尔”号船长职位。按照沙俄海军部的计划，这艘军用运输船建成后，将定期从喀琅施塔得运载军需物资，前往堪察加的主要海港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涅维尔斯科依接受新的任命后，立即前往彼得堡见海军总参谋长缅施科夫，要求允许他在完成堪察加之行后乘该船到黑龙江口进行“勘察”。缅施科夫回答说：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鉴于“黑龙江是中国的河流”，担心测绘黑龙江口会引起同中国的冲突；而且，根据原订计划，“贝加尔”号必须于一八四九年秋季到达目的地，为这次航行拨付的款项只够一年使用，由于时间和经费不足，难以实行这一方案^③。但是，缅施科夫深知新任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正在积极策划侵占黑龙江，便授意涅维尔斯科依前去寻求解决的办法。涅维尔斯科依和穆拉维约夫臭味相投，一拍即合。

① 特列涅夫：《格·伊·涅维尔斯科依传》，第一四——一五页。

② 什利亚明：《格·伊·涅维尔斯科依船长的功勋》，一九四九年莫斯科出版，第三页。

③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第七四——七六页。

穆拉维约夫“完全赞同”他的方案，答应“努力用一切方法来促其实现。”^①

涅维尔斯科依为了尽快实现他的侵略野心，他一面急不可待地亲自跑到造船厂催促提前完工和安装大炮，以便早日成行；一面拟订了“调查”鞑靼海峡、黑龙江口的计划，函请已在伊尔库次克任所的穆拉维约夫转呈沙皇政府批准。一八四八年七月，他又去见缅施科夫和内务大臣彼罗夫斯基，再次提出自己的请求，并且预先编造了一套谎言说，如果被中国察觉，他就诡称这艘船是被鄂霍次克海的“疾风和急流送到黑龙江口的”^②。在穆拉维约夫和彼罗夫斯基等人的支持下，缅施科夫同意了涅维尔斯科依的要求，并答应报请沙皇批准。

为了策划和部署侵略黑龙江地区的罪恶活动，沙俄政府根据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训令，于一八四九年二月在彼得堡成立了由沙俄外交大臣、陆军大臣、海军总参谋长、内务大臣等主要军政头目组成的“黑龙江问题特别委员会”。该会不顾《尼布楚条约》的明确规定，悍然决定：由海军部派遣以涅维尔斯科依为队长的海上“勘察队”，从鄂霍次克海岸的阿扬港出发，“勘察”黑龙江河口湾和库页岛的北部海岸，并尽可能在黑龙江口北面选择有利地

①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第七四页。

②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第八二页。

点，伺机占领；同时决定，由外交部训令俄美公司派出“贸易考察队”从阿扬取早路前往黑龙江口北岸费雅喀人居住区活动，以加强对他们的影响和控制。为了不要引起中国政府的注意，该会要求涅维尔斯科依“不声不响，小心谨慎”，暂时不要勘察黑龙江本身及在该江航行；为了“避免政府公开参与其事”，上述措施最好以俄美公司名义执行，所需费用由国库开支。“特别委员会”根据沙俄总参谋部的意见，还决定派遣以阿赫杰中校为首的秘密人员，伪装“打猎的”，从格尔必齐河开始，到外兴安岭南麓一带“考察”。沙皇批准了上述各项决定^①。

其实，早在沙皇政府成立“黑龙江问题特别委员会”、作出入侵黑龙江的各项决定之前，涅维尔斯科依在穆拉维约夫等沙俄军政头目的支持下，已于一八四八年九月二日，率领军官九人，军士、水兵和炮兵二十八人，乘“贝加尔”号从喀琅施塔得启航，横渡大西洋、绕过南美洲，穿越太平洋，于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赶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在这里，他收到了穆拉维约夫的密信和一份正呈请沙皇批准的训令副本。穆拉维约夫在密信中要求他详细“考察”中国黑龙江口及该河本身的状况，调查库页岛北部港湾情况和黑龙江河口湾一带通航前景，探明有无便于“防卫”黑龙江河口湾和它的入口处的地点。为了掩盖沙俄践踏《尼布楚条约》、侵犯中国主权的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一卷，第一九五——一九七、二〇一页。

海盗行径，穆拉维约夫还要求：“调查”要秘密进行，船上不得悬挂俄国的军旗或商旗；“考察”结果应尽速密报缅施科夫、穆拉维约夫转呈沙皇，不得声张。密信通知说，彼得堡大概很快就要送来经沙皇批准的训令。但是，涅维尔斯科依决定不等收到正式训令，就“不失分秒地”采取行动。他召集船上所有军官，号召他们努力“使运输船早日从这里出航”^①，“前往黑龙江口及其河口湾，即当时我国（俄国）政府及整个文明世界公认属于中国的地方去。”^②

六月十一日，“贝加尔”号卸完货物，立即驶向库页岛和黑龙江口。六月二十四日，到达库页岛东北岸，从这里开始了涅维尔斯科依之流梦寐以求的在中国领水内的“勘察”活动。七月九日，该船偷偷侵入河口湾北部停泊。七月二十二日，涅维尔斯科依率领一批军官和水兵，分乘三只舢板沿河口湾西北岸南驶，于次日潜入中国内河黑龙江，当晚沿左岸到达费雅喀人称为库艾格达岬的地方，并采用殖民强盗的惯伎非法将该地改名为康士坦丁半岛。二十五日，又潜往黑龙江右岸，然后沿河口湾南侵，进入鞑靼海峡。八月五日，舢板穿过海峡最窄处，到达北纬五十一度四十分，即布劳顿等曾经从南面到达的地点，

①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第九〇页。

②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第三六三页。

从而才明白了库页岛不是半岛。

涅维尔斯科依返回运输船后，按照指令，又窜到鄂霍次克海西南岸“测绘”，在黑龙江河口湾北面，先后“找到”一个巨大的港湾和一个开阔的可以避风的停泊场，并非法把这两处分别命名为幸运湾和圣尼古拉湾。九月十五日，涅维尔斯科依回到阿扬，在这里见到了正在等待这次“勘察”结果的穆拉维约夫，收到了实际上已经由他执行了的沙皇训令。

涅维尔斯科依对这次他从海上入侵中国黑龙江口作了如下结论：库页岛是一个岛屿；各种类型的海船都可以从北面或南面驶入黑龙江河口湾和黑龙江^①。这是俄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对黑龙江口一带所作的比较接近事实的描述。沙俄侵略者自吹自擂，说这是“重大的地理发现”。其实，远在涅维尔斯科依的“发现”上千年以前，中国唐朝就对库页岛作了记载（《新唐书》）。明朝对于“在奴尔干海东”的“苦夷”、“苦兀”、“库兀”即库页岛的记载更是屡见不鲜（如《明实录》、《寰宇通志》、《明一统志》、《辽东志》等），在清代《康熙皇舆全览图》中，已经清楚地标明库页岛是一个脱离大陆的海岛；其后，乾隆年间编撰的《盛京通志》更明确地指出：库页岛是一“大洲”，在“混同江（黑龙江）口之东大海中。”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就连

^①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第一〇四、一〇八页；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一卷，第二二四页。

帝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从很古以来，就确信库页岛是一个岛屿”，并且早已绘图立说，对自己的这一带土地作出了正确的记载了^①。

(三)

涅维尔斯科依在首次入侵后不久，又向穆拉维约夫提出占据黑龙江下游的建议，要求俄国政府继续对这一地区进行“勘察”，大规模地向那里移民，“不失分秒地在黑龙江下游站稳脚跟”。^②穆拉维约夫表示全力支持。为了使沙皇早日作出决定，一八五〇年一月他特派涅维尔斯科依携带他亲自起草的报告，前往彼得堡，要求“刻不容缓地占据黑龙江口”，夺取黑龙江航行权，并占据这条河的左岸^③。但是，涅谢尔罗迭对涅维尔斯科依的“探险”结果表示怀疑，并认为占领的时机尚未成熟，不宜操之过急。一八五〇年二月，尼古拉一世召开“特别委员会”研究上述问题。涅维尔斯科依在会上强调要占领黑龙江

^① 帝俄地方自治会编：《黑龙江地区》，一九〇九年莫斯科出版，第三六页；并参阅克莱德：《满洲的国际争夺（1689—1922）》，一九二八年美国出版，第一六页。

^②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第一一二页。

^③ 穆拉维约夫：《呈御前海军总参谋长、侍从将军缅施科夫先生的报告》。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二卷，第五〇——五一页。

口。经过讨论，“委员会”决定，先调派哥萨克和水兵，以经营俄美公司业务为名，在幸运湾建立冬营，但不得触及黑龙江口及河口湾。同时，擢升涅维尔斯科依为海军上校，指定他在穆拉维约夫领导下占领幸运湾^①。

担负着新的侵华使命，涅维尔斯科依匆匆赶回阿扬，率领武装人员乘“鄂霍次克”号轻快巡航战船，于一八五〇年七月初再次窜入中国领海。九日，涅维尔斯科依等在幸运湾附近登陆，十一日在那里建立了俄国第一个侵略据点——彼得冬营。但是，这个贪婪的扩张主义分子绝不以此为满足。他早就打定主意，为占领黑龙江而采取一切行动。七月下旬，涅维尔斯科依亲自率领水兵和译员，携带火炮一门，乘小艇潜入黑龙江，溯流上行约一百二十公里，到达特林，即中国明朝奴儿干都司衙门和永宁寺所在地。

沙俄侵略者的出现，引起了当地居民的警惕。当涅维尔斯科依和译员刚爬上岸，约二百名村民马上把他们团团围住，一名清朝官员（章京）上前向他们提出严正抗议，指出不经中国许可，“任何人都无权来到这里”。涅维尔斯科依不但拒不撤离，反而蛮横地“从口袋里掏出双筒手枪”，威胁说，如果谁敢反抗，“马上就送他归天”。在他的示意下，其他水兵也都拥到岸上，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居民进行武力恫吓。接着，他扬言：俄国“认为石山（外兴安

^①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第一一七——一八页。

岭)以下的黑龙江、全部滨海地区以及库页岛都是自己的属地”!①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个俄国海军军官凭借武力,非法侵入中国领土,肆无忌惮地把大片中国领土宣布为“俄国所有”,真是狂妄之极!

在特林逞凶之后,涅维尔斯科依掉转船头顺黑龙江下驶,八月十三日到达中国黑龙江口的庙街,开枪开炮,在中国领土上非法升起俄国军旗,强行建立以尼古拉一世名字命名的侵略据点——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然后,他留下水兵、武器和船只,实行军事占领,自己则返回彼得冬营,取道伊尔库次克去彼得堡。

一八五〇年十二月,沙皇尼古拉一世听取了穆拉维约夫关于侵占幸运湾和庙街经过的报告后,“表示十分满意。”②可是,涅谢尔罗迭认为俄国正在加紧准备对土耳其的战争,不应同时在黑龙江地区采取类似的步伐,以免“中国大兴问罪之师”,引起战争,影响俄国在近东的侵略部署。因此在不久召开的所谓“黑龙江与基立亚克问题委员会”上,他主张立刻从庙街撤出③。会议以多数票通过,决定撤销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以俄美公司之名继续

①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第一一九——二二一页。

②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一卷,第二八〇页。

③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一卷,第二八一页;纳罗奇尼茨基:《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1860—1895)》,一九五六年莫斯科出版,第一一九页。

保留彼得冬营，但不得触及黑龙江及库页岛^①。

尼古拉一世对这项决定极不满意。他破例召见了涅维尔斯科依，夸奖他的海盗行为是“好样的、高尚的、爱国的”，并连声感谢他对罗曼诺夫王朝的忠诚，赐给勋章一枚；然后指着地图上中国庙街一带地方叫嚷：“俄国国旗不论在哪里一经升起，就不应当再降下来。”^② 根据尼古拉一世的命令，一八五一年一月“特别委员会”重新开会，决定以“俄美公司零售店”的形式保留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并从西伯利亚舰队抽调官兵，组成“黑龙江勘察队”，由涅维尔斯科依任队长，在东西伯利亚总督统一指挥下进行侵略活动^③。

涅维尔斯科依受到尼古拉一世的赏识，更加趾高气扬。会后不久，他从彼得堡赶回东西伯利亚。一八五一年七月，他率领一批军官、水兵和哥萨克，乘船取道阿扬第三次窜入幸运湾。

到达黑龙江下游后，涅维尔斯科依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幸运湾和庙街一带建立和加强沙俄殖民统治。他极力挑拨当地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煽动费雅喀人“不要听满洲

① 帝俄地方自治会编：《黑龙江地区》，第四九页。

② 格鲁兹杰夫：《黑龙江》，一九〇〇年彼得堡出版，第一五页；日丹科：《纪念海军上将格·伊·涅维尔斯科依》，一九一三年海参崴出版，第一五——一六页。

③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第一二四——一二五页。

人的话”，妄图削弱中国各族人民反抗沙俄侵略者的力量，以便分而治之。同时，他威胁当地居民说，谁“胆敢对我们（俄国人）采取敌对行动”，谁就要受到镇压。^①一八五一年底，彼得冬营附近的居民，因不堪忍受沙俄侵略者的奴役，酝酿进行反抗。涅维尔斯科依立即派出哥萨克和水兵一队，前往血腥镇压。沙俄侵略者用手枪和马刀威胁村民说：如果不服从俄国人的命令，“那就立即把他们全体都消灭，把村庄毁掉”。事后，涅维尔斯科依又派人把带头反抗的费雅喀人和满族人绑架到彼得冬营，由他亲自动手，严刑拷打^②。除暴力手段外，涅维尔斯科依还利用俄国东正教“作为在基立亚克人中间扩大俄国影响的工具。”^③他曾直言不讳地供认，俄国人正是凭借着自己的大炮和十字架，来维持自己的殖民统治的^④。

与此同时，涅维尔斯科依以彼得冬营为基地，一再派遣武装人员分头到黑龙江下游、库页岛等地活动，窃取有关当地地形、交通、港湾、气象、物产、居民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为扩大领土侵略准备条件。一八五一年下半年，侵略者的足迹已扩大到亨滚河、黑龙江下游右岸和鞑靼海

①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第一二八——一二九页。

②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第一四〇页。

③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一四四页。

④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第一三〇——一三一页。

峡沿岸。一八五二年初,他又陆续派人渗入土古河上游、奇集湖、克默尔湾(迭卡斯特里湾)和库页岛。三月,往乌第河上游一带活动的奥尔洛夫回来后,编造了一个所谓外兴安岭的走向从乌第河上游起不是向东北、而是向西南延伸的神话。根据这个奇特的“发现”,涅维尔斯科依硬说,“按照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条约》第一条,黑龙江边区和乌苏里江边区至海应当属俄国所有。”^①由于这种说法实在太荒唐,连沙俄学者也不得不指责它是“牵强附会”^②。苏联学者卡马宁也一再指出“这种设想”“是没有根据的”、“错误的”^③。然而在很长时期内沙俄侵略者却一直把这种谬论当作他们随心所欲地解释《尼布楚条约》、向中国提出狂妄的领土要求的主要依据;直到今天,新沙皇还在继续散布这一荒谬绝伦的论点。

接着,涅维尔斯科依又提出了武装占领奇集屯和克默尔湾,并以此为据点逐步吞并整个黑龙江地区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侵略计划。穆拉维约夫表示赞赏,不仅竭力说服彼得堡当局予以批准^④,而且决定“把他所能支

①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第一五〇、一七五页。

② 帝俄地方自治会编:《黑龙江地区》,第五〇页。

③ 卡马宁:《涅维尔斯科依传》,载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第一九页,并参阅该书第三七九、三八一页。——编者注

④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一卷,第三一三—三一四页。

配的一切资金都尽量供给涅维尔斯科依勘察队之用。”^①

在穆拉维约夫的全力支援下，一八五三年三月中旬，涅维尔斯科依派人占领了奇集屯和克默尔湾。六月上旬，涅维尔斯科依侵入“世界上最优良最宽阔的海湾之一”——哈吉湾，并擅自将该地易名为尼古拉一世皇帝湾（现称苏维埃港）^②。

当时，沙俄为了夺取黑海出海口，同英、法在近东矛盾日益尖锐。穆拉维约夫主张，在远东必须抢先采取行动，“即使不能占据整个东亚，至少也要统治东洋的整个亚洲沿岸”^③。尼古拉一世十分赞赏他的建议，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

一八五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涅维尔斯科依在彼得冬营接获穆拉维约夫的通知，得悉沙皇已批准他的请求，并给他增派了侵略军后，侵略气焰更加嚣张，于七月二十六日率军乘“贝加尔”号直驶库页岛，八月十一日侵入该岛南端的阿尼瓦角。十八日，在哈吉湾强行建立康士坦丁哨所，二十一日，在克默尔湾建立亚历山大哨所，接着在奇集湖畔的阔吞屯建立马林斯克哨所，在库页岛西岸北纬五十度处建立了伊利因斯克哨所。九月上旬，涅维尔斯科依与穆拉维约夫派来的增援部队在彼得冬营会师

①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一二七页。

②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第二一二页。

③ 司徒卢威：《西伯利亚回忆录》，一八八九年彼得堡出版，第一五二——一五六页。

后，乘“尼古拉”号兵船再度南侵库页岛，十月四日，在该岛优良港湾——阿尼瓦湾强行登陆，升起俄国军旗，架设大炮，设立了穆拉维约夫哨所，并蛮横地声称：“根据一六八九年俄中两国在尼布楚缔结的条约，库页岛作为黑龙江下游地区的延续，属俄国所有。”^①

尼古拉一世对涅维尔斯科依的“坚决行动和库页岛上主要据点的占领十分满意”，一再赏给他勋章。海军大将康士坦丁亲王也下令嘉奖“黑龙江勘察队。”^②

至此，沙俄通过涅维尔斯科依的侵略活动，实际上已把黑龙江口、鞑靼海峡沿岸中国领土置于自己的军事控制之下。

历史事实表明：沙皇俄国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曾经不断地遭到中国各族人民的反抗；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尽管沙俄侵华之心不死，但它的领土野心并未能得逞。一八四〇年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沙皇俄国逐步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在防御外敌入侵时，清政府只顾东南海疆的防务，对东北边防甚少注意；为了“防堵”从南方入侵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它甚至不惜削弱东北边防，从黑龙江、吉林边境要地抽调精兵南

①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第二三七页。

②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一卷，第三五〇页；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第二八三页。

下^①，从而使沙俄得到可乘之机，导致“前门拒狼，后门进虎”的严重恶果；一八五〇年后，反动、腐朽的清政府又忙于在南方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置国家安危于不顾，频频从吉、黑两省征调大批兵丁入关，形成东北边境粮缺兵少、“各路无防”的严重局面^②。而侵略成性、极端贪婪的俄国沙皇政府就进一步乘虚而入。

(四)

一八四九——一八五三年间涅维尔斯科依在黑龙江下游的侵略活动，为沙俄鲸吞整个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中国广大地区奠定了基础。随着资本主义各国对中国侵略的加紧，清政府的日趋衰败，沙俄把武装“航行黑龙江”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一八五四年一月，沙皇政府召开“特别会议”，悍然决定不管清政府同意与否都要“沿黑龙江航行”^③。经过精心准备，穆拉维约夫于同年五月下旬率领舰船运载近千名哥萨克侵略军，不经中国政府允许，非法沿石勒喀河顺流而下，气势汹汹地闯入黑龙江；沿途又不顾清政府地方

^① 《黑龙江志稿》，第三卷，第三一——三四页；《吉林通志》，第五卷，第一七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一二卷，第一七、二三、二四页；《黑龙江志稿》，第三卷，第三四——四一页；《吉林通志》，第五卷，第一七——一八页。

^③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一卷，第三四六页。

官员的拦阻，强行东驶，最后于六月二十六日到达阔吞屯。“这次远征为俄国开辟了通往东洋（太平洋）的道路”^①。穆拉维约夫对从克默尔湾赶来“祝贺”的涅维尔斯科依说，尼古拉一世“对于他（指涅维尔斯科依——引者）为了实现国家的重要目标而进行的一切活动和所作的一切决定表示感谢。”^②不久，沙皇下令授予涅维尔斯科依海军少将的军衔。

一八五五年五月下旬，穆拉维约夫不顾清朝政府的一再抗议，再次率领舰船运载大批军队和“移民”，非法侵入黑龙江。侵略者到达黑龙江下游后，屯兵占地，强行建立村屯，开始对这一地区实行军事占领。涅维尔斯科依被任命为以穆拉维约夫为司令的沙俄占领军参谋长。至此，他作为夺取黑龙江地区的开路先锋，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一八五六年春，涅维尔斯科依调回彼得堡担任新职，最后被提升为海军上将。

涅维尔斯科依走后，穆拉维约夫继续使用这套侵略伎俩。所以，后来涅维尔斯科依在总结自己的侵略经验时写道：“黑龙江勘察队的榜样……使总督（指穆拉维约夫——引者）相信，在同中国人谈判之前，必须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两岸布满军人村屯，从而事实上向中国人指出，俄国从来认为这个地区是属于它自己的。只有这种行

① 斯韦尔别耶夫：《黑龙江航行记》。转引自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一卷，第三七三页。

② 维诺库罗夫等：《涅维尔斯科依海军上将的功勋》，第一三九页。

动，即建立军人村屯，调遣军队和武装舰艇，才取得了应有的效果。”^①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即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割让黑龙江以北广大地区的《璦琿条约》的当天，穆拉维约夫抑止不住内心的喜悦，首先写信赞扬涅维尔斯科依在黑龙江地区的“建树”：“亲爱的格那基·伊万诺维奇：今天在璦琿签定了条约，黑龙江地区已确定属于俄国，……您是给现在这座建筑物奠定了基础的第一位活动家，任何时候祖国都不会把您忘记。”^②

由于侵华“有功”，涅维尔斯科依不断地得到沙皇政府的嘉奖^③；沙俄的一些沙文主义者也为他大肆颂扬，吹捧他是一个“满怀理想”、“对皇上和祖国极端忠诚的爱国者。”^④

涅维尔斯科依在黑龙江下游的领土掠夺活动，是沙俄对外扩张的必然步骤和典型实例。沙俄为这个狂热的

①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第三五五页。

②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第三五八—三五九页。

③ 沙俄为了表彰涅维尔斯科依，除不断给他加官晋级、授予勋章外，还在海参崴（今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修建了涅维尔斯科依纪念碑，并以他的姓名命名了鞑靼海峡的最窄处，海峡中的一个海岬，库页岛的一个村镇和一座山，如此等等。

④ 日丹科：《水兵在俄国远东的作用》，一九一〇年海参崴出版；日丹科《纪念海军上将格·伊·涅维尔斯科依》；布谢：《俄国征服黑龙江》；维纽科夫：《回忆片断》，一八九五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等等。并参阅里亚鲍夫和斯坦英：《俄国远东史纲》，一九五八年哈巴罗夫斯克出版。

扩张主义分子大唱赞歌，就是宣扬自己的殖民扩张政策，颂扬帝俄武力强占中国领土的万恶罪行，鼓励人们步涅维尔斯科依的后尘，实行更大规模的侵略。

列宁领导的伟大的十月革命，在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结束了长期以来沙皇俄国掠夺中国的罪恶历史；涅维尔斯科依同历史上其他沙俄侵略分子一样，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今天，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与另一个超级大国争霸远东、太平洋，为了继承老沙皇这份“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重新把涅维尔斯科依抬出来，当作神物加以供奉，恬不知耻地赞美他“满怀理想”，说他“在黑龙江的活动中表现了忠于祖国、毫不利己乃至自我牺牲的精神”，甚至把他在黑龙江的侵略活动标榜为“万古流芳的事业”，说什么这件事“离我们年代越久远，这些十九世纪‘俄国哥伦布’的形象对我们越亲切，越珍贵”，“他们的功绩将永远留在苏联人民充满谢意的记忆中”！等等^①。这

^① 纳罗奇尼茨基、斯拉德科夫斯基等：《远东国际关系》，第一卷，一九七三年莫斯科出版；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的海军》，载苏联《海军文集》杂志一九七二年二——六、八——二期；《阿穆尔——功勋之河》，一九七〇年哈巴罗夫斯克出版；阿列克谢耶夫：《涅维尔斯科依的功勋》，载《俄国海军人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一九七〇年哈巴罗夫斯克出版；马基多维奇：《地理发现史纲》，一九六七年莫斯科出版；斯捷潘诺夫：《涅维尔斯科依的功绩》，载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五日苏联《红星报》；卡巴诺夫、科查琴科：《苏联历史》，第一卷，一九六一年莫斯科出版；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一九五九年布拉戈维申斯克出版，等等。一九六三年莫斯科出版的札多尔诺夫的连续性长篇小说之一《涅维尔斯科依船长》，则是致力于颂扬穆拉维约夫和涅维尔斯科依的艺术作品。

是对客观历史的极大歪曲，是沙文主义的露骨表现。

恩格斯指出：“任何俄国人，只要他是沙文主义者，迟早总会拜倒在沙皇政府的面前”。（《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表彰死了的沙俄侵略者，正是为了鼓励活着的侵略者。苏修如此狂热歌颂沙俄侵略分子的“功勋”，发誓要接续沙皇时代“英雄的家谱”，继承这些“前辈们的光荣战斗传统”，目的无非是追随他们这些“前辈”的足迹，走沙皇俄国侵略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老路，实现老沙皇称霸世界的“理想”。

历史在前进。帝国主义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苏修企图借助于美化沙俄老牌殖民主义者、侵华急先锋涅维尔斯科依之流的形象，在国内掀起新的沙文主义狂热，为它推行新殖民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政策服务，这种倒行逆施，是注定不会有好结果的。

中俄《璦琿条约》与苏修霸权逻辑

钟 钙

一八五八年中俄《璦琿条约》，是沙皇俄国乘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机，凭借武力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沙俄割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原属中国的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吉林省全部海岸线及海参崴港，划归中俄“共管”，而所谓两国“共管”，实际上只不过是沙俄正式吞并这一地区的过渡形式；沙俄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享有航行权，从而夺得了经由黑龙江前往太平洋的通道，初步实现了打通太平洋出海口的宿愿；在边境贸易“自由”的旗号下，沙俄还获得了进一步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国东北内地的便利条件。这个条约彻底毁弃了中俄两国庄严缔结的《尼布楚条约》，使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蒙受了重大损失，标志着近代中国北部边疆危机的加深和割地狂潮的开始。

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沙俄趁火打劫，掠夺中国领土的强盗行径和《璦琿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当时就不止一次地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和无情的揭露。一八五八年九月，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

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中国和英国的条约》)同年十月,恩格斯尖锐地指出,沙俄通过《璦琿条约》,“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俄国在远东的成功》)十月革命后苏联的许多著作,在评述沙俄对外扩张政策时也曾明确地指出:《璦琿条约》使中国“把黑龙江左岸(从额尔古纳河到太平洋)割让给俄国”;这个条约“是沙皇俄国为侵占中国领土迈出的第一步”^①。

沙俄侵略者对《璦琿条约》的订立,满怀喜悦。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欢呼这个条约“为俄国增添了幅员广大的领土”,是罗曼诺夫王朝史册中“灿烂辉煌的新篇章”^②。条约的炮制者——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特别开会庆祝,情不自禁地把黑龙江以北地区称为俄国“新开辟的疆土”,并将璦琿对岸的海兰泡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即“报喜城”^③。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一八五五——一八八一年)更是兴高采烈,认为签订《璦琿条约》“诚乃俄国可庆之事”,破格提拔穆拉维约夫为步兵上将,晋封阿穆尔斯基伯爵,并下令嘉奖所有其他有“功”人员^④。

① 《苏联小百科全书》,第一卷,一九二九年莫斯科出版,第一七四页。

② 波波夫:《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沙皇外交》,载苏联《红档》杂志,一九二七年第二卷,第一九七页。

③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一卷,一八九一年莫斯科出版,第五一三——五一四页。

④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三卷,一九一八年赤塔出版,第一三三——一三四页;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一卷,第五二七——五二八页。

一些旧俄学者也承认：“这个条约使俄国获得了五十多万平方俄里富饶的领土，开辟了通向太平洋的方便的水路”^①，并认为这是历史上“对俄国最有利”的事件^②。

然而，一个时期以来，苏修史学界为了适应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公然背弃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科学论断，明目张胆地颂扬沙俄的领土扩张活动，硬说什么签订《璦琿条约》“是为了两国远大的相互友谊和两国臣民的利益”，该约“不包括任何不平等的条款”，“并没有使中国遭受任何损害”^③！他们所持的“理由”，浸透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充满了霸权逻辑。我们必须予以彻底揭露，严正驳斥。

苏修歪曲《璦琿条约》不平等性质的谬论之一，叫做

① 冈索维奇：《阿穆尔边区史》，一九一四年布拉戈维申斯克出版，第一二二页。

② 马克：《黑龙江旅行记》，一八五九年彼得堡出版，《序言》。

③ 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一九七五年莫斯科出版；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一九七二年莫斯科出版；别斯克罗夫内、齐赫文斯基、赫沃斯托夫：《论俄中边界形成史》，载苏联《国际生活》杂志，一九七二年第六期；别斯克罗夫内、纳罗奇尼茨基：《论十九世纪俄国在远东的对外政策》，载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六期；纳罗奇尼茨基、斯拉德科夫斯基等编：《远东国际关系》，一九七三年莫斯科出版；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二卷《引言》，一九七二年莫斯科出版，等等。

“收复失地”。他们说，《璦琿条约》使俄国“收回”了“根据尼布楚条约被中国占去的一部分领土”，“自然，这也不能叫做侵占”。

沙俄通过《璦琿条约》占领黑龙江以北大片土地，究竟是“收复失地”的正当行动，还是侵犯中国主权、吞并中国领土的罪恶勾当？这个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决不允许任意加以混淆、颠倒。

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劳动、生息、繁衍的地方，自古属于中国。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俄国人第一次听说世界上有黑龙江存在的时候^①，中国历朝政府在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行使主权，至少已有近千年之久。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沙俄组织第一批俄国人，跑到黑龙江地区攻城略地，杀人放火，那是对中国主权的野蛮侵犯，决不能构成俄国对黑龙江地区享有主权的理由。沙皇政府本指望依靠这帮武装哥萨克，把中国大片领土一口吞掉，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抗击，结果并未得逞。直到尼布楚谈判开始，除了尼布楚、雅克萨等少数几个孤立据点尚为沙俄窃踞外，黑龙江、乌苏里江广大地区一直在中国清朝政府有效管辖之下。

一六八九年，中俄双方经过平等协商缔结《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广大地

^① 戈鲁勃佐夫，《阿尔巴津古城的历史》，一九〇二年布拉戈维申斯克出版，第三——四页；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第一二卷，第二分册，一八九五年彼得堡—莫斯科出版，第二七四页。

区是中国的领土，规定沙俄军队必须从雅克萨等地撤走。中国方面不但没有通过条约割占俄国一寸土地，而且将贝加尔湖以东尼布楚一带原属中国的土地让给了俄国。苏修歪曲《尼布楚条约》的性质，硬说沙俄从中国的雅克萨等地撤回“意味着俄国丧失了大片领土”，这完全是强盗逻辑。他们的“收复失地论”，洗刷不掉沙俄侵华罪行，恰恰暴露了它自己无视中国主权的凶恶嘴脸。

其实，否定早已客观存在的中国主权，编造“黑龙江历来属于俄国”的神话，宣扬“收复失地”的谬论，这一套并不是苏修的发明，而是老沙皇的惯伎。早在一七三〇年，出使中国归国的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一拉古津斯基，就曾叫嚷用武力“清除黑龙江的西部地区和中国在黑龙江北岸建筑的一切堡垒，收复尼布楚和约时割让的全部土地”，使黑龙江成为俄国“光荣和有益的边界”^①。一七四〇年，沙俄御用学者米勒尔也狂呼《尼布楚条约》是“被迫”签订的，俄国受了损失，因此“有重新占有黑龙江左岸的权利”^②。随着沙俄侵略野心的增长，清朝政府的日益腐败，这种反华恶声更如夏夜蛙鸣，甚嚣尘上。但是，

① 班蒂什—卡敏斯基：《一六一九——一七九二年俄中外交文件汇编》，一八八二年喀山出版，第三七三——三七四页。

② 诺维科夫—达翰尔斯基：《阿穆尔大事记（一六八九——一八五八）》，载《阿穆尔州地志博物馆与方志学会论丛》，第四册，一九五八年海兰泡出版，第八四——八五页；尤里·谢苗诺夫：《西伯利亚的征服和发展》，一九六三年伦敦出版，第二五〇——二五一页。

这种蛊惑人心的“收复失地论”，就连侵略中国黑龙江地区的罪魁祸首穆拉维约夫也不赞同。他说：“整个黑龙江从未属于俄国”，所谓“黑龙江边区是在罗曼诺夫王朝时期丧失的”论点，是“不能令人容忍的”、“似是而非的”，必须“予以批驳”^①。苏修重新拣起这个破烂，如获至宝，真是无耻之尤。

为了宣扬沙俄“侵华有理”，否定中国的主权，苏修还曲解《尼布楚条约》的内容，硬说“根据这一条约，黑龙江下游和整个滨海地区不能认为是中国领土”。

事实与苏修所说截然相反。《尼布楚条约》关于中俄两国东段边界的规定，明确、具体。条约签订后，尽管沙皇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对黑龙江地区的野心，但是它一直不敢公开否认中国对上述地区的主权。例如：它曾应清朝政府的要求，依照条约的规定，多次将越界潜入黑龙江地区的俄国人逮捕治罪^②；一八五三年沙俄外交部致中国的照会确认，“俄罗斯国与大清国分界处所，自固（格）尔毕（必）齐河之东山（外兴安岭）后边，系俄罗斯地方；山之南边，系大清国地方”^③；一八五七年，奉命出使中国的普提雅廷承认，外兴安岭以南地区“按照条约无可争议地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一卷，第二二八——二二九页。

② 图理琛：《异域录》；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一八六一年伦敦出版，第六七页；《清高宗实录》，第一〇八九卷，第二六——二七页；第一〇九〇卷，第一——三页；第一〇九六卷，第一七——一八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六卷，第三二页。

属于中国”^①。苏修想一手遮天，把老沙皇承认的这些真情也加以抹煞，不是比老沙皇更蛮横无理吗？

苏修说：“尼布楚条约没有禁止俄国船只经黑龙江向乌第河右岸未定界地区航行。”言下之意，俄国享有在黑龙江横冲直撞的“权利”！这是诡辩。根据《尼布楚条约》，黑龙江是中国的内河。不言而喻，不经中国政府允许，任何国家的船舶不得在该河航行。这是国际法公认的起码原则，也是沙俄政府在长时期内一直确认的事实。例如，一七五七年俄国枢密院曾请求中国准予“假道”黑龙江“运粮”，清朝政府以两国条约中并无许俄“逾界遣人运送什物一项”，断然予以拒绝^②。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沙俄外交部还多次承认“黑龙江流域永属中国”^③；甚至在一八五四年沙俄大举侵犯黑龙江之后，俄国政府给中国的照会仍然承认：这次俄国兵船是“由中国黑龙江地面行走”，俄国军队是在“中国境内行兵”^④。就连积极支持沙俄侵华的美国人柯林斯，也不得不指出：“根据这条约（指《尼布楚条约》），俄国不得在黑龙江航行”^⑤。显

① 波波夫：《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沙皇外交》，载苏联《红档》杂志，一九二七年第二一卷，第一九六页。

② 《清高宗实录》，第五四四卷，第一——二页；班蒂什—卡敏斯基：《一六一九——一七九二年俄中外交文件汇编》，第二六四——二六五页。

③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人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一九四七年莫斯科出版，第七〇——七一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八卷，第二五——二六页。

⑤ 柯林斯：《西伯利亚旅行记——沿黑龙江到太平洋（一八五六——一八五七）》，一九六二年威斯康星出版，第一九七页。

然，沙俄闯入黑龙江是破坏《尼布楚条约》、践踏中国主权的侵略罪行。苏修无视国际公法，为这种背信弃义的卑鄙行为辩护，实际上是企图为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制造借口。

至于苏修说什么清朝使臣曾保证中国“不在雅克萨构筑工事，不往那里移民”，那也是向壁虚构。在尼布楚谈判中，俄方确曾向清朝使臣提出在条约中规定雅克萨不设防，企图把它变成不属于任何一方的“中立地带”，以便有朝一日在合法的名义下卷土重来，当场被清朝使臣严词拒绝^①。其后，沙俄秘密地用貂皮等贿赂充当中方拉丁文译员的耶稣会士，要他们背着清朝使臣（不懂拉丁文）在中国的交换文本中塞进“中国不在雅克萨建造任何房舍”的内容，也被拒绝^②。条约签订后不久，俄方依约拆毁雅克萨堡，但又向清朝政府提出中国也不在该处筑城的无理要求，仍被中方据理驳回。《尼布楚条约》的各种文本俱在，两国所属地方，规定得清清楚楚，哪有什么中国不在雅克萨设防的规定呢？苏修硬把二百几十年前沙俄未遂的阴谋当作既成的事实，胡说中国“对这些领土的主权是有限的，不完整的”，妄图把臭名远扬的“有限主权论”——勃列日涅夫主义运用到历史学领域中来，为沙

① 荷尔德：《中国概述》，一七三八——一七四一年伦敦出版，第二卷，第三一四页。

②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二卷，第五六八页。

俄侵略中国领土制造“根据”，真是利令智昏，荒谬绝伦。

苏修还说：《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实际上中国仍没有占领黑龙江左岸和南乌苏里地区”，上述地区“没有转入中国版图”。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第一，清朝政府为了保卫国土，防止俄人“侵界”，不仅在中俄边界界河格尔必齐河口等处设立界碑，而且不断派官兵到黑龙江以北地区巡查边界^①。到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又明确规定：“每年派章京、骁骑校、兵丁，六月由水路与捕貂人同至托克、英肯两河口及鄂勒希、西里木第两河间遍查，……三年派副总管、佐领、骁骑校于冰解后，由水路至河源兴堪山（外兴安岭）巡查一次，回时呈报。其黑龙江官兵，每年巡查格尔毕（必）齐河口照此，三年亦至河源兴堪山，巡查一次，年终报部。”^②上述严格的察边制度，始终贯彻执行，直到一八六〇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从未间断^③。吉林方面，三姓副都统每年都派出官兵巡逻黑龙江下游直至黑龙江口附近地区；对乌苏里江以东、绥芬河流域和珲春沿海等地，则由三姓副都统、宁古塔副都统和珲春协领定期带领官兵分路进行巡查^④。

第二，清朝政府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各族居民中，都设有行政机构。黑龙江将军属下的打牲处，

^① 杨宾：《柳边纪略》，第一卷；方式济：《龙沙纪略》；西清：《黑龙江外记》，第五卷。

^② 《清高宗实录》，第七四三卷，第五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三卷，第二——三页。

^④ 嘉庆《大清会典》，第一三卷，第一七——一八页。

设正副总管、佐领、骁骑校等员，分管居于额尔古纳河、黑龙江以北直至外兴安岭的达斡尔、索伦、鄂伦春、毕喇尔等族事务^①。居于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直至库页岛的赫哲、费雅喀、库页、鄂伦春、奇勒尔和恰克拉等部，则隶属于宁古塔副都统、三姓副都统，分置村屯近百处^②，“各设姓长(族长)、乡长，分户管辖。”^③为巩固边防，清朝政府还责成黑龙江城副都统在黑龙江以北山川险要处分设卡伦（如黑龙江和松花江汇流处对岸的黑龙江口卡伦、乌鲁苏木丹卡伦、精奇里江卡伦、牛满河卡伦等），派兵驻守^④。

第三，上述地区各族人民对清朝政府负有纳税义务。按定制，黑龙江将军所辖索伦、达斡尔等族，每年“每丁贡貂皮一张”^⑤。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各族，“每户纳貂皮一张”^⑥，近者到宁古塔副都统（后为三姓副都统）处缴纳；库页岛等远处，则由清朝政府定期派员到黑龙江下游的普禄、奇集屯、德勒恩和尼满河等处直接征收^⑦。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第九七七卷。

② 乾隆四十一年修《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康熙皇舆全览图》；《大清一统舆图》。

③ 《清朝文献通考》，第二七一卷，舆地三。

④ 乾隆元年修《盛京通志》，第一六卷，第一〇——一一页。

⑤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第九八六卷。

⑥ 《吉林通志》，第二八卷，第六页。

⑦ 《清朝文献通考》，第二七一卷，舆地三；萨英额；《吉林外纪》，第八卷；《吉林通志》，第一七卷，第三一页。

以上事实，不仅有中国文献可考，而且也为到达该地区的外国人所证实。例如，十九世纪初，曾到库页岛和黑龙江下游窥探的日本人宫林藏，亲眼看到清朝政府的许多官员，在设在德勒恩的衙门办公，征收贡赋，发放赐品，监督集市贸易；并确证当地的乡、屯长，由清朝政府“颁发文书”，正式任命^①。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人马克也以自己“考察”黑龙江地区的亲身经历证明：“中国政府历来就管辖着黑龙江两岸”，“很久以来，满洲官员每年都从松花江来到黑龙江，沿江而下，向附近居民征收贡赋”。^②事情很清楚，在十九世纪中叶沙俄侵占黑龙江地区以前，清朝政府一直在这一地区行使国家主权。这是客观事实，苏修绝对否定不了的。

苏修理亏词穷，拿不出象样的东西来为沙俄侵华罪行辩护，竟然说什么直到十九世纪中叶，黑龙江地区和滨海地区仍然“人烟稀少”，甚至“根本没有中国人”；“这些领土几乎不提供任何收益”。“人烟稀少”竟成了可以任人宰割的理由，“不提供收益”也成了可以否定别国主权的根据！在这里，人们看到的是臭名昭著的赫鲁晓夫主义。当年赫鲁晓夫支持印度扩张主义者向中国提出狂妄的领土要求时就曾同样说过：中印边境地区“人烟稀少”，“对人的生活没有很大价值”，因而“不值得认真对

^① 宫林藏：《东鞑纪行》，一九四二年东京出版，第二八——三五、七二——七六页。

^② 马克：《黑龙江旅行记》，第一三七页。

待”^①。这就是说，他可以侵占你“人烟稀少”、“几乎不提供任何收益”的地方，而你则不必斤斤计较，应该拱手相让。看，苏修是多么霸道！请问苏修先生，按照你们的逻辑，地处北极圈内的苏联北部地区是不是也可以让人任意占领？谁不知道那里迄今还是世界上人烟稀少、收益甚微的地区之一呢！

这些地区“根本没有中国人”！这简直是痴人说梦。难道一百多年前的事就可以胡说八道，死无对证了吗？既然“没有中国人”，穆拉维约夫在一八五五、一八五七年何必一再要求世居黑龙江左岸的中国各族居民，一律“移居江右”^②？既然“没有中国人”，同一个穆拉维约夫在一八五九年何必趾高气扬地宣布：“现在我正下令将一切中国官员和岗哨，从乌苏里江右岸（东岸）驱逐到左岸去，并命令将那些顽抗的人用武力加以拘捕”^③？既然这些地区“没有中国人”，与中国无关，沙俄尽可占领，又何必还要逼迫清朝政府签订条约，承认这种占有权呢？

值得注意的是，苏修不仅否认沙俄通过《璦琿条约》

①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

② 《清文宗实录》，第一八〇卷，第一四——一五页；《吉林通志》，第五五卷，第八——九页；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一卷，第四九七页。

③ 布克斯盖夫登：《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一九〇二年旅顺出版，第三一页。

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而且还倒打一耙，厚颜无耻地宣称，这个条约规定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居民仍准留住原地，由中国官员管理，“这一点对俄国说来是不平等的”。言下之意，似乎清朝政府通过这一条约获得了有损俄国利益的特权！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左岸、精奇里江口以南至霍尔莫勒津屯一带，是中国固有的领土；祖祖辈辈在那里居住的中国人，是当地的主人。沙俄蓄谋侵占该地，于一八五八年向中国提出江左“中国满、汉人等悉移右岸”的无理要求，并表示“移居费用由该国供给”，企图以利引诱，为清朝政府断然拒绝^①。在璦琿谈判中，俄方又提出同一要求，也被中方驳回。最后，俄方同意该地居民“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由中国官员管理，俄国人“不得侵犯”。据参加谈判的俄方代表供认，沙俄作出这一变动，并非出于对中国的让步，而是为了驱使当地居民为入侵的哥萨克生产粮食，并利用他们向南岸“扩大俄国的影响”，把江东六十四屯变成继续南侵的桥头堡。一句话，这样“对俄国不但没有任何害处，相反，会有好处”^②。这就是事情的真相。沙俄通过《璦琿条约》从中国割去了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同时出于继续侵略的需要，在条约中给中国留下这么一点点权利，现在苏修还说什么对俄国是“不平等的”！按照苏修的逻辑，一

① 《清文宗实录》，第二四五卷，第二〇——二一页。

②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三卷，一九一八年赤塔出版，第一二六页。

九〇〇年沙俄伸出魔爪，在江东六十四屯“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列宁：《中国的战争》）恣意破坏当地中国居民的永久居住权和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权，一手制造骇人听闻的反华大惨案，岂不都成了俄国为废除“不平等”条款而采取的正当行动了吗？除了一心践踏别国主权的帝国主义，今天谁敢说出这样的话来！？

二

苏修否认《瑛珲条约》不平等性质的另一个“理由”，叫做“通过和平的外交途径”解决了问题，“没有使用武力”。他们说：《瑛珲条约》“不是战争和炫耀武力的结果”，这个条约的“意义就在于此”！

事实终究是事实。十九世纪中叶沙俄在鲸吞我国黑龙江地区的过程中，始终奉行军事侵略与外交讹诈相结合的野蛮政策。苏修把穷凶极恶的沙俄侵略者描绘成“爱好和平”的天使，这完全是伪造历史。

武装力量，是沙俄侵略扩张政策的支柱。一八四七年穆拉维约夫就任东西伯利亚总督后，立即筹建外贝加尔哥萨克军，把它作为入侵黑龙江的主力。正如旧俄学者所说，穆拉维约夫确定了如下信念：“目标——黑龙江；

工具——外贝加尔军队；执行人——穆拉维约夫”^①。他公然向沙皇政府建议：“必须保持俄国亚洲部分的实力，以威慑中国。具体作法是，陈兵于接壤较近的地方，向懦弱软弱的近邻显示我国的军威”。他强调“首要的事是占领黑龙江口和库页岛的南部”，然后用俄罗斯武装移民，“立即占领从格尔必齐河到黑龙江河口湾的黑龙江左岸”^②。与此同时，穆拉维约夫力主在北太平洋大办海军，宣称：“欲占领（黑龙江）江口及附近海岸，便不可不有海军，为之臂助”^③。经沙皇批准，他在邻近中国边境的外贝加尔地区大肆扩军，使哥萨克居住地变成了一个大兵营^④。穆拉维约夫供认：到一八五三年，外贝加尔哥萨克步兵、骑兵“可以随时毫不费力地开赴国外”^⑤。沙俄甚至扬言，俄军“可以在一个月内进军北京”^⑥。就在同一年，尼古拉一世指示穆拉维约夫：如果中国不答应俄国的要求，“尔今手握雄兵，可以武力迫其就范”^⑦。磨刀霍霍，杀气腾腾，哪里谈得上实行什么“和平政策”呢？！

①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三卷，第一三页。

②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三卷，第一六——一八页。

③ 黎际涛：《俄人东侵史》，上册，一九三〇年哈尔滨出版，第三六三页。

④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三卷，第四四页。

⑤ 穆拉维约夫：《呈海军大将亲王殿下的秘密报告》。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二卷，第一〇四页。

⑥ 阿特金森：《黑龙江上、下游地区的旅行》，一八六〇年伦敦出版，第三七五页。

⑦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一卷，第四八四页。

按照预定计划，沙俄武力吞并黑龙江地区，大体可分实际占领与逼签条约两个步骤。一八四九年俄国政府派遣海军军官涅维尔斯科依率领一批水兵，从海上潜入中国黑龙江口侦察，迈开了侵占这个地区的第一步。此后几年，他们先后侵占庙街、奇集屯、阔吞屯和克默尔湾(迭卡斯特里湾)、哈吉湾等战略据点和重要港湾，擅自设立尼古拉耶夫斯克、康士坦丁、亚历山大、马林斯克、伊利因斯克等哨所，为沙俄鲸吞整个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中国广大地区铺平了道路。尼古拉一世(一八二五——一八五五年)对涅维尔斯科依的海盗行径，备加赞赏，指着地图上庙街一带地方叫嚷：“俄国国旗不论在哪里一经升起，就不应当再降下来。”^①这就是说，沙俄的魔爪不论伸向哪里，哪里就是俄国的土地！

一八五四年一月，沙皇政府悍然决定，不管清朝政府同意与否都要沿黑龙江航行，标志着沙俄对黑龙江地区的侵略进入了决定性阶段。这年五月，穆拉维约夫亲自率领兵船，运载近千名哥萨克远征军和大批枪炮弹药，不经清朝政府的允许，强行闯入黑龙江东驶。船到瑗琿附近，穆拉维约夫下令，如果中国方面不放行，“一俟得到他的命令，立即攻城”^②。瑗琿守城官不许俄国船队在城旁

^①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第一二四页。

^②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三卷，第五九页。

通过^①，但因“东省兵丁器械一概不足”，无力制止。穆拉维约夫有恃无恐，强行通过^②。俄军到达下游一带，就屯兵筑垒，实行军事占领。经过这次武装“航行”，沙俄探明了中国东北边防废弛，清朝政府腐败无能^③，便更加肆无忌惮，于一八五五——一八五七年不顾清政府的多次抗议，接连三次非法侵入黑龙江航行。到一八五七年末，沙俄用武装占领、普设哨所、军事殖民、设置军屯等办法，侵占了黑龙江上、中游北岸和黑龙江下游两岸的中国领土，造成了“既成事实”，为逼签割地条约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沙俄这一系列的侵略活动，与英、法联军从南方沿海

①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第二九四——二九五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八卷，第五页；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一一九页。

③ 从十八世纪末业已衰微的清朝，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状况江河日下。一八四〇年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乘虚而入，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为了抵御从海上入侵的外国强盗，竟不惜削弱东北陆防，从黑龙江、吉林边境要地征调大批兵丁南下。（据沙俄恰克图地区边防官给沙俄政府的情报，仅一八四一年九月，清政府即下令在接邻俄国的海拉尔地区征集一万人南下。见苏联《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一九六三年第五六期，第一四一页）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反动、腐朽的清政府忙于镇压农民起义，又不断从黑、吉两省征召大批官兵入关，形成东北边境粮缺兵少，“各路无防”，“一切掣肘”的严重局面（《黑龙江志稿》，第三一卷，第三一——四四页；《吉林通志》，第五一卷，第一七——一八页；《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一二卷，第一七、二三、二四页）。穆拉维约夫把清政府的衰弱和中国的国内战争，看作俄国“顺利”地侵占黑龙江的“大好时机”（穆拉维约夫：《呈海軍大將親王殿下秘密報告》。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二卷，第一〇七页），疯狂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入侵。

侵略中国的事件遥相呼应，形成了列强南北夹攻中国的严重局面。正如恩格斯当时所说：“正当英法两国的海陆军向香港调集的时候，西伯利亚边防的哥萨克部队却缓慢地、然而继续不断地把自己的驻屯地由达呼尔山移向黑龙江岸，而俄国海军陆战队则在满洲的良好的港湾周围设立堡垒。”（《波斯和中国》）这个铁的事实，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

与俄军大举入侵黑龙江的同时，沙俄采取的另一个步骤就是向清朝政府约期会谈。沙俄此举，并非象苏修所说，是为了“解决一些争议问题”，而是“阳请分界，阴图侵疆”^①，即诱逼清朝政府签订割地条约，使其非法侵占合法化，扩大化。

还在璦琿谈判之前很久，亚历山大二世即已悍然决定：为了西伯利亚地区的发展，“必须坚决地使整个黑龙江左岸属俄国所有”^②。据此，在一八五五年九月阔吞屯中俄谈判中，穆拉维约夫硬要中国把黑龙江左岸，“分与俄罗斯人占据，设卡守护”，并让俄国人“夏由水路乘船，冬则冰上骑马，上下不断行走”。中方代表根据《尼布楚条约》严正指出：黑龙江“系天朝（指中国）地界”，不能让与^③。沙俄的外交图谋被挫败。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一二卷，第二三页。

②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一卷，第四二四—四二五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一二卷，第三—四页。

一八五六年十月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五六——一八六〇年）爆发后，沙皇政府认为这是对它最有利的机会，决定趁火打劫，于一八五七年三月派遣普提雅廷出使中国，进行“外交上的远征”^①。沙俄外交部训令规定，在谈判中，不管清朝政府态度如何，他“要永远以下面的原则为出发点，就是我们已决定占领黑龙江左岸”；同时授权他“与西方列强一起采取共同合作的行动”^②。这就是要利用英、法侵华的时机，来实现自己的领土野心，并分沾其他列强从中国夺取的一切侵略权益。穆拉维约夫一贯主张“以全副武装进行谈判”^③。为了支持普提雅廷，他在蒙古边境和黑龙江左岸集结了步兵一万六千人，骑兵五千人，炮兵一千人，摆出了随时发动进攻的阵势^④，并叫嚣：“如果中国不同意我国提出的分界线，依然坚持认为黑龙江是中国的，那末，我们必须以武力强迫他们承认我国的权利。”^⑤按照他的计划，如果“外交远征”失败，俄国应“立即诉诸武力”，径取库伦、璦琿、祖鲁海图，直至南满和北京，使俄国“立足满洲、蒙古，从而使满蒙脱离中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一卷，第四九〇页。

② 波波夫：《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沙皇外交》，载苏联《红档》杂志，一九二七年第二卷，第一九三——一九四页。

③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三卷，第六七页。

④ 穆拉维约夫：《致普提雅廷伯爵》。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二卷，第一五四——一五五页。

⑤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一卷，第四八八页。

国，成为受俄国庇护的两个公国”^①。普提雅廷到达直隶湾后，清政府以两国会商边界事宜，应在边界进行的惯例，要求他转赴瑗珲。普提雅廷没有达到目的，便秘密前往香港，怂恿英、法侵略联军北上，封锁天津海口，逼清朝政府投降。普提雅廷与穆拉维约夫两人，一文一武，对中国发起了分进合击的外交攻势。足见苏修所谓的“和平”、“友好”，统统是十足的伪善和欺骗。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日，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天津告急，北京震动。英、法在中国沿海刮起的风，助长了沙俄在黑龙江掀起的恶浪。二十二日，穆拉维约夫突然率兵二三百人，在两艘炮艇护送下闯到瑗珲，向黑龙江将军奕山提出对中国领土的无理要求。由此开始的瑗珲谈判，就是在俄军犯境、兵临城下的形势下举行的。在会谈中，俄方代表使用了赤裸裸的武力恫吓等威胁手段，向中方代表敲诈勒索，完全破坏了两个主权国家平等协商的原则。谈判一开始，俄方就拿出事先拟订的条约草案，悍然宣称黑龙江、乌苏里江“是两国之间最合适的天然边界”^②。清朝方面当即指出，根据《尼布楚条约》，两国以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至海为界，“议定遵行，从无更改”。穆拉维约夫理屈词穷，宣称：“以河为界字样，断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一卷，第四八五—四八六页。

^②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第三五一页。

不能删改”^①，“如其不然，我先将左岸满洲屯户遣兵驱逐，不准屯居。”^②继而，他又以英国正入侵中国相威胁，硬要奕山“毫不犹豫地”在俄方“以最后通牒方式”“提出的条约最后文本上”签字，胡说什么“这个条约对中国特别需要”^③。奕山回答：“要是英国人企图出现在黑龙江”，我们将会把他们“扔进大海里去……”^④。不等说完，穆拉维约夫竟“勃然大怒，举止猖狂”^⑤，向译员大声叫嚷：“同中国人不能用和平方式进行谈判”^⑥：“现在是他们考虑和接受（俄国的）坚决的、不容更改的建议的时候，为此，我给他们限期到明天！”^⑦穆拉维约夫回船后，当夜黑龙江“左岸炮声不绝，陆屯水船，号火极明”，“势在有意寻衅”^⑧。奕山本来是个投降派，早在一八四一年就被英国的大炮吓破了胆，在广州城头扯起白旗。这回，在沙俄的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二五卷，第一二——一三页。

② 《吉林通志》，第五五卷，第一五页。

③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三卷，第一二六页；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第三五三页。

④ 尤里·谢苗诺夫：《西伯利亚征服记》，一九四四年伦敦出版，第三〇六页。

⑤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二五卷，第一三页。

⑥ 格拉切夫：《黑龙江边区同俄国的合并》，一九二〇年俄国地理学会南乌苏里分会出版，第一五页。

⑦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第三五四——三五五页。

⑧ 《吉林通志》，第五五卷，第一四页；《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二五卷，第一三页。

炮口下，他又害怕“兵衅立起，实不知如何结局”^①，决定不顾清朝政府关于在谈判中应“查照从前界碑，与之剖辩，不可迁就了事，致开后患”^②的指示，奴颜婢膝地向俄方屈服，接受侵略者的横蛮要求，于五月二十八日在《璦琿条约》上签字。

以上事实清楚地表明，在侵占黑龙江地区的过程中，沙俄不断挥舞武器，推行极端野蛮的武力外交政策。《璦琿条约》正是这一政策的产物，它是沙俄先用武力侵占中国的土地，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对此，十月革命后不久许多苏联著作都曾作出过公正的结论。例如，一九二三年，历史学家波克洛夫斯基曾指出：穆拉维约夫在“征服”黑龙江地区时，使用武力威胁，“迫使对手离开并让出了他所要求的一切地方”^③。一九二六年《苏联大百科全书》指出：“穆拉维约夫用军队占领了黑龙江左岸之后，便迫使中国人签订了璦琿条约。”又说，这个条约“是帝俄为侵占中国领土作出的第一个坚决步骤”^④。一九三六年高尔基等主编的《苏联国内战争史》指出：亚历山大二世“从中国抢去了黑龙江沿岸和乌苏里江沿岸地区。”^⑤沙俄侵略黑龙江地区的急先锋涅维尔

① 《吉林通志》，第五五卷，第一五页。

② 《清文宗实录》，第二五〇卷，第四页。

③ 波克洛夫斯基：《十九世纪沙皇俄国的外交和战争》（文集），一九二三年莫斯科出版，第三五六页。

④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一卷，一九二六年莫斯科出版，第七五六页。

⑤ 《苏联国内战争史》，第一卷，一九三六年莫斯科出版，第五八页。

斯科依在谈到瑗珲谈判时也供认不讳：当时俄国正是依靠“建立军人村屯，调遣军队和武装舰艇，才取得了应有的效果”^①。就连亚历山大二世本人，在条约签订后，也禁不住夸赞穆拉维约夫在侵略黑龙江地区时“屡建武功”，“不负朕望”^②。现在，苏修竟把这种武力外交美化为“和平政策”，还说什么《瑗珲条约》的“意义就在于此”！这不仅欺骗不了任何人，而且正好给它自己推行的所谓“和平外交”作了最合适的注脚。

三

苏修还说什么沙俄强占我国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是“防御战略”的“迫切需要”。他们声称：“十九世纪中叶远东国际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美国和英国的扩张成为北太平洋俄国领地的真正威胁”，“英美殖民者在黑龙江也可能捷足先登”；“为了保卫俄国远东地区”，“为了保卫黑龙江口和库页岛”，俄国不得不“在黑龙江设防”；《瑗珲条约》的目的，就是“对付西欧大国对黑龙江地区的侵犯”，如此等等。他们用“自卫”、“防御”、“帮助中国”等动人辞藻，把沙俄掠夺中国土地的动机美化到了几乎无以

①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第三五五页。

②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一卷，第五二七——五二八页。

复加的程度。

假的就是假的。沙俄在十九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苏修把这个恶魔打扮得越美，它自己的用心也就越丑。

众所周知，十九世纪中叶远东国际形势的最大变化，莫过于许多亚洲国家遭受资本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逐渐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正如恩格斯当时所说：“**不稳定的亚洲帝国在一个一个地变成野心勃勃的欧洲人的猎获物**”，而中国就**“是其中的一个”**。（《俄国在远东的成功》）沙俄的地位与中国截然不同。它是当时与英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主要对手，在近东、中东和远东都跟英国进行着激烈的角逐和竞争。它**“一直想夺取君士坦丁堡和亚洲大部分地区”**，（列宁：《论单独讲和》）并把俄国建成一个地跨欧、亚、美三大洲的斯拉夫殖民大帝国。太平洋两岸的风云剧变，地图改色，正是英、俄等国竞相争夺的结果。在争夺中，沙俄是获得侵略权益最多的一个。难道俄国在亚洲的殖民势力急剧膨胀，“**使自己的统治权扩大到一块与整个欧洲面积相等的领土上（俄罗斯帝国不包括在内），并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进入了温带**”，（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不正是这一时期实现的吗？难道恩格斯当时作的“**俄国近年来在东亚细亚，即在太平洋西岸有着极顺利的进展**”（《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的科学结论不是千真万确的吗？苏修妄图把掠夺成性、到处伸手的沙俄，摆在与中国等备受侵略之害的亚洲国家同等的地位，用

俄、英两国争霸冲突来掩盖俄、中两国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是极端荒谬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

十九世纪中叶沙俄对中国黑龙江地区的大举入侵，就是在英、俄争霸的背景下展开的。在沙俄心目中，中国不过是近在嘴边的肥肉，势在必夺。英国发动的侵华战争，自然是对妄图称霸东亚的沙俄的严重挑战，并“威胁”着它在对华陆路贸易方面的垄断地位。沙俄决不甘心丧失它既得的侵略权益，更不愿让自己的对手占据上风。它还要夺取新的利益。因此，“**在这里俄国和英国的利益必然要发生直接冲突。**”（恩格斯：《印度起义》）由于沙俄资本主义发展远较英国落后，在经济竞争方面不能与英国相匹敌。但它同中国边界相连，在地理位置上有超越英国的便利条件。它决定利用这个方便，用拓展版图的办法，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领土掠夺，并以此手段保持和扩大在华政治、经济特权，增强其在太平洋西岸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英国首先发动的对华战争削弱了中国的力量，动摇了清朝政府的基础，正好给沙俄打开了前进的道路，使它“**能够顺利地由北方入侵**”中国，（马克思：《鸦片贸易史》）“**占领当今中国统治民族的故乡——黑龙江两岸的地方**”。（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璦琿条约》的签订，正是沙俄在亚洲争夺殖民地的重要步骤，是帝国主义侵华史上的重要一页。因此，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在远东地区殖民势力的增长，不仅没有威胁俄国本身的安全，反而给沙俄提供了扩大侵略的借口，加速了它向中国扩张的步伐。十

九世纪中叶(以及下半叶)的中国,成了俄、英两霸的牺牲品。苏修无视历史事实,硬把沙俄的对外扩张粉饰为“自卫”行动,把侵华的主要角色打扮成帮助中国抵抗外来侵略的友好邻邦,这是地地道道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征服别的民族,吞并左右邻邦的领土”,(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是沙俄的既定政策。侵占黑龙江地区是它妄图征服中国的首要目标。如前所述,早在十七世纪中叶,当西方国家从海上侵略中国东南沿海的时候,沙俄便与之呼应,从北方向中国黑龙江地区伸出了黑手,并且要求清朝皇帝“归顺俄国”,永为“臣仆”,妄图一举灭亡中国^①。《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沙俄虽然信誓旦旦地确认中国对外兴安岭以南广大地区的领土主权,但妄念未消,侵华之心不死。在一八四九年沙俄海军潜入黑龙江口以前的一百五十多年间,沙俄侵略者,上起沙皇,下至总督、将军、外交官、“探险家”,拟订的入侵计划多如牛毛。只因时机没有成熟,才未敢轻举妄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的积弱完全暴露,沙俄终于背弃自己的诺言,撕毁《尼布楚条约》,卷土重来。这是二百多年来沙俄侵华史的必然发展与直接继续。正如马克思所说:“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中国和英国的条约》)割断沙俄侵华的历史,把这种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一卷,一九六九年莫斯科出版,第一二九——一三〇页。

蓄谋已久的赤裸裸的领土掠夺罪行，说成是因为“国际形势剧变”而采取的“自卫”措施，这只有老沙皇及其忠实信徒才干得出来。

苏修还大肆渲染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一八五三——一八五六年）英、法海军在堪察加地区的军事行动，想借此证明沙俄侵占黑龙江地区是“正当的”“自卫”，这也是痴心妄想。

克里米亚战争是沙俄同英、法争夺中、近东霸权的
不义之战。“**对于俄国人来说，这是实现传统的野心的战争**”。（恩格斯：《神圣的战争》）两个强盗为争夺赃物打架，本来就没有“自卫”可言。就算是“自卫”吧！难道为了“保卫”俄国，就应当侵占并未介入战争的中国的领土吗？这样说来，任何一国都可以借口“保卫”自己的安全利益，去侵占别国的任何地方。按照这种逻辑，必然要导致对他国领土的永无休止的掠夺。马克思早就指出：“**如果国界应当根据军事利益决定，那末要求就会毫无止境**”；“**把军事上的考虑当成决定国界的原则**”，“**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和时代错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

事实上，早在克里米亚战争以前很久，即一七八七年初，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一七六二——一七九六年）就已借口北太平洋出现了英、法海上探险队，提出了所谓“自卫论”，说什么“为了捍卫我们在俄国航海家们所发现的土地上的权利”，俄国必须“占有”黑龙江，并策划派遣

大规模的海上“探险队”，前来远东执行这一侵略任务^①。而叶卡特林娜二世“占有黑龙江”的主张，原本是继承彼得一世（一六八二——一七二五年）的遗志。这就是苏修鼓吹的“自卫论”的由来。一八五三年十一月，克里米亚战争刚刚爆发，英、法尚未参战，穆拉维约夫就以“防卫”西伯利亚为“理由”，要求沙皇政府加紧用武力侵占黑龙江，“并且牢固地控制邻邦中国”^②。一八五四年一月沙俄决定武装入侵黑龙江后，穆拉维约夫异常高兴地说：“我们决定利用欧洲进攻我国的时机，在亚洲开拓我们的事业。我将尽一切努力为俄国奠定这一事业的牢固基础。”“不管怎样，我新建的部队大有用武之地了”^③。防御英国是借口，侵略中国是目的。穆拉维约夫的自供有力地戳穿了苏修喧嚷的沙俄侵占黑龙江是为了“对付”英、法的秘密。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值得指出的是，苏修在重弹穆拉维约夫之流的“自卫论”的滥调时，故意略去“我们（俄国）准备向蒙古和满洲地区进军”^④，要“牢固地控制邻邦中国”等极其重要的实质性内容。这不是欲盖弥彰、“为

① 维诺库罗夫、弗洛里奇：《涅维尔斯科依海军上将的功勋》，一九五一年莫斯科出版，第四〇——四一页；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一九五九年布拉戈维申斯克出版，第三四页。

② 穆拉维约夫：《呈海军大将亲王殿下的秘密报告》。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二卷，第一〇五页。

③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一卷，第三五一页。

④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一卷，第四三八页。

亲者讳”吗？

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的主力被牵制于近东战场。战争爆发不久，穆拉维约夫便已认定：在远东的堪察加半岛和鄂霍次克海沿岸，英国“不会把大量的登陆队派到那些遥远的地区”，“甚至不会想到有必要派强大的兵力去攻打”^①；“在那里我们要比英国人强大”^②，俄国稳操胜券。尽管如此，他仍然借口战争的需要，不断把军队开进与交战双方无关的中国的领土，并继续把这一纯粹侵略性的军事行动，伪装成对付英国的“防御”措施。就这样，到克里米亚战争结束时，沙俄虽然在近东战场上遭到惨败，它独霸巴尔干的计划受挫，它在黑海的出海口被英国堵塞；但是它在远东的版图却靠牺牲中国的领土而大为扩大。真是“失之西方，取之东方”。苏修吹嘘的沙俄“自卫论”的真相就是如此。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沙俄决定“报复”。但是它没有向英法寻衅，反而继续拿中国开刀。对黑龙江的侵略步伐，不但没有随着停止，反而愈益加紧了。穆拉维约夫供认：“这一事业（指沙俄侵吞黑龙江地区）无疑将会补偿俄国在西方受到的全部损失”^③！沙俄的贪得无厌，欲壑

① 穆拉维约夫：《呈海军大将亲王殿下秘密报告》。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二卷，第一〇六页。

②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一卷，第三五一页。

③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一卷，第四七九页。

难填由此可见。正在这时，从克里米亚战场上腾出手来的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沙俄决定与昨天在近东火并的英、法携手（自然是同床异梦，心怀鬼胎），一起向中国猛扑过来。

以上事实，早为人所共知。苏联早期历史学者曾指出：克里米亚战争“揭开了俄国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的新的一页。这个阶段俄国殖民政策史的特点是：不仅夺取整个黑龙江左岸（直到该河河口），而且要兼并满洲”^①。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也曾指出：沙俄早就“决意夺取黑龙江”，“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无疑加速了事态的进程”^②。由于“借口必须给被封锁的舰队运送必不可少的粮食，俄国占领了中国的领土，到克里米亚战争结束时，它保持并扩大了这块领土”^③。就连苏修学者过去也曾承认：“沙皇政府力图用向远东和中亚的扩张，来补偿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损失”^④。现在他们力图用“自卫论”来美化沙俄的侵略扩张，完全是自打嘴巴。

至于把侵占中国领土说成是为了“帮助”中国“对付”别国侵略，同样是沙俄的老调。一八五四年俄军入侵黑龙江，沙皇政府却向中国诡称：“此次用兵，不惟靖本国之

① 霍多罗夫：《波克罗夫斯基和远东研究》，载《新东方》杂志，一九二九年莫斯科出版，第二五期。

② 克劳斯：《俄国在亚洲》，一九〇〇年纽约出版，第四六页。

③ 伦森：《俄国向日本的推进》，一九七一年纽约出版，第四五七页。

④ 纳罗奇尼茨基：《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一八六〇——一八九五）》，一九五六年莫斯科出版，第一二〇页。

界，亦实于中国有裨”，“绝无出人不意因而贪利之心”^①。一八五五年阔吞屯谈判中，沙俄又以“保卫黑龙江口不受任何外国侵略”为名，要求中国把黑龙江作为两国“最无可争辩的天然疆界”^②。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沙俄一面与英法勾结，一面厚颜无耻地说什么俄国“竭力剿灭英法两国，以期中国有益”，“倘海岸属为俄国，则外国之人，不致阑入满洲地方”^③。“防堵英夷，请将海兰泡空旷之地，给与我国，自有利益”^④。在瑗珲谈判中，俄方又宣称：“中英正在交战，英国很可能公开露出他们占据黑龙江口及其以南沿海地区的野心；只有俄国根据所订条约声明上述地区属俄国所有时，才能遏止英国的侵犯。”^⑤如此等等。强盗闯进别人家里，偏说是为了“保护”人家的“安全”，对人家“有益”，这是十足的强盗逻辑。清朝政府当时就已识破这套骗人鬼话，指出：沙俄“以防堵英法为名，俾可（在黑龙江）恣意往来”^⑥；“显系强占中国地方，并非防堵英夷”^⑦。今天，苏修大肆吹嘘沙俄的“助华论”，说得神乎其神，它实际上是把老沙皇的这一套作为自己“国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八卷，第二五页。

② 穆拉维约夫：《对划界的意见》。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二卷，第一三七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二一卷，第六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一九卷，第二五页。

⑤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三卷，第一二三页。

⑥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一二卷，第二三页。

⑦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一六卷，第一九页。

际主义”的范例哩！

应当指出，沙俄高唱入云的“助华防英论”，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英、俄两国在掠夺中国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表明沙俄力图利用中国人民由于英国侵华而激起的普遍仇英情绪和清朝政府对英国的恐惧心理，把自己伪装成中国的“天然盟友”，以便招摇撞骗，趁机加强俄国在华的侵略势力。同时，“防英论”又是沙俄用以掩盖俄、英勾结、联合侵华的烟幕；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事实上一直支持英、法联军进攻中国，以便混水摸鱼，从中取利。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前苏、美两家争霸世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不是正在以制止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扩张为口实，打着第三世界人民的“天然盟友”的旗号，向世界各地大伸其手吗？世界人民应该对这个阴险狡猾的敌人，保持高度警惕。

随着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全面复辟，苏联史学已堕落成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推行霸权政策的驯服工具。一些苏修御用的历史伪造者颠倒黑白，公然为老沙皇的侵略罪行全面翻案。他们矢口否认沙俄帝国主义侵吞中国领土的事实，否认《璦琿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就是这种罪恶活动的一个方面。因此，这决不单纯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当前世界人民要不要反帝、反殖、反霸的重大原则问题。按照苏修的逻辑，连沙皇俄国割占黑龙江地区那样露骨的侵略都“不能叫侵占”，连沙俄那样野

蛮的武力掠夺政策都叫“和平”政策，连《璦琿条约》那样有损中国主权的条约都是平等条约，那末，世界近现代史上哪里还有什么帝国主义侵略，哪里还有什么不平等条约，哪里还有什么帝国主义和世界被压迫人民的矛盾呢？世界人民正在蓬勃开展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岂不都是“无的放矢”吗？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全部理论岂不都不适用了吗？苏修的矛头指向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反帝斗争，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很清楚吗？

伟大的列宁指出：在党的纲领中，“**中心问题应该是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种区分是由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定的，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却虚伪地避而不谈。**”（《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苏修抹煞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与人民的根本区别，颂扬沙俄的殖民政策，滚进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泥坑，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是一丘之貉。我们要发扬势如破竹的革命精神，彻底批判苏修形形色色的反动论点，彻底揭露新老沙皇的侵略罪行和称霸世界的野心，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

柳条边的历史和苏修的谬论

纪 实

柳条边是清朝政府在辽河流域修的一条柳条篱笆，用以标示禁区的界限，禁止一般居民越过篱笆打猎、放牧、采人参。柳条边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为了适应其扩张政策的需要，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的政府声明中，竟把这样一个和国界毫不相干的柳条边硬说成是清代中国东北的“国界”，说什么“满洲的臣民如果越过‘柳条边’的界线之外，就被认为是出国了”。妄图以此证明柳条边以外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不是中国领土。苏修的御用文人也紧跟着炮制出一篇所谓《论俄中边界形成史》，胡说什么柳条边是康熙时修建的“边界工事线”，是“一条无法穿越的林带”。还说什么从柳条边到黑龙江沿岸“是宽达数百公里的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带。”等等。信口雌黄，荒唐已极！现在，就让我们打开柳条边的历史来看看苏修叛徒集团及其御用文人所制造的这些谎言，多么荒谬可笑！

一、清朝顺治年间柳条边出现的原因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随着明王朝势力的衰落，

明王朝东北地区的方官满族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势力崛起，逐渐统一了东北广大地区，并取代了明王朝在东北的统治地位。努尔哈赤在统一东北的过程中于一六一六年建立后金政权，一六二五年迁都沈阳（后改称盛京）。一六三六年皇太极改后金为清。柳条边是清统一了广大东北地区以后，才开始在辽河流域和吉林部分地区修筑的。

满族贵族为什么要修筑柳条边呢？

一六四四年清军入关，福临（顺治）即位不久便在北京建立起以满族贵族为首的中央政权。在满族统治者看来，辽河流域和吉林部分地区是其“祖宗肇迹兴王之所”的“龙兴重地”^①，他们为了维护这地区的特殊性，便把这一地区划为特殊地带，严禁其他各族尤其是汉人入内。同时，在清入关之初，关内的斗争形势极为复杂，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交织在一起，面对这种复杂的斗争形势，满族贵族统治集团为了保护“龙兴重地”，以巩固其“根本”，便修筑了柳条边。正如乾隆皇帝在《老边诗》中所说：“征战纵图进，根本亦须防。”^②这清楚地说明，清初修筑柳条边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其“龙兴重地”，这是十分明确的。

辽河流域大部分是农耕地区，清朝统治者为了缓和满族内部的阶级矛盾，保持经常征用的八旗武装力量，制

① 《盛京通志》，卷八——九。

② 《盛京通志》，卷一六。

造民族间的矛盾以达其统治的目的，曾制定了优待旗人（满、蒙、汉军旗人）的政策。清王朝为了执行这种政策，从清初开始，就把辽河流域的大量肥沃土地分给八旗官兵及其家丁^①，以维护旗人的经济特权，清朝统治者严禁八旗以外的汉人或其他民族的成员迁入柳条边内垦耕种植和放牧。

东北依山傍水的地方，产有人参、貂皮、珍珠、鹿茸等物，其产地分布范围较广，一部分在柳条边之内，大部分在柳条边之外。满族贵族为了独占这些特产，把柳条边以外的有关产地，如采参山场、捕珠河流、特产贡山等，也用立封堆等办法划为禁区，不让边内人民（包括满族）自由流动到边外去，以保证满族贵族的经济利益。所以柳条边既是保护边内的“发祥重地”，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边外禁区包括皇族的围场在内的一条封禁界限。

清初修筑柳条边也是为了用以作为行政区的分界线。如《奉天通志》记载：“清起东北，蒙古内附，修边示限，使畜牧游猎之民，知所止境，设门置守，以资镇慑。”^②

大量的历史事实表明，清代的柳条边是清统一了广大东北地区之后才出现的，这是满族贵族统治集团为了

^① 《清圣祖实录》卷八七：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年）丈量奉天所属东至抚顺、西至宁远州（今兴城）、南至盖平、北至开原的土地，共丈出垦地五百四十八万四千一百五十五顷，其中八旗田地就有四百六十万零五千三百八十顷。这些旗田都分布在柳条边之内。

^② 《奉天通志》，卷七八。

维护清朝皇室所谓的“发祥重地”、独占东北经济上的特权利益所采取的一种措施，也是东北几个行政区的分界线。十分清楚，清代的柳条边和中国东北的国界没有任何联系。

二、柳条边的建置和变迁

苏修御用文人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硬把顺治年间（一六四四——一六六一年）在辽河流域修筑的柳条边，歪曲为“一六七八年，奉满清皇帝康熙之旨，开始在南满修建的（的）边界工事线”，说它是“一条无法穿越的林带”^①。这是明目张胆地伪造历史。

什么是柳条边呢？康熙时杨宾在《柳边纪略》中说：“今辽东皆插柳条为边，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中原）之竹篱。”^②可见柳条边就是一条柳条篱笆。柳条边的修筑办法，是用土堆成宽三尺、高三尺的土堤，堤上每隔五尺插柳条三株，各株间再用绳连结横条柳枝，即所谓“插柳结绳”。乾隆皇帝在《柳条边》诗中说：“我来策马循边东，高可逾越疏可通。”^③这对苏修所谓的柳条边是“一条无法穿越的林带”也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辽河流域的柳条边，从顺治初年开始分段修筑，到顺

① 《论俄中边界形成史》。

② 杨宾：《柳边纪略》，卷一。

③ 《盛京通志》，卷一三。

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完成^①。它的走向：南起凤凰城（今辽宁凤城）西南，向东北经兴京（今辽宁新宾）折而西北至开原东北的威远堡；又从威远堡折而西南至山海关接长城，周长一千九百五十余华里，名为“老边”，也叫“盛京边墙”。在吉林部分的一段，即自威远堡略向东北至法特哈（今吉林市北法特）是一条单边，在康熙九年至二十年（一六七〇——一六八一年）修筑，长六百九十华里，名为“新边”。柳条边总的形势是，以山海关、威远堡、凤凰城和法特哈四个交通要道为点，所联成的一个“人”字形的封禁篱笆。（见“柳条边示意图”）这里必须指出，苏修把辽河流域柳条边的修筑时间故意拉后到沙俄强盗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之后，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前的一六七八年（康熙十七年）是别有用心的。因为自此以后，清朝军民掀起了抗击沙俄入侵的雅克萨战争。苏修妄图以此证明是清朝“侵占”了“并入俄国的土地”，从而一笔勾销黑

① 《大清一统志》卷四四、乾隆元年《盛京通志》卷一六：白石嘴边门“顺治八年设（于）水口”。乾隆四七年《盛京通志》（文中所引《盛京通志》未注明版本的均系四七年本）卷五一：新台边门“顺治十一年设”。乾隆元年《盛京通志》卷一九：“鸣水堂边门顺治十一年设于平川营”，“梨树沟边门，顺治十一年设于黑山口”。康熙《广宁县志》卷五、康熙《锦县志》卷五、康熙《宁远州志》卷五、康熙《锦州府志》卷八、咸丰《开原县志》卷五等记载：松岭子边门、九官台边门、清河边门、白土厂边门、彰武台边门、法库边门等，均在顺治十一年设有笔帖式、防御等员驻守。又《清圣祖实录》卷二：顺治十八年奉天府尹张尚贤上疏论奉天形势说：“广宁一城，……北至我朝新插之边，相去数十里。”所以到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辽河流域的柳条边已经建成。

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这是痴心妄想。

沿柳条边的走向，初设边门二十一，后减为二十。自山海关至凤凰城有边门十六：鸣水堂边门、白石嘴边门、梨树沟边门、新台边门、松岭子边门、九官台边门、清河边门、白土厂边门、彰武台边门、法库边门、威远堡边门、英额边门、兴京边门、碱厂边门、暖阳边门、凤凰城边门。吉林部分的“新边”自威远堡而东北有边门四：布尔图库边门、克尔素边门、伊通边门、法特哈边门。“老边”东段自威远堡至凤凰城，归盛京兵部管辖并受盛京将军兼统；自威远堡至山海关的西段，归盛京将军管辖^①。“新边”归宁古塔将军管辖。^②

清政府为了控制交通要道，把柳条边的边门均设在主要的交通要道上。这些交通要道可通往关内和包括蒙古、黑龙江流域在内的东北各地。如威远堡边门是地处“黑龙江、吉林咽喉之地”^③，法特哈边门则为“伯都讷、黑龙江往来孔道”^④。清代的陆路交通驿站是以北京的皇华驿为中心，在东北路是从皇华驿达盛京，再由盛京通过各边门，进而把广大的东北地区联成一片。清朝统治者为了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封建剥削和严密的政治统治，曾规定：凡进出边门进行生产的各族居民，均须持有关部门

①② 《盛京通志》，卷三三、五一；《清文献通考》卷一八二。

③ 《盛京通志》，卷一九，咸丰《开原县志》，卷二。

④ 《盛京通志》，卷三三。

发给的印票，从指定的边门验票出入，否则就以私入“禁地”论罪。如果“各项采捕人，将本身印票转卖给他人者，买卖之人各枷两月，鞭一百”^①。因而边门就成为清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勒索各族人民的封建关卡。以威远堡边门为例，“当时经过边门的马车，都要纳税，出边门的纳二百文，进边门的纳四百文，从船厂（吉林）来的纳钱更多。死了人出葬经过边门也要纳钱”^②。

康熙时，随着统治者的需要，在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年）、十八年（一六七九年）、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年）、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年），在“老边”西段自鸣水堂边门，北到松岭子边门一段，曾有四次向西展边，民间俗称“三展皇边”（上述各边门均系展边后的名称）。如白石嘴边门，“顺治八年初设（于）水口，（康熙）十四年展边高台堡，二十五年展边宽邦，三十六年展边白石嘴，安设此门”^③。又如新台边门，“旧设于芹菜沟，在（宁远州）城西北四十里，本朝康熙十四年展边二道河，三十六年展边移置于此。”^④今天在兴城县境内，还留有“头道边”、“二道边”、“旧门”一类的地名。据柳条边建置调查：“新台门这块地方，原来是蒙古达王占的，那时王爷吃租，汉人种地。新台门最早是在旧门（兴城县西北），距这四十多里，三展皇

① 《大清一统志》，卷八八九。

② 《柳条边建置调查纪实》。

③ 《大清一统志》，卷四四。

④ 《盛京通志》，卷三三。

边才设的新台门。”^①康熙时的四次向外展边有力说明，柳条边的建置和变迁是随统治者的统治需要，随时可以一再移动的，由此可见，柳条边和“国界”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三、柳条边的性质和作用

苏修把这样一个柳条边硬说成是清朝北部“疆界的标志”^②，还说从柳条边到黑龙江沿岸是一片“荒无人烟”的“缓冲地带”^③。言外之意，柳条边外的土地并非中国领土，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恰恰相反，柳条边的“边”除了标示“禁区”的界限外，更主要的是盛京和宁古塔、内蒙古几个行政区的分界线。对此乾隆皇帝在《柳条边》诗中说的十分清楚：“取之不尽山木多，植援因以限人过。盛京、吉林各分界，蒙古执役严谁何。”^④据《吉林外记》记载：“吉林乌拉（今吉林市）西南至威远堡盛京界，五百七十里。”^⑤《柳边纪略》在记述宁古塔将军所辖范围中说：“宁古塔将军所属……西至威远堡盛京界。”^⑥又据柳条边建置的调查：“过去的威远堡

① 《柳条边建置调查纪实》。

② 苏联政府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声明。

③ 《论俄中边界形成史》。

④ 《盛京通志》，卷一三。

⑤ 《吉林外记》，卷二。

⑥ 杨宾：《柳边纪略》，卷一。

是一步三界的地方，出威远堡边门是吉林界，门里归奉天的开原县，道西属西丰县。”^① 上述“老边”归镇守辽宁的盛京将军管辖，“新边”归镇守吉林的宁古塔将军管辖，都是证明。这十分清楚地说明，柳条边威远堡一段，是盛京和宁古塔两个地区的分界地。“老边”和“新边”所联成的西边一线，则是内蒙古和盛京、宁古塔三个行政区的分界。（见“三将军分界示意图”）《大清一统志》载：“吉林、开原以西边外，为蒙古科尔沁等诸部驻牧地。”^② 康熙时高士奇在《扈从东巡日记》中说：“癸亥道经柳条边，插柳结绳，以界蒙古。”^③ 在这条线以西为蒙古游牧地区，受内蒙古王公管辖；以东是盛京、宁古塔将军辖区。十分清楚，柳条边只是清王朝在东北的行政区的界线。苏修指鹿为马，把行政区界说成是“国界”，这是何等的荒唐！省有省界，县有县界，甚至旗民所占土地也有边界。《清会典》载：“国初按旗分处，各有定界，”^④ 后“勘盛京未垦地亩，分给旗民，设立边界”^⑤。如果把柳条边的“边”硬说成是“国界”，就有如把沙皇的特辖区亚力山罗瓦村也说成是俄罗斯的国界一样的荒诞可笑。

在柳条边外，还分布着清朝皇室大量的禁区。例如

① 《柳条边建置调查纪实》。

② 《大清一统志》卷六〇，《奉天府二》。

③ 高士奇：《扈从东巡日记》（舆地丛钞本），第五页。

④ 《清会典》，卷一三七。

⑤ 《东华录》，卷二六。

在“老边”东段边外的盛京围场，方圆五百余里^①，在蒙古族居住地区有伯都讷围场，在黑龙江阿城还有阿勒楚喀围场，等等。地处柳条边外的三姓（黑龙江依兰）和长白山区一直被清朝尊为“祖宗发祥重地”，也是禁区。清朝祭长白山神都有定制，每年“春秋两祭，吉林将军副都统主之，盛京礼部遣官随祭。国家大典，遣大臣告祭。”^②清朝历代皇帝曾多次“东巡”东北，都亲自祭过长白山，还作有不少祭长白山的诗文，其重视可见一斑。至于那些采参、捕珠的山河等禁地，更是举不胜举了。清朝把柳条边之外这么广大的地方划为禁区，尤其是把他们一部分“祖宗发祥重地”也划在柳条边之外，柳条边是不是“国界”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历史事实已经说明，清入关以前早已统一了东北。随着清王朝对东北统治的加强，包括柳条边在内的广大东北地区都是清朝统辖的范围，其领土主权和行政区划也是十分清楚的。一六四四年清政权入关之初，定都京师顺天府（今北京），以盛京（沈阳）作为留都，整个东北地区都在留守盛京的内大臣管辖之下。从顺治开始，清朝政府先后在“东北柳条边内外设将军三：曰盛京将军、曰

① 《大清一统志》卷五七三：盛京围场“南自沙河尔郎头南三道河沿起，北至阿机各色合勒北义道河沿止，四百八十余里；东南自骆驼砬子起，至西北三因哈达交界西北封堆止，五百一十余里；西南自英额边门起，至东北色珠勒阿林止，五百二十余里。”

② 《盛京通志》，卷二七。

宁古塔将军、曰爱浑(琿)将军(黑龙江将军)。”^①三将军设置的经过是，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年)设奉天昂邦章京(康熙元年改奉天昂邦章京为镇守辽东等处将军，四年又改为镇守奉天等处将军，即盛京将军，驻沈阳，镇守辽宁)，顺治十年(一六五三年)“于宁古塔设昂邦章京、副都统镇守之”(康熙元年改宁古塔昂邦章京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驻黑龙江宁安，镇守吉林)^②，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为了增强黑龙江地区的防守力量，以抗击沙俄的侵略，又设黑龙江将军(驻瑗琿，镇守黑龙江)。并任命在抗击沙俄侵略者过程中有功的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为将军。值得注意的是，当镇守吉林的昂邦章京设置的时候，辽河流域的柳条边才陆续修筑，吉林部分的“新边”更没有修建。世界上那里有一个国家自己制定一条边界线，把自己的行政机构及其管辖的地区放在边界线之外的道理!

东北三将军所统辖的地区，其范围也是十分清楚的。宁古塔将军所统辖的范围，东至日本海，东南至希喀塔山(锡霍特山脉)海界，东北至飞牙喀海界(鄂霍次克海)，包括库页岛在内都归宁古塔将军管辖^③。黑龙江将军所统辖的地区，以齐齐哈尔计里：“东至野里白赫河二千二百余里宁古塔界，西至喀尔喀九百余里彻陈罕(车臣汗)

① 杨宾：《柳边纪略》，卷一。

② 《大清一统志》，卷五七，《盛京统部》。

③ 杨宾：《柳边纪略》，卷一。

界，南至松花江五百余里宁古塔界，北至外兴安岭三千三百余里鄂(俄)罗斯界。”^①

清朝在东北设置的三将军，不仅其管辖范围明确，而且在其下设置了各级官员进行管辖。以黑龙江城驻防区为例，内设副都统一员，协领四员，佐领十六员，索伦、达斡尔佐领八员，汉军佐领二员，防御八员，骁骑校二十六员，笔帖式四员，管理官庄七品官一员^②，分兵驻防所属各地。在黑龙江将军管辖范围内，凡“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③。列宁说：“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强力工具”。(《国家与革命》)东北三将军的设置及其分布在各地区的常备戍军，是清朝政府对广大东北地区行使国家权力的确凿证据，它有力地说明，从柳条边到黑龙江流域并非“无主”之地，而是清代中国的领土。

柳条边以外的广大地区不仅并非“荒无人烟”，相反，其社会经济和交通、文化事业自清以来也有进一步发展。康熙时宁古塔一带的农业品种繁多，“谷凡十种：曰稗子、曰小麦、曰大麦、曰粟、曰秫、曰黍、曰稷、曰高粱、曰荞麦、曰穠麦，而以稗子为最”^④。其他如“艾浑(瑗琿)麦面，甘香胜中土(中原)，所产作饼松美”^⑤，更是闻名于当时。在

① 乾隆元年《盛京通志》，卷一二。

② 《盛京通志》，卷五二。

③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五。

④ 杨宾：《柳边纪略》，卷三。

⑤ 方式济：《龙沙纪略》(舆地丛钞本)，第八页。

交通要道地区，如吉林乌拉、宁古塔、伯都讷（也叫新城）、依兰哈喇（黑龙江依兰）、卜魁（齐齐哈尔）、墨尔根、瑗琿等城，是当时著名的边外七镇，商业更趋繁荣。在吉林乌拉“中土流人千余家，西关百货凑集，旗亭戏馆，无一不有，亦边外一都会也”^①。宁古塔西门内“有东西大街，人于此开店贸易，从此人烟稠密，货物客商络绎不绝，居然有华夏风景。”^②至于卜魁也是“扼四达之要冲，为诸城之都会”^③，“入土城南门抵木城里许，商业夹衢而居，市声颇嘈嘈”^④。从清初开始，还在黑龙江流域建立了台站交通网，把边外七镇和其他地区联系起来。《柳边纪略》记载，宁古塔将军辖二十二站：由吉林乌拉西南行到叶赫七站；东北行到宁古塔八站；西南行到伯都讷七站。黑龙江将军辖十九站，由黑龙江城西南行到茂欣速素^⑤，后又开辟了由齐齐哈尔到呼伦贝尔（十站）和由乌兰诺尔到呼兰（六站）的道路^⑥。各台站均设有一定数量的官员、丁壮和牛马，台站制度相当完备。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于墨尔根开始设立学校，自后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等地“皆有官学”^⑦。这些事实，都有力地揭露了苏修篡

① 杨宾：《柳边纪略》，卷一。

② 吴振臣：《宁古塔纪略》（丛书集成本），第二页。

③ 西清：《黑龙江外记》，卷一。

④ 方式济：《龙沙纪略》，第九页。

⑤ 杨宾：《柳边纪略》，卷二。

⑥ 西清：《黑龙江外记》，卷二。

⑦ 西清：《黑龙江外记》，卷三。

改历史、伪造“从柳条边到阿穆尔河(按：黑龙江)沿岸是宽达数百公里的荒无人烟”地带的弥天大谎。

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封建统治，禁止人们到柳条边内外采参、捕珠、垦耕及旗民杂居。但是，历史的发展总是和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康熙时，“凡走山者(偷采人参的人)，山东西人居多”，“岁不下万余人”，到“甲子、乙丑(康熙二十三、二十四年)以后，乌拉、宁古塔一带，采取已尽”^①。在盛京，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年)盛京官员奏称：“奉天各州县及旗庄地方，旗民杂处，并无旗界民界之分。”^②可见到乾隆时期，柳条边实际上是形同虚设，所以连乾隆皇帝自己都说：“其设还与不设同。”^③此后，随着柳条边越来越不起多大作用，于是清朝便不断地颁发禁止关内人民到东北移民的命令。嘉庆八年(一八〇三年)令云：“山海关以外，系东三省地方，为满洲根本重地，原不准流寓民人杂处其间，私垦地亩，致碍旗人生计，例禁有年。……并着直隶、山东各督抚接到部谕，遍行出示晓谕，以见在钦奉谕旨，饬禁民人携着出口。”^④从这道命令中可以看到，清朝这时在东北的禁区已不限原定地区，而是整个“东三省地方”都是“根本重地”了。这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所伪造的柳条边是清朝

① 杨宾：《柳边纪略》，卷三。

② 《清高宗实录》，卷九九。

③ 《盛京通志》，卷一三，《柳条边》诗。

④ 《东华录·嘉庆》一五。

“北部疆界”的谎言无疑也是个有力驳斥。

通过上述柳条边的历史简介，我们就不难看出，苏修对中国清代柳条边的历史真是极尽歪曲、捏造之能事。他们别有用心地编造谎言、散布谬论，其目的就在于妄图证明柳条边以外的土地不是中国的领土。苏修叛徒集团的可耻行径不仅表明新沙皇为老沙皇割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罪行辩护，而且也暴露出他们对中国具有狂妄的领土野心。然而，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老沙皇早已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而妄图称霸世界的新沙皇也必将遭到更加可耻的失败！

谎言改变不了历史

——驳苏修篡改我国准噶尔部历史的无耻谰言

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

苏修叛徒集团猖狂反华反共，继承老沙皇的衣钵，推行大国霸权主义的扩张侵略政策，公然篡改和伪造我国准噶尔部的历史，无耻地为老沙皇的侵略罪行辩护，竭力为进一步侵略我国新疆地区制造反革命舆论。苏修外交部负责官员齐赫文斯基和御用文人兹拉特金之流，近年来秉承苏修叛徒集团的旨意，连篇累牍地发表有关我国准噶尔部历史的文章和出版书籍，妄图改变历史的本来面貌，造谣惑众。但是，谎言改变不了历史，让我们看一看这一段历史的本来面目吧！

一、准噶尔部从元代起就是中国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成员

苏修叛徒集团及其御用文人别有用心地制造所谓“中国民族”和“非中国民族”的谬论，公然宣称：只有汉族才是中国人，满族、蒙古族和中国其他少数民族都不算中

国人^①。他们把我国厄鲁特蒙古人的准噶尔部描绘成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主权国家，甚至说准噶尔部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②。这是对我国民族关系的恶意挑拨，也是对我国历史的无耻歪曲。

“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国除汉族以外，还有数十种少数民族，各兄弟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伟大祖国的疆土，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开发的。由于长期以来的共同斗争、共同劳动，我国各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他们都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厄鲁特蒙古人是我国蒙古族的一支，准噶尔部则是厄鲁特蒙古人的游牧部落。厄鲁特蒙古人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和祖国各兄弟民族有着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

厄鲁特在元代称“斡亦剌”、“外剌”，明代称“瓦剌”，清代称厄鲁特或“卫拉特”。十二世纪时，斡亦剌是一个半游牧半狩猎、分成许多支系的大部落。他们生活在蒙古草原北部的森林中，草原上的牧民称他们为“槐因亦儿坚”，意即“林木中百姓”^③。

十二世纪末，斡亦剌人以忽都合别乞为首的一部经

① 苏联政府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声明；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一九七二年莫斯科版。

② 伊·雅·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一九六四年莫斯科版。

③ 《元朝秘史》，二二九节；《拉施特哀丁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一二一页。

常活动在现在的锡什锡德河流域以南^①。公元一二〇六年，成吉思汗被蒙古各部拥立为大汗。次年，他即派其长子拙赤去统一北方的“林木中百姓”。忽都合别乞率斡亦剌部首先迎降，并自愿担任向导，帮助拙赤军统一了万斡亦剌、秃马惕、不里牙惕（今布里亚特蒙古）、巴儿浑（今巴尔虎）、秃巴思（今图瓦）等十余个部落。成吉思汗将斡亦剌部封为四个千户^②，仍由忽都合别乞统辖。成吉思汗把自己的女儿阔阔干嫁给忽都合别乞的儿子脱栾勒，忽都合别乞的女儿斡兀立海迷失，是蒙古第三个大汗贵由的皇后^③。据记载，元朝历代皇室经常与斡亦剌部互通婚姻^④。因此，斡亦剌部统治者同弘吉剌、汪古、亦启烈等部贵族一样，是元朝一支“世联威畹”、“亲视诸王”的重要勋阀。作为蒙古族一支的斡亦剌部从元代起，就已成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成员。

斡亦剌部的统治者是元朝中央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一二三六年（元太宗八年），窝阔台汗以“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贵戚、斡鲁朵”^⑤，嫁给斡亦剌部的火雷公主

① 据《元朝秘史》一四四、二三九节，斡亦剌人曾深入林区“失思吉思”和“失黑失惕”（黑为思之误）地面活动，这二地都是指现在的锡什锡德河，为谦河的源流之一。在此以南的德勒格尔汗山阳德勒格尔河北岸所发现的蒙哥汗时代的《释迦院碑记》记载，外剌部的夏营地确实在此。

② 《拉施特哀丁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二六九页。

③ 《拉施特哀丁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一一九页；第二分册，第二六九页。《元史》，卷一〇六，《后妃表》。

④ 《元史》，卷一〇九，《公主表》。

⑤ 《元史》，卷二，《太宗纪》。

分得了延安府民户近万户^①。由于延安是斡亦剌部贵族在中原的领地，所以在十四世纪元朝普遍封赐诸王驸马王号时，斡亦剌部的统治者也不干被封为延安王，他所娶的公主被封为延安公主^②。

元朝时，由于斡亦剌部的勋戚地位，它的领地有了很大的扩充。据《拉施特哀丁史集》记载，十三、十四世纪时，他们已从锡什锡德河向北、向西发展，据有库苏古尔湖以西及唐努乌梁海西部。他们取得了秃马惕人原住的谦河上游地区，成为元朝北疆一大领主，担负起“藩翰屏垣之寄”的重任。

元朝政府除了让斡亦剌部领主管辖自己的属民和领地外，还在谦河流域（现在的叶尼塞河中上游）的谦州设置行政机构实行直接统治。成吉思汗统一斡亦剌部后，就以谦州为中心驻兵屯守^③。成百成千的汉人被迁移到这里，设置了“工匠数局”^④，既生产“良铁”，也织“绫罗锦绮”^⑤。元世祖忽必烈时，在谦州设置万户府，派蒙古万户率军民屯守^⑥。后又设置益兰州，作为吉利吉思、乌斯、撼合纳、谦州、益兰州五部的治所。元朝在这里修建

① 《元史》，卷九五，《食货志·岁赐》，大雷公主位（“大”是“火”之误）。

② 《元史》，卷一〇九，《公主表》。

③ 《元史》，卷一五一，《贾塔刺浑传》。

④ 《元史》，卷六三，《地理志》；《元史》，卷一六七，《刘好礼传》。

⑤ 《长春真人西游记》（王静安遗书本）作“俭俭州”。

⑥ 《元史》，卷一九三，《伯八传》，《元史》，卷一六七，《刘好礼传》均作“欠欠州”。

官廨、仓库，设立驿站，派断事官常驻在这里，行使行政管辖和征收赋税的职权^①。在斡亦剌部和吉利吉思部之间，还开通了一条有六个驿站的驿道^②。这样，当时的谦河流域便成为元朝直辖的行政区域之一，是岭北行省的一部分。

元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摧毁了元朝的统治。一三六八年（洪武元年）一月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元顺帝妥欢帖睦尔逃离北京，但继续割据北方的蒙古草原。从此，蒙古贵族在全国的统治宣告结束。这时，斡亦剌部的人数已扩大到四万户^③，领地也大有扩充，除了占有原来元朝谦河流域的谦州等地外，还西越阿尔泰山，一直扩展到额尔齐斯河流域。斡亦剌部在其首领猛哥帖木儿统领下，割据西北地区。在明代史籍中，通常把这一部分蒙古人称为瓦剌，而把我国东部的蒙古人称作鞑靼。猛哥帖木儿死后，他的领地分属于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三个封建主^④。

一四〇三年（永乐元年）明成祖朱棣继位时，曾派人通告瓦剌各部，并赏赐许多贵重物品^⑤。后又连续派镇抚管哈帖木儿、指挥完者等官吏带着敕书，诏谕“瓦剌等处

① 《元史》，卷六三，《地理志》。

② 《元史》，卷一六，《世祖纪》，至元二十八年九月壬子，“立乞里（台）〔吉〕思至外刺等六驿。”

③ 罗卜藏丹津：《蒙古黄金史》下卷。

④ 《明史》，卷三二八，《瓦剌》。

⑤ 《明史》，卷三二八，《瓦剌》。

诸部酋长”。诏书说：“夫天下一统……尔其遣人往来相好，朕即授以官赏，令还本地射猎畜牧……并赐马哈木等文绮表里。”^①一四〇八年（永乐六年）瓦剌王马哈木等派人来朝贡马，并“请印信、封爵”^②。一四〇九年（永乐七年），明朝政府封马哈木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顺宁王；封太平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贤义王；封把秃孛罗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安乐王，并“赐印诰”^③。马哈木死后，其子脱欢请求承袭爵位。一四一八年（永乐十六年）明朝政府封脱欢为顺宁王。

一四二六年（宣德元年）太平死后，明朝命其子捏烈忽继袭贤义王爵位，并敕曰“遣使往来，有如一家”^④。从永乐时期开始，中经宣德、正统、景泰、天顺，一直到弘治一百多年时间里，明朝政府大批地任命瓦剌首领的属下人员，任命的官衔从都指挥使、都指挥僉事、指挥，一直到千户、镇抚等^⑤。明朝政府不断派遣官吏往谕瓦剌。一四三六年（正统元年）明朝政府给瓦剌顺宁王脱欢的敕书中称“惟王克绍先志，屡修职责”^⑥，以后更明确地称瓦剌王也

① 《明太宗实录》，卷一一，建文四年八月丁丑条；

《明太宗实录》，卷一八，永乐元年夏四月壬子条；

《明太宗实录》，卷二八，永乐二年夏四月辛未条。

② 《明太宗实录》，卷五九，永乐六年冬十月丙子条。

③ 《明史》，卷三二八，《瓦剌》；《明太宗实录》，卷六三，永乐七年五月乙未条。

④ 《明宣宗实录》，卷一三，宣德元年正月丙午条。

⑤ 详见《明实录》。

⑥ 《明英宗实录》，卷二一，正统元年八月戊寅条。

先为“朝廷臣属”^①。一四四六年(正统十一年)也先由于丢失了明朝赐给他祖父马哈木的驼钮金印,请求明朝政府补发,明朝政府“仍给之”^②。也先一度发动叛乱,劫持了明英宗,但是即使在英宗被劫持期间,也先仍明确表示他“完全是代表中国方面行事”^③。

在明代的一个时期内,瓦剌部和哈密卫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一四〇四年(永乐二年)明成祖封哈密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并赐金印。一四〇六年(永乐四年)设立哈密卫^④。哈密卫的建立,对明朝政府统辖我国西域地区各少数民族有重要意义。《明史》上说:“以哈密为西域要道,欲其迎护朝使,统领诸番,为西陲屏蔽”^⑤。天顺、成化时期(一四五七——一四八七年),瓦剌部首领常常同哈密卫的头领一同向明朝纳贡。一四六一年(天顺五年)哈密王母弩温答失里向明朝上书,请求给前瓦剌首领也先弟伯都王一职。明朝政府即“命瓦剌也先弟伯都王为都督佥事,侄兀忽纳为指挥佥事”^⑥。瓦剌平章拜亦撒哈,也“常偕哈密来朝”^⑦。

① 《明英宗实录》，卷一〇九，正统八年冬十月庚子条。

② 《明英宗实录》，卷一四七，正统十一年十一月甲申条。

③ 巴德雷：《俄国、蒙古、中国》，卷一，一九一九年伦敦版，第四四页。

④ 《明史》，卷三二九，《西域一·哈密卫》。

⑤ 《明史》，卷三二九，《西域一·哈密卫》。

⑥ 《明英宗实录》，卷三二七，天顺五年夏四月甲申条。

⑦ 《明史》，卷三二八，《瓦剌》；《明宪宗实录》，卷九〇，成化七年夏四月辛未条。

明代，瓦剌和中原地区的经济关系十分密切。据《明实录》记载，瓦剌每次入贡人数多至几百人、几千人，贡马和皮张数以千计。贡使“络绎于道，驼马迭贡于廷”^①。明朝政府曾专为瓦剌开设“马市”和“民市”。永乐时期（一四〇三——一四二四年），甘州、凉州等地是瓦剌和内地进行贸易的重要市场。一四三八年（正统三年）又在大同开设“马市”，专备与瓦剌等部贸易。蒙古的“驼马，军民得以平价交易”^②。

一六一六年（万历四十四年），沙俄曾派遣“使节”托米尔科·彼得罗夫等来到准噶尔地区刺探情报，他们回国后向沙皇作了汇报。报告中说：他见到了被瓦剌人称为“大明可汗”的中国皇帝派来的官员向瓦剌人征收赋税，“各台吉都要交纳马匹和骆驼，每个台吉交骆驼二百峰，马一千匹”^③。瓦剌是中国明王朝管辖的地域，在沙俄历史档案里也是有据可查的。

上述大量历史事实证明，从元代的斡亦剌到明代的瓦剌，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他们统一于中央王朝管辖也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也好，始终是作为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而存在。

① 胡澐：《论虏情疏》（《明经世文编》，第一九卷）。

② 《明英宗实录》，卷四一，正统三年夏四月癸未条。

③ 巴德雷：《俄国、蒙古、中国》，卷二，第三七——三九页。

二、准噶尔部从来没有形成过 独立的国家，准噶尔部从来 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

苏修御用文人用伪造历史的卑劣手法，炮制了一个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所谓“准噶尔汗国”^①，胡说什么十七世纪初期的“准噶尔汗国”是“坚持拒绝与中国执政的清朝发生任何接触的唯一蒙古领地”^②。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我们必须揭示历史真相，揭穿苏修的谎言和诡辩。

明朝后期，瓦剌分为四大部：和硕特部、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号四卫拉特，统称额鲁特”^③。明清以来，他们游牧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并“以伊犁为会宗地”^④。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上半期，我国北方草原上的兄弟民族乌孙在这里建立过奴隶主贵族王朝。公元前六〇年，中国汉王朝就在这里设有行政机构。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

②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

③ 《西域图志》，卷首一；《蒙古游牧记》，卷一一，《额鲁特蒙古总叙》；《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

④ 《蒙古游牧记》，卷一四；《朔方备乘》，卷四。关于厄鲁特蒙古四部的牧地，据《蒙古游牧记》，卷一一，《额鲁特蒙古总叙》：“绰罗斯（按：即准噶尔）治伊犁、和硕特治乌鲁木齐、杜尔伯特治额尔齐斯、土尔扈特治雅尔。土尔扈特北去，辉特治之。”又见《圣武记》，卷三；椿园：《西域闻见录》，卷一。

唐代中央政府对这个地区的统治进一步加强。西辽、元、明都对这里进行过有效的行政管辖。历史事实昭彰，准噶尔部居住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自古以来和中原地区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

准噶尔部从来没有形成过独立的国家。准噶尔部是中国中央王朝的属部。即使在十七世纪初期也是这样。

在清朝入关以前，厄鲁特四部中的和硕特部顾实汗势力最强，“为四卫拉特之首”^①。一六三七年（崇德二年）顾实汗向清皇太极“遣使通贡”。一六四二年（崇德七年），顾实汗和西藏地区的藏巴汗以及喇嘛教首领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等向清皇太极“奉表贡”^②。

清朝入关以后，厄鲁特蒙古各部和清朝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苏修御用文人说什么准噶尔部“坚持拒绝与中国执政的清朝发生任何接触”，完全是虚构。

清初，在一个时期内，清朝政府是通过和硕特部首领导辖厄鲁特各部的。一六四六年（顺治三年）清世祖顺治皇帝给顾实汗“赐甲冑弓矢，俾辖诸厄鲁特”^③，自此，“间岁辄遣使至”^④。一六五三年（顺治十年）四月，清朝封顾实汗为“遵文行义敏慧顾实汗”，并给他颁赐用满、汉、蒙

① 《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

② 《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

③ 《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

④ 《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

古三种文字制成的“金册印”^①。厄鲁特其它各部都不断向清朝遣使入贡。当时准噶尔部向清朝入贡随着顾实汗“附名以达”的首领有，巴图尔浑台吉及其堂兄弟杜喇勒和硕齐，巴图尔浑台吉的两个弟弟墨尔根岱青、楚琥尔乌巴什，巴图尔浑台吉的侄子罗卜藏呼图克图等^②。苏修御用文人说巴图尔浑台吉与清朝政府没有“发生过一次交往”^③，这纯属造谣。准噶尔部首领向清朝称臣纳贡，对中国中央王朝保持着臣属的关系这一无可辩驳的史实，就揭穿了苏修的所谓十七世纪初形成了“准噶尔汗国”的无耻谰言。

在一六四六年（顺治三年），随着顾实汗向清朝政府进表贡“附名以达”的，还有当时游牧于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的儿子书库尔岱青、罗卜藏诺颜等人。土尔扈特部原游牧于雅尔一带（塔城西北），是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左右因同准噶尔部发生军事冲突，西迁到伏尔加河下游的。一六五五——一六五七年（顺治十二——十四年）书库尔岱青、伊勒登诺颜（和鄂尔勒克次子）、罗卜藏诺颜及其子多尔济等都先后派人到清政府“奉表贡书”^④。康熙年间，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奇曾派人来到北京“表贡方物”^⑤。一七一二年（康熙五十一年）

① 《皇朝藩部要略》，卷九；《蒙古游牧记》，卷一二；《圣武记》，卷三。

② 《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

③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

④ 《清史稿》藩部《土尔扈特》。

⑤ 《皇朝藩部要略》，卷一〇，《厄鲁特要略二》。

清朝政府派内阁侍读图理琛等到土尔扈特部探慰，“历三载乃还”^①。阿玉奇向图理琛表达了土尔扈特蒙古部对祖国的怀念心情，他说土尔扈特蒙古人冠服与祖国相同，与俄罗斯“乃嗜欲不通，言语不同”。他们将图理琛“留旬余，筵宴不绝”，并“赠马及方物”^②。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土尔扈特部因不堪沙俄的压迫，在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毅然克服种种艰难险阻，跋涉万余里回到祖国。土尔扈特部这段热爱祖国的动人的历史事迹，有力地证明厄鲁特蒙古人和祖国的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

准噶尔部的巴图尔浑台吉死后，他的儿子僧格（即僧厄）继任为准噶尔部首领。从一六六六年（康熙五年）起，僧格曾多次向清朝政府入贡^③。一六七一年（康熙十年），噶尔丹篡夺了准噶尔部的汗位。噶尔丹自称汗号，实行割据，他不仅兼并了厄鲁特四部，而且占据了西北地区的广大草原地带。此后的一个时期内，以噶尔丹、策妄阿喇布坦和阿睦尔撒纳为首的准噶尔部反动领主，在沙皇俄国唆使和支持下，先后几次发动分裂祖国的割据叛乱，曾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严厉镇压。

从噶尔丹这个进行分裂祖国罪恶活动的准噶尔部首领对待清朝中央政府的态度中，也可明确地看出准噶尔部是臣属于清朝的。一六七二年（康熙十一年），噶尔丹

① 《清史稿》藩部《土尔扈特》。

② 《皇朝藩部要略》，卷一〇，《厄鲁特要略二》。

③ 《清圣祖实录》，卷一九、卷二四、卷三一等。

向清朝政府上疏，请求继其兄僧格之后仍“照常遣使进贡”^①。经清朝批准后，噶尔丹不断遣使入贡。一六七九年（康熙十八年）我国西藏达赖喇嘛授噶尔丹以博硕克图汗号，噶尔丹还特别“遣使奉贡入告”清朝政府^②。当时，清朝政府对噶尔丹“擅称汗号”及其叛乱阴谋曾累加指责，并严于防范。噶尔丹曾一再向清朝政府表白：“我并无自外于中华皇帝”^③。又说：“我与中华，一道同轨”，“向在中华皇帝道法之中，不敢妄行”^④。噶尔丹的自白，充分证明准噶尔部对清朝的隶属关系。

清朝政府经常派遣官吏到准噶尔部“宣谕”，行使统治权。一六八二年（康熙二十一年）七月，清朝政府在平定“三藩”之乱、统一了中原地区之后，曾派内大臣奇塔特等去厄鲁特赏赉噶尔丹。康熙帝给噶尔丹的敕令说：“尔噶尔丹博硕克图汗，自尔父（按：指巴图尔浑台吉）兄（按：指僧格）历世相承，虔修礼好，敬贡有年。延及尔身，笃尽悃忧，往来不绝，殊为可嘉。朕久欲加恩赉，以示优恤至意，祇以机务殷繁，是以未逮。兹海宇升平，惠泽宜溥，特遣大臣侍卫官员等，齎捧重赏，大沛恩施。尔承此宠锡，当益戴德意，殚心敬顺。”^⑤ 这道敕书，有力地说明了准噶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三八，康熙十一年春正月庚午。

② 温达：《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一。

③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七，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甲申。

④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七。

⑤ 《清圣祖实录》，卷一〇三，康熙二十一年七月。

尔部对清朝的臣属关系。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奇塔特等到达准噶尔部时,噶尔丹以臣下对皇上的礼仪“跪受敕书及赏赉诸物”^①。清朝裕亲王福全在给康熙的奏折里称噶尔丹为“小部头目”^②。雍正皇帝在给策妄阿喇布坦的敕谕里说:“尔台吉不过准噶尔一部落之主。”^③乾隆皇帝对准噶尔部说:“不但轸恤内地蒙古,即尔准部亦在我抚绥之内。”^④这清楚地说明准噶尔部和其他蒙古诸部一样,对清朝中央政府都是保持臣属关系的。

一六九〇年(康熙二十九年),达赖喇嘛曾率领西藏和包括噶尔丹在内的厄鲁特各部蒙古台吉具疏请给康熙皇帝上尊号。上疏中称:“谨上尊号曰大慈普度息争锡福至圣上乘文殊皇帝,虔修职贺。”^⑤这一举动,更说明厄鲁特各部对清朝中央政府的拥戴。

清朝政府曾对厄鲁特蒙古和喀尔喀蒙古规定了一些统一的贡纳管理制度。一六五一年(顺治八年),清政府规定厄鲁特蒙古和喀尔喀蒙古贡使赏例,其中对厄鲁特贡使的赏例是:“一等者,上号蟒缎一,帽缎、彭缎各一,毛青布二十四,银茶桶一,重三十两。”^⑥另外,对随从、小台吉和塔布囊等各官来使,都规定了具体赏例。一六八五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一,康熙二十二年七月戊戌。

②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八。

③ 《清世宗实录》,卷一七,雍正二年三月。

④ 《清高祖实录》,卷一二,乾隆元年二月己卯。

⑤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八。

⑥ 《清世祖实录》,卷五四,顺治八年闰二月丁丑。

年(康熙二十四年)又规定了四卫拉特贡使例^①。康熙认为厄鲁特蒙古和喀尔喀蒙古“两部向相和好,贡献本朝,往来不绝”^②，“世世通贡,朕一体优礼,从无偏私”^③。

正因为准噶尔部人民同内地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着血肉的联系,因此,任何分裂和叛乱的行动必然要受到广大人民的反对。噶尔丹发动分裂祖国的叛乱以后,准噶尔部人民纷纷走向内地,许多上层贵族也率领整个部落内附。“诸部瓦解,名王部落,接踵内属”^④,便是这种局面的写照。这充分说明准噶尔部的广大人民是热爱祖国的,许多准噶尔部上层贵族也是愿意接受清朝中央政府管辖的。对于内附的厄鲁特蒙古人清朝政府表示欢迎,并进行安置。如一六九六年(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一次就在张家口安置了厄鲁特部“大小人口共一千五百人”^⑤。特别是从乾隆元年以来,大批的厄鲁特蒙古人陆续内附。一七五三年(乾隆十八年)杜尔伯特部的三个大台吉,即号称“三车棱”的车棱、车棱蒙克、车棱乌巴什,率部归附清朝。他们共携带五千多户,人口以万计^⑥。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宴“三车棱”。清朝政府对

① 《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

②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一。

③ 《朔方备乘》,卷三,《喀尔喀内属述略》。

④ 《西域图志》,卷首二。

⑤ 《清圣祖实录》,卷一七六,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乙卯。

⑥ 《皇朝藩部要略》,卷一二,《厄鲁特要略四》;《清高宗实录》,卷四五一,乾隆十八年十一月甲戌。

“三车棱”分别授以和硕亲王、多罗贝勒、多罗郡王等官爵，并于第二年将“三车棱”的部落人口仿照内蒙古和喀尔喀蒙古的条例，编旗设盟^①。

在清代，准噶尔部和中原地区的经济关系，比明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六八六年（康熙二十五年），清朝政府规定：厄鲁特部落的四大台吉如噶尔丹等可到北京互市，其余小台吉则在张家口进行贸易，并“著为定例”^②。准噶尔部的首领经常向清朝政府“进贡请安，并乞照常贸易”。准噶尔部和中原地区的经济往来，不仅表现在由清朝政府控制的贸易额有了增长，而且准噶尔部人民和中原地区各族人民的经济交往也愈加频繁。清朝政府曾在肃州、哈密等地建立由官署监督的“民市”。例如，一七四三年（乾隆八年）四月，准部首领噶尔丹策零的属下人员巴布曾在肃州以“羊二千余只，与兵民交易”^③。一七四四年（乾隆九年）准部商人到肃州，一次所带的牲畜“计值银四万两有奇”^④。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一月，准部商人到肃州互市的皮张，价银达“十八万六千二百余两”^⑤。一七五二年（乾隆十七年）七月，准部到肃州交易的牲畜

① 《西域图志》，卷三七，封爵一；《皇朝藩部要略》，卷一二，《厄鲁特要略四》。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七，康熙二十五年九月癸卯。

③ 《清高宗实录》，卷一九〇，乾隆八年闰四月壬戌。

④ 《清高祖实录》，卷二一三，乾隆九年三月甲辰。

⑤ 《清高祖实录》，卷三八一，乾隆十六年一月。

仅羊就多达六万只^①。从这里可以看出准噶尔部人民和中原各族人民在经济上无法分割的联系。

历史雄辩地证明：准噶尔部与我国中央王朝的关系，是一个国家内部地方和中央的隶属关系。苏修所宣扬的什么准噶尔部没有与清朝政府发生过交往，准噶尔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主权国家”，准噶尔与中原的经济联系“中断了大约二百年”等等论调，完全是别有用心谎言，是对历史的肆意歪曲。

三、苏修篡改老沙皇侵略我准噶尔部的罪恶历史，是为它新的侵略阴谋制造舆论

苏修叛徒集团及其御用文人还大放厥词，胡说什么清代中国“侵略”了“准噶尔汗国”^②；并无耻地宣称沙皇俄国是准噶尔部的“保护者”。究竟谁是侵略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不辩论清楚。

列宁指出：“许多世纪以来，沙皇政府一直想夺取君

^① 《乾隆十七年七月初五日陕甘总督黄廷桂折》，《史料旬刊》，第二七期，准噶尔夷人贸易案。

^② 例如：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勃·普·古列维奇：《十八世纪下半叶清帝国入侵中亚和俄国的政策》（载《苏联历史》杂志，一九七三年第二期）；格·符·麦列霍夫：《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清朝中国对阿穆尔河流域和中亚细亚的扩张》（载《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七期），等等。

士坦丁堡和亚洲大部分地区”。（《论单独讲和》）沙皇俄国很早就把亚洲大陆作为它侵略扩张的重要目标。俄国历史上第一个沙皇伊凡四世，于十六世纪下半叶，连续征服了喀山汗国及阿斯特拉罕汗国，把伏尔加河流域置于他的统治之下。接着，沙皇俄国又使用政治收买和武装蚕食等手段，向西伯利亚各地大肆扩张。十七世纪初，它以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等处为侵略据点，逐渐将侵略魔爪伸向中国西部的准噶尔部地区。历史事实昭然若揭，侵略我国准噶尔部的不是别人，正是追求世界霸权，从欧洲把魔掌伸到亚洲来，到处搞侵略扩张的沙皇俄国。

代表极端贪婪残暴的俄国农奴主阶级利益的沙俄政府，对我国厄鲁特蒙古各部及其辖地的侵略，是极其疯狂和卑劣的。沙俄政府对我国准噶尔部的侵略政策是软硬兼施的反革命两手政策。一六一三年、一六一六年的沙俄档案表明，沙皇当时对侵吞我国准噶尔部的“旨令”是：或者“推行怀柔政策”，“竭力争取这个民族的归顺”；“或者将他们征服”，强迫他们“接受俄国宗主权或统治权”。十七世纪初年，正当我国明代末期，沙皇俄国乘着明朝中央政权势力衰弱时机，猖狂地向我厄鲁特蒙古人的游牧部落实行侵犯。厄鲁特部人民曾英勇地抗击过沙俄的侵略。一六〇七年，他们曾和鞑靼蒙古人组成五千人的队伍，狠狠打击了沙俄哥萨克兵二百人的进攻，歼灭了这批侵略者。在这同一时期，准噶尔部人民为反对沙俄侵略者霸占盐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准噶尔部人民“声称这

些盐湖是他们(指准噶尔)的,并把湖占领了”^①。就在这一年,在沙俄对我准噶尔部进行武装侵犯时,塔拉城总督加加林又秉承沙皇的意旨派出一个“代表团”,窜到游牧在额尔齐斯河流域一带我国厄鲁特蒙古人的杜尔伯特、土尔扈特部。这个沙俄“代表团”妄图诱迫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的领主“转入俄国国籍”。一六〇九年三月,沙皇俄国又从塔拉城派出了一个以戈卢平为首的“代表团”,再次闯进我国厄鲁特蒙古人的牧地,来催促和逼迫厄鲁特部的领主“发誓忠于沙皇……定期交纳实物税”等等。厄鲁特部领主阿拜、戈舍夫奇曾主持召开过一部分领主代表会议,与会代表坚决反对和断然“拒绝了”沙俄的无理要求^②。戈卢平一伙灰溜溜地蹿回了俄国。

接着,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又于一六一六年颁布“谕旨”,“训令”托博尔斯克的伊·谢·库拉金公爵派人与“喀尔木克(按:指厄鲁特蒙古人)各台吉联系”,强迫他们接受沙俄的统治。这个库拉金于一六一六年和一六一七年两次派“使节”来到我国的厄鲁特部进行阴谋活动。一六一六年派遣托米尔科·彼得罗夫和伊凡·库尼增来到厄鲁特部,这两个侵略分子窜到准噶尔部的巴图尔浑台吉、杜尔伯特部的达赖台吉以及厄鲁特其他重要台吉的牧地,到处游说,力图诱迫厄鲁特各部成为沙皇

① 巴德雷:《俄国、蒙古、中国》,卷二,第三五页。

②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二章,第二节,转引《俄蒙关系史料(一六〇七——一六三六年)》。

“陛下的臣属”^①。一六一七年又派遣伊凡·萨维利耶夫等人来到厄鲁特部，他们按照沙皇“指出的条件”与厄鲁特部领主“谈判”，企图诱使“大台吉巴图尔和全体喀尔木克人”成为沙皇的“臣民”^②。沙俄侵略者的无理要求，两次都遭到厄鲁特部的巴图尔浑台吉等人的拒绝。沙俄侵吞我国厄鲁特部的阴谋遭到了挫败。

沙俄妄图吞并我国厄鲁特部的野心虽屡遭失败，但贼心不死。一六六六年，沙俄政府派了一个巴维尔·库尔文斯基“使团”，来到准噶尔部僧格台吉及其叔父书库尔台吉处。他们向僧格和书库尔“送交沙皇礼物，并敦促其归顺俄国”^③。书库尔一听说这个“使团”要他臣属沙俄，就十分气愤，拒不接见，仅派他的部下通知“使团”人员“立即离开”。但是，这批侵略分子赖着不走，直拖到一六六七年四月，书库尔才接见他们。沙俄“使团”无理地要他按照俄国的仪式接受沙皇的国书和礼物，书库尔怒斥了这种污辱性的挑衅行为，义正辞严地说：“难道我是沙皇的属臣！……我作为台吉，无法蒙受这种屈辱！你们全给我滚出兀鲁思，回托木斯克去！沙皇的国书和礼品也统统拿回去！”^④僧格也是以同样态度对待沙俄“使

① 巴德雷：《俄国、蒙古、中国》，卷二，第三七页。

② 俄国档案馆：《喀尔木克事务档案》，第二卷，一六一八年一月十二日，转引自巴德雷：《俄国、蒙古、中国》，卷二，第四一——四三页。

③ 俄国档案馆：《蒙古事务档案》，第三卷，一六六七年库尔文斯基出使报告，转引自巴德雷：《俄国、蒙古、中国》，卷二，第一八〇页。

④ 巴德雷：《俄国、蒙古、中国》，卷二，第一八二页。

团”的。书库尔等不仅没有接受要他们向沙皇俄国称臣的要求，反而当面向沙俄“使团”严词提出，要沙俄交出原准噶尔辖地上逃入沙俄的属民^①。一六六七年，当僧格派人向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托木斯克等地区的准噶尔属民征收实物税时，竟遭到了沙俄殖民军的袭击。僧格在准噶尔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奋起自卫”，痛击当地沙俄殖民军^②。沙俄强盗的侵略活动又碰了壁。

从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起，沙俄政府密锣紧鼓地交替使用煽动叛乱与武力强占的两手策略，加紧对我准噶尔地区的侵略。他们一面支持准噶尔部反动领主进行分裂叛乱活动，策动他们“臣属”沙皇俄国；另一面则派遣大批侵略军直接用武力实行强占，真是猖狂已极！

十七世纪末，沙皇俄国曾支持噶尔丹的分裂叛乱活动，妄图肢解我国的大好河山，用从内部颠覆的毒辣手段来霸占我准噶尔地区。康熙皇帝坚决维护清朝版图的统一，迅速平定了噶尔丹的叛乱，沉重地打击了沙俄的侵略阴谋。

十八世纪初，沙皇彼得一世于一七一四年派出以中校布赫戈利茨为头目的侵略军，阴谋侵占从额尔齐斯河上游直到叶尔羌河的我国广大地区。一七一五年，布赫戈利茨率领约三千人的侵略军，侵入我准噶尔部辖地的亚梅什湖一带，强行建立了亚梅舍夫军事侵略据点。准

① 巴德雷：《德国、蒙古、中国》，卷二，第一八三——一八七页。

②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三章，第二节，转引俄国档案。

噶尔部军民对沙俄侵略者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策凌敦多布在准噶尔部人民的支持下，于一七一六年二月至四月，带领一支近万人的军队，包围了俄国侵略军据点，给敌人以有力打击。由托博尔斯克派来的沙俄“增援部队”，也全部当了俘虏^①。一七二〇年，彼得一世又命令利哈列夫带着一支四百多人的侵略军由托博尔斯克出动，再次侵入我准噶尔部的斋桑泊以东地区。来犯的敌人立即遭到准噶尔部军民顽强的“武装抵抗”，利哈列夫入侵军无法立足，被迫向托博尔斯克逃窜^②。沙俄侵略军向准噶尔地区的多次进攻，都遭到我准噶尔部军民的迎头痛击。准噶尔部人民发扬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保卫了祖国的西北边疆。

在赤裸裸的军事侵占屡遭挫败之后，野心勃勃的彼得一世更露骨地支持和策动准噶尔部反动贵族领主的分裂叛乱活动，企图以此达到侵吞我准噶尔地区的罪恶目的。一七二二年，彼得派翁科夫斯基“使团”来到准噶尔部，他们的使命是要策动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喇布坦“正式臣服”俄国，并且“让与领土”^③。这个俄国“使团”向策妄阿喇布坦表示，如果他臣服俄国，沙皇就会“象保护自

①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五章，第一节；〔法〕葛斯顿·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八章。

②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五章，第一节；伊·弗·巴布科夫：《一八五九——一八七五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三篇，第一章。

③ 〔法〕葛斯顿·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一年版，第八〇——八一页。

己的臣民一样来保护他”，就可“免遭他人侵犯”^①。除了政治诱骗外，他们还使用物质收买的手法，以“赠给策妄阿喇布坦本人的礼物及给他部众的赏赐”来“促其臣服”^②。策妄阿喇布坦的武装叛乱，以及十八世纪中叶阿睦尔撒纳的武装叛乱，都曾得到沙俄侵略者的支持^③。清朝政府先后平定了准噶尔部里通沙俄的反动贵族领主策妄阿喇布坦和阿睦尔撒纳的分裂叛乱，使沙俄侵吞我国准噶尔部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从而巩固了祖国的统一。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部的分裂叛乱，这是中国的内部问题，和一个国家征服另一个国家完全是两回事。

上面我们只简略地回溯了十七世纪初到十八世纪中叶，沙皇俄国侵略我国准噶尔地区的历史。仅此一百几十年间，沙俄在准噶尔地区的侵略活动，就已是罪恶累累，罄竹难书，更不要说十九世纪以后沙俄鲸吞我国西北部五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强盗行径了。

面对铁的历史事实，就连专门炮制《准噶尔汗国史》的兹拉特金也不得不承认：当时沙皇俄国对准噶尔地区的所作所为，是力图“把卫拉特王公和执政者变为俄国的臣民，把从属于这些王公和执政者的居民变成替俄国提供实物税的属民，并把他们居住的地方变成俄国的领

①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五章，第一节，转引俄国准噶尔档案。

② 〔法〕葛斯顿·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八〇——八一页。

③ 参见兹拉特金：《蒙古近现代史纲》，一九五七年莫斯科版，第三、四章。

土”^①。问题在于：苏修叛徒集团及其御用文人，包括这个兹拉特金在内，为什么故意篡改老沙皇侵略我准噶尔部的罪恶历史？为什么那末卖力地为老沙皇的卑鄙行为辩护呢？他们这样做，无非是为今天新沙皇的卑劣行为辩护，为苏修新的侵略阴谋制造舆论。苏修史学界围绕着我国准噶尔部的历史，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籍，决不是搞什么“学术研究”，而是为新沙皇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效劳，为侵略我国新疆地区制造历史依据。

苏修史学界关于“准噶尔问题”的研究，极尽其歪曲、伪造和篡改历史之能事。例如兹拉特金的《准噶尔汗国史》，就是一部全面地系统地伪造、歪曲和篡改我国准噶尔部真实历史的代表作。就连苏修史学界自己的评论也不得不承认：“这本书是在摇晃不定的基础上修建起来的楼房”，“往往作出草率的、没有根据的结论”^②。至于苏修其他有关准噶尔部历史的论著，就更是等而下之了。恩格斯曾经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爱尔兰史》的片断）今天，苏修的一些御用文人那么卖力地伪造历史，

①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三章，第一节。

② 《有关准噶尔史的书进行的讨论》，载苏联《亚非民族》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四期。

这只能说明他们的所谓“历史研究”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

墨写的谎言改变不了铁的历史事实。近百年来，帝国主义者，包括沙俄帝国主义者在内，都曾大肆歪曲和篡改中国历史，来为他们侵略中国的政策服务，但是，他们一个个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今天，苏修叛徒集团又拾起过去帝国主义分子的牙慧，重新玩弄这套把戏，也决然逃脱不了彻底失败的命运！

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部叛乱 与抵御沙俄侵略的斗争

庆 思

兴起于中国东北地区的满族，于十七世纪中叶建立了清朝政权。清朝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同分裂割据势力进行了长期激烈的斗争。以噶尔丹、策妄阿喇布坦和阿睦尔撒纳为首的一小撮准噶尔贵族分子，是割据我国西北地区的民族分裂势力的代表。他们在沙皇俄国支持下，作乱边疆，分裂割据，背叛祖国，为害各族人民，严重地破坏国家的统一。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防止民族分裂，捍卫主权与领土完整，清朝政府在削平“三藩”、统一中原地区及台湾之后，在各族人民支持下，同沙皇俄国支持的准噶尔贵族分裂势力进行了长达七、八十年之久的斗争。

准噶尔是我国厄鲁特蒙古族的一部^①，为明代瓦剌

^① 程穆衡：《准噶尔考》卷上：“准噶尔者，西北一部落，……本朝总名为厄鲁特，……准噶尔其一部也。”

之后^①。在清代，厄鲁特也称为“卫拉特”或“额鲁特”^②。他们长期过着“逐水草，无城郭”^③、“不耕五谷，以游牧为业”^④的生活，是居住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的游牧部落。

约在十六世纪末，厄鲁特蒙古分为四大部：绰罗斯即准噶尔^⑤，游牧于巴尔喀什湖以东、天山以北，伊犁河流域；杜尔伯特，游牧于额尔齐斯河两岸；和硕特，游牧于乌鲁木齐地区；土尔扈特，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地区。当时厄鲁特四部虽然还处于“分牧而居”^⑥、“部自为长”^⑦的状态，但已形成了松散的联盟——“杜尔本·卫拉特”^⑧。在厄鲁特四部联盟中有“丘尔干”（即盟会）的共同组织，作为调整各部首领之间的矛盾、加强对本部人民统治以及

① 博明：《西斋偶得》卷上《瓦剌》：“《明史》所载之瓦剌，即今之厄鲁特。”

② 见洪钧：《元史译文证补》、柯劭忞：《新元史》及张穆：《蒙古游牧记》。

③ 《西域图志》，卷一，《图考》一，《西域全图说》。

④ 椿园：《西域记》，卷五，《准噶尔叛亡记略》。

⑤ 准噶尔部祖先姓绰罗斯，故其部亦称为绰罗斯部（见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一一，《额鲁特蒙古总叙》）。至于绰罗斯之所以又称为准噶尔，系因该部居四部之左而得名。按蒙古语中“准”为左，……“噶尔”为手（须佐嘉橘：《西蒙古部族考》，克鲁伦研究室刊，第四——五页）；故“准噶尔”一语，即蒙古语“左翼”之意。

⑥ 邓廷桢：《蒙古诸部述略》。

⑦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

⑧ “杜尔本”为蒙古语“四”之意，“杜尔本·卫拉特”即“四部卫拉特联盟”。

抗击外来侵略的机构。“丘尔干”中有“达尔加”，即厄鲁特四部联盟的盟主。自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丘尔干”的“达尔加”是和硕特的首领拜巴噶斯。

十七世纪初，准噶尔部在其首领巴图尔浑台吉统治时期，势力逐渐扩大，联盟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化。大约在一六二七年——一六二八年间（明崇祯初年，清皇太极天聪一、二年）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因受准噶尔部排挤，率其所部五万余帐，远徙于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流域游牧^①。此后不久，和硕特部首领拜巴噶斯的弟弟图鲁拜琥（即顾实汗）与巴图尔浑台吉发生冲突，图鲁拜琥率其所部也离开了原来牧地乌鲁木齐地区，向东南转移到青海一带，并乘西藏内乱，入据其地，“使其子驻之”^②。至此，厄鲁特四部联盟已基本解体。

随着准噶尔部势力的日益强大，巴图尔浑台吉一面保持与清朝中央政府的臣属关系，一面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不断向其邻部哈萨克、柯尔克孜、诺盖等突厥族发动掠夺战争^③，至使哈萨克等部“在所有事情上都仰望着巴图尔浑台吉，并服从他”^④，准噶尔部逐渐成为我国西

① 详见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一四，《额鲁特蒙古新旧土尔扈特部总叙》及《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中译本），第一五七页。

②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

③ 霍渥斯：《蒙古史》，一八八〇年伦敦版，卷一，第六一八页；和田清：《东亚史研究》，《蒙古篇》（日文本），第八八四——八八五页。

④ 巴德雷：《俄国、蒙古、中国》，一九一九年伦敦版，卷二，第三八页。

北地区的强大割据势力。特别是巴图尔浑台吉之子噶尔丹篡夺准噶尔部的统治权后，在沙皇俄国的怂恿支持下，准噶尔部的割据势力更加恶性地膨胀起来，攻掠邻部，发动叛乱，成为破坏国家统一和制造民族分裂的反动力量。在清代前期，准噶尔部割据势力的历次叛乱，都同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

“俄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有侵略野心的国家”，（恩格斯：《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几代的沙皇都梦想**“建立一个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利亚海到北冰洋的伟大的斯拉夫帝国。”**（恩格斯：《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

自从沙皇伊凡四世（公元一五三三——一五八四年）以后，由于国内大农奴主和大商人的推动，俄国开始疯狂地向外进行侵略扩张。在欧洲同波兰、立陶宛、瑞典进行争夺战争的同时，积极向东方进侵。到了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沙俄的侵略势力一面越过贝加尔湖和外兴安岭，侵入我国东北部黑龙江流域；一面把它的侵略魔掌伸向我国北部和西部的蒙古族地区。

明末清初，我国蒙古族分为三大部分：除漠西厄鲁特蒙古外，还有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漠南蒙古早于清朝入关前，已隶属于清朝统治之下。漠北喀尔喀蒙古位于漠南蒙古之北，分札萨克图、土谢图及车臣三

部，清初以后相继向清朝政府称臣纳贡。漠西厄鲁特蒙古各部，也先后承认清朝中央政府的统治。可见我国蒙古族地区已经重新统一于清朝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但当时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和全俄市场开始形成时期的沙皇俄国，出于国内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殖民利益的需要，早已把我国蒙古族地区作为侵略的目标，而居于我国西北部边疆地区的厄鲁特蒙古更成为它侵略的重要对象。

沙皇俄国对我国厄鲁特蒙古的侵略，或是采取武力征服，或是采取“怀柔”手段。当他们感到厄鲁特“这些好战的蒙古人，在草原上适得其所”，而“无法征服”时，沙俄侵略者不得不收起那套以武装“入侵和以城堡控制的办法，而采取了派外交使节的办法”^①，以威胁利诱手段，诱使厄鲁特各部首领“转入俄国国籍”，从而实现其分裂我国民族、侵占我国领土的罪恶阴谋。这点，连苏修的御用文人、《准噶尔汗国史》的作者兹拉特金也无法否认：“俄国当局极力企图通过和平手段把卫拉特王公和执政者变成俄国的臣民，把从属于这些王公和执政者的居民变成替俄国提供实物税的属民，并把他们居住的地区变成俄国的领土。”^②

从十七世纪初开始，为了诱使厄鲁特首领屈服，沙皇

① 以上所引均见约瑟夫·塞比斯：《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日记》的《徐日升神甫日记导论》，一九六一年罗马版。

②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一九六四年莫斯科版，一六八页。

政府派遣使者来我国厄鲁特蒙古地区进行侵略活动的纪录，是史不绝书的。从一六〇七年到一六一六年，沙皇曾多次派遣代表团潜入我国厄鲁特蒙古地区，阴谋诱使其首领归顺俄国。一六二三年，沙皇又派出沃尔可夫为首的几名使者，从乌发到杜尔伯特部进行阴谋活动^①。准噶尔部势力强大后，更加引起沙皇俄国的注视。在僧格（巴图尔浑台吉之子，噶尔丹之兄）统治时期，沙皇政府不断派遣使者到准噶尔部，要求僧格屈服于沙皇，但遭到僧格的严辞拒绝，并对俄国掠去他的属民提出强烈的抗议^②。

在侵略准噶尔地区的同时，沙俄又极力向东进侵。从十七世纪上半叶开始，沙俄不断派人去阿勒坦汗和车臣汗等处，诱使其脱离祖国，依附俄国，并接连不断地派出“探险队”，侵入贝加尔湖以东的喀尔喀蒙古地区。到了十七世纪下半叶，沙俄侵略势力已深入喀尔喀蒙古地区，直接侵入色楞格河流域的土谢图汗管辖的地方，先后建立色楞格斯克和伊尔库次克据点。沙俄对喀尔喀的入侵，遭到土谢图汗的抗议和蒙古族人民的武装反抗。而这时入侵黑龙江地区的沙俄侵略势力，也遭到我国东北各族人民的抗击和清政府的抵御，使沙俄的东侵势力一时受到中国有力的阻挡。为了扭转其东侵的不利形势，沙俄侵略者便转向积极支持准噶尔部割据势力，勾结并策动噶尔丹在土谢图汗处借故制造事端，企图挑起民族

①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一四四页。

②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二一九——二二〇页。

分裂叛乱，以钳制清朝政府抗击沙俄入侵的武装力量。当时派遣到中国谈判边界问题的沙俄侵略分子戈洛文，在给沙俄外务衙门的报告中，就提出了建立沙俄和准噶尔联盟的主张，建议“由托博尔斯克派出使团去见厄鲁特汗（即噶尔丹——引者）”^①。戈洛文并且“为了取得蒙古封建主们和卫拉特人的噶尔丹·博硕克图对自己的同情，决定向他们送去沙皇国书和沙皇赐给的礼物”^②。噶尔丹得到沙皇的鼓励和支持后，更加疯狂地向喀尔喀蒙古进攻，一场大规模的分裂祖国的叛乱，在沙皇侵略势力的策动下爆发了。

噶尔丹是巴图尔浑台吉的第六子，早年在西藏作喇嘛。一六五三年（顺治十年），巴图尔浑台吉死，其子僧格嗣位。不久，巴图尔浑台吉诸子之间发生了争夺统治权的内讧，噶尔丹闻讯由西藏返回，于一六七一年（康熙十年）夺取了统治权。他大肆向周围各部进行扩张，一六七七年（康熙十六年），进攻青海和硕特部，“因胁诸卫拉特奉其令”^③；接着又转向南疆回部，一六七八年（康熙十七年），进攻天山以南回部诸城，“尽执元裔诸汗，迁居天山以北，回部及哈萨克，皆为其属”^④。噶尔丹据有南疆后，

①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一九七二年莫斯科版，第二卷，第一八页。

② 沙斯京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一九五八年莫斯科版，第一四六页。

③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

④ 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戡定回疆记》。

对当地各族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压榨和掠夺，把他们视为奴仆，“征发期会，惟其所使”^①，强迫当地人民“输租献赋”^②，又派他们往伊犁耕种，“占据其地为牧场，回民（指维吾尔族人民——引者）不堪其扰”^③。由于噶尔丹的残暴统治，致使新疆地区生产凋蔽，民不聊生。这时，噶尔丹的势力更加强大，“控弦之众百余万，驼马牛羊徧（遍）山谷”，而噶尔丹的野心也随之日益扩大，“恃其强盛，四出剽掠”^④，在攻掠喀尔喀蒙古部的同时，进而把矛头指向清朝中央政府。

为了实现吞并喀尔喀进一步发动叛乱的野心，噶尔丹在沙皇政府勾引下，走上了投靠沙俄，背叛祖国的罪恶道路。从一六七四年（康熙十三年）到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间，噶尔丹几乎每年都派人到俄国进行勾结^⑤，“企图同俄国订立军事同盟和求得俄国给予‘军队和枪炮’的援助”^⑥。一六八八年（康熙二十七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前夕，噶尔丹“扬言借俄罗斯兵且至”^⑦，引兵三万由杭爱山大举进攻喀尔喀部。

就在噶尔丹向喀尔喀部进攻的时候，喀尔喀蒙古人

-
- ① 《西域图志》，卷三五，《风俗》。
 - ② 《西域图志》，卷一八，《御制平定回部勒铭叶尔羌碑文》。
 - ③ 椿园：《西域闻见录》，卷二。
 - ④ 敖福合译：《圣驾亲征葛尔旦方略》钞本。
 - ⑤ 〔法〕加恩著、江载华译：《早期中俄关系史》，第七三页。
 - ⑥ 沙斯京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第一六二页。
 - ⑦ 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

民正在色楞格地区抗击沙俄侵略分子戈洛文所指挥的侵略军，使这帮强盗龟缩在色楞格斯克城堡之内，不敢出击。但由于噶尔丹从西面向喀尔喀部进攻，土谢图汗不得不撤退包围色楞格斯克的部队，因而使沙俄侵略军得以扭转狼狈处境。根据沙俄文件记载：噶尔丹对喀尔喀部蒙古的进攻，是根据俄国沙皇的谕旨发动战事的，“有大批俄国军队，并有大量火器大炮协同他作战”^①，噶尔丹的叛军是同沙俄军队“联合行动的”^②。可见沙俄侵略者已直接参与了噶尔丹叛乱。

噶尔丹为彻底吞并喀尔喀蒙古，进一步充实其叛乱的实力，更加无耻地卖身投靠沙皇俄国。就在尼布楚条约签订的第二年（一六九〇年，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密派达尔罕宰桑为使者，带着他的信件去见伊尔库次克总督吉斯良斯基和戈洛文。达尔罕宰桑要求沙俄方面派军队与噶尔丹军队会合，继续进攻土谢图汗的军队^③。噶尔丹给戈洛文的信中提到：要求戈洛文率领侵略军“驰赴约定之地会合，以便并肩作战”^④。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噶尔丹竟不惜出卖祖国的神圣领土。他给使者的指示中说什么：“阿尔巴津（即雅克萨——引者）建寨地区原本是蒙古的，不是博格达汗（指清朝皇帝——引者）的，统辖蒙

①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三六〇页。

②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三〇七页。

③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二八〇页。

④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六二三页。

古人和这个地区是他——博硕克图汗，倘若沙皇陛下有意在这里建城堡，博硕克图汗愿意将这个土地让给陛下”^①。而戈洛文给噶尔丹的复信中，则“保证以俄国军队的相应行动支持厄鲁特部对土谢图汗的进攻”^②，并派基比列夫随达尔罕宰桑返回会见噶尔丹，“继续就可能共同出兵对付土谢图汗及其支持者一事进行谈判”^③，阴谋策划扩大叛乱。噶尔丹的卖国活动已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而沙俄的侵略活动也更加明目张胆。

噶尔丹既得到沙俄的怂恿和支持，反动气焰更加嚣张。一六九〇年六月，他以追击喀尔喀部为名，掀起了反对清朝中央政府的叛乱，叛军一直推进到内蒙古地区的乌珠穆沁，在沙皇俄国支持下，一场大规模的民族分裂叛乱爆发了。

清朝政府对噶尔丹叛乱早就有所准备。当清朝政府在南方镇压“三藩”，在东北抗击沙俄入侵的紧急时刻，清朝当局对西北地区噶尔丹割据势力的滋长与骚扰，一直密切加以注视。早在一六七八年（康熙十七年），清朝政府就派人至甘肃一带注意“厄鲁特部落噶尔丹台吉信息，不时以报”^④，并命当地守将“务须令其坚立信誓，不许骚扰人民”，以“严加防护”^⑤。当噶尔丹进攻喀尔喀部时，清

①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三〇页。

②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二八一页。

③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二八一页。

④ 《平定三逆方略》，卷三六。

⑤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一。

朝政府立即命裕亲王福全(康熙之兄)“预为备御”^①,又命费扬古等将领率军驻于张家口外“形势之地,以听调遣”^②。康熙早已看出,噶尔丹这个野心家,“势力强横,妄自志大”,“断不免窥视中原”^③,因而坚决主张对噶尔丹割据叛乱,必须“早为图之”^④。

当清朝政府得知沙俄侵略者与噶尔丹互相勾结、酝酿订立反清军事同盟和噶尔丹“请兵二万于俄罗斯”的消息时,康熙立即召见当时在北京的俄国使者吉里古里和伊法尼齐,义正辞严地指出:“噶尔丹迫于内乱,食尽无归,向内行劫。今乃扬言会汝兵,同侵喀尔喀。喀尔喀已归顺本朝,倘误信其言,是负信誓而开兵端也。”^⑤康熙向沙俄侵略者提出的严正警告,有力地揭露了沙皇政府表面议和、暗中助乱的阴谋。

一六九〇年(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引叛军二万,以追击喀尔喀为名,越过呼伦池南进,清军初战失利,噶尔丹便乘势深入到距北京七百里的乌兰布通(今克什克腾旗境内)。康熙亲临前线,组织反攻,大破噶尔丹叛军于乌兰布通。噶尔丹以诡计争取了喘息时间,逃回科布多,一面纠合残部,以图东山再起;一面派人去莫斯科,继续乞求沙俄的支持。沙俄政府派人与噶尔丹相约,“至青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六。

②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

③ 敖福合译,《圣驾亲征葛尔旦方略》钞本。

④ 《康熙政要》,卷二一,《征伐》。

⑤ 《清圣祖实录》,卷一四六。

草出后助鸟枪手一千及车装大炮，发至克鲁伦东方界上”^①。一六九五年(康熙三十四年)，噶尔丹又率骑兵三万，沿克鲁伦河而下，进踞巴颜乌兰，扬言：“借俄罗斯鸟枪兵六万，将大举内犯漠南”^②。噶尔丹在俄国支持下，又点起了叛乱的战火。

康熙立即于一六九六年(康熙三十五年)组织了平定叛乱的第二次军事行动。清军分东、西、中三路大举出击，约期夹攻。西路清军于昭莫多与噶尔丹叛军相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昭莫多(蒙古语大树林之意)在肯特山之南，汗山之东，土拉河之北，地势平旷，自古以来即为漠北之战场。清军采用以逸待劳、诱敌深入战术，把噶尔丹叛军诱入包围圈中。清军官兵“皆下马步战，约闻角声始上马”围歼^③。噶尔丹率叛军向前迎战，清军“据山顶临之”，“据险俯击，弩统迭发，藤牌继之”^④，双方展开了殊死战斗。自午至暮，清军浴血奋战，大败叛军，噶尔丹仅“引数骑逃去”，其零星散逃叛军千余人也都投降了清军^⑤。

昭莫多战役，是清军战胜噶尔丹叛军的一次决定性战役，基本上歼灭了噶尔丹叛军。此后，噶尔丹率残部流窜于塔米尔河流域，成为一股日暮途穷的流匪。他的

①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四。

② 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

③ 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

④ 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

⑤ 《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一。

伊犁根据地早已为其侄策妄阿喇布坦在他进攻喀尔喀时所占据，其“回部、青海、哈萨克，皆隔绝叛去”^①，但噶尔丹仍继续坚持分裂祖国的叛乱，妄图作最后的垂死挣扎。

康熙决定不给噶尔丹以喘息的时机，在昭莫多战役之后的次年，立即组织第三次军事行动。这时噶尔丹的残部不过五、六百人，食尽粮绝，在清军进攻下纷纷投降。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一切依靠外国侵略势力的走狗，“**不论如何蠢动于一时，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噶尔丹这个借助沙俄侵略势力发动分裂叛乱的野心家、卖国贼，这时已失掉了主子对他的兴趣。噶尔丹“欲北赴鄂（俄）罗斯，而鄂罗斯拒不受”^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噶尔丹自知末日已到，遂服毒自尽。噶尔丹在沙俄支持下发动的分裂祖国的叛乱，至此，被清朝政府平定下去。

三

噶尔丹的叛乱虽被平定，但是沙俄支持准噶尔贵族分裂势力进行叛乱的活动，并没有就此结束。到了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策妄阿喇布坦及其子噶尔丹策零又与沙俄相勾结，继续发动叛乱。

①② 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

策妄阿喇布坦是僧格的长子。噶尔丹夺取准噶尔统治权后，策妄阿喇布坦率部众五千余人，逃居吐鲁番，向清朝“遣使乞降”^①。及至噶尔丹进攻喀尔喀发动叛乱时，策妄阿喇布坦乘机返回噶尔丹的根据地伊犁，“收其父旧属及噶尔丹余众，复成部落”^②。策妄阿喇布坦占据伊犁后，一面向清朝政府“请安纳贡”，假称愿为“效力尽瘁”^③；一面不断发展其割据势力，准备叛乱。康熙末年，策妄阿喇布坦袭击哈密，进兵西藏，杀死拉藏汗，发动叛乱。一七二〇年(康熙五十九年)，清政府进军西藏，驱逐了叛军，使西藏的局势稳定下来。

策妄阿喇布坦统治准噶尔部期间，沙俄并没有改变对准噶尔部的侵略政策。当时，俄国正是彼得一世(一六八二——一七二五年)在位。彼得一世是个“向自己的继承者指示种种侵略方针的帝王”，(恩格斯：《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从他开始沙皇俄国便走上了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彼得及其继承者对其欧洲邻国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的同时，在东方积极推行扩张政策。特别当时盛传我国西北地区富有金矿的消息，更加刺激彼得一世的贪欲，因而沙皇政府对我国准噶尔地区采取了“更直接的行动”^④。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七四。

② 《西域图志》，卷首一，《天章》→《准噶尔全部纪略》。

③ 《清圣祖实录》，卷一八二。

④ [法]加恩著、江载华译：《早期中俄关系史》，第七四页。

一七一五年(康熙五十四年),彼得一世派出布赫戈利茨中校为头目的一支三千人的“远征队”,沿额尔齐斯河两岸修筑据点^①。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写信给策妄阿喇布坦,“向他(指策妄阿喇布坦——引者)许诺如果他不干涉这支军队,将来他便得到帮助和声援”^②。沙俄侵略军遭到准噶尔部军民的自卫反击,而未得逞。但沙俄侵略者仍贼心不死,一七二〇年(康熙五十九年)又派利哈列夫为首的一支四百四十人组成的侵略军从托博尔斯克出发侵入斋桑湖,于湖边“筑造要塞”^③。而策妄阿喇布坦在西藏的叛乱势力被清军驱逐后,转向沙俄求援,以允许沙俄远征队自由过境作为交换条件,要求与沙俄订立反清的“防御同盟”^④。彼得一世立即派翁科夫斯基来准噶尔活动,“设法使策妄阿喇布坦让与领土,以便在这些领土上建筑堡垒要塞,修筑一条连续不断的堡垒线会使西伯利亚与前哨站连接起来,并且可以保护探矿队的全部旅程”^⑤。彼得一世指示翁科夫斯基,如果策妄阿喇布坦与沙俄签订臣服条约,“俄国就会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甚至可以举行一次军事示威”^⑥。沙俄与策妄阿喇布

① [法]加恩著、江载华译:《早期中俄关系史》,第七七——七八页;迈可尔·刘金:《俄国在中亚》,一九六三年伦敦版,第一六页。

② [法]加恩著、江载华译:《早期中俄关系史》,第七七页。

③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三四七页。

④ [法]加恩著、江载华译:《早期中俄关系史》,第八〇页。

⑤ [法]加恩著、江载华译:《早期中俄关系史》,八〇——八一页。

⑥ [法]加恩著、江载华译:《早期中俄关系史》,第八〇页。

坦相互勾结、露骨地干涉中国内政的侵略行径，引起清朝政府的强烈抗议。一七二二年(康熙六十一年)，清朝政府召见沙俄在北京的使臣郎克，向他提出了质问，并将其驱逐出境。

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策妄阿喇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屡次发动骚乱，并窝藏青海和硕特叛匪头目罗卜藏丹津^①。一七三二年(雍正十年)，噶尔丹策零发动叛乱，进入喀尔喀部境内，袭击三音诺颜部之塔米尔河，“尽掠子女牲畜”^②，为三音诺颜部郡王额駙策凌所败。噶尔丹策零逃回伊犁，遣使求和。清政府以为准噶尔叛军“已远徙，不敢深犯”^③，遂与之议和，因而使准噶尔割据势力又得以在西北地区继续盘踞下去。

必须指出，噶尔丹策零的叛乱也是在沙俄侵略者的策动下发生的。就在噶尔丹策零进攻喀尔喀期间，沙俄特务乌格留莫夫悄悄地溜进了准噶尔部，住在“伊犁河流域及其支流各地近半年的时间”^④，长期与噶尔丹策零勾结。

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封建贵族为了争夺汗位而互相残杀，经过将近八年的内讧，最后准噶尔贵族达瓦

① 罗卜藏丹津为顾实汗之孙。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于青海发动叛乱，被清军镇压失败后逃往准噶尔部。详见魏源：《圣武记》，卷三；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一一。

②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一一，《厄鲁特要略三》。

③ 魏源：《圣武记》，卷三，《雍正两征厄鲁特记》。

④ 克鲁巴特金：《俄中问题》。

齐在辉特部^① 贵族阿睦尔撒纳的支持下取得了准噶尔的统治权。

阿睦尔撒纳是个奸诡狡恶的野心家。他本想利用准噶尔贵族内讧时机,通过对达瓦齐的支持,以篡夺准噶尔部的统治权。而达瓦齐为人极其残虐,在其残暴统治下,准噶尔人民“无不离心解体”^②。一直垂涎汗位的阿睦尔撒纳,便乘势进攻达瓦齐,但在达瓦齐的反击下,阿睦尔撒纳力不能敌,遂率所部投归了清朝。

根据当时准噶尔的局势,清朝最高统治者乾隆认为,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是康熙、雍正两朝“筹办未竟之绪”^③，“准噶尔一日不定,则其部曲一日不安”^④,因而决定乘准噶尔内部动乱的时机,兴兵进讨,平定准噶尔这个长期割据西北地区的叛乱势力。

阿睦尔撒纳参加了清朝政府向伊犁的进军。伊犁平定以后,清朝政府原想把准噶尔部“封为四汗,俾各管其属”^⑤,以削弱准噶尔的割据势力,“并非祇封阿睦尔撒纳一人统管准噶尔地方”^⑥。但阿睦尔撒纳归附清朝,本是为了借用清军力量消除其政敌达瓦齐,从而实现其“为四

① 辉特原隶属于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出走后,辉特部遂为厄鲁特四部之一。详见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一一,《额鲁特蒙古总叙》。

②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九。

③ 《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九。

④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一二。

⑤ 《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一。

⑥ 《清高宗实录》,卷七。

部总台吉，专制西域”^①的政治野心。因此，他进踞伊犁后，便“隐以总汗自处”^②。任意杀掠，独断专行，向各处派人，竭力扩展割据势力。

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阿睦尔撒纳公开发动叛乱。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政府出兵向叛军大举进攻。当时准噶尔部痘疫流行，死亡相望，清军长驱直入，叛军败溃，阿睦尔撒纳逃往沙皇俄国。

阿睦尔撒纳的漏网脱逃，成为清朝政府的隐患，正如当时乾隆所说：阿睦尔撒纳“将来必不能久甘穷困，势必滋生事端，为患边境”^③。特别是侦知阿睦尔撒纳逃入俄国的确实消息后，更引起清朝政府的不安。乾隆认为：“俄罗斯既已收留叛贼，必且抚而用之”^④，因而一再向沙皇政府交涉，要求将阿睦尔撒纳送回。但沙俄当局百般推诿，甚至捏造谎言，说阿睦尔撒纳已“落水身死”^⑤。后来阿睦尔撒纳病死，沙皇政府在清朝政府强硬交涉下，才不得不把尸体送至恰克图，交清朝政府派出的官员验看。

沙皇政府收容和庇护准噶尔的叛匪，正是它对我国准噶尔地区一贯推行侵略政策的表现。在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割据叛乱期间，沙俄为了窥探准噶尔地区的事态发展，把奥连堡和托博尔斯克作为搜集准噶尔情报的中

① 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

② 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卷二，《平定准噶尔正编述略》。

③ 《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七。

④ 《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五。

⑤ 《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七。

心。“西伯利亚和奥连堡省的省长们定期地、相当频繁地向彼得堡提供有关‘当地情况’的详细报告，报告中附有与准噶尔接壤各地区和各要塞送到省署的许多报告。这些附件中有当地军事指挥官和管理人员、使者和信使、商人及其经理人的各种口头和书面报告，也有短期经过准噶尔或长期居住在那里因而目睹一些事件的人们的各种报告”^①。根据沙俄档案资料记录，准噶尔贵族内部为争夺统治权而火并时，沙俄就企图收买在哈萨克避难的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一七五二年（乾隆十七年），沙皇政府指示奥连堡的涅普留耶夫和捷夫凯列夫将军，要他们竭力“争取”达瓦齐，“因为他是目前有希望控制全准噶尔贵族的人”^②。为此，奥连堡当局立即派遣特务雅科夫列夫去哈萨克进行勾结。阿睦尔撒纳叛乱后，曾一度逃往哈萨克，这时奥连堡当局又派出特务卡斯金诺夫去哈萨克，把沙俄当局的信“秘密交给阿睦尔撒纳”，“邀请阿睦尔撒纳来奥连堡”^③。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当阿睦尔撒纳叛军在清军进剿下节节失利时，沙俄政府答应阿睦尔撒纳在“俄国安全避难”，保证“在吃、穿和其他救济方面都做到称心如意”^④。同时，清军从截获阿睦尔撒纳的辎重车中，发现沙俄边境当局勾引阿睦尔撒纳“加入

①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四二七页。

②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四三五页。

③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四五三页。

④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四五八页。

俄国国籍”的四封信件^①。可见，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和沙俄侵略者的策动有着直接联系。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这四封信件，就是沙俄策动准噶尔割据势力妄图分裂我国的罪证。

阿睦尔撒纳叛乱被平定后，清朝政府于一七六〇年（乾隆二十五年）进军南疆，平定维吾尔族大、小和卓的叛乱。清朝政府设伊犁将军统治天山南北两路，至此，我国西北地区又重新统一起来。

四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部叛乱中取得的胜利，主要是由于各族人民推动与支持的结果。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部贵族的民族分裂叛乱，是维护国家统一、消除分裂割据的战争。这场战争既顺应当时我国重新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也符合各族人民要求统一安定的共同愿望，因而它必然得到各族人民的支持。事实证明，在平定叛乱过程中，不仅满、汉军民直接参加了战斗，而且得到了新疆、蒙古、西藏和青海地区各族人民的支持。例如：内蒙古察哈尔部军民，在平定噶尔丹的叛乱中“效力为最”^②。喀尔喀蒙古人民在“引路、探信、牧马、掘井诸事”方面，都积极

^①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四五九页。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七四。

为清军“效力”^①。在驱逐策妄阿喇布坦入藏叛军的战役时，被叛军胁迫对抗清军的藏族人民，遇到清军“其鸟枪则高举放过”，“但放空枪”^②。清军进军伊犁时，新疆各族人民“牵羊携酒”^③，“载道欢迎”^④，而且协助清军捕获叛匪，达瓦齐就是被南疆维吾尔族霍吉斯所擒获的。

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消除了准噶尔部贵族中的民族分裂割据势力，在统一西北地区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有力地打击了沙皇俄国侵略中国的野心，保卫了国家的独立与完整。

今天，苏修叛徒集团完全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为了实现其领土扩张的野心，他们在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的问题上，大作文章，胡说什么清朝平定准噶尔叛乱是“满洲中国征服者”对准噶尔部的“征服”和“侵占”。苏修叛徒集团对中国的内政问题，如此大放厥词，就更加清楚地暴露出他们妄图侵略我国新疆地区的狼子野心。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复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三。

②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六。

③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一二。

④ 程穆衡，《准噶尔考》，卷上。

沙俄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早期侵略

希 达

沙皇俄国早在十七世纪初期，就将侵略魔爪逐渐伸入我国边疆地区。特别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沙俄勾结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推行瓜分中国的政策，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先后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中俄伊犁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占了我国东北和西北地区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血腥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犯下了一系列滔天罪行。中俄两国关系的历史，就是沙皇俄国侵略中国的罪恶史，也是中国人民反抗沙俄侵略的斗争史。

沙俄侵略我国西部地区的历史，是整个沙俄侵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十七世纪初，沙皇俄国向东扩张，开始与当时我国西北部厄鲁特蒙古地区的一段边界接壤。厄鲁特蒙古是我国蒙古族的一支。贪婪、残暴的沙俄侵略者在继续向西伯利亚东部扩张的同时，还在西伯利亚西部建立侵略据点，向南侵略我国厄鲁特蒙古各部。开始，沙俄频繁地派遣“使节”，企图用政治收买的卑劣手段，不费一兵一

卒，吞并我国西部领土；以后，又用煽动和支持厄鲁特准噶尔部反动贵族分子叛乱的手段，妄图分裂我国。十八世纪初，沙皇彼得一世又派遣侵略军，图谋占领额尔齐斯河上游至叶尔羌的我国西部广大地区，但是没有得逞。一七五九年，清朝政府平定了准噶尔部和回部反动贵族分子的分裂割据叛乱，统一了西部地区，这对野心勃勃的沙俄侵略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此后，沙俄继续采用武装蚕食领土、派遣间谍、掠夺资源、颠覆分裂等手段，不断入侵我国西部地区。特别是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沙俄对我国西部地区的侵略更加疯狂。在这些侵略活动中，武装蚕食我国西部领土又占首位。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沙俄已逐渐用武力侵占了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部分领土，并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攫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特权。这些侵略活动，为沙俄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大规模地侵略我国西部地区作了准备。

今天，苏修叛徒集团为了适应他们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竭力为老沙皇侵略我国的罪行翻案。他们豢养的一小撮御用文人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华文章，肆意篡改和歪曲沙俄侵略中国的历史。在这些反华文章中，有一部分是为老沙皇对中国西部地区侵略的罪恶历史翻案的。这些反华文章的作者如齐赫文斯基之流编造了种种谎言，说什么：十九世纪中叶被沙俄侵占的中国巴尔喀什湖

以东、以南地区，过去“实际上没有受中国管辖”，甚至说这些地区“从来没有隶属过清帝国”；沙皇政府在十九世纪中叶“继续同中国保持着睦邻关系”，等等。他们把老沙皇在逼签不平等条约前对我国西部领土的武力侵占，说成是“俄罗斯移民的经济开拓”，把沙俄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颠覆分裂的侵略活动，称之为这些少数民族向沙俄寻求“保护”，而“自愿归并”于俄国^①。这是十足的霸权主义口吻，不折不扣的强盗逻辑。

苏修之所以编造这些谎言和谬论，目的在于为他们今天推行的侵略政策辩解。但是，谎言代替不了事实，历史真相决不容歪曲。为了揭穿苏修篡改、伪造历史，继承老沙皇侵略扩张衣钵的社会帝国主义本质，我们有必要重新翻一翻老沙皇一七五九年至一八六〇年这一百年间侵略我国西部地区的历史^②。

对我国科布多、唐努乌梁海 等地区的入侵活动

我国西部，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一九七二年莫斯科出版；别斯克罗夫内、齐赫文斯基等：《论俄中边界形成史》，载苏联《国际生活》杂志，一九七二年第六期；古列维奇：《大汉族沙文主义和中亚细亚民族历史的若干问题》，载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九期。

② 关于一七五九年以前沙俄侵略我国准噶尔部的罪行，《谎言改变不了历史》和《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部叛乱与抵御沙俄侵略的斗争》已作了揭露，本文暂不论述。

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早在公元前六十年，中国汉朝政府就在巴尔喀什湖一带的广大西部地区设置了西域都督府。公元七世纪，中国唐朝政府又在这里设官置守，征收赋税，驻军屯田。十八世纪中叶，中国清朝政府平定西部少数民族反动贵族分子叛乱，统一西部地区，设置以伊犁将军为首的行政机构，建立卡伦（即哨所）、台站，规定了一系列巡查边界的会巡制度，行使有效的行政管辖。沙俄入侵前，中国西部的边界在巴尔喀什湖，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不仅有我国大量官方文献的记载，就连沙俄和苏联的许多历史著作和地图都是确认的。

一七五九年，清朝政府统一西部地区时，沙俄与中国巴尔喀什湖一带的边界相距尚远，仅仅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到沙宾达巴哈之间有一段边界接壤。这段边界以南的我国领土是清朝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所属唐努乌梁海和科布多的一部分。

野心勃勃的沙俄为了侵占我国西部领土，一面在中俄边境上制造事端，杀害中国守卡官兵；一面大肆制造中国要向中亚“扩张”，“威胁”俄国安全的谎言，伺机向我国边境入侵。修筑堡垒，偷立标记，武装蚕食，是沙俄在这一时期的侵略特点之一。

一七六〇年三月，沙俄西伯利亚总督索伊莫洛夫在“防御”清朝“进攻”的借口下，向沙皇政府提出要从俄国边堡涅格尔图喇（今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沿我国领土布克图尔玛河（今布赫塔马河），到阿勒坦淖尔（今帖列茨

科耶湖)建筑堡垒的建议。为此,他派了两个武装“勘察队”,侵入我国科布多境内的哈屯河(今卡童河)、阿勒坦淖尔一带,树标测量,勘查建筑新城堡和多角堡的地形。当时,清朝阿勒坦淖尔总管扎拉纳克立即将沙俄这一侵略行径上报朝廷。清朝政府就命令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扎布“传集游牧兵丁”,前往查办;并抽调官兵“两路会哨巡查阿勒坦淖尔之处,果有设立标记,即行拆毁;如有屯驻人等,即行驱逐”^①。

沙俄枢密院根据以上两个“勘察队”提供的情报,于同年底下达了从铿格尔图喇到我国阿勒坦淖尔以及其它“合适地点”建筑侵略堡垒的指令^②。一七六三年九月,清朝政府得到报告,沙俄侵入卫满河(又名鄂依满河)源、库克乌苏河(均哈屯河上游支流)、布克图尔玛河和色毕河(今查雷什河上游一个支流)等地,“造屋树栅”,建造堡垒,就立即命令成衮扎布派厄鲁特、乌梁海官兵各一百名,前往色毕等地,“将俄罗斯木栅、屋宇尽行拆毁”^③。次年夏,清朝军队遵照上述命令,拆毁了沙俄在布克图尔玛、色毕等处所建之碉堡和房屋^④。清朝政府的措施,遏止了沙俄这次武装蚕食我国领土的侵略活动。

一七六四年十月,沙皇政府在彼得堡召开“国务会

① 《清高宗实录》,卷六一七,页八上——九下;页一六下——一八上;卷六一八,页二。

② 《帝俄法律全书》,第一编,第一五卷,第五三四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六九二,页一——二。

④ 《清高宗实录》,卷七一〇,页七下——九上。

议”，专门讨论强化西伯利亚管理系统，增加西伯利亚的兵力，企图以重兵压境，威胁我国边疆地区，伺机向我国西北边境入侵。一七七一年，清朝科布多参赞大臣集福向清廷报告：在所属境内汗山（今北部阿尔泰山）、哈屯河一带发现有潜入该地耕种的俄国殖民者，建议“将三年稽查一次之处，改为每年稽查一次”。清朝政府批准了这一请求，下令“每年委派干员，带兵百名，搜查一次”^①。到了十八世纪最后十年，沙俄武装殖民者又沿额尔齐斯河而上，潜入我国布克图尔玛河一带，非法建盖木房，逼迫当地中国人民“归附”俄国。一八三一年，又有沙俄商人潜入哈屯河上游推河（又名吹河）一带，陆续修建木房三十七间^②。这些入侵活动都是沙俄利用我国边疆地区地广人稀的情况，偷偷摸摸地进行的。

派遣间谍、窃取情报和掠夺资源，也是沙俄在这一时期的侵略特点之一。

一七六四年，沙俄西伯利亚总督派遣间谍泽列诺夫和格涅泽尔等，潜入我国塔尔巴哈台、科布多界上的斋桑湖，并沿额尔齐斯河而上，深入该河七十俄里。同一时期派遣的另一名间谍科兹明潜入阿勒坦河（今比亚河）和叶尼塞河上游间的我国唐努乌梁海领土，刺探情报^③。一

^① 《清高宗实录》，卷八八八，页三二。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一六，同治二年五月壬戌；卷一八，七月丙午。

^③ 休基纳：《中亚地图是怎样画成的》，一九五五年莫斯科版，第二四—二五页。

七九三年，又有沙俄“植物学家”西伐尔斯、“采矿工程师”斯内格希罗夫等，侵入我国塔尔巴哈台山区进行“考察”，窃取有关资源的情报^①。这些特务、间谍盗窃了我国边疆地区大量的军事、地理、经济等情报，为沙俄侵略我国西部地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在掠夺资源方面，沙俄驻额尔齐斯河堡垒的哥萨克军队于一八〇三年逐渐沿河而上，侵入我国斋桑湖，掠夺我国渔业资源。最初，他们在我国科布多境内布克图尔玛河至纳林河（今纳雷姆河）口一段非法捕鱼。以后又继续沿河而上，到达我国卡伦霍尼迈拉虎、辉迈拉虎一带捕鱼。最后，就钻进斋桑湖地区进行掠夺。一八〇八年，沙俄正式建立了“军用渔场”，大肆掠夺我国斋桑湖一带的渔业资源。据统计，仅从一八〇三年到一八四五年这个时期，沙俄掠夺的渔业收入就达五十万零四千八百八十卢布^②。

沙俄对我国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侵略活动，不断受到清朝政府的反击。直到一八六四年沙俄逼签不平等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以前，清朝政府一直在这一地区行使有效的行政管辖，任免当地乌梁海各部总管，征收赋税；清朝的边疆大臣也基本上坚持了每年巡查边界

① 普里热瓦尔斯基著、摩尔根英译：《从伊宁翻过天山到罗卜淖尔》，一八七九年伦敦版，英译本附录，第一七一页。

② 巴布科夫：《一八五九——一八七五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一九一二年彼得堡版，第二〇〇页。

的会巡制度。这些历史事实，再一次证明了这些地区是我国领土，所谓“从来没有隶属过清帝国”，只不过是苏修捏造的无耻谎言。

为了替老沙皇侵略罪行辩护，今日苏修御用文人还胡说什么，早在一七五六年，额尔齐斯河上游的布赫塔马河、纳雷姆河入口处，以及阿勒坦淖尔等地都划入了俄国的版图^①。他们的唯一借口是，这个地方的乌梁海首领十二人曾于一七五六年“归顺”了俄国。这个借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事实的真相是，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年）我国境内汗山、哈屯河一带的乌梁海首领鄂木布及其子博罗特等十二人，惧罪由中国国界白河（今查雷什河上游）叛逃俄境，被沙俄收留。当时，清朝政府曾派兵“赴俄罗斯边境索取”^②。一七五七年五月，沙皇在给清朝政府的回文中，借口鄂木布及其子博罗特从前曾抢掠过俄国边境地方，因此将他们“由边界严押解送来此”^③。这些乌梁海头人完全是叛逃的丧家之犬，叛逃后根本不能再管辖他们原来管辖的地方了。当年老沙皇还不敢以此作为侵占我国领土的借口，而今日苏修竟然企图据此来证明这一带地方早已属于俄国，这只能说明苏修比老沙皇更无耻，只

① 古列维奇：《十八世纪下半叶清帝国入侵中亚和俄国的政策》，载苏联《苏联历史》杂志，一九七三年第二期。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五一五，页一〇。

③ 刘泽荣、王之相编译：《故宫俄文史料》，第二三号，第三〇九—三一〇页。

能暴露新沙皇的侵略扩张野心比老沙皇还大。

将侵略魔爪伸入我国巴尔喀什湖一带

在向我国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区入侵的同时，沙俄还逐渐吞并了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哈萨克草原，逼近和开始入侵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

十八世纪初，沙皇俄国的边界在里海北岸，同中国巴尔喀什湖相距尚远。当时，在里海东边的广阔的哈萨克草原上，分布着哈萨克人的三个“帐”（又称“玉兹”，即以氏族为基础所建立的封建游牧性质的部落联盟）：大帐、中帐和小帐（中国文献称右部、左部和西部）。十八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沙俄侵略者不断向东侵略扩张，修建军事堡垒，并联结成堡垒线，将哈萨克大块大块的土地圈入了俄国的版图。同时，又用武力威胁和欺骗拉拢的手段，收买哈萨克封建上层统治者“归附”俄国。在这种形势下，游牧于草原西部和北部的哈萨克小帐和中帐的一部分统治者被迫在名义上臣服于沙俄。

到十八世纪中叶，我国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反动贵族分子叛乱后，哈萨克大帐、中帐的一些部落自一七六七年起，经清朝政府的允许，陆续迁入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游牧。清朝政府派遣官员定期向这部分哈萨克人征税，“牛马百取一，羊千取一”^①。这些历史事实

^① 椿园：《西域闻见录》，第一卷，第一〇页。

雄辩地证明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从来是中国的领土，苏修所谓这些地区“实际上没有受中国管辖”，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沙俄加紧了对哈萨克草原的吞并。根据一八二二年由西西伯利亚总督斯佩兰斯基拟定、经沙皇政府批准执行的《关于西伯利亚吉尔吉斯条例》^①，沙俄正式侵吞了哈萨克小帐和中帐，划归西西伯利亚、奥伦堡总督管辖。接着，在临近我国西部边界地区，沙俄建立了一系列所谓的“外围州”，如一八二四年设置的科克切托夫和卡尔卡拉林斯克两州，一八二六年设置的巴彦乌尔外围州等。有的外围州已经逐渐逼近我国边界地区。这种吞并哈萨克草原，侵入我国西部边境的侵略行径，在上述《条例》中有明确的规定：“西伯利亚边界线在防卫的意义上不是永久的设施”，“这种防卫可以向前推进，最后，应该在实际的国界上永久固定下来”^②。老沙皇贪得无厌的侵略野心跃然纸上。就在这时候，沙俄侵略军的铁蹄踏上了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土地。

沙俄侵略军最早侵入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是在一八二五年。这年七月，沙俄派遣上校舒宾率领

① 这里的吉尔吉斯是指今哈萨克族。在十八、十九世纪时，欧洲人普遍把哈萨克人称为吉尔吉斯，把哈萨克草原称为吉尔吉斯草原，又把现名吉尔吉斯族（即柯尔克孜）称为吉科卡门吉尔吉斯（Дикокаменныйкиргиз）。

② 巴布科夫：《一八五九——一八七五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一五三页。

三百余名侵略军，侵入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库克乌苏河（今卡拉塔尔河）的哈喇塔拉一带，在我国哈萨克上层分子中大搞分裂颠覆活动，企图建造侵略据点，武装蚕食我国领土。他们拉拢、收买我国哈萨克上层分子，强征哈萨克人赋税，还私盖房屋，扬言“明岁筑城种地，为屯兵之所”。九月间，伊犁领队大臣乌凌阿依例巡查边界，征收哈萨克人马税，中途发现沙俄侵略者在哈喇塔拉所盖的土房，立即上报清廷。清朝政府为此向沙俄提出了强烈抗议，指出：“凡爱古斯（今阿亚古斯）、勒布什（今列普萨）、哈喇塔拉均立有鄂博”，是中国领土；斥责沙俄侵略者“越境远来，盖房侵占”，要求“萨纳特衙门（即沙俄枢密院）……速行拆毁”^①。由于我国对上述地区拥有明确的主权，沙俄枢密院理亏心虚，在回文中多方狡赖，说什么俄军建盖房屋“并未呈明国王”，只是“暂避风雨”，“凉不日亦必坍塌”等^②。在清朝政府的抗议之下，沙俄不得不于第二年将所盖房屋拆毁^③。

一八三一年至一八三二年间，沙皇政府两次召开“西伯利亚和亚洲问题委员会”会议，进一步策划向我国西部地区侵略扩张的方法和步骤。会议最后决定仍然采取“渐进行动”和“审慎行事”的原则，也就是说，要“一步一

① 《清季外交史料》，道光五年九月初十，十二月十五日。

② 《清季外交史料》，道光六年六月十三日。

③ 《清季外交史料》，道光六年八月十九日；巴布科夫：《一八五九——一八七五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一五四页。

步地逐渐占有据点，移入武装居民和建立防线，在防线上逐渐准备继续前进活动的物质材料”。沙皇政府企图用占领中国领土的既成事实，使清朝政府理会到：俄国占领的土地“都是属于俄国的”^①。沙俄所以采取这种隐蔽的蚕食政策，是因为害怕急进的侵略行动会引起我国哈萨克人民的强烈反抗。同时，它也企图以此来麻痹清朝政府，防止和减少清朝政府的抗议和武装反击。根据会议的决定，沙皇政府命令西西伯利亚总督继续在楚克里克河（今科克佩克特河）、爱古斯河的我国边界附近驻扎军队。

总之，在一八四〇年以前，沙俄企图侵占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领土的侵略活动，因我国清朝政府的抗议而未能得逞。以后，为了寻找时机实现侵占我国西部领土的野心，沙俄进一步在我国西部边界附近建立据点，驻扎军队，随时准备入侵我国领土。

非法建立侵略据点 侵占我国大片领土

“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成了帝国主义侵略和宰割的对象。而沙皇俄国逐渐变成了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成为侵略我国

^① 巴布科夫：《一八五九——一八七五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一五二——一五三页、一五八——一五九页。

极为猖狂、掠夺我国领土最多的帝国主义强盗。

一八四〇年以后，沙俄对我国西部地区侵略更加疯狂。它进一步采取“筑垒移民”的武装蚕食手段，公开侵入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设立侵略据点，武装移民，霸占中国领土。一八四六年至一八四七年，沙俄侵略军再次入侵到库克乌苏河的哈喇塔拉以北，建立了一个侵略据点——科帕尔。为了巩固和扩大在这一地区的侵略势力，沙俄还把原驻比斯克的一团哥萨克军全部调到谢尔基奥波利（今阿亚古斯）、科克佩克特和科帕尔等据点附近，强占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领土。

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立即遭到我国清朝政府的强烈抗议。一八四九年，清朝伊犁领队大臣依例巡查，走到哈喇塔拉附近的库库鄂罗木河（今卡拉塔尔河支流库克苏河）时，被沙俄侵略军无理阻拦。清朝政府得报后，立即通过理藩院向沙俄提出抗议，指出哈喇塔拉一带是中国领土，道光五年（一八二五年）俄军“于哈喇塔拉地方搭盖房屋”，经抗议后拆毁，今又“越界扎营”，阻拦我官兵正常巡查边界，必须立即“全数撤回”^①。一八五〇年十月，沙俄极其狡猾地作了“不确定的答复”，含糊地声称：当交西西伯利亚衙门，“令其查明回报”^②。一八五一年三月，沙俄枢密院竟然在答复中，歪曲事实真相，诡称一八四九年中国伊犁派官与俄官在库克苏河“会面”，请求索回该

①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理藩院给俄罗斯咨文。

② 道光三十年九月初四日俄罗斯萨那特（枢密院）衙门咨复。

处中国丢失的马匹和骆驼，现在俄国已如数查出，并派人送还伊犁。这显然是有意制造混乱，避免正面答复清朝政府的抗议。在咨复中，沙俄还无耻地把它刚侵占的我国领土说成是俄国的，把它非法建造的科帕尔堡垒，说成是该地哈萨克人“再三恳请”，故俄国“于廓帕勒（即科帕尔）地方设立营寨”^①。沙俄侵略者在这里，又采用了它扩张领土的惯用手法，打着“保护”哈萨克人的幌子，侵占我国西部大片领土。

还必须指出：沙俄的两次咨复是其枢密院、外交部精心策划的。据一八六四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俄方签字代表巴布科夫供认，他们使用这种“不确定的答复”，是“为了争取时间，并有机会准备应付各种意外事故”^②。做贼心虚的沙俄同时还密令西西伯利亚总督采取“必要的措施”，于一八五〇年在科帕尔及临近我国边界的各个据点充实了粮食储备，加强了军队。

当时，清朝政府“已经既不能够驾驭自己的人民，也不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特别是一八五一年我国国内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清朝政府忙于镇压国内革命人民，无力反抗外来侵略势力，给日益猖獗的沙俄以可乘之机。

一八五一年，新上任的沙俄西西伯利亚总督加斯弗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咸丰元年正月辛亥。

② 巴布科夫：《一八五九——一八七五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一五五页。

尔德派遣哥萨克军队，攻占了我国伊犁河南的托乌楚别克。接着在一八五四年，沙皇尼古拉一世批准了加斯弗尔德侵占我国伊犁河南的土地和建筑堡垒的建议。八月，由一个步兵营和三百名哥萨克组成的沙俄侵略军侵入我国伊犁河古尔班阿里玛图附近，开始建筑堡垒，次年建成，名维尔内(今阿拉木图)。这支侵略军在向西深入时，遭到当地我国布鲁特人民(今新疆柯尔克孜族)的愤怒反抗。他们包围了侵略军，迫使其缩回堡垒。到一八五五年至一八五六年，沙俄开始向维尔内附近移入两连哥萨克军队，建立大、小阿拉木图殖民村，进行武装垦殖。当这些武装殖民者到达维尔内附近时，世代居住在这里的我国布鲁特人民出于对侵占他们家乡的沙俄侵略者的仇恨，袭击了俄军的驻地，赶走马群，并杀死十二个哥萨克殖民者^①。

沙俄凭借非法建造的科帕尔、维尔内等侵略据点，武装移民垦殖；然后，再将这些据点连接起来，形成“堡垒线”，一块一块地蚕食侵占了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领土。这条新的堡垒线，北接谢米巴拉丁斯克的额尔齐斯堡垒线(又名西伯利亚堡垒线)，中经谢尔基奥波利、科帕尔，直至维尔内，名新西伯利亚堡垒线。以后，在这条新堡垒线的两侧，沙俄又继续移住武装哥萨克，不断在被侵占的我国领土上建立殖民村和哨所，最终切断

^① 谢苗诺夫：《天山游记》，一九四七年莫斯科版，第七八页。

了我国正常巡查边界的道路。一八五六年，沙俄竟然在它陆续侵占的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非法成立所谓“阿拉托夫区”，由西西伯利亚总督管辖，对当地我国居民实行血腥的殖民统治。

沙俄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今日却被苏修歪曲为什么“俄罗斯移民的经济开拓”和当地人民“自愿归并于俄国”。事实证明，他们所谓的“俄罗斯移民”，正是全副武装的哥萨克侵略军；所谓“经济开拓”，正是这些杀人不自眨眼的沙俄殖民强盗霸占土地、牧场，屠杀和掠夺我国当地人民的侵略罪行；而所谓“自愿归并于俄国”，正是他们借以掩盖老沙皇武力征服我国当地少数民族，血腥镇压他们反抗斗争的无耻谎言！

通过《中俄伊犁、塔通商章程》 攫取侵略权益

在武装蚕食领土的同时，沙俄还以“通商”的手段，扩大对我国西部地区的侵略。早在一八四七年，沙皇政府就曾数次向清朝政府提出在中国伊犁、塔城和喀什噶尔通商的要求。一八四九年清朝政府最后被迫同意沙俄在伊犁、塔城两处通商，拒绝了在喀什噶尔通商的要求。一八五一年八月，中俄双方在伊犁签定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根据这一章程，沙俄商人取得了在伊、塔两处免税贸易，及在指定地区有存货、居住、放牧、

埋葬、设置教堂等一系列特权。沙俄的工业产品(如棉毛织品、铁器、皮革等)源源不断输入我国西部。沙俄从中掠夺了巨额的经济利益，“独享内地陆路贸易”。(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

沙俄通过《章程》还取得了在我国西部重镇伊犁、塔城设置领事的特权。这两个俄国领事的驻地立即成了沙俄侵略我国西部的间谍活动中心。首任驻伊犁领事札哈罗夫就是因在这里大搞间谍活动，受到沙皇的赏识，以后被任为与中国签定不平等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俄方首席代表的。这个侵华急先锋在领事任内，偷偷地绘制了我国西部边防、卡伦的地图，窃取了大量重要情报^①。《章程》里还规定：“遇有两边商人之事，各自秉公办理”，“两边商人遇有争斗小事，即着两边贸易官员究办”等。这种规定因仅在中国领土上实行，所以实际上使沙俄取得了在我国西部的领事裁判特权。

不仅如此，沙俄代表科瓦列夫斯基等借口贸易安全问题，诱使昏庸的中国清朝代表奕山在《章程》中写明俄国商人在卡伦外遇劫，“中国概不经管”。这就使沙俄以“保商”为名，肆无忌惮地不断派兵侵占我国西部领土。所以，沙俄侵略分子巴布科夫曾得意地说：“从这个观点来看，《伊宁条约》(指一八五一年《章程》)不仅在商业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成为向中亚细亚

^① 谢苗诺夫：《天山游记》，第一八五页；巴布科夫：《一八五九——一八七五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二三〇——二三一页。

内部继续进攻的强有力的动机”^①。也就是说,《章程》的这一规定,给他们扩大侵占我国西部领土大开了方便之门。

“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沙俄对我国西部领土的侵占和经济掠夺,激起了我国西部各族人民的愤怒反抗。一八五五年爆发的塔城各族人民烧毁沙俄贸易圈的斗争,就是突出的例证。

这一斗争是沙俄侵占我国塔城地区图古勒池(今阿拉湖)南的雅尔噶图金矿,派遣军队驱逐、残害我国挖金人民所引起的。一八五五年八月二十日,塔城各族人民聚集了五、六百人,用苇子放火烧沙俄塔城贸易圈。是夜,风大火猛,一时将贸易圈延烧殆尽。沙俄领事和哥萨克卫队在塔城人民反抗声中,狼狈逃回俄国^②。沙俄乘机向清朝政府勒索巨额“赔款”,扬言要仿效英国“在广东索赔烟土”之例,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最后,清朝政府在沙俄的军事压力和战争恫吓之下,被迫同意以“赔补”为名,“赔款”三十万卢布,以武夷茶五千五百箱抵偿,分三年付清^③。

① 巴布科夫:《一八五九——一八七五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一三四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五年八月庚戌;咸丰六年三月甲子。

③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八年八月辛未。

塔城人民火烧沙俄贸易圈的正义斗争，是我国西部各族人民大规模反抗沙俄侵略斗争的先声，表现了我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的优良传统，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入侵我国特穆尔图淖尔、楚河上游， 甚至妄图侵吞喀什噶尔地区

一八五六年，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向西扩张暂时受挫，于是就加强了对中亚和我国的侵略。这时，沙俄利用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以更加疯狂的势头，对我国进行大规模的领土掠夺。在我国西部，它一面巩固和加强在已侵占的我国领土上的侵略据点，一面继续向南扩张侵略势力，侵入我国特穆尔图淖尔（即热海，今伊塞克湖）、楚河上游（中国文献称为“吹”地区）一带，甚至妄图吞并我国喀什噶尔地区。

一八五六年五月，沙俄西西伯利亚总督加斯弗尔德派遣以哈密托夫斯基上校为头目的哥萨克侵略军，从维尔内出发，侵入我国特穆尔图淖尔地区，血腥地残杀了当地我国布鲁特族人民四十余名^①，并且测绘地形，企图建造侵略据点。由于我国布鲁特族人民的反抗，这支侵略

^① 巴托尔德：《吉尔吉斯（历史概述）》，一九二七年伏龙芝版，第五〇——五二页。

军的阴谋未能得逞^①。

这时，臭名昭著的沙俄侵略分子谢苗诺夫也打着“科学考察”的幌子，潜入特穆尔图淖尔地区，沿湖对我国天山北坡约二百公里的地区进行了侦察。他极力收买和拉拢我国布鲁特族布库部上层分子，窃取了大量情报。一八五七年四月，他再次潜入该地，挑拨和分裂我国布库部和萨尔巴噶什部的关系。他还向东经过善塔斯塔坂，偷偷地绕过我国卡伦，深入天山中部，最后甚至潜入特克斯谷地，窥测伊犁通往喀什噶尔的最东边的通道——穆札尔特达坂。七月，谢苗诺夫回国后，大肆鼓吹侵占我国伊犁河南，包括特穆尔图淖尔、楚河上游等地的重要性，说什么：占领了这些地区就“可以建立起俄罗斯在中亚的势力和统治的最坚强的不可摧毁的堡垒”，“尤其可以将俄国国界往前推移。”^② 谢苗诺夫的一系列侵略主张，以后为沙皇政府所采纳。这个以“考察”我国天山起家的沙俄侵略分子，后来还无耻地把他的名字改为“谢苗诺夫一天山斯基”。

谢苗诺夫在我国天山一带大搞间谍活动的时候，发生了中亚的浩罕汗国策动和卓后裔倭里汗入侵我国喀什噶尔的事件。沙皇政府密切窥伺这一事件的发展，企图

^① 佐姆戈尔捷诺夫：《吉尔吉斯归并于俄罗斯》，一九五九年莫斯科版，第一五七——一六〇页。

^② 谢苗诺夫：《天山游记》，第一九四——一九五页；第三七〇——三七一页。

乘机插手，侵吞我国喀什噶尔地区。

沙皇政府决定：（1）派一名“训练有素”的军官潜入喀什噶尔地区刺探情报；（2）在临近喀什噶尔边界增派侵略军；（3）不拒绝入侵喀什噶尔的和卓后裔的求援等。陆军大臣苏哈札涅特将决定通知了加斯弗尔德，加斯弗尔德立即草拟了派遣俄军支持倭里汗匪帮的行动计划^①。但是，与侵略者的愿望相反，浩罕支持下的倭里汗匪帮，不到三个月就被我国军民击溃，狼狈逃出国境，沙俄侵吞我国喀什噶尔地区的计划破产了。可是，沙俄侵略者仍不死心，决定仍然要派一名“有经验的可靠的”军官去喀什噶尔刺探情报。最后选中了在西西伯利亚军队里充任骑兵中尉的哈萨克人卓湛·瓦里汉诺夫^②。

瓦里汉诺夫出发前，沙俄外交部给他的训令中特别指出：“此举的目的是政治性的，而非商业性的……”^③。一八五八年六月底，瓦里汉诺夫按侵略计划在科帕尔附近加入了一个专门组织的、从谢米巴拉丁斯克来的浩罕商队，经过我国的特穆尔图淖尔、纳伦河上游，向喀什噶尔进发。一路上，瓦里汉诺夫偷偷地记录了山川形势、民

① 哈尔芬：《俄国在中亚的政策》，一九六〇年莫斯科版，第一〇七页。

② 此人系原哈萨克中帐阿布賚汗的曾孙，毕业于沙俄鄂木斯克武备中学，一八五六年和一八五七年，他曾参加过哈米托夫斯基和谢苗诺夫的“考察团”，在中国西部地区进行间谍活动。

③ 《瓦里汉诺夫文集》，第一卷，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阿拉木图版，第六五页。

族分布等情报。他通过与各阶层人士及中亚各汗国商人的频繁接触，窃取了我国喀什、英吉莎尔、乌什、阿克苏、莎车及和阗等六城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大量情报。一八五九年四月，瓦里汉诺夫随商队返回维尔内。沙皇政府对瓦里汉诺夫所盗窃的情报十分赏识。这些情报成为沙皇政府制定和推行侵略政策的重要依据。

到一八五九年，沙俄还进一步将侵略触角伸进了我国巴尔喀什湖以南的楚河上游地区。当时，清朝政府在这一带的边防力量十分薄弱。在沙俄侵略势力伸进来之前，浩罕汗国曾不断向这一带入侵，并在楚河上游非法建筑了皮什别克（今伏龙芝）和托克马克等堡垒。沙俄认为这是侵占我国领土的有利条件，便打着“防御浩罕”的旗号，向我国楚河上游地区伸出魔爪。一八五九年夏，沙俄派维纽科夫率领一支侵略军，从维尔内出发，沿楚河而下，进行侦察和骚扰活动。这支侵略军穿越我国领土六百余俄里，测量地形，绘制托克马克、皮什别克等地平面图，并收集有关我国哈萨克、布鲁特族部落的大量情报^①。沙俄西西伯利亚总督根据这次侦察结果制定了进攻楚河上游的侵略计划，并在卡斯捷克山口建立前哨堡垒。完成这些准备工作之后，沙俄便于一八六〇年八月，派出齐麦尔曼上校率领的配有各式火炮的两千名侵略军，大举入侵楚河上游，攻占托克马克、皮什别克等地。但

^① 哈尔芬：《中亚归并于俄国》，第一一〇——一一六页。

是，沙俄当时并未能在楚河上游完全站住脚，侵略军在当地我国布鲁特人民的反抗下，后来不得不退回了维尔内。直到一八六四年，沙俄侵略军才完全占领了这一带。

综上所述，从十七世纪开始，沙皇俄国即对我国西部地区执行疯狂野蛮的侵略扩张政策。它沿额尔齐斯河而上，侵占了当时我国准噶尔部一部分辖地后，就继续在我国西部领土上采用建筑堡垒、武装移民和颠覆分裂我国西部边疆少数民族等侵略手段，逐步入侵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

沙俄侵占了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大片领土后，就寻求有利时机把它得到的东西“合法化”，用武装侵占领土的既成事实，逼签不平等条约。

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沙俄利用英、法侵略军的军事压力，强迫我国清朝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规定了中俄西部边界的大致走向，把它已经侵占的和还没有侵占的大片中国领土划到了自己的一边。随后，在一八六四年，沙俄又歪曲《北京条约》的有关条款，逼签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我国西部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今天苏修叛徒集团继承老沙皇的衣钵，为争夺世界霸权，疯狂地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不惜颠倒黑白，伪造历史，胡说这些地区“实际上没有受到中国管辖”，“从来没有隶属过清帝国”。试问：老沙皇一批批侵略武装，一个

个侵略据点，不是曾经在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和清朝政府抗议交涉下撤走、拆毁的吗？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人民，就连谢苗诺夫、巴布科夫之流的著作中也不得不承认是中国的少数民族。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早已作了科学的结论。铁的事实，是任何人也篡改不了的。苏修的谎言和诡辩，只能在自己的叛徒嘴脸上增添几条丑恶的油彩而已！

老沙皇侵略我国西藏的罪行 是掩盖不住的

李绍明

近几年来，在苏联出版的一些书籍和刊物中，就我国西藏的历史问题大做文章。他们背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中俄关系史的英明论断，为老沙皇侵略我国西藏的罪行辩护。一九七二年苏联外交部负责官员齐赫文斯基抛出了由他主编的《中国近代史》^①。在这本大毒草中，他们一再别有用心地将西藏和中国相提并论，把藏族说成是“非中国民族”，把西藏统一于清朝中央政府统治下，说成是中国的“对外征服”和“扩张”，学着老沙皇的腔调，妄图否认长期以来西藏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一部分这一铁的事实，替老沙皇侵略活动进行辩护。一九七三年苏联又抛出一本传记《勒利赫》^②。书中给勒利赫这个先为老沙皇服务，后为国际帝国主义效劳的间谍和侵略分子大肆涂脂抹粉，给他戴上“艺术家”、

①〔苏〕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一九七二年苏联科学出版社版。

②〔苏〕别利科夫、克尼亚捷娃：《勒利赫》，一九七三年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版。

“历史学家”、“人道主义者”、“学者”一大串桂冠，把他替老沙皇和国际帝国主义从事分裂、侵略我国西藏的罪恶活动，说成是什么“向往东方”，“研究古代文化和宗教”，“科学考察”。书中同样别有用心地将西藏和中国相提并论。一九七四年四月，苏修两个刊物《自然》和《星火》也打起“科学”的招牌，大肆美化、吹捧普尔热瓦爾斯基这个老沙皇的间谍军官。《自然》杂志将此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率“探险队”多次窜入我国西部西藏、新疆、青海等地收集的情报，以及给沙俄总参谋部的一些呈文、书信、电报汇总并加上按语，原文发表^①。《星火》杂志则让一个“历史学家”来就这堆“资料”大做文章^②。这两家刊物把这个帝国主义分子捧上了天，吹嘘他“功勋巨大”，有“许多重大发现”，是什么“西藏的哥伦布”、“亚洲中部第一个考察者”、“卓越的探险家”，等等。苏修叛徒集团关于我国西藏的这些言论，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密切注视。让我们剥开他们的层层伪装，拆穿他们的种种谎言，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一、老沙皇的魔爪伸进我国西藏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由汉族、藏族、蒙

① [俄]普尔热瓦爾斯基：《旅途通讯》，载苏联《自然》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四期。

② [苏]依沃尔金：《为了祖国的荣誉》，载苏联《星火》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一五期。

古族、维吾尔族、壮族、回族、满族等五十多个兄弟民族，经过长期努力，而共同缔造的。西藏成为伟大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藏族人民与祖国各族人民，长期友好往来，团结互助，形成了共同命运的历史必然结果。西藏藏族人民很早以来就和祖国各族人民有了密切的交往。到七世纪，约当唐朝的初期，藏族在西藏一带建立了吐蕃地方政权，并积极向唐朝中央政府寻求政治上的支持。这时汉藏两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有了很大的加强。吐蕃赞普(国王)接受唐朝中央政府的封号，唐朝让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先后与吐蕃赞普结亲。汉藏两族结成了“合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的亲密关系^①。到了十三世纪的元朝，一二三九年蒙古军队已深入西藏，迄一二四四——一二四七年，萨班·贡噶坚赞作为西藏僧俗的代表，至凉州归附蒙古太宗窝阔台的皇太子阔端汗。这是西藏地方政权重新确定与元朝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从此西藏地方就进一步纳入我国的统一建制之中。西藏成为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个历史事实，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

沙皇俄国本来是一个欧洲国家，同我国并不接壤。十六世纪，野心勃勃的沙俄侵略势力开始向东扩张。到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沙俄把侵略魔爪逐渐伸向我国领土黑龙江流域、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正当这时，我国南

^① 见《吐蕃赞普赤德祖赞上唐玄宗书》，载《唐蕃书翰集释》(未刊稿)。事见《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赤德祖赞旧译作弃隶黯赞。

方发生了吴三桂等人分裂割据的大规模叛乱。清朝康熙皇帝不得不首先集中力量解决南方问题。一六八一年（康熙二十年）吴三桂等发动的叛乱已完全平定。次年，清朝政府就两次发动雅克萨反击战，收复了被沙俄侵占的部分领土，终于在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经过双方平等协商，由清朝作了让步，同沙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两国东段边界。

但是，沙俄的侵略野心并没有因《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而有所收敛。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俄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它的方法、它的策略、它的手段可能改变，但是这一政策的主旨——世界霸权是不会改变的。”（《一八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沙俄把对我国侵略活动的重点更集中到我国西部北部的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在侵略活动的方式上，则更多地采取同我国少数民族中的一些分裂割据势力相勾结，以收买拉拢或策划叛乱等阴谋手段，来破坏我国的统一和各族人民的团结。我国西北地区的准噶尔部中的少数反动贵族发动叛乱，并与沙俄侵略势力相勾结，骚扰新疆、蒙古、青海、西藏等地，就是沙俄的侵略罪证之一。

准噶尔，是我国蒙古族厄鲁特四部之一，原居我国新疆北部的巴尔喀什湖以东、天山以北一带，同我国中央政府是地方与中央的隶属关系。沙俄势力渗入新疆后，就竭力挑拨该部与中央的关系。一六六八年（康熙七年），沙俄直接向准噶尔部供应武器。一六七七年（康熙十六年）

噶尔丹自立为汗，接着就与西藏的另一分裂割据势力的代表第巴（藏王）桑结嘉错勾结，发动武装叛乱，先后攻占新疆南部和青海，实行分裂割据。当沙俄与清朝的军队在黑龙江流域对峙时，噶尔丹与沙俄相呼应，率部侵入外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尼布楚条约》签订第二年，他率兵自呼伦池南下，扬言要与沙俄军队夹攻北京，而被康熙击破。噶尔丹与桑结嘉错的分裂卖国活动，遭到包括蒙古族、藏族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一致反对，连多数蒙古族、藏族的上层统治者也不予支持，因而终于失败。一六九七年（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再次亲征噶尔丹。噶尔丹众叛亲离，走投无路，被迫自杀。一七〇五年（康熙四十四年），桑结嘉错也因起兵反对驻在西藏并拥护清朝中央政府的蒙古族和硕特部首领拉藏汗而被处死。这个勾结沙俄走卒噶尔丹妄图割据的反动贵族终于落得个可耻的下场^①。

噶尔丹自杀后，其侄策妄阿喇布坦在伊犁收集旧部，自立为汗，再次发动叛乱，并继续与沙俄侵略势力相勾结。一七一五年（康熙五十四年），策妄阿喇布坦侵扰哈密。一七一六年（康熙五十五年），策妄阿喇布坦与西藏分裂势力的头子达克咱相勾结，派大将台吉策零敦多布纠众侵犯西藏，次年攻陷拉萨，杀死维护祖国统一的拉藏汗，废六世达赖意希嘉错，自行委任第巴，进行直接统治。

^① 参见王先谦：《东华录》康熙朝、雍正朝的有关记载；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卷五，《国朝抚绥西藏记上、下》。

康熙乃于一七一八——一七二〇年（康熙五十七——五十九年）两次派兵入藏，平定叛乱。后一次是以皇子允禔为抚远大将军，出兵青海，坐镇指挥。康熙的军队在藏、汉各族人民支援下，击溃了准噶尔叛乱部队，维护了祖国的统一，打击了沙俄妄图通过准噶尔叛乱集团染指我国西藏的野心。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和一七五〇年（乾隆十五年），西藏先后发生由噶伦阿尔布巴和第巴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制造的叛乱。他们妄图再度借助于与沙俄相勾结的准噶尔反动贵族的势力，对西藏实行分裂割据。但这种破坏祖国统一的叛乱，由于同样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都在很短的时期内被平息了。此后，清朝在西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设立驻藏办事大臣，增添驻军与哨所，废除当地的郡王、贝子掌政，而代之以噶厦制度，使清朝在西藏的统治得以巩固和加强，有利于阻止沙俄等外国势力在西藏的侵略活动^①。

十九世纪下半叶，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逐渐向帝国主义过渡。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沙皇政府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迅速膨胀，侵吞中国的步伐也大大加快。沙俄对中国的“探险热”应运而生，一些披着“科学家”、“学者”、“探险家”外衣的沙俄间谍，纷纷窜入我国西藏和西北地区。列宁指出：沙俄“在东亚也一贯按预先考虑好的计划……在实行扩张，目的在于直接占领一直到

^① 参见王先谦：《东华录》康熙朝、雍正朝的有关记载；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卷五，《国朝抚绥西藏记上、下》。

长城脚下的大片领土，并获得在东亚的霸权。”（《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又说：沙皇政府是想“在亚洲打败英国（夺取整个波斯、蒙古和西藏等等）。”（《论单独讲和》）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和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沙俄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璦琿条约》和《北京条约》，割占我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和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沙俄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伊犁条约》，攫夺我西部五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与这种侵略活动相配合，沙俄的间谍分子都事先窜到了这些地区进行侦察活动。同一时期，沙俄间谍分子也纷纷钻入我国西藏，搜集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沙俄总参谋部间谍军官普尔热瓦斯基上校纠集所谓“探险队”，从一八七〇年（同治九年）开始的十多年，在我国西北地区搜集情报，进行侵略活动。他们曾两次潜入我国西藏藏北草原那曲一带。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底、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初，第一次闯入西藏，到达距拉萨八百公里的地方；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又深入到距拉萨不远的地方，因遭到藏族人民的反对，才被迫离去，转往青海。普尔热瓦斯基在我国青藏高原的侵略活动中，竟擅自将黄河上源的札陵湖改名“俄罗斯湖”，把鄂陵湖改名“探险队湖”。一八八八——一八九〇年（光绪十四——十六年），沙俄政府又派遣间谍彼乌佐夫、波格丹诺维奇、罗蒙洛索夫斯基，以及曾参加过普尔热瓦斯基“探险队”的间谍科兹洛夫上尉等人，

从北疆窜入南疆和田及西藏北部非法进行测量，绘成五千英里地方的地图，企图寻找一条由俄国通往西藏的捷径。一八九二年（光绪十八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批准从国库中拨出三万卢布，组织两个“探险队”深入青藏高原窥探。一八九五年三月（光绪二十一年二月），这批侵略者闯入黄河河源一带，受到当地藏族人民的坚决反抗，入侵者竟开枪打死我藏族同胞多人。当这些侵略者返回俄国时，新上台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还特地予以接见并颁发奖章。此后，科兹洛夫又于一八九九——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五——二十七年），两次潜入青藏高原，直到昌都北境及今四川德格一带进行侵略活动。^①

沙俄这些间谍，除了搜集情报之外，还在藏族上层人士中进行分裂破坏活动。清朝四川总督鹿传霖向清政府报告说：“事在印藏构兵之时，俄人乘间借游历为名，取道后藏而来，甘言厚币，以诱藏番。又因语言文字不能相通，特予密函三件，约令遇有急难，将函驰往俄境，即可电达，助兵援应，藏番欣然信从，结好而去，秘之未敢宣

^① 上述沙俄间谍的侵略活动，参见科兹洛夫上尉：《俄罗斯西藏考察队（一八九九——一九〇一年）》，载《地理学杂志》，第一九卷，第五七九页（一九〇二年五月，英文版）。该刊第九卷，第五四七页（一八九七年五月），载有介绍彼乌佐夫一八八九——一八九〇年在南疆与藏北高原一带“考察”的文章。该刊第三一卷（一九〇八年四、五、六月），第三四卷（一九〇九年十月），载有科兹洛夫的“考察”报告。另参见罗蒙洛索夫斯基：《关于一八九三——一八九五年中亚探险的初步总结》，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通讯》第三四卷，第一期。

露”^①。当时清朝驻藏大臣也说，这些沙俄间谍在藏族上层人士中秘密煽动，说什么“我等此来非不利于西藏，实为尔等保护疆土而来。缘我国与英世仇，我们久思攻取印度，未得其便。今印度无故欺负尔国，我等闻之甚为不平，是以不辞万里远来，实欲替唐古特出力复仇”^②。可见这些“游历家”、“探险家”干的什么勾当！他们不仅用金钱货币、甜言蜜语去收买叛徒内奸，而且还妄图以武力作为后盾，直接用军事行动占据我国领土西藏，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沙俄用制造民族分裂的手段，以达到占领其地而奴役其民的野心，这时已登峰造极。一八九三年二月，沙俄财政大臣、侵华阴谋家维特向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呈交了一份《巴德玛耶夫计划》。该计划建议由沙俄外交官巴德玛耶夫招募俄籍外贝加尔地区的布里亚特蒙古人数千名，扮做商人、旅客，窜入中国边疆各民族地区，收买民族败类，以兰州为中心，指挥各地发动武装叛乱，然后由这些叛国分子出面请求沙皇“收容他们作为俄国臣民”。这样中国广大边疆地区就将“和平地并入俄国版图”。沙皇对此欣喜若狂说，计划一旦实现“则俄国于太平洋岸上及喜马拉雅山上，不仅能控制亚洲的政事，并且能控制欧洲

① 鹿传霖：《瞻对全境收复，番官应请撤回，达赖难遽生衅外向，及英俄窥藏情形》奏疏（光绪二十二年），载《鹿传霖奏牍》，卷三，第一页。

② 驻藏大臣升泰奏《清预防俄人勾结藏民私相馈赠折》（光绪十七年），载《清季外交史料》，卷八三，第三〇页。按蒙古语称西藏为唐古特，意为居屋的部落，清朝时亦沿用此词称西藏。

的政事。”梦想当世界霸主的沙皇，立即拨款二百万卢布，成立“巴德玛耶夫商务公司”，以实施这个分裂中国领土的阴谋^①。

二、沙俄大间谍德尔智的阴谋活动

沙俄大间谍德尔智(多尔济耶夫)在西藏进行的罪恶活动，就是上述阴谋的最好说明。德尔智本是外贝加尔地区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布里亚特蒙古人信奉喇嘛教，沙俄就在他们中间物色走狗，训练成间谍派去西藏。当时在西藏三大寺学经的布里亚特蒙古人经常有二百余人，其中就有沙俄的间谍。德尔智在俄国接受了沙皇颁发的勋章，携带大量活动经费和沙俄交给他的间谍任务来到西藏。他在拉萨改名罗桑古巴，潜伏了一段时期，学习藏语和喇嘛教经典，并使用种种手段，获得十三世达赖的参宁堪布(侍讲经师)的地位，钻进了西藏统治阶级的上层。此后他便利用这个合法地位从事破坏中国的统一和各民族团结的勾当，并来往于俄中两国之间。据当时知情人士说：“彼(德尔智)既被选为达赖之侍讲也，彼乃以得意之才略，论世界之大势，谓清政府不足依赖，谓英国北侵，藏事危迫，喇嘛教之运命，势不至被外教蹂躏殆

^①〔苏〕谢曼尼柯夫：《在沙皇制度背后》，一九二五年列宁格勒俄文版。转引自〔苏〕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一九三七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四八——四九页。

尽不止，因就地图指示俄国幅员，剖切说明，谓其国力之膨胀，版图之扩张，大有兼欧并亚之势，默察将来，定可认为世界之统一者，确足倚为喇嘛教之保护者。复援黄教派经书中引证未来纪，谓其中所谓佛法大王者孰欤？即俄国皇帝是也。促达赖暗为注意，谋脱清国之束缚，依俄国之援助，以防英人之北侵，谋自国之独立。原来锐敏如达赖，为彼说所浸渍，其志意似怦怦欲动”^①。可见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沙俄大间谍的手段多么阴险诡秘，他利用宗教附会去作间谍游说又是多么狡诈。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各国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沙俄也加紧了对西藏的侵略活动。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沙俄再派德尔智到拉萨，带来许多“礼物”贿赂西藏官员，煽动达赖投靠沙皇。第二年，德尔智又来西藏，带来沙皇邀请达赖派“使节”访问俄国的函件，还带来沙皇送给达赖的一套教主袈裟。达赖在沙俄的利诱煽动下，终于在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派遣”德尔智及达赖本人的大仲译（主任秘书）为其“代表”前往俄国活动。一九〇〇年十月十五日，俄京《圣彼得堡日报》的政府公布栏特别将沙皇接见“西藏外宾”一事予

^① [日]山县初男：《西藏通览》，第四章，《西藏与露国》，一九〇九年四川西藏研究会中译本。又鹿传霖在光绪二十二年《密陈西藏情形可虑》奏疏中指出：“自英人窥伺藏地，早存吞并蚕食之心，势已岌岌可危，而藏番素嫉英人，……而俄人从而生心，暗勾藏番，许以有事救护，藏番遂恃俄为外援。”载《鹿传霖奏牍》，卷一，第五页。

以公布。奇怪的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在雅尔塔接见的这个“外宾”不是别人，正是具有俄国国籍的沙俄大间谍德尔智本人。德尔智带去达赖致沙皇的亲笔信，信中称沙皇为“护法皇帝”，声言要与沙俄“亲善”。次年，德尔智又以达赖“代表”的身份再度返俄，沙皇于七月六日又在彼得堡“接见”了他。这次讨论了西藏在彼得堡设立永久“使馆”的问题。接着，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和财政大臣维特又分别与德尔智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七月二十五日在敖德萨还举行了一个所谓“欢迎西藏达赖特派使节”的大会^①。当德尔智等回西藏时，沙俄派参谋部军官专程护送，并用骆驼随同运去一批枪枝、弹药、货物。接着，沙俄两支队伍窜到拉萨。一支队伍由军官亚历山大·尼古拉维奇·奥罗夫率领，声称是一个“科学探险队”，由两百匹骆驼运着枪弹，经库伦到拉萨；另一支队伍由受参谋部间谍训练的外交官员、布里亚特蒙古人赖穆皮尔率领，由五十匹马和两百头牦牛载着枪械、弹药，以“商队”名义，经青海到拉萨^②。还要指出，当德尔智进行这些阴谋活动时，还有其他沙俄间谍与之配合。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年沙俄另一个打着“游历”幌子的间谍布

① 此段参见〔英〕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原名《印度和西藏》），第六章，《条约权利之保障》，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② 〔英〕麦哈拉：《西藏与俄国的阴谋》，载英国《皇家中亚细亚学会会刊》第四五卷，第一期，一九五八年英文版。又朱绣在《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中说：“是年（一九〇〇年），又因藏人惑于俄之甘言，亦思离英而亲俄，俄商及军队潜纵入藏者络绎于途。”

里亚特蒙古人崔比科夫即在西藏活动^①。同年，当德尔智返抵俄京时，就得到另一个挂着“美术家”头衔的沙俄间谍勒利赫“在自己可能的范围内的协助”，使德尔智得以顺利“完成使命”^②。德尔智的下属，沙俄间谍布里亚特蒙古人策仁贝和蒙古人哈木亚布尔，一直在德尔智的直接指挥下，在西藏各地干着偷偷测绘地图等阴谋勾当。后者直到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才在左贡被清朝驻军发觉逮捕^③。当时，沙俄大间谍德尔智的活动颇引人注目，难怪另一个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慨叹说：“（达赖）迳与圣彼得堡联系，公然于布达拉接待俄人多尔济耶夫。当时西藏政权实操达赖、多尔济耶夫及夏札大臣三人手中。三人均主张由俄保护。”^④。

沙俄加紧向西藏侵略扩张，使英、俄争夺西藏的矛盾日益激化。英国得悉达赖派“特使”赴俄，乃于一九〇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以英印事务大臣的名义向沙俄外交部发出照会，声称英国对他们的接触“势不能沉默不问”^⑤。又

① 《地理学杂志》，第二三卷，第九二页，（一九〇四年一月），介绍崔比科夫拉萨之行的文章。

② 别利科夫、克尼亚捷娃：《勒利赫》。

③ 策仁贝的活动，见〔英〕马克格里高尔：《西藏考察编年史》，一九〇七年英文版。哈木亚布尔的活动，见刘赞廷：《三十年游藏记》（未刊稿），卷一五，稿本藏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资料室。

④ 〔法〕古尔（古纯仁）：《旅居藏边三十年》，译文载《康导月刊》，第六卷，第一期，一九四四年七月。

⑤ 〔英〕柏尔：《西藏之过去与现在》，第七章，《英军远征》，一九三〇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于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派兵侵入西藏南部的干坝宗(县),作为对沙俄势力的抗衡。沙俄立即向英国提出抗议,声称:“俄国政府认为英国此次远征,或将发生异常严重的局势,因而迫令俄国当局采取一切手段,以保护该处俄人之利益”^①。试问在中国领土西藏境内究竟有什么“俄人之利益”?沙俄在这里不打自招地供认出他们的侵略野心。无论是沙俄也好,英国也好,简直都把西藏当作自己的保护国和势力范围了。这在沙俄当时的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日记中说得更为露骨。他在一九〇三年二月十六日的日记中供认:“我们皇上的脑袋中有宏大的计划:为俄国夺取满洲,把朝鲜并入俄国,还想把西藏并入本国”^②。沙俄妄想并吞我国西藏的野心,已猖狂到了极点!

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英国利用清朝政府的昏庸软弱,以及沙俄因为日俄战争无力西顾的机会,向我国西藏大举武装入侵。侵略军沿途遭到藏族人民的坚决抵抗,受到沉重打击,但终于因清朝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腐朽动摇,致使侵略军在该年九月暂时占领了拉萨。当英国侵略军进入拉萨前三个月,达赖即弃城出逃,十月抵达外蒙古首府库伦。而达赖出走时即有沙俄大间谍德尔

① 英国《蓝皮书》(第二三七〇号),译文载华企荣:《西藏问题》,第三编,《西藏之外交》,一九三五年。

② 《库罗巴特金日记》,载苏俄《红档》杂志,一九二二年,第二卷,第三一页。

智与之随行，德尔智还率领在拉萨的布里亚特蒙古人七十名作为达赖的“护卫”，以便进行挟持。达赖此行的目的，原是在德尔智等怂恿裹胁下经库伦去俄国投靠老沙皇。只是由于他一到库伦即受到清朝驻外蒙古办事大臣的注意，接着清政府又从北京派来钦差加以监视，再加上当时达赖已得知俄军在日俄战争中败北的消息，不能不有所顾虑，因而沙俄的这一阴谋未能得逞。但是，沙俄却并未因此罢休，又通过德尔智等向达赖游说。达赖乃于次年（一九〇五年）春第三次“派遣”德尔智为其“代表”，前往彼得堡，“请求”沙皇尼古拉二世“保护”其重返拉萨。沙皇当即接见了德尔智，并致电达赖表示慰问，还说什么“达赖喇嘛倘或遭逢不幸，则俄政府的地位将异常困难”，继续对达赖进行拉拢煽动^①。

当时达赖在库伦等地已被沙俄的间谍和外交官所包围，除德尔智外，一九〇五年夏，沙俄驻北京公使波可吉罗夫也奉沙皇之命，特来库伦看视达赖，并代表沙皇赠给达赖许多“礼物”。同年秋，清朝政府命令达赖返藏。次年四月，达赖由库伦动身，而沙俄政府竟正式要求派遣沙俄的“佛教徒”护送。这一干涉中国内政的要求当即被清政府所拒绝^②。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初，达赖到

^① 此段参见〔日〕山县初男：《西藏通览》，第四章，以及〔英〕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第二三章，《一九〇四年后之藏人态度》等。

^② 光绪三十二年外部致胡维德：《俄派佛教人护送达赖断难允许电》，载《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六，第二一页。

达山西五台山，八月又转至北京。沙皇尼古拉二世为进一步拉拢达赖，特地派人到五台山“看望”，送给达赖以亲笔信和许多“礼物”。达赖到京后，波可吉罗夫又加紧对其煽动蛊惑。同年十二月，达赖抵青海塔尔寺，沙俄又派以前曾窜入西藏活动的间谍科兹洛夫来此与达赖频繁接触，使得达赖欣然同意“俄国将与西藏保持更好的友谊关系”^①。与此同时，沙皇尼古拉二世又在俄国再次接见“达赖专使宁万及其随员”^②，对达赖作进一步的笼络。

三、俄英侵藏的争夺与勾结

从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沙俄与英国为了掠夺我国领土，从新疆到青海、西藏展开了激烈争夺。二十世纪初，俄、英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加紧勾结，要在我国西藏划分势力范围。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英、俄在彼得堡秘密会谈，商讨他们在波斯、阿富汗和我国西藏所谓“利益”的问题。这次会议议题即是从西藏问题开始的。会谈结果，于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在彼得堡签订《英俄同盟条约》^③。条约规定了两国在伊朗、阿富汗

① 科兹洛夫：《蒙古和安多（西宁一带）及黑城废墟》，一九二三年莫斯科—彼得格勒俄文版，第五〇五——五〇六页。

② 宣统元年驻藏大臣联豫、温宗尧致外部：《闻俄皇接见达赖专使电》，载《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三，第二一三页。

③ 《英俄同盟条约》中关于西藏协议的译文，参见〔英〕柏尔：《西藏之过去与现在》，附录九，《一九〇七年英俄协定》。

和中国西藏的殖民利益，反映了它们之间既争夺又勾结的关系。正如列宁所指出：“一九〇七：俄英条约（八月三十一日）：瓜分波斯、阿富汗、西藏（准备同德国作战）。”（《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英、俄关于西藏的协议在条约中特加一章予以说明。协议竟自将我国在西藏地方的完全主权，偷换为所谓的“宗主权”，这是国际文件里关系到我国内部事务第一次使用“宗主权”一词。此外，协议除了表面上承认中国对西藏的所谓“宗主权”，声明不干涉中国的内政以外，又非法规定了“英俄两国臣民之奉佛教者，如有纯属宗教上之事务，可与达赖喇嘛及西藏其他佛教代表发生直接关系”，承认“英国之监督商务官员”可在西藏一些地方设立机构，以及西藏对英国的战争“赔款”等等。这无异给英、俄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开了大门，划分出他们的殖民利益，并为德尔智之流的所谓“佛教徒”取得了“合法”活动的权利。这是中国人民坚决不能答应的。

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清朝政府为了抵御英、俄帝国主义势力在西藏的扩张，派遣了一支由川军组成的部队进驻西藏以巩固边防。达赖在英、俄帝国主义的唆使下，下令在昌都以西一带阻止清军入藏。清军击溃阻挠的藏军后，于次年二月进抵拉萨。达赖在德尔智等人裹胁下又离开拉萨，但这次是向南逃往英属印度。此时，达赖一面找英国出面干预，一面又寄希望于沙俄。沙俄也通过其大间谍德尔智“在俄都遍登西报，迭为达赖辩护，甚

至谓中国经营西藏，破坏旧例”^①，大肆制造反动舆论，干涉我国内政。沙俄又怂恿达赖致函沙皇政府，请求“帮助”。沙俄驻华公使便联合英国驻华公使向清朝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清朝政府取消准备废除达赖封号的处分。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再次写信给逃亡印度的达赖，公然声称“朕的政府极其关切地注视着西藏问题的发展”^②，煽动达赖继续进行叛国活动。沙俄侵略者还进一步鼓吹俄、英两国联合侵藏。但由于英国不愿沙俄插手西藏，对联合行动表示冷漠，又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大战已迫在眉睫，沙俄的阴谋没有得逞。用当时沙俄外交大臣涅拉托夫的话来说，就是：“最近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正吸引两国（按：指英、俄）政府最密切的注意，一时尚难造成谈判西藏问题的基础”^③。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并结束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帝制。俄、英帝国主义趁我国政权转变之际，加紧了对我国西藏的侵略活动。他们怂恿西藏的分裂势力，妄图以“独立”为名，把西藏从祖国分离出去，从而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沙俄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写信给总理大臣科科乌采夫，说达赖请求俄、英两国政府正式承认“西藏独立”和予以“保护”。又说达赖还请求给“西藏的不可侵犯性和中立地位作出

① 宣统二年四月军机处庆亲王、世续、鹿传霖、那桐、吴郁生：《复川督赵尔巽函》，载刘赞廷：《三十年游藏记》（未刊稿），卷一〇。

②③ 《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第二集，第一九卷，第一部，一九三八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俄文版。

新的保证”，以便“按其他方式调整不再符合于一九〇七年条约精神的既成局势”。这就是说，要重新审定英、俄条约，承认“西藏独立自主”^①。俄、英两国趁此时机，就所谓“修订一九〇七年条约”的问题进行了接触。但由于俄、英策划西藏分裂的阴谋遭到我国各族人民包括藏族人民以及爱国上层人士在内的坚决反对，也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加深，因而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没有敢公开承认西藏的“独立”。

英、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虽然不敢公开导演西藏“独立”的丑剧，但是，都在背后施展手段，阴谋从这里捞到更多的油水。一九一三年十月，英国胁迫当时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开始在印度西姆拉举行会议，妄图获得更多的殖民利益。英国还背着中国政府，向当时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提出所谓“麦克马洪线”的领土要求。一九一四年六月，英、俄还举行了密商，英国取得沙俄的同意，“有权”攫取在西藏的租让权和商务委员在拉萨的活动权。英、俄既取得协议，便强迫当时中国当局在条约上签字^②。由于我国各族人民的反对，迫使袁世凯的代表不敢在正式条约上签字，会议破裂，英、俄帝国主

① 原信见列宁格勒《国立中央历史档案库档案》，转引自〔苏〕列昂节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一八八八——一九一九）》，第三章，《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帝国主义在西藏的扩张》，第二节，一九六〇年民族出版社中译本。

② 此段参见〔苏〕列昂节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一八八八——一九一九年）》，第三章，第三节。

义的阴谋又未得逞。正当西姆拉会议进行期间，沙俄深恐他们的殖民利益落在英国之后，就一面指使当时受沙俄控制的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大活佛的“自治政府”出面拉拢达赖，一面又令其大间谍德尔智加紧在西藏上层分子中进行分裂活动。这样，达赖于一九一四年一月委派德尔智为他的“代表”去库伦与外蒙古会谈，并秘密签订了非法的《蒙藏条约》。这个条约说什么“蒙古与西藏均已脱离满清之羁绊与中国分立，自成两国”，又说什么“西藏达赖喇嘛承认蒙古之自治权；蒙古政府承认西藏之自治与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之独立；两国政府于内忧外患危险之际永久互相援助；物产家畜两方自由贸易并互设新商业机关”，等等^①。当时的外蒙古实际已成为沙俄的附庸。正如列宁所指出：“俄国同‘独立的’蒙古订立‘条约’。（掠夺蒙古。）”（《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非法的《蒙藏条约》实质上是沙俄侵略势力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向西藏的进一步渗透。由于这个条约遭到我国各族人民的反对，也受到英国的嫉妒，使得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也不敢公开承认，只含糊其词地表示：“达赖遣德尔智（赴蒙古）之书，系属普通信札，仅请其努力为佛教谋利益而已”^②。

以上这些铁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老沙皇直到被推翻以前，始终没有放弃对我国西藏的侵略活动。

^{①②} 见〔英〕柏尔：《西藏之过去与现在》，第二三章，《蒙古》，附录十三，《相传之一九一三年蒙藏协约》。按条约所署之年月，应订正为一九一四年一月。

四、如此“科学考察”

苏修叛徒集团近来竭力把老沙皇侵略中国的大间谍尼·米·普尔热瓦斯基和尼·康·勒利赫打扮成什么“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这两个究竟是什么人？他们从事的究竟是“科学考察”，还是间谍活动？

老沙皇的走卒普尔热瓦斯基出身沙俄贵族，一八五五年中学毕业后即投身沙俄军队，一八六一年被选进总参谋部学院，他搞了个《黑龙江边区军事统计评论》，深得沙俄军方的赏识，此后即成为沙俄的间谍军官。从一八六七年到一八八五年，他秉承老沙皇的侵略旨意，五次以“探险队”为名窜入我国领土，大搞所谓“科学考察”的间谍活动，成为入侵我国的急先锋。他最早是在一八六七——一八六九年窜到乌苏里江地区活动。此后又进行四次所谓“亚洲中部探险”，第一次在一八七〇——一八七三年，第二次在一八七六——一八七七年，第三次在一八七九——一八八〇年，第四次在一八八四——一八八五年。他首先侵入外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然后钻到我国内蒙古地区，接着又侵入我国甘肃、新疆、青海、西藏等地。一八八八年，他又组织了所谓“第三次西藏探险”，临行前病死于喀拉科尔。

普尔热瓦斯基用了十几年时间，跑了几万公里，在

中国领土上搜集了大量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地理、物产、气候和军事方面的情报，还测绘了地图，偷拍了照片，调查了交通线路，盗窃了生物标本和历史文物，等等。这些都是间谍活动，无一不是为沙俄军事侵略中国的目的服务的。可是，老沙皇却给他挂上“地理学会会员”的招牌，赏给他“科学院名誉院士”的头衔，以便他更好地披起伪装进行间谍活动，这是尽人皆知的事。苏修叛徒集团继承老沙皇的衣钵，继续粉饰这个间谍，利用《自然》和《星火》这两个刊物，为他大唱赞歌，一会儿说“普尔热瓦斯基的工作是和俄国科学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会儿又说他的出名是“由于卓越的科学功勋”。其实这都是欲盖弥彰，枉费心机。试问，他的上述活动究竟哪一件是为了“科学”呢？就拿普尔热瓦斯基的得意杰作《蒙古及唐古特地方》、《第四次亚洲中部旅行记》^①，以及其它“科学”著作来说，其中多是些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替老沙皇效劳的乱语妄言，哪里有多少科学价值。正相反，《自然》杂志所抛出的十六件普尔热瓦斯基的“资料”，每件都是“给参谋部首脑”的；他这支“探险队”的二十一个成员都是沙俄官兵，还携带着六十枝枪枝和上万发弹药；它的活动全部由总参谋部指挥并报呈陆军大臣审批。更有甚者，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这支“探险队”

^①〔俄〕普尔热瓦斯基：《蒙古及唐古特地方》，卷一（一八七五年），卷二（一八七六年），彼得堡出版；《第四次亚洲中部旅行记》，一八八八年彼得堡出版。

还在我国青海黄河源地区无故开枪，杀害我藏族同胞四十余人，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①。这些难道不正好证明此人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侵略强盗，他的活动始终是为沙俄侵略政策服务的军事谍报活动吗？

正因为普尔热瓦斯基为沙俄的军事情报机构搞间谍活动有“卓越的功勋”，老沙皇才对他生则加官晋爵，由一个小尉官提升为校官以至少将；死则赐以哀荣，用他的名义颁发奖金、奖章，还将他葬身之地改为“普尔热瓦尔斯克”。俄罗斯地理学会更擅自将我国新疆南部的乌斯登塔格山、阿克塔克山改名为“普尔热瓦斯基山”，表彰他搞间谍活动的“功劳”。

老沙皇的另一走卒勒利赫，于一八七四年出生彼得堡，后来学画，成为沙俄“美术学院院士”和“著名美术家”，其实也是沙俄的一名间谍。早在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年间，当沙俄侵略我国西藏的大间谍德尔智“代表”达赖到彼得堡从事分裂中国的阴谋活动时，勒利赫即与之配合，干了一系列罪恶勾当。俄国十月革命后，勒利赫极端仇视苏维埃政权，借出国举办他的作品展览的机会，叛国出逃，在亚洲各国游荡。一九二五年他到克什米尔定居，此后又几次钻进我国的东北、西北和西藏，进行了一系列为国际帝国主义服务的“探险”活动，于一九四七

^① 《普尔热瓦斯基上校致总参谋部军事学术委员会的电报》（一八八四年九月二十三日），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通讯》，第二〇卷，第二期。

年病死。

勒利赫一生虽然也作了些画，用象征手法，表明他深受佛教、印度教等形形色色宗教哲学的影响，受到老沙皇和欧美资产阶级的欣赏，但他一生的主要精力是用于从事间谍性的“探险”和搜集情报的活动。一九二五年勒利赫打着“向往东方”、“向往印度”、“研究古代文化和宗教”的幌子窜来亚洲。他又带着科学“考察队”从克什米尔钻进我国领土新疆，经喀什、库车等处到达乌鲁木齐，随后又闯到阿尔泰山和外蒙古。一九二七年又从外蒙古折返我国新疆，接着又到青海、西藏，并由西藏出境。《勒利赫》一书说他的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他的前辈，他的“考察队”研究西藏的政治和宗教状况，研究西藏的民族、语言和生活风尚，等等。什么“考察”？说穿了，他搞的是盗窃我国各方面情报的活动。为了“研究”和继续搜集我国的情报，由国际帝国主义支持和资助，他在克什米尔办起一个所谓“乌鲁斯伐第喜马拉雅山科学研究学院”。一九三五年在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指使下，他奉命组织“第二次更长期的对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纠集一帮人再次窜入我国。他们“一会儿出没在兴安岭山麓，一会儿深入到戈壁沙漠”，从东北窜到西北，为美帝国主义盗窃我国的情报效犬马之劳。

可是，就是这个先为沙俄帝国主义效劳，后为国际帝国主义服务的间谍，而今却受到苏修叛徒集团的大肆吹捧。一九五八年，在莫斯科举办了他的美术作品展览；一

九六四年，为他诞生九十周年举行纪念大会，还在报刊、广播和电视中对他大吹大擂。一九七三年，又出版《勒利赫》这本传记，并收集在所谓《名人传记丛书》里。通过这些活动，苏修给他戴上种种桂冠，而对他的间谍破坏罪行则加以百般掩饰和美化。比如《勒利赫》一书就掩盖了德尔智的间谍身份，只说他是“外贝加尔地区的布里亚特人”、“喇嘛教徒”和“久居西藏”；把德尔智“作为达赖喇嘛的特使”回到俄国从事分裂中国之行，说成是要“俄国在亚洲中部包括西藏进行积极活动，以堵塞英国推行殖民主义的道路”。而对勒利赫在这个阴谋中的罪恶勾当，则闪烁其辞，说他“在自己可能范围内协助德尔智完成使命”，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同是这本书，甚至还多次别有用心地把西藏和中国相提并论。这些都是新沙皇为老沙皇的侵略罪行翻案，步老沙皇的后尘，觊觎我国神圣领土西藏的铁证。

五、为老沙皇翻案的目的何在？

毛主席指出：“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众所周知，沙俄从十六世纪下半叶起，就积极向外扩张，掠夺与宰割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中国只是众多受害者中的一个。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引用资料揭露：到一八七六年，沙俄掠夺的殖民地已达一千七百万平

方公里,超过本国领土有两倍多^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充分揭露了沙俄延续几世纪的对外侵略活动。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军大权,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完全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因此,百般粉饰沙俄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他们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竟然把历史上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抬出来加以粉饰美化。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苏联政府的声明公然声称,在清朝以前中国北部疆界在长城,西部疆界不超过甘肃和四川。与此相配合,苏修在前几年抬出波雅科夫、哈巴罗夫、涅维尔斯科依等几个为沙皇效劳的侵华急先锋百般吹捧。最近又为普尔热瓦斯基和勒利赫这两个替老沙皇效劳侵略我国的间谍分子大唱赞歌,把普尔热瓦斯基吹捧成“西藏的哥伦布”,吹捧勒利赫“经拉萨横越西藏高原”,所到地方是“俄国旅行家们没有到过的,西欧旅行家更是连看也没有看到过的”。什么“西藏的哥伦布”?真是一语泄露了天机。新沙皇拚命吹捧这些殖民主义的冒险家,重弹所谓“地理发现”的陈词烂调,无非是“**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他们借着为老沙皇的罪行翻案,来为他们推行破坏中国的统一和各民族团结,妄图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新殖民地的侵略扩张政策制造舆论根据。

^① 见《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八〇〇页。

西藏由于地处我国西南边疆，是中国西南屏障，具有战略上的重要地位。老沙皇侵略西藏，不仅为了妄图独霸我国这一地区，而且是为了从中亚经西藏，将其势力扩展到南亚次大陆，南出印度洋。当年沙皇彼得一世就曾露骨地叫嚣：“当俄国取得了进入印度洋的直接通道的时候，它就能够在把整个世界置于它的军事和经济统治之下”。现在新沙皇继承老沙皇的衣钵，已经把魔爪从海洋上伸进了印度洋，每年派出大批船舰进入这一地区，并且在印度洋沿岸取得了一些港口的使用权，进而与美帝争霸。苏修觊觎我国西藏、新疆，妄想从陆路上打开通往印度洋的道路。这就是苏修如此吹捧普尔热瓦斯基和勒利赫之流的实质所在。

新沙皇抬出这些臭名远扬的帝国主义侵略分子，还有另一个目的，那就是他们要向老沙皇的奴才和鹰犬那里去找“精神武器”，用以腐蚀和毒害苏联人民。列宁指出：“数百年来，沙皇政府比任何专制魔王更厉害地掠夺和压迫其他民族，不仅压迫大俄罗斯民族，而且使大俄罗斯民族腐化堕落，成为屠杀其他民族的刽子手。”（《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新沙皇现在正走着老沙皇的老路。请看，《星火》杂志这样说：“向那亲爱的亡灵（普尔热瓦斯基）致敬，这亡灵便会乐意地把他蓄积的全部并不复杂的精神武器转赠给你。这就是心灵的纯洁，勇士般的无畏……，以及对自己祖国火焰般的无限忠诚。”再看，《勒利赫》一书说勒利赫“到东方去是他对俄国尽的天职”，把

他从事的间谍活动和窃掠行径，说成“可以称之为俄国的亚洲中部研究者的凯旋归来”，是什么“奋不顾身地为祖国服务”。这些话恰好暴露了苏修叛徒集团是一群拜倒在老沙皇脚下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和扩张主义者。当前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野心勃勃，在全世界到处插手，妄想实现老沙皇所不曾实现的称霸全球的迷梦。所以他们迫切需要有普尔热瓦斯基和勒利赫那样的人，去为他们卖命。

我们要正告新沙皇及其御用辩护士们：老沙皇的滔天罪行不是你们洗刷得了的；你们替新沙皇的扩张政策制造舆论，更属欲盖弥彰。当年老沙皇到处伸手，已被苏联人民一脚踢倒；今日新沙皇到处扩张，妄图称霸世界，终将被包括苏联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所彻底埋葬。

沙俄的侵华工具 ——俄国东正教布道团

方 秀

十八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初，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的所作所为，构成沙俄侵华史中阴险毒辣的一章。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至今记忆犹新。

早在十九世纪中期，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就揭露过俄国教会的官方背景和侵略本质，指出俄国“教会变成了国家的普通工具，变成了对内进行压迫和对外进行掠夺的工具。”（《希腊人暴动》）

“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恩格斯：《〈爱尔兰史〉的片断》）苏修为了适应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需要，早已堕落成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历史伪造者了。他们有的把作恶多端的俄国驻北京布道团打扮成一个宗教性和学术性的团体，借以掩饰他的“老前辈”在中俄关系史上的丑闻和劣迹，为今天在世界各地声名狼藉的“不体面的俄国人”制造一个“体面”的外交传统；有的则说“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绝大多数人员的活动，都充满着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尊重，促进了

俄国公众熟识中国人民的经济、历史、生活和艺术。”^①在苏修御用文人笔下，俄国驻北京布道团这个地地道道的侵华工具，竟被美化成一座中俄友谊的桥梁。这种历史的颠倒，必须再颠倒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恢复历史真面目，把历史伪造者的丑恶嘴脸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一小撮用传教的鬼话 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

十六世纪后期，沙俄越过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扩张；十七世纪中期，沙俄一小撮殖民主义者又从西伯利亚侵入黑龙江流域，因穷凶极恶而使“罗刹”一名充满血腥气。在沙俄殖民主义者“东进”过程中，东正教会是它的重要帮凶。十七世纪时，沙俄殖民主义者在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拿河三大流域建立军事扩张据点时，就同时修建东正教修道院。俄国教士为了稳定寺院地产的劳动人手，从经济上巩固对当地的殖民占领，竟然以签订服劳役的“卖身契”为条件，将被俘的雅库特和蒙古妇女配予俄国“流浪汉”为妻^②。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苏联科学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布纳科夫：《十九世纪前期的俄中关系》，《苏联东方学》杂志，一九五六年第二期，一〇四页。

^② 巴德雷：《俄国、蒙古、中国》，伦敦一九一九年英文版，第一卷，一三六——一三七页；阿历山大罗夫：《十七至十八世纪初西伯利亚的俄罗斯居民》，莫斯科一九六四年俄文版，一三二——一三三页。

早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前，在北京已开始有东正教的活动，当时在北京的镶黄旗俄罗斯佐领，有俄人近百名，这些俄国人都是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前因入侵黑龙江流域而被俘获的战俘或降人，其中有一人为东正教教士，康熙帝允许这些俄国人信奉其本国宗教，并在该俄罗斯佐领所住地（东直门内胡家圈胡同），建立一所教堂，听其作礼拜。当时的北京居民，把这所教堂呼之为“罗刹庙”，后称之为俄罗斯“北馆”。

彼得一世（一六八二——一七二五）统治年间，沙俄政府即着手谋求利用东正教作为向中国侵略的工具。一七〇〇年（康熙三十九年），彼得一世便向基辅总主教瓦尔拉姆·雅申斯基发出手谕，要他精心挑选所谓“德行高洁”的得力神棍，派往沙俄在西伯利亚的行政和宗教中心托博尔斯克主持教务，“庶儿上蒙天恩，一步一步地使中国和西伯利亚那些愚妄无知、执迷不悟的生灵，皈依真正的上帝。”^①恩格斯指出：彼得一世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向自己的继承者指示种种侵略方针的帝王”。（《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为实行沙皇上述侵略方针，俄国教会多方钻营。每次俄国商队来华，都配备若干神父随行，用以与“罗刹庙”不断建立联系。如一七〇三年伊凡·萨瓦齐耶夫率领的商队，就有九名教会人员混迹其间^②。以上这些

^① 索洛维约夫：《二十九卷本俄国史》，第八分册（一五——一六卷），莫斯科一九六二年俄文版，九五页。

^② 《故宫俄文史料（清康乾间俄国来文原档）》，一九三六年版，二七九——二八〇页。

试探性的活动，为正式向中国派遣布道团积累经验和准备骨干。

一七一二年(康熙五十一年)，俄国商队专员，以俄国在北京的教士仅有一人，且已年老为由，请求另派沙俄教士接替，获得清朝政府的准允。一七一五年(康熙五十四年)，沙俄从托博尔斯克派出一批“行教番僧”，随同清政府内阁中书兼侍读图理琛抵达北京^①。这个布道团共十人，包括修道院长伊拉里翁、神父拉甫伦齐、教堂执事菲力蒙，及其他七名教会人员^②。他们以东直门内的俄罗斯北馆为驻地，正式建立传教据点。由于这个布道团是当时俄国在中国的唯一联络机构，因此，沙皇政府苦心经营，想方设法扩大它的活动范围和政治影响。一七二五年(雍正三年)，俄国外交部对来北京谈判边界事务的特命全权大臣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发出秘密训令，要他向清政府力争让俄国布道团人员“不仅能自由居住北京，按东正教的礼俗在教堂中礼拜，并且能不受限制地到博克达汗(中国皇帝)陛下统辖的其他地方探望自己的教徒。”^③用意十分明显，就是想把它的侵略触角伸向四面八方。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沙俄政府通过签订《中俄

① 图理琛：《异域录》，《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三帙。

② 班蒂什—卡敏斯基：《一六一九——一七九二年俄中外交文件汇编》，喀山一八八二年俄文版，八〇——八一页。

③ 班蒂什—卡敏斯基：《一六一九——一七九二年俄中外交文件汇编》，四五四页。

恰克图条约》，将北京布道团由临时性的机构变成常设性的机构，每十年轮换一班。并按约文在玉河桥西建立新的东正教堂，是为“南馆”。此后，北京就有了两个东正教堂^①。这样，在俄国萨纳特(枢密院)衙门与清朝理藩院之间，便出现一条官方的联系纽带，通过教会的形式，逐步建立起沙俄在中国从事阴谋活动的大本营。

俄国驻北京布道团是一小撮“**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列宁：《中国的战争》)无论在组织结构、隶属关系和经济来源方面，都有相应的独特性。第一，布道团的世俗人员大大超过僧职人员。通常每班由九至十二人组成，正式成员仅三、四人，包括领班的修士大司祭(清代官方文书称为“达喇嘛”)、司祭和神父；其余都是随班人员，以奉命来华学习汉文和满文的学生居多。这批所谓“俄罗斯学童”，基本上是十八至二十二岁之间的青年人，他们组成俄国外交部亚洲司侵华骨干的后备力量^②。第二，布道团归沙俄外交部管辖。期满换班时，由亚洲司派监护官(多为校级武官)一名，负责送新班人员来华，接旧班人员返俄^③。第三，布道团每年向沙皇政府领取一万六千二百五十卢布的津贴，并接受恰克图、张家口、汉口

① 一八六〇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沙俄在东交民巷设立使馆，用的是南馆的地方，因此，南馆移到北馆，两教堂合并为一。

② 戈尔巴切娃：《俄国的中国研究史略》，《苏联东方学》杂志，一九五五年第二期，一四二页。

③ 德吉昂：《俄中宗教、政治、商业关系历史概述》，北京一八七三年英文版，第三〇页。

和天津等地俄商的资助^①。事实证明，所谓“行教番僧”，不外是沙皇政府豢养和驱遣的一群侵华鹰犬。苏修为这个布道团大唱颂歌，恰恰说明它“拜倒在沙皇政府的面前”。（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两百年（一七一五——一九一七）的俄国布道团史，可以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为界线，分成两个时期。在此之前，它是沙皇政府派驻中国的官方代表机构，名为“教会”，实为对华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的中心。在此之后，北京布道团的外交权限移交公使馆，它本身改隶宗教事务部管辖，以更隐蔽的方式从事政治活动，继续为沙皇侵华政策效劳。前期在时间上占布道团整个历史的四分之三，为沙俄侵华的罪恶事业积累了经验，开辟了渠道，训练了骨干。作为沙皇的侵华工具，俄国布道团正是在前期大显身手的。因此，本文着重揭露它前期的侵华罪行。

从一七一五年建班至一八六〇年改组，俄国驻北京布道团换班十三次，人员共一百五十五名^②。这个数目，仅为一五八三至一七七三年入华耶稣会士总数（四百七十六人）的三分之一。尽管人数不多，它的反动能量却是很大的。西方人士早已注意北京布道团的政治性，直至十九世纪中期还公开称它为“宗教的和外交的使

① 德吉昂：《俄中宗教、政治、商业关系历史概述》，第三六页。

② 英诺森：《中国的俄国东正教会》，《教务杂志》，一九一六年第一〇期，第六八〇页。

团”^①。就连沙俄的西西伯利亚军区参谋长巴布科夫在为俄国布道团歌功颂德时，也这样供认：“设立这个布道团是我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事务中的一项重要措施。我国布道团成为培养后来在学术界知名的或因有功绩而著名的人物的养成所”，“我国政府从这个来源可以获得关于中国的最确实和最新的材料。”^②很清楚，俄国驻北京布道团既是侵华骨干的训练班，又是沙皇政府的情报站。这两方面的反动职能，在一批所谓“中国通”的政治生涯中，非常露骨地表现出来。

“中国通”与俄国外交部

恩格斯在评论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时，尖锐地揭露过俄国外交界那批政治冒险家的丑恶嘴脸，指出：“这一帮人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这个深刻的论断，同样适用于俄国驻北京布道团。

早在入华初期，俄国布道团人员就着手进行刺探国情、盗窃机密等非法活动。因此，当第三班（一七三六——

^① 德吉昂：《俄中宗教、政治、商业关系历史概述》，第三六页；〔法〕葛斯顿·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一九六一年版，第一四四页。

^② 巴布科夫：《一八五九——一八七五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彼得堡一九一二年俄文版，第一二七——一二八页。

一七四五)布道团接班后,清朝监督俄罗斯馆御史赫庆即于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上奏,主张对沙俄“在京读书子弟(指随班学生)亦不可任其出入,使知内地情形。舆图违禁等物,禁勿售与。”^①但是,这一帮人仍然继续施展自己的“本领”。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俄国来华商队的领队阿历克塞·弗拉迪金(原第二班随班学生,一七三一至一七四六年居留北京)伙同北京布道团人员,以一千五百卢布的高价,从书阁中非法复制了一套清朝行省和京师地图,转给俄国枢密院供秘密考察之用^②。甚至被捧为“俄国汉学之父”的雅金甫·俾丘林,在担任第九班(一八〇九——一八二〇)达喇嘛期间,也曾干过类似的勾当。他经常易僧服为华服,逛市场,穿胡同,用目测和步测的办法,于一八一七年绘制了一张《北京城廓图》。离京返俄时,俾丘林带走的图籍、手稿重达一万四千磅,分装十五只骆驼。其中不少就是当年赫庆主张要严防外流的“舆图违禁等物”^③。

俄国布道团殖民渗透的规模和深度,在一八一二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进入一个新阶段。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① 《朔方备乘》,卷一二,“俄罗斯馆考”。

② 索洛维约夫:《二十九卷本俄国史》,第十二分册(二三——二四卷),莫斯科一九六四年俄文版,第三九〇页;班蒂什—卡敏斯基:《一六一九——一七九二年俄中外交文件汇编》,第二一七、二五八页。

③ 戈尔巴切娃:《俄国的中国研究史略》,《苏联东方学》杂志,一九五五年第二期,第一四一——一四二页;德吉昂:《俄中宗教、政治、商业关系历史概述》,第三五页。

及其继承者尼古拉一世，都想称霸世界，伸向东方的魔掌越来越长，妄图在中国掠夺更多的领土和权益。为了适应大规模侵华的需要，沙皇政府于一八一八年（嘉庆二十三年）八月四日，向北京布道团下达新训令，规定它“今后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应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①俄国宗教事务部也于一八二三年（道光三年）二月十四日，行文给北京布道团，督促僧职人员致力于搜集“中国农村经济和家庭生活”的情报资料^②。为实现这些意图，采取了如下措施：第一，沙俄政府拨款给布道团添购图书、医疗器械和科学仪器，并筹建图书馆和观象台。第二，从大学和教区中学的优秀毕业生中选拔随班学生，并增派医生（包括军医）和画家（绘图师）前来北京^③。第三，布道团设理事会，负责解决工作和财务方面的问题。可见，从物质设备、人员素质到组织管理，都比过去全面加强。因此，十九世纪中期的北京布道团，在沙俄侵华过程中，以更快的速度为俄国外交部训练出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通”。

鸦片战争前夕入华的第十二班（一八四〇——一八

① 布纳科夫：《十九世纪前期的俄中关系》，《苏联东方学》杂志，一九五六年第二期，第一〇一页。

② 布纳科夫：《十九世纪前期的俄中关系》，《苏联东方学》杂志，一九五六年第二期，第一〇一——一〇二页。

③ 帕·叶·斯卡奇科夫：《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的医生》，《苏联的中国学》，一九五八年第四期，第一三六——一四八页。

四九)及其后的第十三班(一八五〇——一八五九),在俄国布道团史上,都是以盛产“中国通”闻名的。出身这两班的布道团人员,有不少直接参加过俄国公使伊格纳切夫一八五九至一八六〇年的侵华勾当。如伊格纳切夫来华之前,沙俄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的监护官彼罗夫斯基(旧译丕罗福斯启),曾被沙皇政府提升为全权代表,向清朝政府提出割占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的无理要求。另一沙俄布道团成员古里神父,当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前夕,伊格纳切夫于五月二十八日离北京南下伺机趁火打劫时,则被留在北京专门负责搜集情报。他们或提供地图,或充当暗探,群魔乱舞,凶相毕露^①。这里不必一一列举,只剖析其中两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扎哈罗夫和斯卡奇科夫。这对侵华的伙伴,都是著名“汉学家”,又都任过总领事,最能够说明“中国通”与俄国外交部的关系。

第十二班随班学生扎哈罗夫(清朝官方文书译为“杂哈劳”),入华前就学于彼得堡神学院。居留北京期间专攻满语,著有《满俄大辞典》和《满语语法》等书。换班后,被俄国外交部委任为五等文官,自一八五一年(咸丰元年)至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担任俄国驻伊犁总领事。扎哈罗夫在他的任期内,为沙皇侵华立过两次“大功”:其一,一八五五年,塔城俄国“货圈”(贸易站)被挖金谋生的

^① 布克斯盖夫登:《俄国与中国·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旅顺一九〇二年俄文版,第一二三——一二四、二〇三——二〇四页。

当地居民焚毁，此事纯粹是“该国驱逐金夫，杀毙民命所致”^①。本来是俄方无理，但扎哈罗夫却在谈判中施加压力，进行政治讹诈，勒索“赔款”三十万卢布，以武彝茶五千五百箱抵偿^②。其二，在一八六四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过程中，扎哈罗夫一开始就策划如何在划定边界时，“变更伊犁省方面和斋桑湖方面的部分走向”^③。他是“沙皇钦差分界全权大臣”，直接用满语与清朝代表谈判，强行解释旧约（《中俄北京条约》）中关于“常驻卡伦（哨所）”的条文。后又调兵数千人，在斋桑湖地方耕地盖房，“于未经分界之先，预行占越”^④，结果，在他谋划下，沙俄割占了中国西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领土。对这种种侵华勾当，中国文献早有明文记载，严正指出“杂哈劳”的罪状：“人极狡诈，一切皆其主谋”^⑤。

扎哈罗夫的侵华伙伴斯卡奇科夫，是第十三班随班天文师，也是一名搜集中国情报的“能手”。他在大学受过天文学和农学的专门教育，毕业后被派到北方实验农场当助理。来华时已二十八岁。象他这样一个年龄不小的人，要熟练掌握汉语，非有特殊条件不可。因此，斯卡奇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六年十月乙亥。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八年八月辛未。

③ 巴布科夫：《一八五九——一八七五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一二九——一三〇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二年四月乙巳。

⑤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二年六月乙酉。

科夫不惜用每月五两八钱（一般是四两）的高薪，聘请一名秀才给他上早课（一般是晚课）。除积极研习汉语外，他专管俄罗斯馆的观象台，大量窃取中国的天文气象资料。仅一八五三年一年之内，他就向俄国天文台负责人库普费尔寄去观测报告二百三十一页^①。五十年代中期，太平天国运动势如燎原，清王朝岌岌可危。天文学家斯卡奇科夫此时对“政治风云”更感兴趣，不仅在日记中详细摘录《京报》所载的战况，还经常坐茶馆打听消息。这种间谍活动的方式，被他概括为一条反革命经验：“茶馆是中国街谈巷议的活的百科全书”^②。居留北京期间，斯卡奇科夫曾多次窜往郊区，搜集当地农业、染布业和砖瓦业的情况，以及有关地租、人口、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社会资料。看一看他部分著作的目录，就可知道这个“中国通”的手有多长：从《中国人的水师事务》（一八五八年）到《北京郊区的乡下游艺》（一八五八年），从《中国天文学的命运》（一八七四年）到《中国食谱》（一八八三年），应有尽有，无孔不入。这样的一只文化鹰犬，自然会受到俄国外交部的重用。一八五七年，斯卡奇科夫返俄养病，即被亚洲司任命为八等翻译官。一八五九年（咸丰九年）再度奉派来华，任俄国驻塔城领事。在中俄勘分西北边界期间，斯卡奇科夫所提供的背景材料，被俄方签字代表巴布科

① 《太平天国起义日子里的北京》（斯卡奇科夫的北京日记），莫斯科一九五八年俄文版，第一七页。

② 《太平天国起义日子里的北京》，第一九页。

夫视为“真正财宝”^①。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他调任天津总领事,兼管各通商口岸有关事务。斯卡奇科夫前后居留中国二十四年,直接参预沙俄侵略我国西北边疆和掠夺沿海通商权益的罪恶活动。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卸任后,仍继续为争取从海路贩运中国茶叶出谋献策。

扎哈罗夫和斯卡奇科夫的政治生涯,以缩影的形式展示出一幅十九世纪“不体面的俄国人”的百丑图。它活龙活现地表明:在沙俄的侵华事业中,俄国布道团人员虽然各有各的“本领”,但都追求一个共同目标:掠夺中国,瓜分中国,奴役中国。这帮以宰割“肥肉”为业的家伙,当然需要用假仁假义来掩饰其伤天害理的事情,因此,他们也到孔家店去“朝圣”。

尊孔侵华的吹鼓手

孔孟之道是维护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和束缚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对于旨在侵华的俄国布道团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东西。因此,它们必然要结成“非常亲热的两兄弟”。(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自一七一五年入华以后,俄国布道团人员利用居留北京的方便条件,大力搜求儒家经典^②,并着手进行翻译

① 巴布科夫:《一八五九——一八七五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一一〇页。

② 戈尔巴切娃:《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入藏的中文刻本和印本》,第一节“收藏史”,《东方学研究所学术集刊》,第一五辑,一九五八年俄文

工作。最先将《大学》(一七八〇年)和《中庸》(一七八四年)译成俄文的,就是第三班随班学生列昂节夫。此人毕业于莫斯科“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一七四二年(乾隆七年)和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两度来华,居留北京达二十年之久。返俄后,在外交部供职多年,是十八世纪俄国尊孔派的头面人物^③。

十九世纪初,站在孔孟之道鼓吹者最前列的,是雅金甫·俾丘林。他在第九班达喇嘛任期内,已将《四书》全部译成俄文^④。这个“中国通”,很懂得孔家店有些什么可用的东西。一八二九年,俾丘林将贩卖孔孟之道的《三字经》译成俄文,捧之为“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一八三九年,又在《祖国之子报》发表《孔子首创的中国史法》一文,赋予为“克己复礼”服务的“春秋笔法”一种不可侵犯的正统性。一八四八年,他在彼得堡出版了《中国的国情与民风》,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生活加以随心所欲的歪曲^⑤。在该书第三分册“教育篇”中,俾丘林把孔孟之

版,第三一〇——三二六页;扎涅根:《论俄国和苏联的图书馆对中文书籍的收藏》,《世界文化史通报》,一九五八年第五期,第一三七——一三九页。

③ 班蒂什—卡敏斯基:《一六一九——一七九二年俄中外交文件汇编》,第三二四页;斯特莱尼娜:《在俄国中国学和世界中国学的发源处——评罗索金和列昂节夫合译的〈满洲八旗通志〉》,《苏联民族学》,一九五〇年第一期,第一七〇——一七二页。

④ 楚古耶夫斯基:《东方学研究所存档中的俾丘林遗稿》,《东方学问题》,一九五九年第五期,第一三八页。

⑤ 别恩什坦:《俾丘林及其著作》,见《古代中亚各族史料汇编》,第一卷,莫斯科一九五〇年俄文版,第五——二四页。

道奉为“圣训”，说“《四书》包含着关于道德和治国的最纯正的概念”。一个东正教的神棍，这样崇拜孔老二的亡灵，无非是因为儒家的治国方案和道德标准，符合沙皇侵华、亡华的野心。所以，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最初时刻，就给最腐朽的教条披上一件“最纯正的概念”的外衣，以便为复古思想与奴化思想的合流，进行初步的配备。

在俾丘林影响下，出身俄国布道团第十班的克雷姆斯基，以更露骨的姿态在尊孔侵华方面大放厥词。他于四十年代写了《论孔学》（一九〇六年由北京布道团以《孔学义解》之名刊行）^①，狂叫“最可靠的幸福存于中庸之中，因此必须热爱中庸。”调子之高，无以复加。然而，克雷姆斯基并不是什么“中庸狂”，而是彻头彻尾的侵略者。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中庸之道与卖国之道的统一：“要厚待远方来人和使者，并保护他们”。这就是他从“孔学”中“解”出来的一条“义”，赤裸裸地暴露了俄国尊孔派“热爱中庸”所包藏的祸心。

从列昂节夫经过俾丘林到克雷姆斯基，俄国布道团对孔孟之道的研究和利用，随着沙俄侵华事业的展开而步步加深。到了第十二班，终于孕育出一个以瓦西里耶夫为代表的学派，更高地举起尊孔侵华的黑旗。这个与东正教有血缘关系而又受沙皇宠爱的官方学派，在列强

^① 帕·叶·斯卡奇科夫：《中国学书目》，莫斯科一九六〇年俄文版，第四三页。

瓜分中国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充分发展。因此，瓦西里耶夫一伙便较其前辈具有更鲜明的政治倾向。他把尊孔侵华和反对革命联在一起，宣称一切革命都是“灾祸”，咒骂伟大的太平天国运动是“匪”；而以孔孟为代表的反动儒学，则被他捧为“民主的和革命的学说”^①。爱谁恨谁，一清二楚！必须指出，瓦西里耶夫自己就是一个狂热的“黄祸”论者，“他给俄国提出了一个亚洲的、特别是对中国的使命。几十年来，他一直在谈论俄国作为亚洲的解放者的作用，他认为在远东采用欧洲的宪法和开发这些国家的经济是绝对必要的，他的强烈的帝国主义思想使他很早就要求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直通太平洋”^②。毫无疑问，瓦西里耶夫之所以致力于孔孟之道的研究，正是为了把孔丘的亡灵和沙皇的迷梦结合起来，变中国为罗曼诺夫王朝的“黄俄罗斯”。难怪苏修至今还对他念念不忘，奉若神明。在瓦西里耶夫诞生一百五十周年时，大搞纪念活动，作报告，出文集^③，热闹非常。苏修借此机会，进行尊孔侵华的“传统教育”，为的是造就一批现代化的“瓦西里耶夫”，以适应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反动政治需要。

① 戈尔巴切娃等：《俄国的中国学家瓦·巴·瓦西里耶夫院士》，《俄国东方学史论丛》，第二卷，莫斯科一九五六年俄文版，第二七八、二八八页。

② 海因茨·哥尔维策尔：《黄祸：一个口号的历史；帝国主义思想研究》，格廷根一九六二年德文版，第一〇二页。

③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瓦西里耶夫院士纪念文集》，莫斯科一九七四年俄文版。

非常清楚，俄国驻北京布道团那些连篇累牍的孔学“研究”，决不是象苏修所美化的那样：“充满着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尊重”。恰恰相反，尊孔是他们侵华的手段。这正如鲁迅所说：“那里是重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老调子已经唱完》）

总之，俄国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的历史，是一部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罪恶记录。自从彼得一世派遣布道团入华以来，历代沙皇都执行这条侵略方针，并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加强这个侵华工具的反动作用。

出身于俄国东正教布道团的大批“中国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充当了沙皇俄国侵华的急先锋。他们有的挥刀，有的动笔，有的两者并用。披着“友谊”的面纱，打着“尊孔”的旗号，软硬兼施，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无论苏修叛徒集团怎样祷告，也不能把罗曼诺夫王朝这群侵华的鹰犬解脱。

霸权主义的“杰作”

——评莫斯科出版的《中国近代史》

吴寅年

莫斯科出版的、由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一书，通过对近代中国历史的伪造和篡改，通过对中俄关系的歪曲和捏造，充分反映了苏修新沙皇对中国侵略、颠覆的一系列反动论点，暴露了这个超级大国声东击西，到处扩张，称霸世界的狂妄野心。新沙皇为自己辩护，对别人恫吓，贪得无厌，称霸有理，所有这一切，都在书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它所反映的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精神面貌来看，它够得上是日益堕落的苏修历史学的一部“杰作”。

这本《中国近代史》，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完全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反动历史观点，来篡改近代中国历史，颠倒中俄关系，荒谬绝伦，无以复加。

第一，齐赫文斯基一伙把中国近代史提前到清朝建立的一六四四年，“理由”是因为“满洲人征服封建的明朝所统治的中国，恰好与世界史近代时期的上限——十七

世纪四十年代相吻合”^①。如果以为他们这只是重弹“欧洲中心论”的老调，那就不对了。他们的主要问题不在这里。本书之所以把中国近代史的时间提前，是要把“反对满洲统治者”作为“主要着眼点”，把“清帝国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即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统治放在“从属地位”。这样就突出了国内的民族矛盾，掩盖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这个最主要矛盾，从根本上颠倒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本书否认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决定作用，否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和把封建主义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其目的就是否定中国的近代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奴隶主和奴隶，封建主和农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就是古代的、中世纪的和近代的社会主要的阶级对立。他们在一系列著作中，又论述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十七世纪以后，西方涌起的资本主义的凶涛狂澜，把整个世界都卷进了它的漩涡。资产阶级象疯人那样奔走于全球各地，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苏联科学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以下该书引文，均不一一注明。

东方从属于西方。”随着资本主义强国的血腥征伐和掠夺，广大的弱小国家和地区，先后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而开始进入了它们历史的近代时期。由此可见，所谓近代史，在欧洲、北美和日本，就是资本主义确立、发展和开始衰亡的历史，而在其余地区，就是被这些资本主义强国侵略、奴役而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这些地区各国人民反抗这种侵略和奴役的历史。中国的近代史就是属于后一种情况的历史。

中国近代史之所以从一八四〇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开始，而不以齐赫文斯基一伙提前的一六四四年清朝立国作为起点，根本原因在于一六四四年建立的清朝，就其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来说，同封建的明朝并无根本不同。约略同时发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任何一点上都与东方古老的封建的中国毫不相干。直到两个世纪以后，英国挑起的鸦片战争，才使中国的社会性质、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区别为两个不同的时代。中国开始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全部社会生活中，从经济、政治、军事到文化思想等一切重要领域占有支配地位，使中国原来的封建社会遭到了破坏。中国从此丧失了作为一个独立国的地位，封建统治阶级则逐渐变成外国资产阶级统治中国的支柱。帝国主义一经侵入中国，就成为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成了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反动的势力。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

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就是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基本的阶级关系。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了并将继续证明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的侵略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这是齐赫文斯基一伙永远抹煞不了的。时至今日，除了最顽固的帝国主义分子，谁还敢于否认这个事实？齐赫文斯基一伙的篡改和歪曲，正好说明他们属于这种最顽固的帝国主义反动分子一类。

第二，齐赫文斯基一伙极力渲染“满洲人”在全国范围内的征服、屠杀、掠夺，以及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反满”斗争，把这作为主要线索，一直贯穿到辛亥革命。这是用民族斗争同阶级斗争相对立，以民族斗争取代阶级斗争。中国近代史一下子变成了一部反满民族斗争史。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人类除原始社会外，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民族斗争问题，说到底，是个阶级斗争问题。从来没有脱离阶级斗争的单纯的民族斗争。民族斗争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阶级斗争内容。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以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为界限，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从形式到内容都同过去有着根本的不同。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当然也和世界所有多民族的封建国家一样，存在着民族

矛盾和民族斗争。但是问题在于：高喊民族矛盾，夸大民族斗争，掩盖它的阶级内容，丝毫也无助于揭露历史的真相。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地主同农民两大阶级的对立。无论是哪个民族的地主阶级，包括一些民族的奴隶主阶级，都是统治阶级；反之，不管是哪个民族的农民，包括还处于农奴和奴隶地位的劳动大众，都是被统治阶级。所谓民族斗争或反满斗争，或者从属于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或者从属于地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和派别之间的斗争。当各民族人民反抗清朝政府的时候，往往同时反对本民族的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而清朝政府则伙同各民族的封建地主共同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当人民群众的斗争处于高潮时刻，也会有部分封建地主卷进来，但他们总是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也往往在关键时刻背叛人民大众。那些为了本集团和派别的利益，同中央政府争夺权利的各民族封建地主，根本不能代表人民大众。相反，为了进行这种争夺，更加重了对本民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这种毫无进步意义的争夺，只有沙文主义者才会把它和人民的斗争混同起来。大致说来，清代的民族斗争或反满斗争，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清政权入关，明朝地主阶级的拥清反明派勾结满洲贵族用武力镇压了农民起义，打败了反清拥明派地主的反抗，使清朝统治权基本上在全国确立。在这以后，反清派地主的反抗便由战争的形式转变为另外两种形式的斗争：一是利用和发挥“夷夏之防”的大义，宣传反满思想；一是操

纵民间秘密结社，鼓吹“反清复明”。这种在民族斗争的口号下进行的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只是为了争夺政权以恢复明朝的封建统治，并不是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推翻当时的封建统治。到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以白莲教起义作为标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地主阶级内部的各派联合起来镇压农民革命。从此，反满这面旗帜就成了—些农民起义号召群众的旗帜。至于鸦片战争以后的反满斗争，实质上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政府的斗争，服从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样一个总任务的需要。它的性质完全不同于鸦片战争以前的反满斗争。本书既不分析清朝民族矛盾的阶级内容，也不分析各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更绝口不谈近代中国反满斗争的阶级实质，一味夸大国内的民族矛盾和斗争，用来伪造历史，这是典型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史观。

第三，齐赫文斯基一伙胡说只有汉族才是“中国民族”，满族、蒙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壮族和中国其他少数民族都是“非中国族人民”，中国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都不是中国的领土。满族“居住在中国辽东领域(南满)疆界以外”，蒙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都是“靠使用暴力强制纳入清帝国版图的”，清政府十八世纪对苗、瑶、壮等少数民族的政策，属于“对外政策”，等等。照他们的叙述，汉族等于中国人，汉族居住地区以外不是中国；清朝立国是外国对中国的征服，清朝统一全国是对中国以外领土的扩张。这完全是别有用心胡说八道。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国家从它产生之日起，一直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的国家，而一个民族又往往分布在几个不同的国家里。“**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不管封建王朝如何更迭，也不管哪个民族是统治民族，中国始终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存在于世界。在历史上中国的边界曾经有过多次变迁，但从来没有局限于汉族居住的地区。一六四四年，满洲贵族取代汉族地主阶级统治的明朝，建立了清朝政权，就是这样一次封建王朝的更迭。如同以往王朝的更迭一样，清代的统一中国，是农民起义被镇压之后，地主阶级中的一家削平各地封建主、农奴主的割据势力，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的新的统一王朝。它所统一的版图大体上也就是过去中国历史上几个最强盛的封建王朝管辖的地区。齐赫文斯基一伙把中国的少数民族排除于中华民族之外，把他们的居住地区说成不是中国领土，这是极端荒唐和反动的。

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的存在，决不是单靠武力能够长久保持的。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决非短时的、乃至三两百年的结合，而是数千年历史逐渐发展形成的结果。中国各族人民在近百年来共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互相支援和团结，使彼此之间的联

系更加紧密起来了。鸦片战争时期西藏地区藏、满、汉等各族人民反对英国侵略的斗争，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汉、壮、瑶、回、彝、苗等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政府的斗争，新疆哈萨克、维吾尔、满、汉等各族人民共同反对沙皇俄国占领伊犁的斗争，义和团运动时期东北满、汉、蒙、赫哲、鄂伦春等各族人民反对沙皇俄国侵占东三省的斗争，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辛亥革命时期各族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政府的斗争，西藏地区藏、满、汉各族人民反对英国侵略的斗争，蒙、满、汉各族人民反对沙皇俄国分裂蒙古的斗争，等等，都是这种互相支援和团结的体现。正是由于各兄弟民族互相支援，不屈不挠地团结战斗，使得帝国主义长久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因此，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齐赫文斯基一伙写中国近代史不写这部历史，却把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篡改为汉族反对满族征服的历史。这是明目张胆地为分裂中国制造历史根据。如果照苏修先生以民族划分国家的“原则”写苏联近代史，显然应当只写俄罗斯民族史，其他许多民族的历史都不能写进去。请问，你们写苏联史，是否只写伏尔加河上游俄罗斯民族本来居住的那个不大的地区的历史？你们是不会这样做的，但为什么偏要把数千年形成的中国历史作这样的伪造和篡改？

第四，齐赫文斯基一伙提前中国近代史的上限，抹煞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诬蔑中国是“亚洲最大侵略

者”^①。他们胡说什么中国农民革命领袖有“凌驾于全世界的奢望”，中国人民反抗教会侵略“有狂妄的排外思想和沙文主义宣传”，义和团运动是“对外国文化的盲目仇视，甚至对一般进步事物的否定”；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往往伴随着“大汉族主义、沙文主义和排外思想的增长”；甚至直到“现代时期”中国劳动群众还深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等等。照他们的叙述，一部中国近代史，不是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而是中国社会各阶级都有沙文主义，侵略了别国。

清朝政府作为封建统治者，从阶级本性出发，象世界上许多封建统治者一样，总要用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对待邻近一些国家。不那样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民对此不负任何责任。近代的中国和亚洲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在这里，是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邻近国家，是俄国侵占了中亚各汗国，是英国侵占了缅甸，是法国侵占了越南、老挝、柬埔寨，是美国侵占了菲律宾，是日本侵占了朝鲜，把这许多国家变成它们的殖民地。是帝国主义跑到中国来进行侵略，是英国割占了中国的领土香港，是俄国侵占了中国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领土，是日本侵占了中国的台湾省，是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之内开辟了租界，强占了租借地，而不是中国占领了别国的土地。沙皇俄国侵占西伯利亚、中亚诸汗国的土地

^① 尼基甫洛夫：《书评：〈中国近代史〉》，载苏联《近现代史》杂志，一九七三年第四期。

等于俄国欧洲部分的三倍，英国侵占印度、缅甸的土地等于英伦三岛的十九倍，法国侵占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土地也超过本土。究竟谁是亚洲最大的侵略者，不是一清二楚吗？就是那个被齐赫文斯基一伙利用来攻击中国人民的清政府，也变成帝国主义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这些都是一般常识，齐赫文斯基一伙偏要颠倒黑白，凭空捏造，这是什么样的“中国近代史”呢？

中国人民是侵略的受害者，一贯反对侵略。百余年来，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难道只能俯首帖耳，不应该奋起反抗？鸦片战争，中国人民反抗了英国的侵略，这是沙文主义吗？太平天国革命，中国人民反抗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的联合进攻，这是沙文主义吗？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人民反抗了英、法联军的侵略，这是沙文主义吗？中国人民反抗俄国对中国东北、西北大片领土的占领，这是沙文主义吗？外国教会在中国为非作歹，中国人民掀起反教会斗争，这是沙文主义吗？法国、日本对中国挑起战争，中国人民起而反抗，这是沙文主义吗？各个帝国主义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勒索无数利权，中国人民为了反对瓜分，救亡图存，掀起了义和团运动，抗击了八国联军的侵略，这是沙文主义吗？清政府完全变成了帝国主义侵略和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人民起来推翻它，这是沙文主义吗？都不是。所有这一切，无非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领土上反抗了外国的侵略，沙文主义从何而来？齐赫文斯基一伙偏要混淆

是非，白昼见鬼，这又是什么样的“中国近代史”呢？

中国人民在自己国土上反抗帝国主义强盗，无论采用什么方式，运用什么武器，在什么时候进攻，都是正义的革命的行动。恩格斯在评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曾高度赞扬中国人民采用各种方式反抗英、法侵略的英勇斗争，严厉驳斥那种诬蔑中国人民“野蛮”的种种谬论。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帝国主义、特别是沙皇俄国的报刊，对中国人民发动了疯狂的咒骂和攻击。列宁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的战争》这篇光辉的论文，义正辞严地给予驳斥。列宁还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中热情地支持中国和一切被侵略国家反抗沙俄等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他说：“假如明天摩洛哥向法国宣战，印度向英国宣战，波斯或中国向俄国宣战，等等，那末不管谁先进攻，这些战争都是‘正义的’、‘防御的’战争，而任何一个社会党人都会同情被压迫的、附属的、主权不完整的国家，希望它们战胜压迫者、奴隶主和掠夺者的‘大’国。”革命导师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是这样热情地支持、赞扬和同情，而齐赫文斯基一伙却是那样疯狂地反对、诬蔑和攻击，这是何等鲜明的对照！

第五，本书以大量篇幅为沙俄侵华辩护，照他们的说法，仿佛不是沙皇俄国侵略了中国，倒是中国清朝政府主动地把领土主权奉送给了俄国。众所周知，中俄关系史就是沙俄侵略压迫中国的历史，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对此作过多次的论述。

马克思在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谈到沙皇俄国侵占中国黑龙江流域的土地时说道：沙皇俄国“占领当今中国统治民族的故乡——黑龙江两岸的地方，才只有几年的时间。”（《俄国的对华贸易》）“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中国和英国的条约》）

恩格斯在同时期谈到沙皇从中国掠夺这些土地的过程时，曾明确写道：“正当英法两国的海陆军向香港调集的时候，西伯利亚边防的哥萨克部队却缓慢地、然而继续不断地把自己的驻屯地由达呼尔山移向黑龙江岸，而俄国海军陆战队则在满洲的良好的港湾周围设立堡垒。”（《波斯和中国》）“当英国终于决定打到北京，当法国希望为自己捞到一点东西而追随英国的时候”，俄国“竟能挺身而出充当衰弱的中国的秉公无私的保护人，而在缔结和约时俨然以调停者自居”，“它除了分沾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的利益以外，还得到了黑龙江沿岸地区”。（《俄国在远东的成功》）

列宁多次尖锐指责沙皇政府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他在一九〇〇年指出：“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欧洲资本家的贪婪的魔掌现在已经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中国的战争》）一九一二年，列宁指出：“现在沙皇不仅是欧洲的宪兵，而且是亚洲的宪兵，他力图用阴谋、金钱和最野蛮的暴力，把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一切争取自由的运动镇压下

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选举纲领》）在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间列宁又指出：“其实全世界都知道，……俄国对中国、波斯、阿尔明尼亚和加里西亚实行掠夺政策，也已经有好几十年了。”（《在伯尔尼国际群众大会上的演说》）“只要翻一翻——哪怕只是翻一下——近几十年的外交史和对外政策史，就不能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敢否认这一点。”（《跟着〈俄罗斯意志报〉的脚印走》）

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指出：“沙皇俄国是以最残忍最野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压迫——资本主义压迫、殖民地压迫和军事压迫的策源地。……谁不知道，对土耳其、波斯、中国广大地区的剥削和沙皇制度对这些地区的侵占，和侵占领土的战争是融合起来了呢？”（《论列宁主义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话明确指出，沙皇俄国从十七世纪中叶阿·米哈伊洛维奇在位时起，一直企图侵占中国领土，自十九世纪中叶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就伙同英、法、美等国，成为侵略中国的主要凶手之一。但齐赫文斯基一伙却秉承苏修叛徒集团的旨意，无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教导。

关于沙俄抢占中国广大领土的问题，本世纪六十年代初以前的苏联著作以及旧俄学者也从不讳言，甚至老沙皇的将军、大臣也多少有过真实的招供。例如三十年代的《苏联国内战争史》就指出：“在十六——十七世纪，俄国沙皇制度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开始向东方进行广

泛的军事远征。十九世纪中叶，亚历山大二世，从中国抢去了黑龙江沿岸和乌苏里江沿岸地区。”帝俄时代的著作也写道：明王朝在黑龙江下游的特林“建立了地方管辖机构，把奴尔干改为省一级的都司”^①。贝加尔湖以东、黑龙江以北的达呼尔地区是“中国最北部的地区”^②。甚至沙俄侵华急先锋涅维尔斯科依也不得不承认，黑龙江地区是“当时我国(俄国)政府及整个文明世界公认属于中国的地方”^③。这些论述，也是无需解释的。然而，照齐赫文斯基一伙的叙述，凶恶的俄国沙皇却一变而为中国人民的朋友，什么两国的疆界都是通过“和平途径”确立的，什么沙俄在侵略中国的各种活动中“都未表现出主动性”，如此等等。这种拙劣的辩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第六，一八五八年，俄国利用武力威胁和外交讹诈的手段，通过强迫中国签订《璦琿条约》、《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后从中国夺去了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在世界殖民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这本是举世皆知的事实。齐赫文斯基一伙却按照苏修新沙皇的需要，挖空心思制造种种无耻澜言，为老沙皇辩解。

一曰“收复失地”论。这个文章是从一六八九年的

① B.И.瓦西里耶夫：《关于黑龙口附近悬崖上的碑文的记载》，载《帝俄科学院通报》，一八九六年第四期。

② 《百科辞典》，一八三三年彼得堡版，第二册，第一六一页。

③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一九四七年莫斯科版，第三六三页。

《中俄尼布楚条约》做起的。《尼布楚条约》是平等条约，早有定论。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著作和沙皇时代的著作也是这么说的。本书竟对该约性质进行全面的歪曲，最后归结为俄国由此“丧失了很大一片领土”，而把一八五八年俄国强逼中国签订《璦琿条约》，从中国夺去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的土地，说成是“一六八九年俄国失去的大部分领土重新归还了俄国”。不是俄国抢夺了中国领土，而是中国抢夺了俄国领土，这真是天下奇闻。如果《尼布楚条约》真象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屈辱的条约，为什么俄国全权代表因签订该约有功而受到沙皇升官晋爵的厚赏呢？若是说这个条约割让了土地，那只是中国清朝政府对俄国作了让步，把包括尼布楚在内的一片领土割给了俄国。

二曰“开发新土地”论。他们说：“俄国在远东和中亚的领土，是靠合并既无中国人又无满洲人居住的土地来扩大的，而且这些地方在经济上与清朝中国没有联系”，又说黑龙江是俄国“新土地发现者”在十七世纪中叶“发现”的，黑龙江流域是俄国“移民”“开发”的，等等。请问，这些土地既然无人居住，又无人管辖，沙俄尽可径自占领，何必还要找上门来，施加压力，迫使清朝政府签字画押，承认这种占有权呢？这不正好说明，俄国是从中国抢去了这些土地吗？

三曰“自卫防御”论。他们说：俄国夺取黑龙江下游和滨海地区，是因为那里存在着英、法、美等“西方列强的

威胁”，俄军进占中国伊犁地区是“不许英国势力扩张到俄属中亚领土”。这是打着“自卫防御”的招牌，为侵略扩张辩护的强盗逻辑。如果你俄国人可以用这个理由占领别国这一块领土，西方列强又以存在着“俄国侵占的威胁”为理由占领别国那一块领土，照此下去，那么世界不是只能被你们几个“强国”瓜分完了吗？

四曰“安置难民”论。他们说：俄国占领中国伊犁地区十年之后终于通过不平等条约夺去“伊犁边区西部一块不大(!)的土地”，是“为了分配土地给来自准噶尔和东土尔克斯坦的维吾尔族和东干族难民”。这是极端无耻的辩词。用煽动、诱骗、强制、裹胁等种种恶毒手段驱策一部分中国边疆居民置于沙皇俄国统治之下，从而制造了大批“难民”，然后又以“难民”作借口，反过来向中国进行勒索，这确是老沙皇的一大发明。苏修新沙皇承袭了这个发明权，至今仍不断使用类似办法对我国边疆地区搞颠覆分裂活动。

这些谬论不过是老牌帝国主义用滥了的旧谱，统统是“扩张有理论”的翻版。齐赫文斯基一伙用它来掩盖老沙皇夺占中国领土的事实，结果只能同他们的愿望相反：欲盖弥彰！

第七，齐赫文斯基一伙为老沙皇的侵华罪行涂脂抹粉，给它安上一个“友好睦邻”的美名，说俄国与西方列强是“不同”的。他们说，在鸦片战争以前乃至十九世纪中叶，不同于英、美、法，俄国对中国“致力于建立”和“保持

着友好睦邻关系”。为了证明这种“不同”，他们说中俄之间的条约体现了“协商”精神和“和平”特点，《璦琿条约》是中俄双方代表“谈判”的结果，中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是俄国代表在清政府和英、法之间“充当调停者”、“起过调解作用”后取得的；漫长的中俄边界都是根据这些条约“通过和平的外交途径”确立的；“俄中贸易是通过商队进行的，具有完全平等的性质”，等等。然而事实有力地驳斥了这些谎言。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乘人之危，利用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机会，对清政府进行军事威胁和外交讹诈，甚至使用了先占领土地然后逼签条约的卑劣手段。璦琿、天津、北京条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所谓“和平”“协商”和“友好睦邻”在哪里呢？书中在讲到中俄《天津条约》时说：该约允准“将其他列强已享有的或可能得到的权利和特权，其中包括在开放港口通商的权利，扩大到俄国。”既然“其他西方列强已享有的或可能得到的权利和特权”一古脑儿都“扩大到”了俄国，那么这不恰好说明当时——正是十九世纪中叶——沙俄同英、法、美都是一丘之貉吗？至于中俄贸易，至晚从一八五一年订立《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规定俄商在伊、塔两地贸易免税以后，两国贸易就具有不平等的性质。后来俄国又取得了陆路通商减税的特权，只交进口税的三分之二，减免三分之一。中国受不平等的协定关税的束缚，长期以来进口税定为值百抽五。马克思在五十年代曾指出，中国海关税率是世界上最低的，而沙俄还

要求减免，说明它是多么贪婪。还应指出，陆路通商减税，在当时只俄国一家独享，后来法、英分别占领越南、缅甸后，才援例效尤。这是沙俄与西方国家确实有所“不同”的又一点。这些“不同”与作者的原意相反，他们本来想用“不同”论为沙俄的“友好睦邻”政策多敷一层脂粉，但结果却证明在某些方面沙俄的侵略性更加阴险。

齐赫文斯基一伙为了使人们相信他们的“不同”论，还对中俄关系中一系列具体问题肆意捏造。例如，什么“俄国没有向中国输入鸦片，没有从中国输出苦力，也没有用传教士作为商业扩张的间谍”，等等。这些统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自欺欺人的手法。其实，沙俄贩卖鸦片，传教士从事间谍活动，是有案可查的；而把中国边疆地区大批居民诱骗劫持到俄国去，与西方国家掠卖华工，则有“异曲同工”之妙。苏修先生们写历史的方法实在别开生面：中俄关系方面那么多“有”的事情他们不写，反而热衷于写这也“没有”、那也“没有”的事。既然历史上“没有”，又何必写上历史？说穿了，他们无非企图用彼有我无的对比方法，来宣扬沙俄在中国不是侵略者，而是“和平”和“友好睦邻”的朋友。这是骗不了人的。俄国与英、美、法西方列强，侵略的本质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沙俄比其他西方列强从中国夺得的利权更大，领土更多。

第八，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沙俄也象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在激烈

争夺世界的同时，展开了瓜分中国的斗争，争先划分势力范围，抢占租借地，攫取各种让与特权。沙俄对我国广大的边疆地区怀有极其贪婪的领土野心，妄图把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占为己有。沙俄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曾于一九〇三年的日记中写道：“我告诉维特，我们皇上脑袋中有宏大的计划：为俄国夺取满洲，把朝鲜并入我国，还想把西藏并入本国。”^① 财政大臣维特也表示，俄国企图在中国扩张的地区，“包括由太平洋海岸至喜马拉雅山之巔”^②。老沙皇确实是按照这个计划行事的。沙俄对中国使用了军事、政治、经济等一切手段，直至收买清朝官员，策动边疆地区封建上层统治者搞分裂活动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对其他帝国主义纵横捭阖，时而互相争夺，以至火并，时而狼狈勾结，合伙分赃，充分地表现了它凶残奸诈的本性。但是齐赫文斯基一伙却采取轻描淡写，简化隐瞒的手法，从根本上掩盖了这一时期沙俄侵华的全貌，甚至把侵略说成进步，为老沙皇唱赞歌。

明明是沙俄同日本争夺侵占中国东北地区，齐赫文斯基一伙却把俄国联合法、德“干涉还辽”，说成是对中国的“支持”。明明是沙俄同英国争夺侵略中国西藏，齐赫文斯基一伙却说由于“沙俄的反对”，才使清政府有不承

① 《库罗巴特金日记》，载苏俄《红档》杂志，一九二二年第二卷，第三一页。

② 麦哈拉：《西藏与俄国的阴谋》，载《英国皇家中亚杂志》，一九五八年第一期。

认《英藏条约》并在以后加以修改的“可能”。尤有甚者，他们竟公然为老沙皇破坏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丑恶行径喝采。本书在评论一九一二年十一月沙俄与外蒙封建主订立的把外蒙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俄蒙协定》时写道：“蒙古实现自治，尽管这是在对沙俄政府处于不平等和依附地位的情况下实现的，可是它终究使蒙古人民和国际革命运动先锋队的俄国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这促进了民主、社会主义以及各民族的友好合作的先进思想在蒙古的传播，……这在蒙古人民历史上，客观上来说，是一个进步的现象。”这里，凭着苏修御用文人的“生花妙笔”，投靠老沙皇的蒙古封建主摇身一变就成了“蒙古人民”，帝国主义的俄国一下就幻化成为“国际革命运动先锋队的俄国”，从而沙俄的分裂活动也就变成了“客观上”的“进步作用”。照此说来，对老沙皇的依附越深，势必“客观上”的“进步性”就越强，彻底依附，就会彻底“进步”！亲爱的先生们，你们说的那个俄国不是“国际革命运动先锋队的俄国”，而是被列宁斥之为“欧洲宪兵”和“亚洲宪兵”的帝国主义俄国。你们竟卑鄙到不惜盗用国际革命运动先锋队的名义去美化老沙皇的地步！就在你们如此地赞赏的那个《俄蒙协定》由老沙皇代表与蒙古封建主躲在阴暗角落里偷偷签字时，即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列宁发出了一次又一次的正义呼声，对老沙皇插手外蒙，分裂中国的罪行给以无情的鞭挞。列宁讥讽并谴责了俄国“亲密地拥抱了”蒙古，妄图吞食中国这块“肥肉”的野

心《新生的中国》，并严正宣言：“第四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特别反对俄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它痛斥我们国家在波斯普鲁斯海峡、土耳其属阿尔明尼亚、波斯、中国强占别人的土地来扩张领土的企图，痛斥强占蒙古这种破坏我国同伟大的兄弟之邦中华共和国的友好关系的行爲。”（《关于杜马中的工人代表和他们的宣言问题》）这就是列宁的声音，真正的国际革命运动先锋队的声音。先生们，你们如果还有一点勇气，请和你们白纸黑字印在书上的话对照一下吧，把你们这些马列主义的叛徒叫做老沙皇的辩护士，是十分恰当的。

从以上可以看出，本书处处宣扬修正主义，并把矛头恶毒地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向毛泽东思想。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根据他对中国历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路线和策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是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指导我国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一个统一和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是苏修新沙皇对外侵略扩张，争霸世界的不可逾越的重大障碍。难怪那个很了解本书底细的尼基甫洛夫说什么：“由于暴露出中国领导逐渐堕落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立场（按：应读为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就需要对中国的实

际状况和中国过去的发展重新加以分析了。”“中国、中国历史，成了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对象。”^① 这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涂改中国的过去，是为了歪曲中国革命和现实，为了证明他们捏造的中国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以便蒙骗苏联和世界各国人民。本书作者之所以那样处心积虑地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就是想借此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梦想阻挡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齐赫文斯基一伙对中国近代历史和中俄关系的伪造和篡改，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思想体系的自我表白，又是它推行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招供。齐赫文斯基一伙的这本《中国近代史》，打着探讨近代中国历史的幌子，实际上着眼的却是今天的现实。本书用以颠倒历史的每一个谬论，都清楚地显示了苏修新沙皇妄图扑灭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烈火，充当世界头号霸主的野心。他们赞美老沙皇分裂别国所使用的“民族原则”，证明了苏修正在沿用分而治之的老办法，肢解和分裂其它国家，企图建立沙皇式的殖民帝国。他们为老沙皇割占中国领土所作的辩护，不仅表明苏修为实现老沙皇的“未竟之业”，企图永远霸占和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而且是为其的全球性领土扩张政策寻找历史依据。他们给别

^① 尼基甫洛夫：《书评：〈中国近代史〉》，载苏联《近现代史》杂志，一九七三年第四期。

国扣上“沙文主义”的罪名，既是为了掩盖它自己的霸权主义，掩盖它那里已成为当代最危险的新世界战争策源地的真相，同时又用来压制各国人民的反霸斗争。他们赋予老沙皇的侵华政策以“友好睦邻”的美名，恰好反映了新沙皇在什么“天然朋友”，“无私援助”等等动人词句掩饰下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他们给老沙皇打上“进步”的印记，正是为新沙皇控制下的那个损人利己，专门剥削和奴役别国人民的“大家庭”贴金。他们论述沙皇俄国与西方列强“不同”，则是为了证明苏、美两霸不能相提并论。他们宣扬“扩张有理”，同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一类东西更是一脉相通。他们在书上写的是沙俄帝国主义的名字，而埋藏在整个作品里的则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灵魂。所以它就既是沙俄殖民主义的辩护书，又是苏修霸权主义的自供状。

马克思在一百年前谈到资产阶级伪科学时指出：“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对于齐赫文斯基一伙所代表的苏修历史学，也必须作如是观。

自从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来，苏联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历史学也完全变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御用工具。由于这种社会帝国主义

的腐朽性，作为它的理论基础的现代修正主义再也翻不出什么新的花样，以这种现代修正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学也只有靠造假和贩卖老牌帝国主义的发了霉的陈货过日子，日益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如同资产阶级曾经把一切历史学都变成商品一样，在一小撮垄断寡头的倡导和重金犒赏之下，伪造和篡改中国近代史和中俄关系史，已成为苏修御用历史学的热门。从苏修政府官员到带有学衔的“学者”，竞相投身于这个卑劣活动。他们或则公然同革命导师的科学论断相对抗；或则不惜自打耳光，把过去说过的实话斥为“凭空捏造的谰言”。在这群出卖灵魂的奴仆中间，近年来，最露头角的，恐怕要算这个齐赫文斯基了。其实他根本不学无术，只是由于他为苏修反华和争霸世界制造舆论特别卖力，得到了主子的宠信。

一个苏修文人在评论此书时，说它“总结了十五年的研究成果”^①。这有一部分对。它确实把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后攻击、诽谤中国人民的反动观点，把苏修历史学界的各种破绽百出的伪造和篡改，都搜拢起来，集中地表现在这本书中。所谓“研究成果”云云，如此而已。

另一个苏修文人在评论中说，这本书不仅是“必需而有益的专著，而且是一本很有意义的书”^②。这话也有一

① 尼基甫洛夫：《书评：〈中国近代史〉》，载苏联《近现代史》杂志，一九七三年第四期。

② 米亚斯尼科夫：《清帝国的兴衰》，载苏联《远东问题》杂志，一九七三年第三期。

部分对。说它“必需而有益”，这不仅是因为苏修新沙皇需要有这样一株大毒草，为它制造舆论，也不仅是因为那些反动的腐朽势力需要有这么一株大毒草，以便从中吸取毒汁作兴奋剂，而且更因为世界各国人民包括苏联人民在内，需要有这样一个反面教材，看一看苏修及其御用历史学究竟是什么东西，从中进一步认识新沙皇的丑恶面目，以提高警惕。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本书确实是“很有意义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感谢新沙皇所豢养的文丐、这部“杰作”的炮制者，我们回敬给他们的礼品就是：批判，再批判。

无耻的背叛

——斥齐赫文斯基之流对义和团运动的诽谤

石 岚

对待被压迫民族反抗斗争的态度，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之一。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机密通知》）列宁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并且明确指出：“**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最紧密地全部团结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从来把殖民地、附属国的人民的反抗斗争，看作是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支伟大的同盟军。因此，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生存的斗争，总是引起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热烈同情和歌颂。他们认为，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殖民地、附属国人民对于资本主义宗主国统治阶级的决定性打击，是“先进国家”无产阶级争取解放，争取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反帝运动期间，正当沙俄等帝国主义国家说什么“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与文明”，大叫大

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派遣大军象野兽一样扑向中国杀人放火的时候，列宁发表了《中国的战争》一文，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谴责帝国主义列强（首先是沙皇政府）对中国的侵略罪行，严正地驳斥了“文明”强盗们对义和团运动的攻击和污蔑，为我们树立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辉榜样。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掠夺、瓜分，是引起“中国人袭击欧洲人”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野蛮”，更不是什么“对文明的仇视”，而是为了争取民族生存，中国人民才被迫奋起对帝国主义强盗进行反抗的。

列宁指出，那些叫嚷什么俄罗斯“文明使命”的家伙，才是真正的盗贼、野兽，“它们盗窃中国，就象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象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更不用说抢劫皇宫、住宅和商店了。”（《中国的战争》）

列宁指出：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殖民掠夺政策的继续，“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中国的战争》）这种政策只对一小撮贵族、资本家有利，它不仅严重地侵犯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严重地损害了俄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一切觉悟的工人”要起来“反对那些挑拨民族仇恨和使劳动人民的注意力离开其真正敌人的人们”，“以结束

政府的专制统治”，（《中国的战争》）打倒沙皇君主专制制度！

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辉文献，是评价义和团运动的经典指示。

自称“遵循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指示”，被吹捧为“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令人信服而明确地写成的”科学“巨著”，齐赫文斯基主编的所谓《中国近代史》，是怎样阐述和评价义和团运动的呢？

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是齐赫文斯基之流评述义和团运动的主要手法。透过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词句，义和团运动实际上被描绘成为“迷信和无知”、“保守和落后”、同反动势力“结盟”并被反动派“控制”的毫无希望的“排外”运动。书中写道：

“义和团团民们在和洋人作斗争时，主要寄希望于圣人和神灵，护身符和咒语。”

“起义者由于痛恨洋人而发展到完全否定欧洲文化和最新的科学成就的地步”。

“义和团的排外立场，他们所宣布的扶清口号，极端的保守主义和蒙昧主义，使他们和部分当权的中国封建主接近起来”。

“义和团运动是自发的，组织很差，浸透着神秘主义及迷信色彩。”^①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苏联科学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三四二、三五三、三五九页。

透过这些结论性的评述，不难看出，这不是“遵循了”而恰恰是违反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指示”；这不是什么“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写成的，而恰恰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无耻背叛。列宁痛斥沙皇政府及其仆从叫嚷“中国人的野蛮”，齐赫文斯基之流却渲染义和团的“迷信和无知”、“保守和落后”、“神秘主义”、“蒙昧主义”；列宁痛斥沙皇政府及其仆从叫嚷“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与文明”，齐赫文斯基之流却攻击义和团“完全否定欧洲文化和最新的科学成就”，“盲目仇视”“外国文化”。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争取民族生存的正义斗争。它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治势力、经济势力、文化势力乃至军事干涉，进行了全面的英勇的抗击，震撼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和压迫。帝国主义强盗从中国掠夺了大量的财富，用中国人民的血和汗“给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当肥料”，（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使中国人民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陷于非常落后的状态。义和团所以带有某些迷信色彩，正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而造成的落后状态的反映。然而，手持刀矛的广大群众在敌人快枪利炮面前奋勇冲杀的大无畏精神，难道是“迷信和无知”所能解释的吗？不，这是基于对帝国主义者们的深刻仇恨。义和团捣毁和焚烧外国商品、铁路、电线，也是这种仇恨的一种素朴的

表现。十八世纪晚期，工业革命刚刚从英国开始的时候，初期工人运动曾表现为破坏机器的斗争，这是由于当时工人对自己的敌人认识不够，企图用砸碎机器和捣毁厂房来寻找解放的出路。义和团运动处于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始初阶段，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还不可能具有理性的认识。由于感受到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苦难，基于对帝国主义分子的深仇大恨，义和团号召居民捣毁和焚烧外国商品、铁路、电线，有什么可以非难的呢？

在阶级社会里，文化、文明都是有阶级性的。科学技术掌握在帝国主义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帝国主义在中国和其他各地修筑铁路，是“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十亿人民（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决不是象齐赫文斯基一伙所吹嘘的是什么“资助建设”，为中国人民“造福”。列宁早就义正词严地为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声张正义说：“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中国的战争》）干尽欺骗、掠夺和镇压之类坏事的新老沙皇，有什么资格在伟大的义和团面前哼一声呢？

中国人民有过两千多年反封建斗争的经验，但在十九世纪末，怎样开展反帝斗争则是一项新课题。革命人

民总是在斗争实践中摸索革命真理而不断前进的。“灭洋人、杀赃官”曾经是义和团基本群众的战斗目标。当“瓜分”危机迫于眉睫的时候，参加“灭洋”斗争的成分复杂起来，不仅有农民、手工业者、士兵、游民，而且有部分地主士绅、爱国官吏。不同阶层的人们，除“灭洋”的共同目标外，还带有各自不同的要求，从而在义和团的口号、传单中留下了痕迹。经过斗争实践的检验，广大群众抛弃了其中“扶清”的口号而迅速转为“扫清”，正说明通过革命的洗礼，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义和团运动虽然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联合进攻下失败了。但是它粉碎了帝国主义的瓜分阴谋，动摇了清朝的统治基础，表现了中国人民英勇的反抗精神，传播了爱国思想，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开辟了道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人士的斗志，在义和团运动的反抗风暴中受到鼓舞，他们撰写的《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曾经指出：“夫义和团岂不知寡不可敌众，弱不可敌强哉，然出于爱国之心，忍无可忍，故悍然冒万死，出万难，以一敌八，冀国民之有排外自立之一日耳。而谓二三民贼假神托鬼所能使之履险如夷，置生死于不顾乎？”齐赫文斯基之流对义和团的种种诽谤，不仅是早已遭到列宁痛斥，甚至是早已受到中国民主革命派批判过的一些霉烂的货色。

必须指出，齐赫文斯基之流如此卖力地诽谤义和团运动，是别有用心的。苏修叛徒集团疯狂地争夺世界霸权，因此象害怕瘟疫一样害怕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而

对于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更是恨之入骨。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及其吹捧者们，攻击义和团运动，既是为了阻挠当前亚、非、拉地区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也是直接影射和污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承了“排外”的历史“特点”；“不加区别地骂倒一切外国事物，维护反动的旧传统”，等等。齐赫文斯基之流胡说什么义和团之所以成为中国史学家“喜爱的研究对象”，是因为它符合宣传“‘造反有理’、‘天下大乱’的要求”^①。这就彻底暴露了苏修攻击义和团的险恶的政治用心，无非是反对第三世界广大人民起来造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反。但是，中国有一句形容蠢人的俗语：“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齐赫文斯基之流对义和团运动的种种诽谤，只能是更加丑恶地显示出一副叛徒的无耻嘴脸而已。

^① 见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苏联《真理报》，A·麦利克谢托夫：《关于中国史的新书》。